

目 录

克拉列维察造船厂通讯

1926年8月26日萨格勒布《有组织的工人》杂志第35期 1

斯梅德雷沃帕兰卡通讯

1927年3月17日萨格勒布《有组织的工人》杂志第12期 3

报刊是工人运动的宣传手段

1927年5月写于萨格勒布 6

地方党委员会关于1927年1月至1928年2月 期间的工作报告(补充报告)

1928年2月写于萨格勒布 8

萨格勒布党组织代表关于在萨格勒布成立地方 委员会和省书记处的报告

1934年8月2日于维也纳 16

萨格勒布组织的现状 19

省委员会 20

红色援救会 20

社会文学家之间的纷争 22

农民问题 25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

1935年1月《镰刀与锤子》杂志第1期 29

反对封锁西班牙

1936年10月《无产者》杂志第8期35

寄往塞尔维亚的信

1936年11月2日于维也纳4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走在新的征途上

1937年4月写于巴黎,载于1937年《无产者》杂志第5期51

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

1937年11月下半月写于维也纳,载于1937年《无产者》杂志第9期55

致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威廉·皮克的信

1937年8月28日于巴黎61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信

1938年4月1日于国内65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8年7月于巴黎70

为青年一代而斗争

1940年9月上半月写于萨格勒布79

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40年10月19日于萨格勒布84

现领导从1937年底至今的工作99

我们党的组织状况 110

青年问题 112

妇女问题 112

我们在西班牙的志愿军 113

组织方面的错误 114

培训干部 115

对于干部的态度和领导制度 117

南斯拉夫共产党五月会议

摘自 1941 年 3、4、5 月《无产者》杂志第 3、4、5 期…………… 120

造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悲剧的原因…………… 121

党与最近的事态…………… 123

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

1941 年 8 月 10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

《公报》第 1 期…………… 130

共产党和到底谁是占领者的盟友

1942 年 3—4 月《无产者》杂志第 14—15 期…………… 133

人民解放斗争和我们党的组织问题

1942 年 3—4 月《无产者》杂志第 14—15 期…………… 143

干部的培养…………… 150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意义和隐藏的卖国贼

1942 年《军事政治评论》杂志…………… 152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创建

1942 年 9—11 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人民

游击队《公报》…………… 157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报告

1942 年 11 月 26 日于比哈奇…………… 160

在反法西斯妇女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42 年 12 月 5 日于波斯尼亚-彼特罗瓦茨…………… 165

在南斯拉夫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2 年 12 月 27 日于比哈奇…………… 170

从人民解放斗争角度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1942 年 12 月《无产者》杂志第 16 期…………… 175

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是首要任务

1942年12月《无产者》杂志 185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1943年11月29日于亚伊策 190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对我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联邦国家的建立的意义

1944年3月《新南斯拉夫》杂志 205

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也不给别人

庆祝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成立两周年时的讲话

(1944年9月12日于维斯) 213

在自由贝尔格莱德的第一次讲话

(1944年10月27日) 221

胜利的节日

1945年5月9日在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上的讲话 226

在塞尔维亚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5年5月12日于贝尔格莱德 230

在解放后的萨格勒布的第一次讲话

(1945年5月21日) 238

人民阵线的任务

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5年8月8日《战斗报》) 250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45年8月8日于贝尔格莱德 259

同舒巴希奇达成的协议 261

| | |
|--|-----|
| 我的莫斯科之行 | 261 |
| 其他盟国的援助 | 263 |
| 联合政府的建立 | 264 |
| 赔偿 | 266 |
| 外交政策 | 267 |
| 结束语 | 270 |
| 解放斗争和新南斯拉夫革命改造的特点是什么? | |
| 194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 | 272 |
|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
| 1948年7月21日于贝尔格莱德 | 282 |
| 一、南斯拉夫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 | 283 |
| 二、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 | 296 |
| 三、南共被禁止以及国家保卫法颁布后最初几年里 在非法条件下的发展和工作 | 305 |
| 四、1934年到1941年间国内的政治状况 | 322 |
| 五、1937—1941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工作和路线 | 330 |
| 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解放斗争时期 | 336 |
| 七、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建立新国家——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方面所做的工作 | 407 |
| 我国社会变革的意义和科学在建设中的作用 | |
| 1948年11月11日在塞尔维亚科学院的讲话 | 439 |
| 论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 |
| 1948年11月11日在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 448 |
|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人民青年联盟 合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
| 1948年12月15日于贝尔格莱德 | 459 |

| | |
|--|-----|
| 全体进步人类都应当了解我们为真理和正义 的胜利而斗争 | |
| 在塞尔维亚军事演习结束典礼上的讲话 | |
| (1949年10月4日《战斗报》) | 470 |
| 论经济企业的工人管理 | |
| 在人民议会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 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前发表的讲话 | |
| (1950年6月26日) | 483 |
| 同英国国会代表团成员的谈话 | |
| 1951年5月24日于贝尔格莱德 | 507 |
| 就美国结束对南斯拉夫援助发表的声明 | |
| 1951年8月11日《战斗报》 | 509 |

克拉列维察造船厂通讯^①

1926年8月26日萨格勒布

《有组织的工人》杂志第35期

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工人们把它叫做扒皮厂，这更名副其实）工人的状况糟透了。情况糟得就象俗话说的，连鬼神都要为之嚎啕大哭了。

当工人们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是熟练工人。从他们的外表来看，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叫化子，因为他们穿的不是衣服，而是裹着破布烂絮。

当人们看到这些贫穷的、衣衫褴褛的工人，再看看那些在饭馆、酒吧间和其他娱乐场所“辛劳”了一番之后来到克拉列维察休息的穿着富丽豪华的资产阶级先生们，那么这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工人们从早干到黑，受尽折磨，走起路来象乞丐，脸色苍白，骨瘦如柴，而资本家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穿罗着缎，由于肥胖又汗

① 《克拉列维察造船厂通讯》一文发表时没有署名，约瑟普·布罗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把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工人的困苦状况公诸于众。约瑟普·布罗兹本人从1925年9月起也在那里工作，他用这个办法使公众支持即将举行的罢工。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证实布罗兹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书的脚注，除译者注外，都是根据塞文原著的编者注选译的。——译者）

流浹背。他们肥头大耳，满脸红光。这就是那种神圣的社会制度！

为了把工人们榨干，资方实行计时工资制，付酬的情况如下：每小时熟练工人 3—6.5 第纳尔，工头 6.5—7.2 第纳尔，学徒 1.2—2.7 第纳尔。

这一工资还加上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奖金，因此中等工资每小时就是七至八第纳尔。

到目前为止，只要工厂赚钱，就发给奖金，每个工人可得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二百四十的奖金，但是一旦活少了，厂方就决定取消这种奖金。这样工人每天所得就减少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由于没有集体的合同，工会组织又软弱无力，因此厂方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工人们还不能按时领取工资，最近已拖欠了五个星期之久，这种情况已有五年了。政府付给工人的钱仍存放在苏沙克的银行里，因为这家银行是该厂的大股东。

工人们向四面八方，向社会福利部和劳动局发电报和写信，提出抗议，但是得不到任何方面的回答。

劳动局的视察员到厂里来，可是工人们到第二天才知道。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是说，工人们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他们不能期望得到任何方面的帮助。

应该把零散的队伍团结起来，应该同心同德地捍卫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译自《铁托全集》1977年塞文版第1卷）

斯梅德雷沃帕兰卡通讯^①

1927年3月17日萨格勒布

《有组织的工人》杂志第12期

最近有大批工人来到帕兰卡，想在“亚塞尼察”车厢厂找活干。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有组织的工人》杂志曾多次告诉同志们不要到帕兰卡来，因为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只会使在这个人间地狱干活的工人的艰难处境更加恶化。

看来，工人们不相信这种告诫，却上了厂方各种广告的当。这个厂在贝尔格莱德的厂方人员一年到头定期地在报上做广告，招聘五十多名工人。为了把情况说得更动听，他们还说什么要五十名装配工。这些装配工实际上干什么活呢？他们清理废铁，修理车厢。他们的工资每小时三个到五个半第纳尔，而厂方曾答应给他们每小时八个半到十个第纳尔。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厂方人员接收工人并把他们送到帕兰卡，而当他们抵达那儿时，厂方却跟他们说不能马上接收他们，还得等一、两天。工人们现在已经在工厂门前等了好几天了，直到他们最后明白是受骗上当了。他们为了回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卖

^① 布罗兹的文章发表时署名为布拉多普 (Brador)，就是从他的名字布罗兹 (Broz) 中取 B 字母，rador 是工人通讯员的缩写。弗·德迪耶尔证实本文作者是布罗兹。

掉最后一件衬衣。必须让每一个工人明白,厂方这样做的目的是:工厂门前的失业工人越多,他就越能以此来吓唬已就业的工人,让他们服服贴贴地当奴隶。

这里一天劳动达十六个小时,每小时的工资从两个半第纳尔到五个第纳尔,而拿到五个第纳尔者甚少。

卫生条件差得实在可怕。今冬有半数的工人得了肺炎。由于风太大和严寒,厂方允许工人烧各种旧车厢的油污木板,这些木板发出滚滚浓烟,臭气熏天,使工人感到窒息。在这儿我要提醒一句,火不是生在什么炉子里,而是生在各种铁筐里。

罚款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只要哪个工头或经理愿意,就可以无缘无故地罚工人的款。罚款从二十到五十第纳尔不等。谁也不知道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地区里的劳动视察部门对我们提出的一切申诉和意见都置若罔闻。

一个月前曾选举过工人代表。厂方想方设法,制造种种障碍,企图破坏选举。根据工人保护法,我们有权这样做,在我们坚决要求下,厂方最后同意了,但要求厂方有一名职员在场。选举前一两天,所有工头和车间主任都得到命令,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要他们不去投票。这些人中,特别突出的是臭名昭著的木工工头萨瓦。更有意思的事情是,选举时,经理作为厂方职员亲自同赫赫有名的工头萨瓦一起出席。

选举是中午在大门前举行的,而这两个人睁大眼睛死盯着每一个工人,以此威胁他们。这两个人得逞了,因为三百名工人中只有九十四人投了票。经理当然非常高兴,他宣布不承认代表。

同志们,任何东西都无济于事,只能相信自己。谁也不关心我们,所有社会福利机构都只是名存实亡。同志们,大家都应参加自

己的战斗的工会组织，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那贪婪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布拉多普

1927年3月13日于帕兰卡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1卷）

报刊是工人运动的宣传手段^①

1927年5月写于萨格勒布

报刊无疑是工人运动中教育和培训无产者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报刊为我们保存并传播了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和战士们思想和经验。

当前，报刊是我们反对反动的资本家阶级的最必需的和最强大的武器。

因此，无怪乎资产阶级今天首先最疯狂地迫害和惩处工人报刊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

资产阶级一方面这样对待这些人，另一方面又制订最严厉的法令来对付报刊。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法令会危及资产阶级的报刊，因为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这些法令是要扼杀工人报刊，这些报刊由于物质力量不足而处境艰难。

资产阶级如此害怕工人报刊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工人报刊

① 1975年夏天，铁托同志在审稿时批注道，本文是1927年5月写的，同年7月14日萨格勒布警察缴获了此文手稿。当警察逮捕布罗兹时，文稿没有藏好。后来只找到警察的转抄稿（用薄纸打字的）。文章后面有如下字样：“蒂利亚克保证传抄的准确性，1927年7月14日于萨格勒布。”

揭露了资本家阶级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城乡的劳动人民通过工人报刊及时了解到资产阶级政策的种种图谋。工人报刊是一个哨兵，他警惕地注视着并每时每刻提醒无产阶级要当心。

一方面，资本家的报刊拥有一切手段，每天可以大张大张地出版，大量地散布种种谎言。

另一方面，工人报刊只能靠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和牺牲而存在下去。

如果我们看到报刊工作是多么重要，那么，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努力使工人报刊深入到每一个农村，深入到有劳动人民的每一个地方。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1卷）

地方党委员会关于 1927年1月至1928年2月期间的 工作报告(补充报告)^①

1928年2月写于萨格勒布

1927年的一月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地方党组织的状况和工作的报告，考虑到有利的客观条件，会议提出了下列主要任务：

1. 通过在工厂内建立新的支部和把工会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的办法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地方党组织。

2. 从组织上加强支部和区委员会。

① 这个报告是约瑟普·布罗兹为萨格勒布地方党组织第八次代表会议(1928年2月25至26日在萨格勒布潘托夫查克召开)写的，因为他同“左派分子”发生了公开冲突，这些分子在南斯拉夫共青联盟代表的支持下在南共地方委员会中占多数。从1927年底起，布罗兹在同南共内两派的斗争中，同“左派分子”的冲突越来越大。1928年初，在讨论向第八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时，冲突达到了顶点。用铁托的话说，地方委员会分裂成两个部分——左派分子有三名委员，占多数，反对派别活动的委员有两名，占少数。组织书记布罗兹得到委员安德烈·赫布朗的支持，拒绝接受政治书记杜尚·裕尔科维奇提出的地方委员会多数派的工作报告，因为这个报告没有向党员说明南共地方组织工作中产生缺点的原因，也没有对今后制止宗派活动提出保证。所以布罗兹决定向代表会议提出专门的补充报告。

3. 建立区委员会对支部和地方委员会对区委员会的真正和全面的领导。

4. 用集中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以及对政治事件作出反映的办法使地方组织在政治上积极行动起来。

5. 在支部中有步骤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6. 从组织上加强党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作，并使之积极行动起来。

7. 建立地方党校，并视可能再建立工会学校，以培养当地的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

存在着完成上述任务的有利客观条件，因为既有总的政治形势，又有无产阶级本身的状况。最近一年来总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是：1) 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險日益增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巴尔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險也日益增加；^① 2) 对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剥削加重（参阅三中全会决议）^②。

除了这种总的政治形势外，国内形势的特点是：1) 实行全面的

① 关于总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爆发反苏战争的危險性日益加剧这样一种估计，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估计和立场，也是欧洲相当大一部分报刊的估计。它们认为，在当时中国发生事件（发生革命起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进攻）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会准备进攻苏联，所以某些共产党提出了这方面的任务。

② 南共三中全会（以四月全会而著称）于1927年4月26日或2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上分析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和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近六个月来党的全部活动。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独立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大会的所有文件草案几乎都已草拟出来了）和某些职业工会（服装、皮革加工和五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些代表大会于同年5月和6月召开。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在南共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布罗兹向党提出的政治局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

法西斯专政；2) 宫廷集团和塞尔维亚大资产阶级加强了民族压迫，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克罗地亚农民党、联邦党人^①等）的首领执行的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政策也助长了这种压迫；3) 城乡劳动人民贫困化，失业增加，这是国内经济危机普遍加深所致（参阅三中全会决议）。

这种经济和政治总危机使萨格勒布的工人阶级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经济危机和萨格勒布的一些企业中实行合理化的改革使成千上万的工人遭到解雇。^②在工人遭到企业解雇的同时，资本家却让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生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断地把工资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以下。在萨格勒布的工厂中，例如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妇女的工资通常为每小时二至四个第纳尔，而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工人1小时连一个第纳尔也得不到（如“兹沃诺”内衣厂等）^③。除了压低工资之外，在工厂中，特别是在手工业作坊

① 在这时期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表现在，它虽然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并不去争取改变政治制度，而只是一味想掌权。为此目的，在1927年秋又成立了农民民主同盟。在议会发生行刺（1928年6月）后，农民民主同盟的态度才发生变化。

联邦党人是指黑山联邦党成员，该党成立于1922年，联邦党的缔造者利用人们对南斯拉夫王国中央集权主义制度和黑山在王国中的地位的不满情绪。在解决黑山民族问题方面，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主张是，在黑山能作为政治单位的条件下建立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后来党分裂了，在两次大战期间，在政治上没有起多大作用的联邦党人执行同意大利合作的政策，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同占领者合作，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站在人民解放运动一边。

③ 随着二十年代后半期经济危机的加深，失业问题也日益尖锐，因为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建筑业和皮革工业的工人大批地被解雇，建筑业和皮革工业中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工人失业。金属加工工业中也有工人失业。在萨格勒布有一千二百名左右失业的五金工人。1928年的头几个月，有一万一千名工人通过萨格勒布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

中，八小时工作日以及工人选代表的权利，愈来愈遭到破坏。资本家对工人地位发动这种攻势，是由于工人阶级组织得不好以及当局对工人的每一个战斗行动都施加压力（禁止企业中的工会活动，禁止集会，镇压游行，禁止出售我们的报刊等）。

尽管如此，工人们的战斗意志并未减弱，相反更加高昂。“力量”厂、铁路修配厂等的自发性罢工，特别是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大选结果等都表明了这种战斗意志的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上次地方代表会议作出的正确而明确的指示，地方委员会进行了如下的工作：

1. 召开了若干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④；会上提出了一般的政治问题，而萨格勒布组织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却提得不多。

2. 召开了一些区的代表会议，一般都没有地方代表会议的代表参加，特别是没有得到地方代表会议的指示。^⑤

⑤ 从二十年代起，南斯拉夫妇女劳动力的问题日益尖锐，因为女工的人数不断增加，而男工人数下降。1921—1926年期间，男工人数下降了百分之八，而女工人数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七（据工人报刊报道，一百四十万工人中就有三十万名女工）。有近三千名女工在萨格勒布的工厂中作工。但是，女工的工资一般要少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一般认为男子是真正的“养家人”。据布罗盖说，这种状况在扎夫特尼察42号的“兹沃诺”袜子和针织厂与莱恩·巴乌埃尔的内衣厂里亦然。1959年4月铁托在同《今日妇女》杂志编辑谈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我是南斯拉夫皮革工人联合会书记，走访了许多成衣车间，我曾对男工和女工之间工资差距感到吃惊。譬如说在都加霍萨的纺织厂，记得女工每小时只有两个第纳尔，还不到男工工资的一半。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妇女不但是不平等的，而且受到残酷剥削。”

④ 后来证实，在两次代表会议之间（1927年1月和1928年2月）萨格勒布党积极分子开了五、六次会。

⑤ 据南共地方委员会政治书记杜尚·格尔科维奇报告，在萨格勒布有四个区委员会，召开了十二次南共区代表会议，每个区开三次。

3. 召开了一些由地方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区委书记的例行会议和非例行会议。

4. 在竞选运动中一些地委委员做了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撰写和提出召开选举会议的申请等），但是作为领导机关的地委没有领导选举工作。

5. 地方组织的人数稍有增加，但是不能归功于地委，也不是地委领导的结果^①。

6. 在俄国革命十周年时组织去农村的郊游活动。^②一些地委委员为此做了准备工作。

除了指出地方委员会进行的上述工作外，还必须指出，上次地方代表会议向地方委员会提出的任务并未尽力地去完成。

1. 地委作为领导机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地委会议最初还定期举行，但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地委内部没有分工。

2. 对于地方组织在工矿企业抓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地委没有向区委和支部下达过必要的指示，也不去监督它们的工作。地方组织在一些地方确有增加，那是一些支部和一些同志的功绩。

3. 地方委员会既不领导区委员会的工作，也不向区委员会下达必要的指示来领导支部的全部工作。

① 1927年1月南共萨格勒布组织有七十名党员，在南共第八次代表会议前有一百三十四名党员（分散在十六个企业的支部、四个工场支部和两个街道小组）和八十九名同情南共的人士（分散在十九个小组中）。

② 指1927年11月6日组织的去萨格勒布郊区马鲁凯舍韦茨（圣希蒙）农村的郊游，约有一百名萨格勒布大学生和工人参加。米兰·杜尔曼谈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在回到萨格勒布时，学生们举着红旗，高呼共产主义口号。11月7日，在萨格勒布街头出现南共中央和南共青联盟的传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俄国革命万岁！南斯拉夫各民族工农万岁！”

4. 地方委员会同区委员会以及支部之间的联系很不够，因此支部和区委员会经常不得不在批准新党员、对某些问题的批示、批准工作计划等问题上等待好长时间；地方委员会对上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尚未批示。

5. 地委委员对各区和各支部的日常领导和同它们的个人联系很少、很不够。

6. 地方委员会不领导、不监督收党费的工作，也不那么关心地下刊物的正常分发和经济核算，甚至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也不关心，尽管这些东西早已及时发到地委，可是它们两个月来一直不动，至今不发给各支部。

7. 地委这种无所事事的情况，使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工会中的党组织的工作等实际工作遭受损失。

8. 尽管上届地方代表会议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并不断向地方组织的全体成员提出希望和要求，但地方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打算开办党校。

9. 地委委员对统一行动并不关心，而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处境和要求，这些行动是必要的（集会、秘密会议、郊游、游行、纪念活动等）。

10. 地方委员会既不在工人阶级的其他外围组织里，也不在红色援教会里开展工作，它既不关心红色损教会的工作，也不对其进行帮助。

11. 一些支部和区委员会为失业者开展行动而积极提出倡议，但地委毫无反应。这样，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大部分落空了。

12. 地委对妇女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关心，甚至还扼杀她们的主动性。

13. 地委不关心农村工作, 尽管有些支部和地区已建立了关系; 它不向它们输送干部, 尽管它们有此要求。

14. 地委同青年几乎没有联系, 也没有帮助青年开展工作。

15. 地委全部工作中最典型的一个事实是, 它没有把上次地委代表会议的决议印发给各支部。它在自己的工作中甚至不按这一决议的精神行事, 而且无视这一决议, 从未制订过自己的工作计划。

16. 除了地委这种无所事事的作风外,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 一些支部, 甚至一些区委工作都做得不错, 有成绩, 这证明萨格勒布组织确实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精神办事的。

17. 在贯彻共产国际、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南共历次中央全会有关清除党内派别活动、宗派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正确决议时, 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以及向这次地方代表会议提出的报告都证明, 他们要么不理解, 要么不愿意执行这些决议。^① 只有在群众中开展实际工作, 把我党同广大产业工人群众联系起来并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 才能清除派别活动、宗派活动和小集团活动。

① 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各派“和解”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17—22日在维也纳举行。有四十七名代表和来宾及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讨论了国内革命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和党的作用, 是以对派别进行尖锐的批评和对南共上层的派别斗争进行谴责为标志的。1926年9月和1927年4月、11月和12月举行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南共中央全会对派别冲突进行了讨论。南共内部派别斗争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中心的注意。1922—1926年, 共产国际为了解决南共内的危机, 对南共内的派别之争也多次干预, 并作出了决议。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1922年12月), 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决议(1924年7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1925年4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6年4月)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为此，下届地方委员会的一项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执行上届地方代表会议的正确决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巡视员的意见，^①而不象大多数地方委员会那样把自己的错误和过失的责任推诿给“上级领导机关”。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1卷）

^① 指共产国际的巡视员“米尔科维奇”（“Mirković”或“Milković”，其名不详），此人于1927年春被派来南斯拉夫，其任务是调查南共状况，特别是派别之争的状况。“米尔科维奇”在好几个月里（5月至8月）走访了国内的许多党组织，参加了支部、地方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的会议，还同许多南共党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在会上他总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党这样软弱，必须做什么事情来推动工作向前发展？”大约在1927年11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南共状况的详细报告。报告找不到了，但根据在狱中的党员写的《南共历史》，可以了解到报告的一些内容。“米尔科维奇”谈到他参加的南共萨格勒布区的一个会议时说，萨格勒布组织是基于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同产业工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当中建立了支部，在工会中也有党组织，工人参加各种组织。南共中央四中全会（1927年11月27—12月1日）了解到“米尔科维奇”的报告。

萨格勒布党组织代表关于在 萨格勒布成立地方委员会和 省书记处^①的报告

1934年8月2日于维也纳

我出狱后，同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进行了接触，他们通知我关于让我出国的决定，并要我出国前在内地安心等待。^②我想时间不会太久，但还是可以让我了解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到了克罗地亚的山区，在那里我确实看到了人们想象不到的最可怕的贫困境况。我回到了萨格勒布，住在萨莫博尔（因为受到侦缉，我不能呆在萨格勒布），从那儿我可以经常去城里治病，尽可能了解党的组织情

① 约瑟普·布罗兹在维也纳写了这份报告。南共中央在其1934年7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补选布罗兹为政治局委员，几天后捎信到萨格勒布，让他尽早离开国内。布罗兹是在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企图政变并杀害了多尔夫斯总理之时（1934年7月25日）偷越南奥边界的。这是最早一份以铁托这一新的化名签署的文件，这一化名后来成了他的名字的一个组成部分。

② 布罗兹于1934年3月12日从弗兰科潘城堡（奥古林监狱）释放出狱。在此之前他由马里博尔监狱被押运来此服五个月徒刑（1927年10月28日判决）。出狱后他在卡蒂察·克利奇科—波斯特尔陪同下抵萨格勒布市的波德戈尔斯卡大街23号。估计他在这里最见南共中央在克罗地亚的代表斯尔贾奇·普里茨或者南共中央主要技术人员阿尔弗雷特·贝尔格曼，他是从他们那里得知南共中央的上述决定的。

况和党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党的组织根本不存在,只有
一些小组,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系。一些同志要我相信党在“工作”,
这主要是些知识分子,而工人同志们则要我相信,党什么也不
做。——这些同志大部分服过刑,他们希望参加工作,可是有些人
对他们说,由于保密的原因,他们得呆在组织外,因为他们可能在
无意之中使组织受到破坏(实际上组织并不存在)。当然通常这都
是同这些同志有交道的那些知识分子说的。我接触的第三类“党
员”是我的老相识,我曾同他们一起在党内工作过,那时他们也是
积极分子,但是现在他们用对领导机关和一些知识分子统统批评
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他们说知识分子占据着领导机关,
占据在中央的知识分子使国内的领导机关遭到了破坏。因此他们
声称他们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因为他们会立即被暴露。在中
央或中央周围有内奸的想法,总会多多少少地传到所有同志那里,
也会传到领导机构成员那里。这种想法我一开始也有,后来我从
一位同志那儿了解到,中央里而也有一些可以充分信赖的工人^①。
可是我同坐过牢的几位同志一道作出决定,要对这些流言进行调
查,调查这些人是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各种破坏的。最后我才看到,
有些破坏纯属偶然,可还是有人说这些破坏是上面造成的,而我们
萨格勒布有几起破坏直到今天还弄不清楚。

有些同志认为,当然应该建立组织和领导机关,但要等到弄清
楚破坏不是上面造成的或等到内奸被揭露出来以后才同中央建立

^① 当时在维也纳的南共中央委员或南共临时领导成员中,铁托早就认识了老的
党工作者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和布拉戈耶·帕罗维奇,他是铁托在萨格勒布
时的亲密合作者。除他们之外,在南共中央里还有:米兰·戈尔基奇、卡尔·
胡多马尔和伊万·格尔热蒂奇。

联系。不过我还是使他们明白了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是在国内搞秘密活动，那么要从外面来破坏组织是不大可能的。

五一节刚过，我们五位同志（都是从监狱出来的）立即开会，商量了各种问题：建立组织和领导机关、造成萨格勒布那种混乱状况的原因、红色援救会①、文学争论、先前的组织的弱点和造成某种状况（1932—33年出现了两派：T派和B派）②的原因等问题。

在这次会上选出了临时地委，地委的任务是立即同一些小组取得联系和整顿地方组织。会上还谈到了必须成立临时政治书记处，并立即指定两名同志来抓这项工作，不久又有一位同志抓这项工作。③从监狱出来的同志中，有两名进入地委，另有两名进入政治书记处。

在那次会上我告诉同志们，中央是由工人组成的，同志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我还谈到了必须揭穿种种流言蜚语和阻止破坏党

① 在南共即合法的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的领导下，红色援救会于1923年12月成立，是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的一个部分（支部）。

② 编辑部无法确定T和B的大写字母是指什么。大家都十分清楚，从1932年至1934年初这段时期里南共萨格勒布组织包括几个相互联系不多的或者根本没有联系的小组。最初的一批小组中，有以南共中央委员久罗·茨维伊奇为核心的小组，该小组是在1931年春他从监狱出来后成立的。这一小组最有名的成员是：帕夫莱·格雷戈里奇博士和兹沃尼米尔·特卡莱茨博士，他们于1932年4月30日在萨格勒布被捕。由于兹沃尼米尔·特卡莱茨博士被捕前一直同维也纳的久罗·茨维伊奇保持定期的通信联系，因此大写字母T很可能指的是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小组的领导人是帕瓦奥·布雷耶尔，他是最坚决反对南共中央的一个，因此可以认为大写字母B是指他。

③ 当时南共萨格勒布临时地方委员会由约瑟普·波耶、马托·苏德塔和安顿·鲁塞克组成。进入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省委政治书记处的有弗拉尼奥·克拉利和德拉古廷·佩特罗维奇，稍后有德拉古廷·马鲁希奇和达尼洛·拉乌舍维奇。那时，布罗兹实际上是省委员会的领导人。当时还成立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地委、南共地委的技术服务机关和红色援救会的领导机关。

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威信的行为，因为如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威信，如果下面也来破坏这一最高领导机关的威信，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健全的和强有力的党组织。同志们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报告和对中央的看法，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因为直到那时为止由于受到种种流言蜚语的影响，他们是不了解情况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例如，同志们批评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太笼统，因为它不很了解国内的情况，也不考虑有些事情能否办到。总之，它不了解国内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即使有人从中央回到国内，他听到的汇报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听到的是那些自己不工作的、通常是知识分子的人谈的情况。此外，有人还批评中央支持其在国内的特派员^①，以此来否定党的下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他们认为，中央应该发出一切指示，至于党的工作，则通过国内现有的领导机关来做。谈到后一种情况时，应该注意到，表面上看好象中央确实是同一大批人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同知识分子有联系，因为不时发生这种情况，个别这种“党代表”被调到“上面”，即领导机关之后就根本不听地方领导机关的意见了。

萨格勒布组织的现状

同各种自发的小组建立联系的工作进展得非常好。一个月以前，党组织共有十九个支部，而十四天前又发现了这样一个自发的

^① 指中央经常从国外派到国内各地区去的南共领导人。在国内这些地区由于党员大批被捕，并表现出软弱和存在其他问题，南共的活动停止了，南共中央同党员失去了联系。这些领导人被称为南共中央代表或特派员。这些人一般不参加党的省领导机构，而是同南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并独立开展活动。

组织,并与之取得了联系。该组织有五十名成员,而且还是在真正的工人中心特雷什涅夫卡。当然,必须非常谨慎行事,必须对这些组织进行改组,因为同志们估计到,这样有可能混进一些奸细,因为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小组会是警察搞的。铁路修配厂最不好办,因为老党员不愿干,他们托词上面肇事生非,不过我们已经能够越过这些人深入到这个工场中去了,并将建立一个由新人组成的组织。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有能力的,能在各下级机关里担负职务的同志;要造就一批年轻的新同志,尚需一定时间。

省 委 员 会

大约在六月中时候,省委员会才真正开始起到作用。省委遇到的困难相当大,主要是缺乏资金,因为舍此就无法开展省书记处的工作,因为经常要到各地去,不是恢复党组织和建立联系,就是整顿现有的党组织。党中央拨给省书记处二千第纳尔的预算,同志们认为太少了,无法使这样的一个领导机关正常工作(我也持此看法)。应该设法弄到所需之款项。省委的任务是够重的了,因为它长期不存在,因此要恢复联系和建立新组织是相当艰难的。

红 色 援 救 会

红色援救会在国内根本不成其为组织。它仅限于募捐,而且范围很小。因此,我们的人募捐到的钱为数甚少,根本无法满足现

在由于牺牲在反动派手下的人数很多而产生的极大需要。国内有一些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摧残，丧失工作能力，尤其是刚从狱中出来时。而红色援救会却无法帮助他们——同样，也帮不了那些正在狱中的人们。应该注意到，现在狱中的伙食糟透了。同志们认为，应该从国外拨出一笔固定的金额，供国内的红色援救会用。这里指的是1929年的预算。^①工人中间相当普遍地认为，现在得到的预算还是那么多，不比以前多，但全花在流亡在国外的人身上了。

由于不能对一些同志或其家属进行救济，这不仅在他们中间，而且在他们周围，在工人队伍中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们认为，党不关心他们，党不再关心那些遭反动派残害的人了。当然，这种想法肯定会有，以前也有过。但是这一次很强烈，我认为，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是说，如果没有钱，就通过下级机关向党员作解释，在不泄密的情况下，说清楚中央红色援救会有多少资金。

现在萨格勒布在组织红色援救会方面开始做得多些，再过一些时候，他们或许能成立一个红色援救会组织，至少在萨格勒布可组织一个，问题是要善于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市民中间有大量同情者愿意为红色援救会捐款。

我认为，应该发一个如何在全国建立红色援救会组织的指示，并做到早在1928年就已开始做的事，^②因为只有这样，红色援救会才能完成其任务，如果它将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话。

^① 指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以及该运动在全世界的领导机构从国际无产者援救会组织执行委员会得到的财政资金。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得到的金额不详，但其领导机构每年向国际无产者援救会组织提出财政计划，即预算，是众所周知的。

社会文学家之间的纷争

当我还在狱中时,我就从同志们那里得到一个任务:出狱后同我们的文学家取得联系,并向他们表示狱中的同志们对我国社会文学中所发生的摩擦的不满。此外,还要我为消除这些摩擦进行调解。我把我的意图向上述会议作了报告,以后地方委员会通知我,要我以地方组织的名义去见这些文学家。首先,我找了1号报的编辑(米兰·杜尔曼,《文学家》杂志编辑),将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地方组织的要求告诉了他,要他们立即停止那种非同志式的论战,即不要再在报刊上发表那种会刺激团结在2号报^③(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今日》杂志编辑)周围的那批人的文章(我得提一下,1号报的编辑杜尔曼本人也要求我到克尔莱扎那里进行调解,要他不要在自己办的杂志上进行攻击),即使克尔莱扎还继续在其杂志上进行论战。后来,我找了克尔莱扎,他向我详细说明了相互进行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他一点也没错,因为这是1号报的那些人写的一篇题为《克尔莱扎往何处去》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是海尔曼(博

^③ 铁托指的是贯彻1928年1月召开的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当时克罗地亚在开展援救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的活动中取得了最大的成绩。通过募捐使援救会的工作合法化的意见被采纳了。为此目的,1928年成立了援救反动派受害者的组织,办了《人权保卫报》,即争取人权和公民权的独立报,作为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的机关报。在阿乌古斯特·策萨雷茨主持下这个报于1928年8月1日出版。

^④ 布罗兹所指的1号报,是《文学家》杂志,从第4期(1931年)到最后一期(1939年)都是由米兰·杜尔曼主编的。2号报是指由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和米兰·博格达诺维奇主编的《今日》杂志,该杂志于1934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开始发行。

戈米尔)写的,他是设在诺维萨德市的省报的工作人员。他说,在1号报工作的“那些人”都是些文学上的文盲,是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他们今天站在我们这边,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跑到反动派那边去。他认为,这种人没有资格把他称作叛徒或堕落分子,因为他在我们的社会文坛上已工作了十六年以上。使他不满意的是,那些人现在卑鄙地引用了他在1919年写的一些诗句,并装作好象是他现在写的。他认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才干的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只会在我国文坛中制造混乱。我把在狱中的和在外面的同志们的意见告诉了他,并要求他不要再写,不要再回击1号报了,尽管1号报最近还写过一篇向克尔莱扎通牒的文章。我认为,那篇文章的结尾写得不妥,因为那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克尔莱扎仍是罪魁祸首。他对我说,他不会再写这类东西了,只写历史,谈谈怎么引起论战的,但是不加评论。但是,我要求他在党对此作出决定之前不要发表它。以后,我又召集了1号报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是:杜(尔曼)、伊(韦科维奇)和尤(恩)。我把克尔莱扎的意见以及他感到恼火的原因转告给他们。^①他们承认这是ABC(博戈米尔·海尔曼)的文章,这篇《克尔莱扎往何处去》的文章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欠妥之处,它是由党认可后发表的。在我问及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是否服从党对此事作出的决定时,他们回答说,他们会服从的,他们愿意同克尔莱扎合作,他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包括克尔莱扎在内的编辑委员会,并由他本人从对方挑选他愿意要的人,党的代表也可以进编委会。不久前我又同克

^① 上述缩写,除米兰·杜尔曼外,很可能指的是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博士和米罗斯拉夫·尤恩博士,因为他俩同杜尔曼一起都是《文学家》杂志的积极工作者,同时他们又都是阿乌古斯特·策萨雷茨领导的宣传委员会的委员。

尔莱扎进行了一次会晤，他事先答应我，要请他的两三位同事来，但我去了之后，发现只有他一人，经过几小时的谈话，扯来扯去，毫无结果。他不赞成同那些人合作，不相信他们会服从党的决定等等。当我告诉他，我还是要弄个明白，他究竟想什么，是不是非要什么精神上的满足。他间接地使我明白，如果1号报能刊登一个声明，他就无异议。我让双方的人都知道，党对任何继续在我们文坛上这样胡作非为的人都将进行最严厉的处置，不管他是什么人。对此并未作出具体决定，没有宣布什么决定，因为如果作出决定并公布的话，那么就非得明确对违反决定的人到底采取什么制裁措施。我曾反对通过决定，因为我认为，应由中央作出决定，因为已经宣布过一个决定，宣布了，却又违背了，结果不了了之（我主要是指斯蒂利诺维奇被捕事），这样反而使党的威望受到损害，显得极不严肃。^①

我认为，中央应该对此事尽早以决议形式作出决断，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文学上的扯皮现象，因为这对运动极为不利，而且会被敌人利用，特别是教权派，他们已在小册子上和他们的报纸上报道此事了。我们在地方上的同情者和同志们都很气愤，他们极想知道，为什么这场争吵恰巧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所有敌对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

^① 指1933年年底前南共中央给萨格勒布地委的指示，要《文化》杂志编辑部公开同意“一批社会文学的读者”的“信”，信中谴责了对克尔莱扎的攻击。该指示是由戈尔基奇在萨格勒布草拟的，并向南共地委书记作了口头传达，后来未向地委会议传达，因此地委领导无法把它看成是正式指示。

农 民 问 题

在扎戈列时，我就看到，克罗地亚农民党作为一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了。农民放任自流，为了反对当局，参加了“十字军”^①。神父在农民中间大力进行宣传，慷慨激昂如同民族勇士。农民和农村青年去参加“十字军”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爱神父，信仰神父，而是出于反抗的精神，对强迫他们参加“南鹰”^②不满，是出于对贝尔格莱德的仇恨。因为要是既不加入“十字军”也不加入“南鹰”的话，他成了反国家分子。当局更喜欢农民受神父的影响，而不喜欢农民受克罗地亚革命者^③或共产党人的影响。我在同这些参加“十字军”的农民和青年谈话时发现，他们并不是出于信念去参加的。到处都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打仗？俄国会很快开战来救我们吗？”等等。穷得真吓人，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是无法想象和相信的。除了扎戈列，我还去过别洛瓦尔郊区，在那里我同前农民党的一些头头有过接触。他们以前就认识我。他们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地下的革命农民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活动，从年轻的左派分子中培养新的领导。很典型的一点是，他们承认，只有靠

① “十字军”是亚历山大国王实行独裁后头一年成立的宗教组织，作为天主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② 作者指南斯拉夫王国的“雄鹰”组织，于1919年在卢布尔雅那成立的体育组织，名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鹰会”，一年以后改名为“南斯拉夫鹰会”。

③ 指克罗地亚民族革命运动，南共中央对此曾有所忽视，从1932年底起对它比较注意了，中央当时通过决议，在克罗地亚成立克罗地亚民族革命者小组这样一个运动，以使南共在农村开展工作。

我们共产党人的帮助,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认为,这个克罗地亚革命党必须同共产党联系,共同进行斗争,反对塞尔维亚帝国主义,即反对贝尔格莱德的帝国主义。他们要我把他们的这种愿望转达给决策机关。他们要求我党能让他们派两三个领导人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商定所有问题。他们不承认《进化报》^①的所谓领导人,但是他们认为,对马切克博士应该十分讲究策略,就是说,要使他摆脱特鲁姆比奇的影响,因为他在农民当中仍有威望,如果把他搞掉,那看来就象分裂了。但是,如果他继续推行和好政策,那连他也要被搞掉。别洛瓦尔的莱博维奇博士等人和萨格勒布的伊韦科维奇·姆拉登博士等左派人士对马切克也抱这种看法。别洛瓦尔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对我说,我们的确该过问一下,并有所作为,不要再停留在许愿上,因为我曾答应,我一定会使他们的观点被我党采纳,他们不久便会得到有关此事的通知。我当时这样做,还不知道党已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后来,我遇到了从此地派回国内工作的那个农民[德拉加·贝德科]。^②当然,我立即把他派到别洛瓦尔,让他同那些人联系。

在萨格勒布,我同伊韦科维奇·姆拉登会晤,主要是为了同他谈谈成立农民总委员会的事。他同意此事,并答应我,他将同一些他认为是优秀革命者的人谈谈此事。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他同一些人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些地下组织,但不知道该怎么利用

① 《进化报》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个派系的报纸,1931—1934年期间和1936年在萨格勒布出版,它反映右派的思想政治观点。这派最出名的人是安东·特鲁姆比奇博士。

② 指德拉加·贝德科·塞利亚克,南共中央负责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民族革命运动工作的指导员。

一些合法的形式来团结农民。他们认为，搞合法形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应把重点放在成立地下组织上。至于成立总委员会，他们说，要稍等一等，因为目前马切克正在萨格勒布的医院里，还要同他商量。也就是说，他们不直接告诉他，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只是试探他对此事有何看法。此外，伊韦科维奇博士告我，凯日曼攻击马切克，并把马切克博士同科瓦切维奇相提并论，这是不妥当的，出于策略考虑，现在应立即停止这样做。

我同那位塞利亚克经常保持联系，给他指点，并给他弄到一些资料：《克罗地亚之路》^①、我们在萨格勒布复印的一些东西以及对农村工作的指示等等。最后我让他同省委取得了联系。

我同出版3号报^②的K也见了面。当我同他谈起《克罗地亚之路》时，他表示希望我能给他订该报，因为他想使他的杂志尽可能同《克罗地亚之路》的文章协调一致，当然是尽量如此。他从未看过《克罗地亚之路》。3号报颇受农民欢迎，但是却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教权派和法西斯分子的极大不安。教权派简直是暴跳如雷，他们称它为伪装得不巧妙的共产党杂志，是莫斯科雇佣的人

① 《克罗地亚之路》是克罗地亚民族革命者的喉舌，该报由南共中央出版，实际编辑是南共中央委员布卡·茨维伊奇（虽然公开出面负责此事的是卢德维格·凯日曼博士，他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第一把手）。该报第一期于1932年上半年在柏林出版。1933年起在巴黎出版，1934至1935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后来又是在维也纳出版。从1935年初起《克罗地亚之路》由南共中央指导员伊万·克尔恩德利担任编辑。

② 铁托可能是指《评论报》。该报是关于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刊物，1934年4月25日创刊。1934年底以前，它起了动员南斯拉夫进步舆论声援反法西斯的共和西班牙的作用。鉴于该报由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创办，估计是他参加了作者所说的会晤。文中提到的一个缩写字母是他的许多化名之一的第一个字母。据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博士回忆，上述会晤是在1934年夏，布罗兹去维也纳进行的。

用它来欺骗不明真相的农民。

大家都觉得,《克罗地亚之路》印数太少了,特别是应把发表纲领^①的那几期送到国内来。

这就是目前的大体情况,一些小问题以后面谈。萨格勒布的同志们让我当他们的代表,向同志们汇报他们的希望和萨格勒布的大概情况。萨格勒布的同志们希望,所有这些问题能尽早得到解决,如果是他们做错了或者不了解情况,那么就对他们说清楚,因为他们还希望中央同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即同党员之间的关系要明朗和融洽,因为只有这样,在一经消除误会之后,党组织才能得到加强和发展。我希望能尽早了解一些此地以外的事,并尽量协助同志们解决那些问题。我的唯一愿望是我做有益于党的事。

铁 托

1934年8月2日于维也纳

(译自《铁托全集》1977年塞文版第2卷)

^① 纲领是以“救民族革命运动各党派和人士书”为题,由“克罗地亚民族革命运动临时领导小组”签署,发表于《克罗地亚之路》报1933年1月—2月号。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①

1935年1月《镰刀与锤子》杂志第1期

1934年12月举行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下列各省的代表：黑山、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的代表虽然受到了邀请，但是没有到会。伏伊伏丁那和波斯尼亚没有选派代表参加会议。代表会议的议程有：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工会问题。

从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②以来已经有六年了。我党经受了严

① 在1934年12月29日南共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时，决定下一期的南共中央机关报《无产者》、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委员会机关报《镰刀与锤子》刊登有关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章。当时铁托的任务是为《镰刀与锤子》撰写关于南共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章。文章发表于该刊1935年1月号，题为《关于南共第四次代表会议》。

② 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1月上半月（6日至16日）在泽年兰德（德累斯顿附近）德共中央党校中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达尔马提亚和伏伊伏丁那的二十五名代表，他们是在1928年9、10月间在省党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出席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以及青年共产国际两名代表。

重的考验，但是血腥的军事法西斯独裁未能消灭我们党，相反，我们党在经受了种种打击和恐怖统治之后，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了。我们不在这里罗列代表会议的一些决定，因为它们会全部发表在小册子上，或者发表在中央的其他报刊上，我们只扼要地指出一些促使我们一定要召开这一代表会议的情况。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1928年南斯拉夫国内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举行的。我们党在这同一时期里，在清算了右的和“左”的两个派别之后，开始得到巩固，但在一月六日军事法西斯专政的前夕又毫无准备。它不但没有致力于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同城乡劳动群众联系，相反却几乎在整个1928年和1929年中为反对右派，特别是反对以10号^①为首的右派（该派不断攻击公开信^②，甚至还企图制造党内的分裂）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显示了党的团结。决定和指示是根据公开信的精神通过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决定并未得到正确的贯彻。党的新领导经常犯一些严重的错误。最后，这个领导^③在久罗·贾科维奇^④遭到杀害之后背离了公开信的路线，陷入了小集团的斗争。

一月六日实行军事法西斯独裁时，我们党面临一个抉择：要么

① 10号或1号是南共右派首领西马·马尔科维奇博士在党内通信中用的代号。

② 1928年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于4月上半月在莫斯科南共领导干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一起举行的会议上被通过。公开信分析了南共成立以后的活动，特别是指出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遭到严厉谴责，指出派别活动损害南共的活力，带有消灭南共的明显趋势，尤其是上层的派别斗争开始蔓延到全党。

③ 指四大上选出的南共中央政治局。

④ 久罗·贾科维奇是南共中央组织书记，1929年4月20日于萨格勒布被捕。

投入战斗，要么投降，正象 1921 年通过取缔共产党的“通告”时所作的那样，也正象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在宣布独裁时所作的那样。现在所不同的是，1921 年时党有广大群众为后盾，但是那时还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更不用说领导的无能了；而在一月六日专政到来之时，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核心，即有了党的积极分子，可是没有群众为后盾。不言而喻，在我们党只有积极分子而没有群众参加斗争的情况下，血腥的军事法西斯独裁对我党进行沉重的打击是不难的。在这场斗争中，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迄今还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党的积极分子表明，无论是死还是长期而艰苦的监禁都不能使他们离开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我们党六年来不断地受到迫害、恐怖统治，受国家法庭及其他法庭的严酷审讯，但它仍保存了自己。国内的党员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设在国外的、在那里进行小集团斗争的党领导机关的任何帮助。共产国际不得不进行干预，它用任命新的临时领导的办法结束了这种小集团斗争。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1932 年年中由共产国际任命）的领导下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才使我党能有今天的力量。领导机关为同国内党员恢复中断了的关系，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新的领导机关由于党员不信任，处境相当困难，这种不信任是由于前几届领导机关的工作不力或无所作为，由于许多内奸和间谍混进党内和各种领导机关，由于各种制造混乱者和取消主义分子加剧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但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和系统的工作，这一切障碍终于得到了克服。在最近的两年中，几乎在各省都重建了党的组织。当然，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经常发生这种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来的

组织由于形形色色的内奸而被发现和遭到破坏。许多事往往要从头做起。在下达和贯彻各种指示时也遇到相当多的障碍，因为一些党员，经常是整个组织都产生各种偏向和错误的观点，例如，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的问题以及组织问题。在组织问题上一些同志主张应先建立坚强的组织，然后再去采取行动，而不是在争取工农日常需要的斗争过程中通过进行各种活动把组织建立起来并使其布尔什维克化。

建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现实意义

举行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而且是在国内举行这次会议，表明血腥的军事法西斯政权完全是枉费心机。党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了。从8月至10月在有党组织的各省举行了地方代表会议、区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而且没有一个会议遭到破坏，也证明了这一点。它还证明了可以防止奸细混进党内，通过改进秘密工作可以防止这种破坏。这次代表会议的举行，对党今后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具有巨大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之所以更大，是因为我们是在国际政治形势极端恶化的时候，是在战争危险与日俱增的时候召开这个会议的。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燃起一场世界性的熊熊烈火，并且再次使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遭到屠杀。马赛谋杀案可能导致的冲突并未消除，只不过是推迟而已，因为由马赛谋杀案而引起的火苗固然熄灭了，但是死灰里仍埋藏着许多火星，而且无法肯定的是，今后火星会不会熄灭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压倒各种和平主义者的善意。唯一能真正阻止上述现象的力量是苏维埃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除了外部的纠葛之外，在马赛谋杀案发生后，南斯拉夫

的对内政策也出现了变化。当局关心的是通过让步和争取在野党领袖的办法来支持摇摇欲坠的军事法西斯专政，并将这些在野党绑在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战车上。这一企图迄今并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不能排除当局搞点“民主化”。这取决于争取在野党的工作能取得多大的成功。不管它在这方面能否成功，它已经事先用建立各法西斯集团之间团结的办法作了准备，这些集团采取一个比现在更强硬的方针作为团结的广泛基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共产党都必须作好准备。不管当局在争取在野党方面是否成功，党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在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在野党；不管会不会有更强硬的方针，党必须准备经受一切打击。

由于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切，可以看出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面临着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刻不容缓的。代表会议对所有这些问题都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并作出了决议。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会上一致通过了所有决议，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党的团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前经常要就谁进入领导机构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次代表会议上却一致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会这么一致呢？这是由于我们党变得健康了；这是由于它今天摔掉了各种宗派主义的包袱，能够全力以赴地提高党员的水平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这是由于每一个中央委员以及支部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建立一个能领导劳动群众为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

除了上述问题外，代表会议还审议了建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问题，通过了为建立这些党而立即着手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的决定。这些党将成为南共的一部分。代表会议的这一

历史性决定无疑不仅将对今后克罗地亚党和斯洛文尼亚党，而且也将对整个南斯拉夫党的发展、壮大和布尔什维克化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报纸还将谈到这个决定。

目前我们在党的工作的一切方面都有明确的指示；当前全体党员的责任是要了解这些指示，领会这些指示并加以执行。当前党已奠定了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但是还应该为建立一个能经受住任何打击，并在关键时刻能转入反攻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而不断努力，要使党在争取工农切身利益的斗争中进行战斗演习。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2卷）

反对封锁西班牙

1936年10月《无产者》杂志第8期

法国政府于8月2日提出了关于缔结对西班牙国内事态采取中立立场的条约的建议。它是出于维护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这一建议的。但是今天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来自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的军用物资——飞机、步枪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给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实在已为时太晚了。起初，飞机的力量对比是1.5比1，政府军占优势，而今天是1比12，叛军占了优势。但是，今天所有的法西斯国家还在抵制这一协议。拖延了近十四天，为的是赢得时间，把尽可能多的武器送给佛朗哥将军。他们提出了种种条件。我们将指出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蛮横行径。德国答复说，如果马德里将所扣留的“运输”机归还给它，那么它就同意。它称之为运输机的不是什么其他东西，而是8月10日被迫在奥萨德降落的飞机。这一“运输”机备有最新式的钢炮和机关枪。在搜查时表明，机枪子弹带少了好几颗子弹，因为这些子弹被发射出去了。在马德里的许多外国人，包括美国公使都见到了这架最新式的容克斯式飞机。德国和意大利都提出了这样的和类似的条件，最后它们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可是实际上仍在通过葡萄牙法西斯分子向西班牙运送

武器。

所谓采取中立立场的条约阻碍了合法政府取得武器等物的权利。其次，这一条约直接损害了法国和英国的利益。这就是斯特罗博尔季上议员所说的：“上帝要哪个人死，就最先叫那个人丧失理智。”美国《新共和》周报写道：“在这件事上，正象在过去的侵略活动中一样，法西斯分子利用反对他们的人对战争恐怖进行投机，意大利和德国步步紧逼，不断向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挑衅，它们公然威胁或暗示这些国家，任何真正反对它们侵略的行为都可能引起战争。当这种策略得逞时，法西斯分子就达到了其既定的目的，这又便于它们进一步转入进攻。当它们以这种方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时，他们就作好了战争的准备！西班牙人民英勇地反抗着奴役他们的人；除此之外，西班牙目前还是全世界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之间进行较量的战场。

法国和英国在目前的事件中仍象在阿比西尼亚、莱茵地区等发生事件时那样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搞绥靖。以为德、意法西斯会停止对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积极援助的想法确实是天真前。好象这里只是事关对佛朗哥及其匪帮的同情心而已，而不是把整个西班牙、西属摩洛哥和岛屿变成未来的战场似的！西班牙政府说得对：“如果法西斯分子在瓜达拉马山取胜，那么将来的前线就会在比利牛斯山，就会在法国的边境上。”

看来法国领导人已经忘记了半疯不疯的威廉二世在1905年和1911年挑起了摩洛哥的战争，而且两次挑衅都产生了赫赫的战果。特别是1911年的第二次挑衅，当时德皇派遣其军舰“黑豹号”去阿加遣尔。当时几乎导致了一场战争，但是由于英国的斡旋，这场挑衅才这样结束：法国把刚果的约十万平方英里的大片土地让给

了德国。当时，正是威廉的“黑豹号”窜入摩洛哥之时，而今却是希特勒的“豹号”、“德国号”和德国与意大利的许多其他军舰正游弋在摩洛哥和西班牙沿海，等待着自己的猎获物。

现在，当莱昂·勃鲁姆亲自出马在巴黎工人面前维护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时候，有一代表巴黎三十万五金工人的代表团去他那里，要求政府取消其禁止运送和转送武器给西班牙合法政府的禁令，德、意法西斯分子一定已经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了。法国政府总理拒不接受民主派报纸每天报道的东西，而且拒不接受这样一些报纸报道的东西，它们对法国政府毫无好感，但看到如不解除对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援助的禁令，法国民主就要濒临危险。全世界的报刊每天都登载着对西班牙法西斯匪徒提供援助的消息。《新闻纪事报》9月1日报道，意大利和德国不断运送军事物资去葡萄牙，后者又把这些物资转送给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泰晤士报》也报道了叛军不断从国外得到大量武器和飞机。伦敦报纸9月3日报道，三十架由训练有素的驾驶员驾驶的轰炸机飞到了阿尔赫西拉斯。《每日先驱报》9月1日报道，载有给叛军的二十八架轰炸机的德国轮船已驶入加的斯等。汉堡的一位工人写道：“每天这儿都有转送给西班牙叛军的武器。近几日装上船的有下列弹药：

- 1) 从柏林：一百箱，每箱二千五百发，重十七吨。
- 2) 从柏林：一百五十万发，每箱重四十六吨。
- 3) 从格林贝尔：五十万发，每箱重十五吨半。
- 4) 从汉诺威：八十箱，每箱二千发，重十二吨。
- 5) 从莫根布尔：二百万发，每箱重六十吨。
- 6) 从沃尔芬比特尔：五十万发，每箱重十五吨半。

这是装在“大山号”轮船上的。此外，几天前装上船的还有给西班牙叛军的二十八架重型轰炸机。

这只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小部分，但足以驳斥勃鲁姆所说的中立条约签署国没有送武器给西班牙的叛军的断言了。

我们已经说过，除了法国的利益受威胁外，这方西的国际惯例也受到了破坏。请看南斯拉夫政府对人家邀请他参加这一不干涉条约是如何答复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博士昨日邀知此间的法国使节，王国政府愿意参加这一宣言，并禁止向西班牙输出和转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但条件是这不开创先例，也不承担今后会使公认的原则——一个合法政府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可以如自己的要求得到他国政府的援助——发生问题的义务。”很明显，斯托亚迪诺维奇作这样的答复并不是因为他是同情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的，恰恰相反。但是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深感担忧，不管愿不愿意，都不得不承认这一条约破坏了国际法，因为不给一个合法政府以援助，而叛军却在同时得到一些国家的充分的援助。

英雄的西班牙人民装备简陋，他们为反对西班牙的罪恶的卖国贼面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卖国贼用领土作交易，来换取希特勒的“容克斯式飞机”和墨索里尼的“卡宾枪”。但是正在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有权期望比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声援更多一些的东西。

国联的所有成员国有责任不对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保持中立，而是给予最充分的援助。这是法西斯分子图谋分裂各国人民。这是事关最可怕的战争危险。但是这一危险不是用一个中立条约可以避免的，因为中立条约意味着对西班牙合法政府进行封锁，而是

要使西班牙人民从世界民主力量方面，从所有拥护和平的人士方面得到充分和迅速的军事技术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

（译自《铁托全集》1977年塞文版第3卷）

寄往塞尔维亚的信

1936年11月2日于维也纳^①

亲爱的朋友：

你报告有关情况的长信收到了。谢谢你！希望你经常给我写信，以便我能够作出直接和具体的答复，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谈话、行动等之前。这里我要向你提醒一点，你曾答应定期向我汇报和写信。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1)我完全同意人民自由阵线的成员同反对党联盟代表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不应该使其破裂^②。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使反对党联盟成为人民自由阵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没有反对党联盟也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人民自由阵线，尽管反对党联盟还是动摇不定、不够可靠和缺乏斗争性。要尽可能影响民主党、农民党和激进党

^① 寄往塞尔维亚的信是对马斯列沙(斯雷滕)信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这封信是他1936年10月底从贝尔格莱德寄给在维也纳的南共中央的)。信中谈到了建立人民自由阵线的思想和策略，谈到了自由人民阵线和反对党联盟的关系、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实现工会团结思想的方法以及铁托“根据我党新文件的精神作了指示”的一些问题。新文件是指南共中央关于党的策略和工作的决议，首先是指1937年1月发表的题为《反对战争危险，打退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所有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参加南斯拉夫的人民斗争阵线！》的宣言(1937年2月《无产者》杂志第2期)，这些文件是根据1936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斯拉夫领导干都会议作出的决议制定的。这封信是用假名“彼得”写的。

内的更年轻的和更有斗争性的成员和拥护者，要他们不要搞分裂，而是在自己的党内为建立人民自由阵线而努力^②。当然，是在人民阵线的具体行动上同意同这些成员的合作，但他们的活动不应把矛头对着联合的反对党的领导人。这样，大批支持他们的人自下而上的压力（同时又在自上而下地进行谈判）会促使动摇不定的领导去建立人民自由阵线的群众运动，在这方面工人应该支持一切愿为取得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实现人民的和睦而斗争的民主力量。确实，在人民自由阵线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没有作出针对反对

② 当时称之为人民自由阵线的，是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特殊称呼和政治形式。这个名称是南共中央和各省委会之间在1935年来往信件中提出的，并在1935年6月南共中央斯普里特全会上得到正式批准。后来在人民自由阵线的纲领、公告中，特别是在1935年和1936年成功地召开的集会上，以及在为建立人民自由阵线的会议和谈判中，都使用了这个名称。

反对党联盟是1935年议会选举时出现的反对派，它推出的统一候选人是弗拉特科·马切克。参加反对党联盟的有：农民民主党（克罗地亚农民党和独立民主党）、民主党、农民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这个联盟是在没有任何纲领的基础情况下建立的协调的、技术上配合很好的选举合作形式。选举结束后这个联盟很快就解散了。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后来同激进党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党结合起来，组成新的居统治地位的执政党（南斯拉夫激进党），而斯洛文尼亚党在这个联盟中本来就合作得很少。只有民主党和农民党之间有某种密切的关系。这两个党于1936年参加激进党，加入其总委员会。后来反对党联盟这个名称表示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从那时起反对党联盟同斯洛文尼亚民主党经常对话，并于1937年10月8日达成协议，不久以后又建立了人民民主联盟。但这个联盟在1938年12月8日议会竞选纲领中也表现得无所作为。在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达成协议以后反对党联盟就再也不存在了。

③ 民主党是1919年年中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激进党成立的。民主党由各种党派组成，这经常成为不团结和影响缩小的原因。

激进党是塞尔维亚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81年），自认为是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的继承者。该党于1918年以后转向大塞尔维亚一元主义和中心主义，到1929年以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过显著的作用。

党联盟的决议,而是要求加强在基层即在群众中的活动^①。最重要的是:(1)在基层,在具体的行动中(提出议会选举的共同名单,举行集会,开代表会议采取“农民联谊会”^②之类的行动,为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而进行的工人罢工和工人运动等)建立联合有所有民主分子的人民自由阵线;(2)向联合的反对党的领导和联合的反对党中的一些党派提出采取具体的行动的建议,并在这些行动中争取他们的合作。

应该向那些今天甚至不惜分裂旧党派而赞成建立人民自由阵线的小组讲清楚,这是破坏民主力量的,是反对人民自由阵线——这样,就会使联合的反对党得以阻挠人民运动阵线的建立。

2)在南斯拉夫工人运动方面,我觉得,仍在继续机械地和不正确地处理事情。本来就没有设想使南斯拉夫工人运动成为左派分子的党,而是成为所有工人(左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那些无党派人士)的党。团结的基础是一个能为所有无产阶级分子接受的纲领。所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组织和个人都在这个纲领下面结起来。这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在政治行动上团结的形式。(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不应该注重名称,而应该注重内容)因此,这不是把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与左派溶合为一个严密的政党,而是根据大家共同的东西和能使大家统一步调的东西建立全体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组织形式。

① 人民自由阵线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36年9月底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与会的有十六名代表。

② “农民联谊会”是一个合作组织,是根据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倡议而成立的,其宗旨是改善农民的状况。第一个合作社称为“农民联谊会”于1936年初在库皮纳茨成立。该组织在1936年底有成员十多万人。

建立南斯拉夫工人运动的倡议并不是提早了。提出这种倡议是想阻止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幌子下建立社会民主党，因为这样的党会妨碍全体工人阶级联合成一个政治行动的整体。这一点未能做到，不能归咎于过早提出，而是相反，错就错在局限于谈判，然后，一方面中止了进一步的谈判，另一方面又对倡议委员会的成立和开展活动持一种普遍的消极态度，而现有的委员会也不积极活动。其中有许多委员会完全消极起来。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不仅中断了，而且也不懂得利用那些在5月5日选举时和选举以后所取得的阵地和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所建立的联系。

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不是什么凌驾于党之上的党！它不只是要联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人党，而且还要多些，它要成为团结那些今天还是无党派的广大工人群众的党。它应该是一个作为政治因素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制订一个能为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所接受的行动纲领，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和信仰哪种宗教。这里没有什么复杂得使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事情是简单明瞭的。只需要了解一下这样的工人党的当前任务和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使工人阶级在这个党的范围内以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和人民自由阵线的平等一员出现。再者，它应该成为人民自由阵线的核心。名称在这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寻求这样的一个以不损害和忽视任何一部分工人的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为依据的解决办法和纲领，如果这些利益并不违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话。工人的左翼曾提出过这样的纲领，但是在谈判时在民族问题上却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左派分子坚持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原则。这是每个民族应该得到

的权利,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分离都是非要不可的和恰当的。在今天的形势下,[左派分子]反对分裂南斯拉夫,因为被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收买的人希望这种分裂,无疑,这种分裂将导致战争,这是所有法西斯战争煽动者所希望的。左派分子主张在现存边界内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它反对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任何压迫和霸权。

因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人民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表明,他们愿意在国家共同体内建立其相互关系。同时,伏伊伏丁那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有权就他们在国家共同体内的关系表示态度。左派分子的观点是同农民民主联盟的观点一致的。①

如果“联合劳动人民”要成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一致行动的形式,即成为工人阶级在人民自由阵线内行动一致和在人民自由阵线中代表工人阶级主张的一个组织,并使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其纲领和原则范围内有行动自由,那么左派分子就应该加快同上层的谈判,同时具体落实工人阶级的行动,这些行动将促进各个地方、企业、工场和工人机构在行动上的一致。②

3)你没有把左派分子就工会的一致行动问题向右派分子提出的讨论提纲给我寄来,这是很可惜的事③。

① 农民民主联盟是包括克罗地亚农民党和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的斯洛文尼亚民主党的政治集团。成立于1927年11月。

② “联合劳动人民”作为工人运动两翼共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之一,于1936年夏天在关于成立人民自由阵线的谈判过程中产生的。

③ 指1936年10月2日同社会党人一起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工会一致行动的《共同宣言草案》(讨论提纲)。这份草案没有送到马斯列沙手中。

左派在实现(工会的)行动一致方面的基本任务是确保工会和工人机构中的无产阶级民主。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把持着受它控制的工会,只要个别工会领导人惩罚和排斥一些不听话的人和整个组织或用纪律措施来对付主张团结的最优秀和最忠诚的战士,那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民主。

左派分子的立场,正如你所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方面还应该进行谈判,但同时还应该加强工会和企业的一致行动,采取具体的行动。^①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会中的左派分子应该是最优秀的和最守纪律的合作者。应该制止任何宗派主义的逃避行为和咒骂右派官员等;左派分子应该成为守规矩的成员(在交会费、开展行动、履行义务、同工会报刊、文化机构等进行合作方面),并且用建设性的和积极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是真诚努力的和坚贞不渝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应该是相互过得去的和同志式的。如果今天不能在所有的问题上完全达成协议,那么就应该就具体和直接的迫切任务,如工人委员会的选举、区机关的选举、救济失业者、工人代表的选举、争取最低工资、反对反动派针对阶级工会运动制订的最低工资法法案等进行谈判。就这些问题提出同工人总会、“中立分子”、邮电工作者、铁路工人一致行动的具体建议,而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要提出同克罗地亚工会一致行动的具体建议,在斯洛文尼亚则提出同民族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一致行动的具体建议。

^① 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就工会一致行动问题进行谈判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谈工会问题,他们坚持其老调,工会已经一致行动,接受共产党的纲领会破坏他们的政治中立。同时他们还指责共产党人企图控制工会。共产党人拒绝这种“别有用心”的攻击,并作了答复。

4) 在我看来,在同各种无产阶级小组(哈拉米纳、迪瓦茨、科拉奇)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上,左派分子把主动权让给了日夫科,这是错误的。左派分子应该同这些小组进行接触并请它们共同参加谈判。同时,我还认为,使巴卢格季奇活跃起来会有益于一致行动,左派分子就是应该同巴卢格季奇进行认真的会谈①。

在为工会方面的行动一致而进行谈判的同时,应该通过同一些工会中心上层人物的谈判,在各个地方为建立现有工会组织之间的团结委员会而大力做工作。这会成为各地方工会组织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使大家为一些具体的任务面共同行动和战斗,这些任务是那个地方、县、地区等全体工人的共同任务。

在斯洛文尼亚具体地做到了这一点。那里的联合工会、民族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之间实现了纺织工人和矿工的一致行动。

这是实现行动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一致的最好途径,即具体行动和斗争的途径。

5) 对于成立最广泛的人民阵线的纲领草案②,我要提出一些重要和严肃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你们应该认真地谈一谈。

我认为这个纲领基本上是错误的。就其实质面言,它是霸权主义的,即又给一些塞尔维亚的党派提供了压迫克罗地亚人民和其他人民的机会。在纲领中对各族人民希望有民族自由和平等的

① 日沃英·巴卢格季奇是激进党中的有名望的政治家,经常在《政治报》上用笔名“XYZ”撰写社论发表反法西斯的论点,支持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行动,同当局的立场相反,他表示决心为建立各种工人党派的合作而作出贡献。

② 这个草案是左派共和党人在人民阵线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并由该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委员会修改的(委员会里有V·马斯列沙)。由于草案中有错误观点,特别是在民族关系方面(M·格罗尔坚持这种观点),所以铁托批评了这种观点。

权利的要求没有作明确和毫不含糊的阐述。这一纲领充满着霸权主义和大塞尔维亚“维多夫丹”宪法的精神。那个宪法认可了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并导致了1929年1月6日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军事法西斯专政^①。

我要逐点进行分析。

1) 要求回到1929年1月6日以前的状况和恢复宣布国家统一以后出现的各党派的自由。

不应该这样要求,而首先应该要求的是:

恢复充分的民主和归还人民被剥夺的自由。解散耶夫蒂切夫的议会,废除现行的独裁宪法和旧法律^②。保证各族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来表明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联邦国家)内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为此,必须恢复到1918年12月1日以前的状态。

2) 提出组成一个让尽量多的党派参加的政府的要求,这个政府将根据1920年的同一法律进行立宪议会的选举。

我认为应该强调如下要求:把政权交给由目前在议会外的在野党组成的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这一政府内也要有工人阶级象样的代表。这样的政府的任务是,按各省名单进行无记名和按比例投票选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以及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

① 维多夫丹宪法是1921年6月28日在立宪议会上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这部宪法是以集中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君主政体为基础的,因而具有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霸权主义的特征。该宪法由于1929年1月6日宣布独裁而废除。

② 指国王强加的、用自己的权力于1931年9月3日强行通过的南斯拉夫王国的宪法。这个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众议院和参议院,意味着废除专制独裁的制度,因为众议员选举法和参议员选举法明确表明,国家制度的变化只是从公开的独裁过渡到亚历山大国王的隐蔽的专制。

哥维那人可以成立自己的民族议会，这些议会能自主地满足其民族和地区对国家制度的要求。这里，是否要选出通常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将成为立宪议会或为成立新的立宪议会宣布大选，然后又成为通常的立法议会，这点并不重要。

根本的一点是，使各族人民有可能提出意见并表明他们希望建立有什么样内部制度的国家，并确保今后没有任何霸权和压迫……①

立宪议会的绝对权力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工具。

在纲领中提到的其他要求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要求应该渊源于两个基本的要求：各族人民的充分民主和平等。

纲领中漏掉了保护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德意志族、阿尔巴尼亚族）的要求。

鉴于你会对只作批评而感到不满足，所以下面就谈谈我对纲领的几点建议。

基本的原则应该是：

没有民族自由就没有民主（应该向反对党联盟贝尔格莱德分部再次说明这一点），同时，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民族自由（应该向萨格勒布再次说明这一点）。

广泛人民阵线的纲领草案要点是：

1) 恢复充分的民主和民族自决权。

这就是要废除宪法和已产生种种后果的反动法律；大赦政治犯和军事犯；恢复到1918年12月1日前的状态；民族主权。

① 原稿字迹不清，缺两行。根据对下文内容的分析，可以认为，后面一句话应是：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或者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南斯拉夫各民族充分的民主与平等。

鉴于农民民主同盟和反对党联盟坚持保存南斯拉夫国家和承认卡拉卓尔杰维奇王朝作为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省的新国家共同体的基础的立场，因此就要强调联邦的原则（强调要共和国，但不是要骑在它的头上）。

2) 要求成立人民自由阵线政府(或人民协商政府)，其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当然，工人阶级也要有代表)。

这一政府应该负有恢复人民自由(民主)以及宣布和进行自由选举的任务。这可能是立宪议会的选举。但是同样的政府可以宣布普通议会的选举，这一议会将把民主交还给各族人民，并宣布对拥护主权的立宪议会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各族人民将赢得时间，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并解除由于长时期的独裁和暴力所留下的恐怖心理。

3) 纲领草案完全忽略了当代民主最迫切的一个要求。这就是人民自由阵线表示拥护和平与反对战争煽动者的法西斯主义。承认苏联是各小国人民自由以及和平的最一贯的和强大的保护者。

人民自由阵线面向民主和国际和平。

4) 通过有利于工农的经济法、政治法。

完善工人保护法。

通过有利于农民的法律：保护中等劳动阶层(手工业、自由职业等)。

纲领必须清楚而明确地表示如下决心：尊重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即不仅尊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权利，而且也尊重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决定是否要保存其在联邦国家中的地区上自立的权利。

还应该强调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匈牙利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平等权利。

不言而喻，在人民自由阵线内部对如下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应该一致：

1) 联邦国家；

2) 多少联邦单位(我认为是七个)。^①

我认为，塞尔维亚的反对党联盟(以及人民阵线的一部分人)准备给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以自由，但把其他民族和其他省看成是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希望以崭新的巧妙办法来确保其对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伏伊伏丁那人民的统治和霸权。

这种解决民族问题和民主的办法是毫无成果的，并且成为受压迫的各族人民和省份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平等而重新进行斗争的根源。这些斗争将阻碍发展，而且也是对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新威胁的萌芽。

我不想写什么成套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应该从谈判和协商中产生^②。

就这些问题同朋友们交谈交谈，并请经常给我来信。

祝好！

彼 得

于维也纳

(译自《铁托全集》1977年塞文版第3卷)

① 写信人指的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

② 铁托暗指马斯列沙信中的观点，他在信中要求不要把对错误观点的意见仅仅局限于批评，而应该使“任何批评都有成套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建议”。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 联盟走在新的征途上^①

1937年4月写于巴黎，载于1937年

《无产者》杂志第5期

从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那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些决议，贯彻这些决议就要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能够团结和领导青年一代走上为面包、和平和自由以及更幸福愉快的生活而斗争的道路。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具有优良的传统。它作出了许许多多值得人们钦佩的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的榜样。从共产主义青年的队伍中产生了诸如兹拉特科·什纳伊戴尔、奥雷什基、米希奇、马尔加诺维奇、科卢姆博等许多最优秀的战士。^②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并没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它只是党的翻版：它没有联系广大的青年群众，它是在脱离这些群众的情况下进行了使青年群众感到钦佩的斗争的，但是青年群众并未参加这些斗争。因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只是一种脱离广大青

① 这篇文章是铁托在国内呆了三个月后写的。铁托在国内的任务，是调查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决议通过之后在改组中的一系列错误而在青年运动、特别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产生的问题。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的上述几位书记在南斯拉夫实行独裁后牺牲。

年群众而生活和斗争的青年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忽视了那些广大青年阶层所关心的问题。它不理解青年的日常需要。共青团员是些少年老成的人，凡不是百分之百革命的 and 高度政治化的事物，他们都采取藐视态度，这样，它就在自己和青年群众之间挖了一条鸿沟。

共青团员们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这些缺点呢？没有！今天，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举行了一年半以后，仍然可看到我们许多共青团员和整个组织有着宗派主义性质的缺点。不应该再有这种宗派主义的观点了，特别是在涉及到组织问题时更应如此。那种认为我们的联盟应该成为“把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和民主的青年团结在一起的联盟的核心”，认为它“应该成为集结在新的民族组织周围的联盟和运动的领袖”，认为联盟必须“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形象”，认为联盟“不应该只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青年联盟出现”，甚至认为联盟“应该继续以秘密的方法进行自己的工作”的看法，都是对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思想作宗派主义的歪曲。这就是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但不是根据某种模式来改组，而是根据各地和各省的条件逐步地进行。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光荣历史责成全体共青团员勇敢地踏上新的征途，踏上靠拢和加入到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中去的征途。我们团的任务是：1) 为发展和加强一切民主进步的文化组织而工作；2) 开展有益于一切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3) 用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民主、进步与和平的精神教育青年；4) 保护一切青年组织的合法性。

南斯拉夫的进步青年表现了很大的首创精神，并决心使南斯拉夫青年在全世界为和平、面包和自由而斗争的亿万青年大军中

占有应有的地位。但是这一青年运动在我们这里只涉及到一小部分青年，而且仅仅是城市青年，主要是大学生和一部分青年工人。农村青年根本没有参加。克罗地亚农民党在农村中尚无青年组织。佛朗哥分子和僧侣却钻到那里去了。应该接近这些青年并向他们伸出兄弟友爱之手。不要嘲笑他们的宗教感情，要向他们讲清楚，全体青年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为和平而斗争，因为战争灾难的主要负担落在年青一代身上。我们不要散布仇恨，我们要的是爱和兄弟情谊。我们不要战争和残杀，我们要和平、面包和自由。

在工作中，进步青年应该更多地关心民族文化、教育等问题。要更关心青年的需要，更多地关心青年生活的内容和多样性。从内容上丰富起来的青年生活可促使建立群众性的民族青年联盟，因为这对青年有吸引力。

青年就其本性而言喜欢发挥自己的干劲。青年富有斗争性。但是，只是有时候利用青年的这一特性，要他们参加某些政治性示威游行，那是错误的。这样做是需要的，但是也应该知道为娱乐活动和体育运动创造条件。争取和平的问题应该同人民的教育、青年的文艺演出和日常需要问题更多地结合起来。

如果条件尚未成熟，人为地把各种青年组织联合到民族联盟中去，不管在哪个省，都是有害的。最好是事先就各种青年问题开展合作。在诸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等地筹备和建立强大的民族联盟，对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建立强大的民族青年运动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停止南斯拉夫各地区青年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青年应该并且能够在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和南斯拉夫各族

人民的相互接近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将削弱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佛朗哥分子等)的影响,这些法西斯分子特别在青年中散布仇恨。这些法西斯组织为了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正干着有利于那些今天正在竭力挑起世界大战和正在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法西斯国家的勾当。

到底谁是南斯拉夫青年一代的共同敌人?这是一些利奥蒂奇的残兵,是那些得到希特勒资助,散布南斯拉夫的沙文主义(乔装打扮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和策划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中世纪奴役的恐怖主义的匪帮。他们是克罗地亚的佛朗哥分子,他们也为希特勒的思想所鼓舞,得到了罗马的资助,散布和煽起民族仇恨,为克罗地亚不共戴天的敌人意大利帝国主义效劳。这是些反动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企图从精神和肉体上奴役农村的青年一代,并且企图以此来教育他们,驱使他们去反对一切进步的和人道主义的事物。神父和教会借天主的名义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客观上在鼓动青年一代拥护战争,因为这些人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而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

青年一代不要战争,他们要和平、文化和自由。他们要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要可怕的战争和再一次的黑暗与沦亡。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3卷)

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

1937年11月下半月写于维也纳，
载于1937年《无产者》杂志第9期

“最近”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尚未满二十年——而战争又再次临近。

这种流行病的到来正在使所有社会力量行动起来。人们正在进行抉择——要么拥护战争，要么拥护和平，要么拥护法西斯主义，要么拥护民主。世界上这两大力量之间的搏斗越是激烈，那些尚无法决定站在哪一边的第三者就越是无力解脱。天主教组织的几十万名教徒就是属于这第三类。他们不可能参加战争和法西斯阵线，因为战争是违背他们的最根本的道德观念和物质利益的。他们不参加和平和民主的阵线，因为他们害怕什么“共产主义的幽灵”。两共产党人却是争取和平和人民自由的最坚定的战士。

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巨大的社会运动分隔开来呢？是什么东西妨碍他们共同捍卫和平和自由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共产主义组织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两基督教组织又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工人的运动，有一部分城乡贫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天主教组织主要的群众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城乡贫民和以天主教神职人员为首的这些阶层中的青年。因此，我们在一刻

也不忽视“教会大公们”的教阶和一定阶层的资本家、掠夺者的意义的同时,可以断言,天主教组织和共产主义组织的群众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并非大得无法使这两个运动进行合作。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一差别几乎与克罗地亚农民党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不相上下。

就世界观而言,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是无神论者。天主教徒就其哲学观来说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相信神和教义。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的确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既有阶级根源,又有历史和科学根源。

如果这样两位哲学家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猛兽,直向他俩扑来,企图将他们撕碎和吃掉,你们说,该怎么办呢?他们只有齐心协力。可是他们不但不共同防卫,不呼唤大家,呼唤左邻右舍和朋友来帮忙,反而在争吵,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臆想出(造出)上帝来。你们一定会说,快把哲学争论搁在一边,在为时未晚之前保全自己的性命吧!我们今天的状况也是如此。现在法西斯和战争的大敌已向我们扑来。这一危险把一切都推到次要地位。所以,共产党人向天主教徒伸出手来,以便共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危害人民大众,而不问是什么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德国法西斯主义认为天主教义过于自由,因而把它当作“叛逆者”而加以迫害。

当今,天主教运动正在提出抗议,反对人类这个主要敌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如果今天天主教组织和天主教运动能起来反对法西斯和战争,那么,客观上它们就成了进步的,而不是反动的运动。这是共产党人对待这些组织、运动和人民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决定性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接受和帮助这种抗议,把它纳

入抗击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普遍浪潮之中,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

你哪儿还能找到比俄国僧侣更反动的僧侣,他们赤裸裸地和直接地同沙皇的警察串通一气!在1905年俄国有一部分僧侣开始抗议沙皇的暴力和专横的时候,列宁曾写道:

“……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抓住他们关于自由的言论,要求他们坚决割断宗教和警察之间的任何联系。……”^①

列宁在谈到反对沙皇的独裁的斗争时写道:

“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②

对我们来说,今天一切为和平、自由和进步进行斗争的所有民主和爱好和平的运动的团结,要比这些运动的世界观更为重要。现在让我们把关于天堂的争论放在一边,同那些相信天堂的人一起来反对人间的地狱,因为地狱之火既殃及天主教徒,也殃及非天主教徒。正因为如此,为了便于他们参加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阵线,我们应该不作任何会损害其宗教感情的事。

9月27日的《斯洛文尼亚人报》的社论写道,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义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信仰上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一点,它说,在苏联,“……信神受到惩罚,宗教教育被禁止……”首先,说在苏联信神受到惩罚这一点并不属实。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信神和尊神,他决不会因此而掉一根头发。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个党纲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4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页。——译者

就强调,要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和信仰充分自由。^①列宁曾这样解释党纲的这一部分,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每人都有充分的信仰自由的权利。……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②

列宁在另一处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将有关其无神论的声明写进纲领和为什么甚至“不禁止”信神的战斗的和正直的无产者“加入我们的党”^③……

在苏联,政府只对那些利用教会和信仰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或向国际间谍组织卖身投靠的宗教团体和教会人员采取措施。

天主教政党的政策的实质在于,它们滥用宗教感情和信仰,把宗教和国家的问题及利益、把精神和政治的问题及利益混淆起来,力求在国内获得政治上的优势,确保其宗教的优势或垄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世纪教会与僧侣特权的残余。因此,天主教和教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就是信仰和政党之间的差别。

多数天主教徒并不赞成天主教政党的政策。有不少天主教的政治家是真心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战士,但在天主教政党里也象在其他资产阶级政党里一样,有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天主教政党里的法西斯分子手持武器和十字架,反对加利西亚、巴斯克和加

① 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于1903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在党纲第五条中主张良心无限自由。第十三条主张国家和教会分离。

② 弗·伊·列宁在其著作《给农村贫民》中宣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铁托从中引述了社会党人对待宗教的立场。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页。——译者

泰罗尼亚的天主教群众和组织。因此，“笼统”反对天主教是根本错误的，把天主教同天主教政党的政策相提并论，将它称之为“僧侣法西斯主义”，更是错误的。应予停止！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运动、每一个组织以及每一个天主教首领的具体表现及其对战争和法西斯的态度，对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运动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和作出评价。

我们这里有一部分天主教报刊（《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哨兵》、《星期日》等）为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喝彩，吹捧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的叫嚣，以致连信仰和教会的教诲全都忘了。这些报刊的这种政策也助长了法西斯搞战备和法西斯恐怖。因此，我们反对这一政策，我们应当反对这一政策。

但是，我们要问：难道只有我们反对吗？难道“十字架”组织、“启蒙协会”和其他群众性的天主教会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天主教徒赞成这种政策吗？不。他们会赞成摩洛哥的阿拉伯穆斯林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杀害西班牙的农民天主教徒吗？他们会同意把教堂和寺庙变成法西斯营垒和弹药库吗？难道他们愿意使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人民的自由和自治道到血腥镇压和剥夺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徒愿意使他们的祖国受到墨索里尼、希特勒或匈牙利压迫者的铁蹄的蹂躏吗？不，正象他们不愿让大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掠夺和压迫他们那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把广大天主教徒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哨兵》等所写的东西相提并论就是根本错误的了。

天主教群众正在奋起反对法西斯和战争。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伸出手去，并帮助他们转到同全人类的共同敌人进行共同斗争的道路上来。

在不应忘记我们之间分歧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和寻找使我们同他们之间接近的东西。首先使我们接近的是争取天天要吃的面包的共同斗争，争取和平和自由、反对战争和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争取克罗地亚人民和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平等和自由的共同斗争，反对“一月六日”法西斯集团（他们不仅压迫和囚禁共产党人，而且也压迫和囚禁天主教领导人和封闭其组织）的共同斗争，争取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共同斗争。

面对战争和法西斯的黑暗势力的危险，我们为了共同捍卫和平和全人类的幸福而伸出手来。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3卷）

致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威廉·皮克的信^①

1937年8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们已经四个星期没有从索梅尔[米兰·戈尔基奇]和弗拉伊舍尔[伊万·格尔热蒂奇]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了。^②同时,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目前全南斯拉夫所关注的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协商一致问题的答复。我们在给弗拉伊舍尔的一封信中陈述了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听到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铁托已经回来了。^③他完成了几件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周向你们作详尽的汇报,但是我们首先要向您汇报如下:

1) 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了。出席代表大会

① 这封信是铁托于1937年8月28日在巴黎写的。原稿上日期的字迹不清,也可能是8月20日。然而,根据铁托1937年10月初给威廉·皮克的电报可以断定这封信是1937年8月28日写的。

② 米兰·戈尔基奇(索梅尔)应共产国际的邀请于1937年7月下半月前往莫斯科,过些时候被撤销了南共总书记的职务,接着被捕,后来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害。

③ 指铁托离开国内地下工作回来,他从1937年5月底或6月初到8月17日在国内。

的有来自各最重要的地区的十九名代表。选出了十二名中央委员和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代表大会进行顺利,全体代表平安地回去了。

2)铁托挑选和审核了去学校学习的人选。他们同从其他省来的人和已经在这里的两个人一起正在待命。速告我们应如何处理上述人选。^①

3)在铁托参加下举行了一些代表会议并同各省来的领导同志谈了话,同中央工会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也谈了话,同时还研究了全国的工会工作,并且利用这一机会还作出了如下决定:

(1)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各有一名同志补选入中央委员会;^②

(2)在有阶级工会的所有地方要成立工会委员会;

(3)指出联合工会得到了加强;在一些大规模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取得很大胜利,还可以把这些胜利看作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因为联合工会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克罗地亚工人联合会组织在一些大的工业中心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根据地是一些没有任何阶级组织的小城镇。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南斯拉夫全国各地的斗争和行动,不仅要推动工会运动行动上的团结,也要推动组织上的团结。

4)我们同南斯拉夫工人运动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同样认

① 必须把铁托挑选的党的干部送到苏联,送到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或者送到列宁学校的短期训练班去学习。鉴于当时的局势,看来这些干部没有到苏联去,不久被送到西班牙,或者回国工作。南共中央在巴黎为某些干部办了短期训练班。

② 弗朗兹·莱斯科舍克(来自斯洛文尼亚)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来自塞尔维亚)参加了设在萨格勒布的工会中央委员会。

为,在其领导人被释放之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了。新生力量被补充进总委员会。会上作出决定,要着手发行一份两周出一期的报纸。^①根据一月间的决议,克罗地亚的这个党组织成克罗地亚工人党,它将同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类似的党建立联系。

5)党的地位已有改善,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最近遭到的破坏使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工作放慢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内,我们在塞尔维亚也能使我们的组织站住脚^②。

在铁托到来前夕作出了决议,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大会以及塞尔维亚的代表会议之后在国外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这一点,国内的领导人已接到通知。迄今我们不知道您对此有何想法。国内的形势非常严重,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到缺乏党的领导。^③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除了书记外,整个领导机关应该迁回国内,以便从有合法身分的人中筹组领导机关。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做。鉴于时间紧迫,国内的形势又非常困难,我们建议:

(1)除了应该留在这里以便同您保持联系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回到国内去领导工作和筹组合法的领导机关:

① 可能是指《新报》。

② 1937年年中,在塞尔维亚约有三百名共产党员被捕。塞尔维亚地区党领导机构(设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一部分成员被捕,该地区领导机构下属的大多数党组织遭到破坏。

③ 计划召开的塞尔维亚共产党地区代表会议和南共全国代表会议当时没有开成。

(2)撤销这里的技术部门,把那些依靠党的经费生活的人派回去。

代表的问题还一直悬而未决。我们曾向您提出两个候选人:安德雷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和瓦利奇(沃拉纳茨·普雷日霍夫)。瓦利奇很有可能取得合法身分。因此,我们撤回他的候选人资格。^①

我们还告诉您一个有关穆克的消息,他成了我们党的大叛徒。我们将把他开除出党,并就此事在《无产者》上发表消息,向党员和工人阶级说明他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得到您有关此事的意见。

请对下列问题给予答复:

- 1)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2)撤销这里的技术部门;
- 3)去学校的人选问题;
- 4)穆克问题;
- 5)代表问题。

铁 托

(译自《铁托选集》塞文版第3卷)

① 可能是指领导支援西班牙共和西的国际战士事务的南共中央代表,这个职务在布拉戈耶·帕罗维奇被杀害(1937年7月初)以后曾空缺。可以作出上述这个结论的根据还有:铁托推荐的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安德雷耶夫)不久接受了这个职务。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信^①

1938年4月1日^②于国内

亲爱的同志：

我来这里前曾从巴黎给你写过一信，信中谈到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出发前我曾发表了有关德奥合并的声明。因此，我必须尽快到基层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在从巴黎写的那封信中，我主要谈了下列几件最重要的事：把中心转到国内。我们的问题在你那里得到解决以前，先建立一个临时的国内领导机关。在巴黎只有一个代表，那就是瓦利奇[沃拉纳茨·普雷日霍夫]。什瓦尔茨[斯雷坦·茹约维奇]到安德雷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那里去，而罗增科[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则在巴黎等你提出解决办法。

只有我到基层去，我将努力落实最重要的措施，使公司[党]不要出现混乱，我要在这些对公司来说是严重的时刻尽我所能使公司免遭各种冲击和防备一些不健康分子搞宗派和小集团活动。你

① 给季米特洛夫的这封信是铁托从巴黎回国以后写的。铁托亲笔写的这封信的原稿保存至今。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信的日期故意写成1938年3月1日。

② 原稿写的是3月1日，而确切的日期是4月1日，是铁托于3月底回国之后。

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通常会出现各种“好心”人，他们以“救世主”自居，但却为了自己病态的个人野心不惜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今天这种现象更加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让各种托洛茨[基]分子和公司的其他敌人钻空子和进行活动。

在国内尽管有种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工作和公司[党]的威信却大大提高了。最近，工会在团结等方面取得了十分良好的结果。在塞尔维亚和其他省的不少地方同一些民主团体和党派进行着十分密切的合作。我们有优秀的干部，他们根据七大的路线，在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受到教育。宗派病症日渐消失，人们对当前的任务和需要日益理解。公司[党]的干部没有沾染上戈尔基奇的作风。除了几位知识分子之外，在基层谁也不认识他，而这些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戈尔基奇的事件对我们公司来说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但是我请求你竭尽全力使我们的问题尽早解决。在这风云突变的时刻，在得不到你方面的任何道义、政治和物质上的帮助的情况下，要有所作为是很困难的。我了解整个形势，也正因为这样，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并竭尽全力来拯救公司和完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

季[米特洛夫]同志，考虑到不排除我会出事的可能，我要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哪怕是简要地谈谈，此外，如有机会我还想当面谈谈这些看法。

首先，我认为，目前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领导机关设在国内。因此，使中心留在国外的任何建议和想法只会使我们的公司[党]遭到削弱或者对它没有任何益处。其次，我认为，应该以国内的人组成中心。但是，鉴于我们在国内的人政治上太缺乏经验，可以从国外调两个或最多三个人来，不过一定要调一些决心在最困

难的情况下工作的人和确实能以自己的威望给公司带来好处的人。第三,我认为,中心的大多数人应由正直的工人组成。在国外的知识分子中,我能够推荐的只有两个人,就是:塞尼科[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和安德雷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他们表明他们是忠于公司并决心为其作出牺牲的。

我认为,在审查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时应该注意到每个人的所有情况,要了解谁帮助和参与某人的有害活动,我深信,这样的人今天对我公司危害最大。应该谨防那些所谓的“谨小慎微”的人和野心家,他们已经开始出现并指责每一个人都是“戈尔基奇分子”,尽管他们自己以前也围着戈尔基奇转,对他唯唯诺诺。我认为,真正的戈尔基奇分子是有的,但毕竟很少,他们是很容易被孤立的,也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损害。具体说吧,在那些于1936年秋同戈尔基奇一起进入领导机关的人当中,我认为说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例如,罗增科[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依我看来,他担任这个职务过早,尽管他坐了约十二年牢,但是他没有任何在外面工作的经验,尽管他在理论方面很有修养。我认为,他受过戈尔基奇的影响,但更多是不自觉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应该谈一谈。我认为,在今后的结合中,不能考虑他。但是,把他打倒和不让他在家[党]里做一定的工作,那也是一个损失,如果你那里对他没有不同意见的话。①

什瓦尔茨[斯雷坦·茹约维奇]是位很好的群众工作者,是位谦虚和任劳任怨的人,但是他也提拔得太快了。虽然他不象罗增科那样受到戈尔基奇的影响,但他也没有多少反对的表示。他对戈尔基奇也不甚了解,因此把他看作是戈尔基奇的人是不公正的。但是,正由于他对戈尔基奇这个人过于盲目信任,所以他很可能成

为这样的人。当然,现在他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错误。

第四个是一直在国内的斯洛文尼亚人莱[斯科舍克·弗兰茨],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戈尔基奇。他是一位受到爱戴的忠心耿耿的[工]人战士。

第五个人是我。对我自己,这次我不想谈什么,还是让其他人来说。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哪个人的人,我只是公司[党]的人,今后我仍将这样。

现在,那些住在巴黎并担任负责工作的人是:瓦利奇[沃兰茨·普雷日霍夫],他不是戈尔[基奇]的人;他是公司[党]的忠心耿耿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工作人员。在这艰难的时刻,他对我的帮助最大。

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是位相当勤奋的人,如果在一

① 在米·戈尔基奇被罢免后,我于1937年8月应罗·乔拉科维奇和斯·茹约维奇的邀请从国内抵达巴黎。在我进行了初次的谈话后,我就已经发现了领导机关中,特别是伊·马里奇身上的不良现象。他还同一伙人一起立即开始搞宗派行为,并逐渐形成了宗派中心,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更有甚者,在1938年期间,当时我们在共产国际内的情况更加复杂,我党领导机关的问题一直拖而不决,而伊·马里奇却自封为党的书记。他那一伙人开始指拉所有早先的领导成员是戈尔基奇分子,特别是指控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同时还指责我与戈尔基奇分子合作并庇护过他们。1937年12月初,当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监狱中的情况,并作出决议撤换佩·米莱蒂奇时,马里奇写了一封信给我和共产国际,再次指控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和克伦德利。当时他拒绝在中央委员会内继续进行合作,如果上述同志仍参加中央的工作的话。我在共产国际作出决议(1937年12月底的信中)之后,还是让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留住,让他们继续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马里奇又写了一封信给格·季米特洛夫。这样,他就用自己的宗派行为恶化了我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

至于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我一直把他们留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直到1938年3月底,我决定取消国外的领导机关,并建立国内的临时领导机关。(这是作者为《铁托全集》塞文版所写的注释)

个得到你支持的领导机构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不是独立地，而是在坚强的领导之下做一些工作，他是非常合适的。要不然，他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宗派和小集团的习气方面，会表现得很坏。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也就是说，他在国内的名声相当臭，不能考虑让他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有这样的抱负。

热列扎尔[伊万·马里奇]在达尔马提亚是很有名望的，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修养很差。我认为，他更多的是一个带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残余的乡巴佬，他是以独特的方式来忠于“公司”的。但是，应该考虑他开的店铺是使用劳力最少的。商人穆克的经验表明，不应该再做这样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表现得极其无组织无纪律，并有各种不轨行为。

海尔奈特(奥斯卡尔)[卡尔·胡多马利]他在1936年由于四月中央全会上的冲突而被解职。他在奥地利的监狱中呆了一年，出狱后，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但他是个很能干、很勤奋的人。他是一个应该帮助他纠正自己错误的工人。他至今表现良好。他是一个不断反对戈尔基奇阴谋的人。

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建立一个还是由老班底组成的领导，是不好的。应该建立一个由国内忠诚的和久经考验的工人组成的领导，并增加一、二名经过考察的知识分子。

致以同志的敬礼！

瓦 尔 特

如你召见我，我将立即起程。

(译自《铁托全集》1977年塞文版第4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8年7月于巴黎

亲爱的同志：

遵照你所嘱，我到巴黎来以便到你^①那里去。我在巴黎已呆了一个月了。虽然我在抵达这里以后，立即向上面报告，希望能为我安排路上所需的一切东西，但我至今还在徒劳地等待入境签证。家[党]里的情况要求我们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因此，我请你尽力使我能得到入境许可。

现在家里需要我留在国内，因为必须针对国内总的政治形势和我们家里目前的状况采取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措施。我在下面待了两个半月，走访了所有较重要的地区，但应你的要求，我必须迅速到这里来，因此未能把最要紧的事办完。

我在下面逗留期间，办了以下几件事：

1) 举行了联合工会的各阶级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同社会民

^①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信，实际上是一份报告，是由铁托大约在1938年7月中于巴黎写的。此信是由当时正从西班牙回来并在巴黎同铁托相遇的约西普·科皮尼奇（洛夫欣）带到莫斯科的。他们早在1934年搞党的工作时就已相识。

主党人一起显示了工会的充分团结。一致通过了各项决议。有八名工人阶级左翼的支持者被选入联合工会新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其中三名进入执行委员会，五名进入全会。详情待口头汇报。对不具备阶级性质的工会（克罗地亚工会等）也取得了一致的立场，即必须同它们取得行动上的一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曾持相反立场，他们反对这一点。）工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的和左派的报纸——都应该被当作正式的报纸，不要再相互攻击，应该进行同志式的有原则的讨论。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再也不要攻击苏联。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把左派支持者开除出工会，以前被开除的人必须重新加入工会等。^①在具备阶级性质的工会运动中，由于我们的同志工作对头，取得了极好的成果。有关此事的其他细节我将口头汇报。

2)代表大会刚一开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就立即同我们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并就政治方面的联合行动进行了商谈^②。双方达成协议，共同开展政治行动，并对联合反对派等采取一致行动，但是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不要把这一协议公诸于众。^③请你注意此事！

3)在我的家乡合法地开了一次工人党的倡议委员会的全国代

① 铁托指的是举行联合工会所属各工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工会运动要团结的思想取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就工会斗争和更广泛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所指的报纸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贝尔格莱德的《工人新闻》和萨洛勒布的《自由之声》；左派的报纸——萨洛勒布的《工人报》和卢布尔雅那的《劳动新闻》。

② 指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南共代表之间有关采取共同政治行动的协议。

③ 鉴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立场——他们对“当局”，特别是宫廷如何看他们是十分敏感的——铁托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不发表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因此，铁托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点。

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今后工作的重要决定。最后弄清了这个工人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选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还批准了各省的领导机构。有关这一重要问题的详情,将作口头汇报。

4) 4月间开了一次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会议,我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由于“德奥合并”而举行的,会议通过了反对希特勒的影响及防止其渗透到斯洛文尼亚的重要决定。至今,我们的斯洛文尼亚党已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和发布了一些公告,提请注重希特勒的危险。该党在团结斯洛文尼亚社会各阶层人士反对希特勒方面已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5) 根据南共中央今年3月间的公告,我党正在进行十分频繁的活动,团结所有爱国力量的队伍反对希特勒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罪恶政策而加紧对南斯拉夫的渗透。为此,我们出版了一个专供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农民读的小册子^①。

党的组织状况

在斯洛文尼亚,由于党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相当好的领导干部,党的状况有了改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党同各地均有联系,即在所有较重要的地方都有党组织。^②

在克罗地亚存在着中央委员会,它是去年在克罗地亚共产党

^① 指《农民要知道什么》的小册子,萨格勒布1938年。

^② 当时南共有为数众多的党的干部,一部分在莫斯科学习,而大部分在南斯拉夫各监狱里的“共产主义大学”里学习。其中有,博·基德里奇、爱·卡德尔、博·集海尔、T·托姆希奇、S·什兰德尔和L·申丘尔茨等人。

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我们对领导机关刚进行了改组,因为迄今,它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会上,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因此,克罗地亚的党并未同各地取得联系^①。

在塞尔维亚,有省的领导机关,但那里都是年轻人。在该省,人们一直感到需要能干的人和干部。不过,在塞尔维亚内地各处均有党组织,与其他地区相比,党的威望是最高的,同其他党派的合作也是最好的。^②

在黑山设有省委会。但是,由于有一些不健康的分子在施加影响^③,那里的情况并不很好。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后终于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地方成立了党组织。有必要举行一次代表会议以便最终选出一个负责

① 铁托于1938年3月底抵达萨格勒布后对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改组的内容是成立一个较为坚强的执行局,负责全党的工作。在这之前,分委员会进行工作,使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② 铁托于1938年5月14日至20日在贝尔格莱德。在此期间,他同塞尔维亚党的领导人和临时领导机构的成员(米·德热拉斯和伊·洛·里巴尔)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个别谈话。在这些会议和谈话中,讨论了同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并通过了重新成立南共塞尔维亚本部地区委员会(会址在克拉古耶瓦茨)和南共科索沃临时领导机构以及马其顿省委会的决定。为了广泛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党的出版工作,铁托在萨格勒布同沃伊斯拉夫·武奇科维奇、尼科拉·佩特罗维奇、拉多万·佐戈维奇进行了谈话;此外,还决定成立南共知识分子工作部。

③ 进入南共黑山省委会的人最可能是:布拉若·约瓦诺维奇、约万·马里诺维奇、米尔科·什切帕诺维奇和安德烈亚·穆戈沙。由于佩·米莱蒂奇搞派性活动,黑山党的工作受到阻挠。因此,反对米莱蒂奇在黑山的影响的斗争比起其他一些地区来要持续得更久些,从1937年底一直进行到1939年初。到1939年8月在南共黑山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才以铁托为首的新的党的领导机构方针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波斯尼亚的领导机构。然而，代表会议由于我的离开而延期了^①。

在伏伊伏丁那有省的领导机构，各地几乎都有组织。那里的党组织就其工作而言，属于最好的组织^②。

近年来，除了塞尔维亚，即去秋在尼什之外，党组织没有发生更大的被破坏的情况。^③ 今年3月萨格勒布遭到的破坏是由内奸告密所致，但只涉及组织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中的技术服务部门。该机关的领导人是一个被人雇佣的内奸，是佩特科·米莱蒂奇从监牢里把他作为可靠的人加以推荐的。该人现在已彻底暴露，并正在此地为南斯拉夫的“警备队”效劳。今年六月，斯洛文尼亚的组织遭到破坏，对此要负责的是一前政治犯，他出于宗派原因在写给佩特科·米莱蒂奇的一封谈党的代表会议的信中提到了六个人的名字。这样，这六个人就全被捕了，但破坏并未进一步扩大。已经以合法身分出现的比尔克(爱德华·卡德尔)再次被捕^④。

① 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代表会议原定于6月举行，但一直拖到1938年7月底才举行。该会议的日期可根据铁托于同年8月8日所写的信来确定。铁托在信中说，代表会议是“在几天前”开的。它是在莫斯塔尔“大钩子”古城堡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省的代表和南共中央的代表。会上通过了有关任务的决议，并选出了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会。

② 指南共伏伊伏丁那省的领导机构，其成员有：扎尔科·兹雷尼亚宁、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拉迪伏伊·契尔帕诺夫、约西夫·图利奇、米兰·阿达莫夫和伊万·维约格拉文。当时最积极的南共地方组织是诺维萨德、兹雷尼亚宁、苏博提察和弗尔沙茨。

③ 指大规模逮捕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人，即所谓的克拉古耶瓦茨大破坏。这次破坏除了克拉古耶瓦茨外，还遍及亚戈迪那、克鲁舍瓦茨、乌日策、查查克、克拉列沃、帕拉钦、斯梅德雷沃帕兰卡、斯维拉伊纳茨、丘普里亚，在尼什和萨拉热窝也抓了一些人。当时被捕的有南共克拉古耶瓦茨地区委员会的成员克尔斯托·波皮沃达、斯帕塞尼亚·巴博维奇和日沃因·久尔杰维奇。在警察局受刑后，有15名共产党人被送上法庭，但由于克·波皮沃达和斯·巴博维奇在警察局和法庭上表现英勇，他们被判较短的徒刑(从几个月到两年)。

在各级党组织里，除达尔马提亚有两派在相互斗争（是化名为热列扎尔的伊凡·马里在这里挑起的）之外，情况都很正常和良好。^⑤

在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监狱里，情况还很乱。以莫·皮雅德为首的三分之二的人很守纪律并服从决定。三分之一的人（其中大多数人由于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不好而被开除出党；还有几个知识分子——这三分之一的人为首者是佩特科·米莱蒂奇）干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象话的事情和反党活动。莫·皮雅德把这伙人称作罪大恶极者。这伙人在巴黎得到热列扎尔和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的支持。我成功地把监狱里的斗争限制在狱中，未使它扩散到外面的党组织去。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党组织发表了最严厉的声明，谴责佩特科·米莱蒂奇这伙人破坏我党团结的企图。关于监狱中情况的材料，我早已送给了你们，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我将作口头汇报。

国内的领导机构

我在国内建立了一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临时领导机构，由几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塞尔维亚的几位同志组成。临时领导机构中有三名南共中央委员，他们是在1934年党的代表会议上选出来的。我和这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开过一次会。

④ 爱·卡德尔是在1938年6月9日被捕的。由于证据不足，卡德尔在同年10月5日被释放。

⑤ 达尔马提亚党组织工作中的困难是由于伊·马里奇搞宗派活动造成的。马里奇通过自己的同伙维策克·耶拉斯卡和伊沃·巴利卡斯，力求破坏南共中央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权威，这使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同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关系受到削弱。

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各自省里活动。那次会上作出了许多重大决定，这些决定直到你解决我们家里的问题之前一直有效。会上还决定在国内出版《无产者》，但是由于我离开，这件事搁下来了。在执行所有这些任务时，出现了不少困难，因为物质资金极其缺乏。已有整整一年我未从你那里得到任何资金了，因为以前并未采取过这种在国内筹集资金的方针。^①

季米特洛夫同志，如今，我们不仅做到了使党免受大震动，而且还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基层有健康的分子，他们忠于党，忠于共产国际。但是，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是危险的。在侨居国外的人中间有一些极坏的现象。当我动身回国前，我解除了罗贝特(拉·库索瓦茨)和热列扎尔的职务，因为他们搞宗派活动。但是我一走，这里的兄弟党^②又把热列扎尔请了回来，并委任他做我国侨民的工作。他滥用这一点，并到处散布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说什么不存在什么领导机构，因为他看不起任何人。他在南斯拉夫大学生中间的工作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和宗派主义性质。这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这些人

① 在1934年12月的南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南共中央的委员有，铁托、米哈·马林科和弗兰茨·莱斯科舍克。除了他们之外，进入铁托1938年5月初建立的临时领导机关的还有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的爱·卡德尔，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的约·克拉什，A·扎亚，很可能还有D·佩特罗维奇以及南共塞尔维亚省委的米·德热拉斯和亚·兰科维奇。稍后，被选入领导机关的还有伊万·米卢蒂诺维奇。这一领导机构的常委还有伊·洛·里巴尔，他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书记。临时领导机构第一次会议是1938年5月在扎萨维耶的利斯卡山举行的。除了一些任务之外，当时还商定，要大力推行一条使党组织和整个革命运动在财政上自立的方针。

② 指法国共产党。

要回去的。是谁搞的，让他重新得到了这一工作？或许是博格达诺夫？^①他在去南方时，同热列扎尔和罗贝特谈过话。他当时为什么不找我谈话，我当时不是还在那里吗？他如果不帮忙，那至少也不应该制造混乱。在到你那里去解决之前，我不插手这儿侨民的事。这里原先的领导机构曾商议过，要我不介入那件事。大家现在等待着你的决定。有关其他一切政治等重大问题（这里这些问题还非常之多），我将向你作口头汇报，或者有必要的話，我将向你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请你过问一下，以便使我们的问题尽早解决。如果我不必到你那里去，那么请你允许我回到国内去，以便尽我所能进行工作。如果对我不信任，那么就必須任命另一个人，并给他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不能从这些腐朽的侨居国外的人中间任命任何人。我觉得，我对国内的党负有重大责任，我不能在此继续坐着不动。

我坚持这样一个看法：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领导机构应该设在下面，在国内，处于党的监督之下。^②

① 安东·伊万诺夫（科集纳罗夫-博格达诺夫）是保加利亚的革命者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1938年春在巴黎，他同伊万·马里奇和拉布德·摩沙瓦茨谈过话。博格达诺夫避而不同南共唯一的真正代表——铁托交谈，他的这一表现使侨居国外的南共党员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分子产生了希望：共产国际会让他们领导南共，为此，他们在巴黎的南斯拉夫留学生中和侨民中加强了派别活动。同时，他们还在贝尔格莱德、达尔马提亚及监禁在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中间进行派别活动。

② 在报告背后，马雷克（斯坦凯·季米特洛夫）用俄文写了批语：“此件是由南斯拉夫人洛夫欣（约西普·科皮尼奇）交来，他今日从西班牙抵此。他见过瓦尔特同志。马雷克，1938年7月21日。”

致以
同志式的敬礼

瓦 尔 特

(译自《铁托全集》塞文版第4卷)

为青年一代而斗争

1940年9月上半月写于萨格勒布

于1940年年中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六次代表会议不仅表明了共青联盟在发展和加强自己队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在共青联盟同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的联系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六次代表会议所代表的一万八千名共青盟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斯拉夫共青盟终于摆脱了多年来的关门主义，成了真正的群众性的共青联盟组织。

南斯拉夫共青联盟成为群众性的青年组织的这一巨大转折正是在最近两三年里发生的。多年来盛行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风气也反映到南共青联盟里来。钻进党领导机构的形形色色派别分子和异己分子的带来危害的反党活动使南斯拉夫共青联盟和共产党一样蒙受损失。在1925年至1929年派别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组织的一些领导人不仅自己热衷于这一斗争，而且还竭力使整个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组织卷入这一斗争。为了便于利用南斯拉夫共青联盟来搞派别活动，时而左派，时而右派都力求让自己信得过的派别人物占据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的领导岗位。这样一来，就使警察能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把其暗探，诸如臭名昭著的佩特科维奇（塞利亚克）、马托维奇等人打入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的领导机关。这些警察暗探是南斯拉夫共青联盟内各派系

相互进行斗争的主要挑动者。不言而喻，这一切对南斯拉夫共青团的发展及其领导干部的提高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许多优秀的共青团员都染上了派别斗争，后来都为党牺牲了。南斯拉夫共青团仍然是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的组织，是十足的共产党翻版。它有一千至二千名盟员，同广大劳动群众毫无联系，包括一些大学生和一些大城市部分行业的青年工人，但是很少有，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乎没有较大一些的工厂企业的劳动青年。南斯拉夫共青团固步自封，脱离劳动青年群众；它不去领导这些青年为日常需要而斗争，它的行动主要是政治性的、时而进行的和鼓动性的。南斯拉夫共青团认为自己是同党平行的，表现出有时是很危险的先锋主义的不健康倾向。党和南斯拉夫共青团之间曾经有过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部分是由于党内有上述不健康的现象和有机会主义，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各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诸如臭名昭著的科尔斯基之流于1932年和1933年提入了南斯拉夫共青团组织和领导岗位，这些人想通过南斯拉夫共青团来危害共产党和工人运动。

尽管有这些现象，尽管南斯拉夫共青团的发展是艰难而缓慢的，但是其主要干部还是健康的、忠于党和工人阶级的。在实行一月六日专政时，在党的干部队伍遭到破坏时，当南斯拉夫共青团的五位书记牺牲时，在共青团的优秀盟员遭到杀害并被监禁时，在一月六日专政的杀人成性的反动派进行袭击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南斯拉夫共青团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共青团在这些艰难时刻也证明了，宗派主义和那些我们在前而提到过的一切情况，是既妨碍南斯拉夫共青团的发展，也妨碍党发展的桎梏。南斯拉夫共青团

在这些艰难时刻还证明，用枪决、杀戮和关押在格拉弗尼亚查和服苦役的办法是不可能把它消灭的。在这一时期里牺牲的青年的鲜血已结出了上百倍的果实。

一旦南斯拉夫共青联盟挣脱了多年来捆住它的手脚的镣铐，那它就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1937年，当时占据党的上层的敌对分子曾企图取消南斯拉夫共青联盟，但是被及时挫败了。南斯拉夫共青联盟于1937—38年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精神进行了改组，这一改组，正如今天大家看到的，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南斯拉夫共青联盟许多区和地区的代表会议都在1940年间举行，最后，那年还召开了南斯拉夫共青联盟全国代表会议。有着大量代表参加的这些代表会议证明，南斯拉夫共青联盟走在争取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的正确道路上，并日益成为群众性的组织。但是，南斯拉夫共青联盟在各省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和伏伊伏丁那的一部分地方，南斯拉夫共青联盟在盟员的数量增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在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别是斯洛文尼亚，这方面的工作就大大落后了。在这些省里，还举棋不定，在对待劳动青年加入南斯拉夫共青联盟问题上仍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还没有克服宗派主义的老毛病。这种宗派病的表现是：认为南斯拉夫共青联盟是党的一个平行的组织，是狭隘的宗派性秘密组织，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应该同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结合和打成一片的广泛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这些省里的南斯拉夫共青联盟组织主要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组织，因此，它有着脱离劳动青年群众的危险。

当我们谈到这些缺点和弱点时，还有必要强调指出不少党组

组织和个别同志对待青年工作问题的错误态度。某些党组织和同志对做青年工作根本没有兴趣，也不帮助南斯拉夫共青团组织做工作。这些组织和个别人认为，如果南斯拉夫共青团有自己的领导，那么党组织就不必过多地担心在南斯拉夫共青团中会出什么事；另一些人则认为，南斯拉夫共青团在工作中没有任何独立性，南斯拉夫共青团的领导人每件小事都要请示党组织或某些人。前者和后者都对南斯拉夫共青团犯了严重的错误。前者应该知道，所有党组织，从支部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责任是积极地帮助青年。他们应该把这项工作理解为他们在工厂、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争取劳动青年并把他们团结在共青团中，同时为劳动青年和青年学生的日常需要而斗争的工作的一部分。后者则应该懂得，做青年的工作和帮助青年并不意味着限制共青团领导的独立性及其领导机关的独立性，也不意味着获得某些“权限”等，因为这不仅经常阻碍了青年联盟领导机关的主动性，而且也形成了不正常的关系，妨碍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的正常发展和开展。党组织对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的监督不应该妨碍南斯拉夫共青团的主动性。但是要使党组织确实能够进行这种监督，必须认真研究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在南共中央帮助和监督下颁发的关于青年问题的指示。正是由于某些党组织和领导机关对关于青年问题的一些指示的实质不理解，才发生了围绕所谓“权限”的冲突。南斯拉夫共青团的工作是由党为这一艰巨和负责工作而指定的年轻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们需要帮助，而且需要所有党组织的经常帮助。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还远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和睡大觉。这只是在争取劳动

青年方面迈出的第一步。绝大部分劳动青年还处于神父和民族沙文主义分子等反动派的影响下，还有许多劳动青年受到厂主和雇主的残酷盘剥，还有许多年轻的一代人由于无知而感到徬徨，并且很容易地成了资产阶级蛊惑宣传者之流的俘虏。相反，目前应该加倍努力做青年工作：做工场学徒的工作，做工厂中青工的工作，做农村青年的工作，做年轻士兵的工作。应该团结这些青年，以便开展争取他们的日常需要的斗争。应该教育这些青年，并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今天如此遭受苦难的原因，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应该走的道路，指出通向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的道路。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应该用忘我的工作来赢得青年一代的信任和爱戴。这一代劳动青年应该知道，今天他们的岗位是在什么地方。

做青年工作的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有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使劳动青年一代接近党、靠近党；成为这样一个后备军，为党输送新的干部和战士，输送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将充实并加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队伍。

南斯拉夫共青团和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拯救劳动青年，不允许反动派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用劳动青年一代的鲜血来使它们苟延残喘。不能让青年一代为那注定要毁灭的东西而牺牲，为那些妨碍劳动人民幸福和富裕的东西而牺牲。不能让各种神父和其他反动分子毒化我们的血液，毒害我们的工农青年。我们要为争取这些青年进行斗争，我们决不允许资本主义剥削者把其沾满血迹的双手触到青年身上。让争取青年群众的斗争成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争取劳动青年一代的战斗口号。

铁 托

（译自《铁托全集》1978年塞文版第5卷）

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 上的报告

1940年10月19日于萨格勒布

同志们：

自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举行以来已有六年了，自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以来已有十二年了。一个革命党怎么可以在这样长的时期里不举行其例行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报告和其他报告中了解到。^①

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无论是对党的今后的工作和发展，还是对南斯拉夫全体劳动人民来说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其原因很多：

首先，这次会议从纯属党内的原因来看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在南共的工作和发展都发生急剧的转折时期举行的，因为它是党在纯洁了自己的队伍，克服了内部长期的严重危机之后有了蓬勃发展之时举行的。这一危机表现为上层中的派别斗争，表现为挑拨、背叛、破坏等，阻碍了南共的正常工作和发展。今天我们可以说，南共是完全团结一致的，这一团结是南共从成立以来整整二十

^① 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秋举行，第四次代表会议于1934年冬举行。

年中所渴望的，而南共之所以取得这一团结，是由于它有忠心耿耿的干部，是由于同一切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其次，这次代表会议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是在这样的时候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各国受到的法西斯威胁正在增长，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反动派和对工人阶级实行的白色恐怖都在大大地加剧，阶级矛盾在激化，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正在提高，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同民族独立和进步的敌人，同法西斯战争贩子进行斗争，也要为和平和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而奋斗。

由希特勒德国为首的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只是上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它比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流血也更多。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战争不仅在前方进行，而且还在后方杀害平民百姓、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次战争使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夷为平地，使人类的智慧和劳动的双手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遭到毁灭。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和完全奴役许多至今是独立的小国和小国人民而进行的。捷克、奥地利、阿尔巴尼亚、丹麦、比利时、荷兰、挪威、法国等国独立的丧失就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轴心集团把一切都服从于其战争目的，它不理睬弱小国家的任何中立地位，它不尊重任何国家的独立和小国人民的任何权利。人们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残暴地和肆意妄为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欧洲的小国人民。它们不仅在经济上奴役他们，而且还把所谓新的（极权主义的）秩序强加给他们。现在，当战争还在十分激烈展开的时候，当离胜利还遥远的时候，轴心国就鼓吹什么欧洲和世界的新秩序，它们想

以此使世界变得更幸福，它们想以此来拯救已经衰亡的资本主义秩序。这种所谓的新秩序不仅是要使资本主义的制度延长寿命，而且还要恢复最残酷的剥削劳动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使资本家在最极端的反动派的保护之下，依靠反动匪帮的白色恐怖即中世纪的黑暗和奴役，最残酷地剥削劳动者。这一秩序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们想以此来确保其在各国的掠夺和反动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每个国家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派化、群众的斗争和作为所有受压迫国家的希望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和强国的存在本身都妨碍了这一计划的实现，但是各国反动的资本主义集团在涉及它们的阶级利益时是一致的，它们双手赞成极权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集团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不顾本国的利益，是没有民族感的，只要它们相信侵略者会保护它们的资本主义利益，它们便出卖自己国家的独立。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等都是说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集团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巨大进步。我们看到它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和保护小国人民的政策。

在南斯拉夫以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坚决维护其起码生存条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疯狂地进行日益残酷的恐怖统治。可怕的饥饿的幽灵正在威胁着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幽灵已经降临。在一些贫穷的地区，达尔马提亚、利卡、扎果列等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里，发战争财、放高利贷、贪污腐化都在当局的庇护之下盛行。反人民的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竭尽全力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绑在轴心国的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把轴心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身上，

使他们不仅成为本国资本家的奴隶，而且成为柏林和罗马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寡头的奴隶。^①

但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反对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卖国的内外政策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是反对政府对苏联采取两面三刀的敌对政策的，也反对对轴心国采取令人作呕的媚外政策，这一政策每天都在报刊上、在当局的一举一动中反映出来。最近几个月来许多游行示威和冲突都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要法西斯主义，不要极权制度，不愿成为德国和意大利金融寡头的奴隶，就象他们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从未接受过所谓的西方民主强加于他们的半殖民地的依附地位一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坚决要求依靠苏联、依靠这个进步和繁荣的国家、依靠小国人民独立的捍卫者。南斯拉夫全体劳动人民怀着信心和希望注视着社会主义的大国和强国，并决心为自己的这些要求而奋斗。

在作这个报告之前，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这一报告不仅包括了从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以来的时期（这是正常的），而且也包括从1928年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时期。首先，这是因为这次代表会议就其组成、筹备和来自南斯拉夫各地区的代表人数来说报过了历次代表会议；其次，这是因为出席这次会议的相当数量的代表不十分了解在迄今这一段最艰难的时期里党内所发生的事件；第三，是因为形势严重，这次代表会议应该高于通常的、例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代替我们党的代表大会。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实行军事专政的前夕，即1928年秋

^① 1941年3月25日，也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后还不到三个月，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加入了三国条约。

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内团结的情况下，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两个派系斗争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场斗争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萨格勒布党组织为首的忠于党的积极分子进行的。1928年春，共产国际向南共党员致“公开信”，通过“公开信”动员凡是未被传染上宗派主义的忠于党的干部，起来开展肃清派别和小集团的斗争，因为这些斗争阻碍了党的工作和发展，并使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蒙受巨大损失。这一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有一大批组织不是受这一派的影响，就是受那一派的影响，在塞尔维亚和达尔马提亚尤其困难。在塞尔维亚，右派分子公开抵制“公开信”，并以分裂党和工会相威胁。可惜的是，从“公开信”发表到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的时间太短（仅七八个月时间），无法完成党的内部整顿工作和使党的代表大会得到充分的准备。但是，国内的政局是：一方面，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变得日益反动；另一方面，（克罗地亚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等日益激化。这种政局要求党的代表大会尽早举行，以便使党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准备地迎接同反动派、同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军事、君主专政进行艰苦的斗争。

左右两派的代表都出席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严厉地谴责了派别斗争，要求右派领导人西·马尔科维奇承认其错误。他也这样做了，但只是形式上做做而已，因为一回到国内，他还是继续搞其派别活动。直到十年之后，他才作为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被揭露出来。^①

还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由两派组成的

^① 西马·马尔科维奇是在流亡苏联时被杀的。

原领导被撤销，任命了新的临时领导。新的领导以久罗·贾科维奇为首。除他之外，还有一些年轻的新人进入了领导班子，这些人都是一些到当时为止并未暴露出来的宗派分子，但后来表明他们也是宗派分子。

第四次代表大会向新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重要任务。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整顿党和彻底消灭派别斗争。此外还有使党从组织上得到加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无法弄到四大的决议和其他材料，因此，无法在此使用这些材料。

新的领导是否完成了四大交给它的任务呢？形势表明，它没有完成。在军事专政开始向我党发动进攻之时，党的领导就表明它不成熟，特别是1929年中央书记久罗·贾科维奇（他在劳动群众和党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惨遭杀害之后更是加此。^① 群龙无首的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

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提出所谓武装起义的口号。党的领导在执行这样一条所谓武装起义的方针的时候，对为数不多的党的干部遭到牺牲无动于衷，简直是犯罪行为。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时，根本不顾主观条件，更不用说客观条件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某种自发运动上，但由于党内当时盛行宗派主义，同群众毫无联系，所以这个口号使党受到重大损失。党在群众面前威信扫地。党员也不相信这一口号是正确的，但还是维护了它。这种情况使许多

① 久罗·贾科维奇在萨格勒布同“红色援教会”书记尼古拉·赫契莫维奇一起被捕。他是在故意安排的让他逃跑的时候在南奥边境上惨遭杀害的。今天不仅犯这一滔天大罪的人和发号施令的人，而且这一罪行的直接执行者都已被查明。

党员萎靡不振，使许多最优秀的干部遭到军事专政的刽子手杀害的罪恶行径也使许多党员萎靡不振。由于党的积极分子（既不同群众联系，又不搞群众性行动）受到军事专政的打击，党不久就遭到了瓦解和破坏——长期无法进行工作和采取任何行动。

此外，当时在各独立工会遭到查禁之后，还发出一项错误指示，要求成立所谓的地下工会。这种成立地下工会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党的领导不仅坚决反对参加联合工会，而且在斯洛文尼亚竟然还命令退出联合工会。这样一个指示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脱离工人群众，不仅助长和煽动党员的宗派活动，而且还要在前独立工会和其他工人那里助长和煽动宗派活动。没过多久，就证明，这样的指示的确是一大错误，不仅给党，也给南斯拉夫的全体工人阶级造成很大损失，因为一大部分工人仍没有组织起来，并且在此期间，听任他们去受资本家的无情盘剥。

如上所述，党遭到了沉重打击，几乎完全被破坏；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士遭到逮捕、审讯和送去服苦役。数十名最优秀的同志受到亚历山大国王的军事专政政权和佩拉·日夫科维奇^①的刽子手的折磨和野蛮杀害。这是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的结果。这是不负责任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干部政策、把为数不多的党的干部任凭阶级敌人残害的政策、把同广大工人群众没有联系的党的积极分子投入斗争的政策的结果。要对这一政策负责的人总是说，这是党的英勇斗争的时期，因为虽然党力量薄弱，但却敢于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搏斗。不错，党的干部英勇地进行了斗争，表现了自己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赤胆忠诚、纪律性和随

^① 指彼得·佩拉·日夫科维奇将军，为朝廷和亚历山大·卡拉齐尔杰维奇效劳的军国主义集团“白手”的首领，他在专政期间出任过首相，后流亡，死于国外。

时作出牺牲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领导人的罪过就更为严重，因为他们都轻率地（如果不是故意地）利用了党的干部的这种精神，而且完全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估计党的力量和形势。他们本来不该大喊大叫武装起义，应该把党的全部力量放在联系群众方面，并通过群众的行动，同军事专政进行搏斗。六年之后的情况表明这样做是可行和正确的，当时，专政遭到群众的最沉重的打击。

1929年底，党的领导中剩下的成员都流亡国外。从那时起到1937年，党的领导机构一直设在国外。在国外，他们还相互倾轧，一直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整个领导机关才被撤换，并任命了新的、临时性的领导。在1933年以前，领导机关同国内的党组织（如果在一些地方有所恢复的话）毫无联系，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示。从1929年到1933年，党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了，只有斯洛文尼亚或萨格勒布等地的一些少数组织例外，它们还做了些事。斯洛文尼亚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1930—1931年就开始恢复。这通常是一些“自发的”互不联系的小组，如萨格勒布的特雷什涅夫卡的一个小组出版了《红旗》报，该小组是由利波夫什查克同志领导的，他后来在西班牙英勇牺牲了。这些党组织要在组织上巩固十分困难。首先，领导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很低，在组织工作上又缺乏经验；其次，阶级敌人的内奸和间谍还能打入党组织，然后逐个加以破坏并把谁是党的干部报告了警察局。此外，今天已经知道，在党的上层，也有敌对分子，甚至间谍，他们现在都已被揭露，并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由于这一切，自然产生了对国外领导机关的不信任，而国内，又相互猜疑，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通常在被捕后在敌人面前表现不好，甚至叛变了。这种猜疑存在了多年，甚至前两

年还有,这使党的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尽管这种猜疑是相当有道理的。

随着1932年党的临时领导班子就任,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同国内的党组织建立了一些联系,尽管是很薄弱的联系。主要是同斯洛文尼亚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而同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联系是通过所谓的党代表进行的,可是他们同党组织的联系很差,对党组织的工作和情况了解得也很差,因为这是一些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联系,也不了解国内的总形势。这些党代表一般是根据咖啡馆和马路上道听途说的东西给中央写报告,这样,中央的同志总是得不到正确的情况,并把这种不真实的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而且还根据这种不真实的情况作出决定,因此这些决定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那样,总是不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常使党员不知所措,他们因此抵制这种决议,党和领导机关的政治威信也为此受到损害。

正象我们看到的,在国外的这个临时领导机关中既有坏分子,又有反党分子。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是由于在这个领导机关中有一些忠心耿耿的同志(如果他们的意见能得到反映的话)。但在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时,就连这个领导机关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这些错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今天,当我们知道领导机关中曾有坏分子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后,这些错误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是这些人搞破坏工作的结果。^①

我们在这里仅列举几个最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表明,整个领

^① 这些人长期侨居国外,脱离工人阶级和人民,由外国政府教养着,他们越来越不象革命战士了。关于他们的命运,请参阅铁托同志纪念南共成立五十年的讲话。

导都犯了宗派病，如果撇开其他一切不说的话。在1933年区级选举时，它发出指示，抵制选举，这不仅引起基层的党员，而且也引起其他工人的极大不满。这一指示使党脱离了群众，而且正当群众对军事君主专政的不满情绪高涨的时候，党本应挺身而出，组织所有进步力量反对军事专政的反动。抵制区级选举意味着要把市政工作交出去，由那些贫农和中农所憎恨的当权人物去执行。另一个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关于成立所谓克罗地亚民族革命反对派和斯洛文尼亚民族革命反对派的指示。这一指示很快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它并不是基于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了解的基础上。这一指示之所以是宗派主义的，因为它只为农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和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人所接受。这一指示的制定者不顾这样一点：当时农民对其领袖尚未失望，而是相反，那段时期恰巧是诸如克罗地亚农民党等这样一些党派兴旺的时期，它们也受到了军事、君主专政的打击。这个指示还使党脱离了广大农民阶层，特别是那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从上到下树立这种反对派势必要吃亏，因为当时党在组织方面以及在农村中的影响都很差，甚至根本没有。这不是一条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争取过来的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在联合会^①内部搞所谓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情况也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在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中还要谈到。这是工会中粗暴的宗派主义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妨碍了工会团结的形成，使共产党人和以前参加过联合会运动的独立工会的其他拥护者都孤立于工会中的其他工人群众。而后者还

^① 南斯拉夫联合会是当时最大的工人组织，它受到社会民主党首领的影响。共产党人参加了联合会，并在联合会内部为自己的革命方针进行斗争。

受到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影响。这不是一个正确地团结最优秀分子的办法，党不能依靠这种办法来执行路线，这更象一种非法的工会的做法。这也不是列宁、斯大林对争取受到社会民主党首领影响的工人群众和加强工会战斗团结的办法。

如果这一切再加上工人协会抵制大选的事，即有条件地参加大选，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决非偶然，而是领导机关内的坏分子有意犯下的错误。

这就是这个领导机关在其工作期间，即1932—1934年期间，也就是到1934年12月24日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之前所犯下的几个最严重的错误。

1934年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差；事先只开过两个代表会议：斯洛文尼亚地区代表会议和克罗地亚地区代表会议，因此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的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之外，都是特邀的和未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但是，尽管如此，这次代表会议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将近十三年之后在国内召开的第一个代表会议，而且是在军事、君主专政的时期召开的。

那次代表会议的缺点在于：领导机关除了就抵制区级大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外，对其所作的一些最重大的错误的决定根本没有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以便在日后工作中吸取教训。其次，在那次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到动员广大进步力量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的问题，即没有提出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问题，虽然当时法西斯的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建立工会团结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提到过，但是有许多框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领导机关仍旧相当脱离国内的运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也根本没有讨论，就是说，代表

们没有参与讨论,而只是做了一些许多人都听不懂的报告。

在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就举行了1935年5月5日的议会大选。南共本应该在這些大选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当时决定,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参加大选。为此,还进行了一些谈判,但在提名问题上谈判破裂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想提名·托帕洛维奇,而我党的领导要提我们的人。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已显出在政治上极不成熟。国内接连不断地收到一个又一个自相矛盾的指示,这些指示在筹备大选时在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按照中央的一个指示,在斯洛文尼亚取消了原定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参加竞选的做法。后来又发来指示说,要单独参加竞选,但是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谁去竞选的问题上弄得一团糟。这样,这么一招也失败了。后来,又来了指示,要投票赞成反对派,在一些地方要赞成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一来,党的政治威望,特别是党领导的政治威望大大下降,党仅仅由于领导在政治上无能而遭到这样重大的挫折。

当时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南共有七个代表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六个为全权代表,一个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南共对这次共产国际的历史性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从领导上来说,做得既不充分又不正规。首先,代表不是由党员推选出来的,而是由领导指定的;第二,来自国内,来自基层的代表仅有三名,其余四名都是中央委员。这样,开完会后,只有二名回到国内,其中一人不久也因在警察局里表现懦弱而被开除出党。因此,党根本没有从这个代表团得到好处,代表团未能把开了一个月的代表大会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口头向党员传达。所以,参加七大的代表并不是一些能够传达和执行七大决议并根据国情具体落实的人。但是尽

管如此,尽管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到达国内相当晚,数量又少,季米特洛夫、皮克、曼努伊尔斯基和埃尔科利的讲话以小册子的形式送到国内,但这些决议对我们党仍有巨大意义。^①这是基层党组织工作和发展中的大转折。只有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指出了我党应走联系群众的必由之路。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样,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在群众组织中做的工作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在贯彻这些决议时,有过困难,因为还有残存的宗派行为。一些党组织中的宗派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贯彻实施。这是初期的情况,后来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以后从其他的报告中我们会看到这些情况。

在1935年的七大以后,由于领导在政治上软弱,增添了一些新人以加强这一领导。但这种加强并不很得当,因为不但没有避免重犯错误,而且在领导内部又发生了小集团斗争。这场斗争在1936年的4月中央全会时充分表现出来。那次中央全会是在未经报告共产国际和未得到共产国际允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仅清楚表明领导内部有小集团斗争,而且还表明存在着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对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的错误评价,对工人阶级团结问题的错误提法(只说自下而上的团结)等等。共产国际又进行了干预,撤销了全会的决议,并宣布全会无效,又一次撤换了领导,并任命了新的领导,最后,坚决要求领导到基层去,回到国内去。

这个新的领导并未按决定的那样转到国内(除一位成员外),

^①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著名的革命家;威廉·皮克——德国革命家;埃尔科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曼努伊尔斯基——乌克兰的革命家和斯大林政策在共产国际中的体现者。

而是继续留在国外。在国外，按当时的书记戈尔基奇的指示，在派遣志愿军去西班牙的问题上组织不当，并遭到破坏。后来，众所周知，那艘载着我国志愿军的船被发现，许多人遭到逮捕，前中央委员穆克在警察局里的叛变行径给党带来极大的耻辱。^①

1937年7月，戈尔基奇被撤职，并终于作为敌人被揭发出来。戈尔基奇及其他前领导人暴露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间谍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他们被揭露出来以后，我党名誉大为扫地。在这些人被揭发之后，为什么我党在十八年内未能发展和加强的问题，就很清楚了。当时才弄明白，为什么阶级敌人总是能够发现和消灭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党组织，也明白了为什么阶级敌人几乎总是知道派到国内去搞地下工作的最优秀的同志，并杀害了他们，如德贝利亚克、B·维这斯、阿加等许多同志。还弄清楚了为什么我党二十年来不注意培养党的干部，不从工人队伍中培养同群众有联系的、从群众中来的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新的领导同志。左右两派都阻挠对新干部的培养。

在我党内存在着派别和派别斗争，使阶级敌人有可能把间谍和内奸打入我们党内。这些内奸和间谍十分卖劲地参与党组织上层的相互倾轧的派系斗争。他们对两派都支持，但更多地是支持左派。其中一些人早在1926—1929年期间就被揭露，如N·佩特科维奇（塞利亚克）、马托维奇、贝伦切克、布雷佐维奇等，但主要的人物直到1937年才被揭发和开除出党。由此可清楚地看到，这些内奸和间谍的作用是：煽动派别斗争，支持党内主要的坏分子，阻挠党的每项具体革命工作，消灭工人阶级最忠诚的战士并将他们

^① 阿多尔夫·穆克、米兰·戈尔基奇（约西普·契任斯基）——1937年前的南共领导成员。他们由于被揭露是党的敌人而被撤职。

交给敌人——阻挠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的发展和加强。

上层的这些派别和小集团虽在谁进入领导机关的问题上相互进行争夺,并为此不择手段,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却是一致的,一贯对共产国际不讲实话,谎报情况,不老实,歪曲真相。如果他们想向共产国际隐瞒什么,他们彼此很快就会进行肮脏的妥协。仅举一例:据戈尔基奇本人称,1939年的4月中央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况下举行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设法达成妥协,完全不让共产国际知道发生过什么斗争。

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怎么能这样长久地呆在上层呢?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一个健全的、能干的工人核心——这些头头对此根本不关心——来引导斗争,反对我们党内的这些异己分子。只是到了1927—1928年,萨格勒布的组织才开始一致反对这两个派别,之后,共产国际又进行了干预。其次是,这一整个时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而出现平静的时期。没有发生过什么较为激烈的阶级冲突,因此在那个时期里,要揭发这些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是不容易的。但是越是接近阶级冲突激化的时期,越是接近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奴役者的斗争的尖锐时期,他们也就越发暴露出自己是异己分子和坏分子。在前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代表,而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and 间谍了。他们成了党内的肿瘤,如果他们想活动,就不得不继续隐藏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被揭发出来了。

在这些坏分子被揭露出来和共产国际由此而产生对我们党的不信任之后,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所有那些正隐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不进行破坏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钻进领导的时机已

到，立即猖獗起来。这就是热列扎尔之流的人。这些人不仅在国外竭尽全力来妨碍那些在这困难的形势下尽力使党保持不垮的同志的工作，而且还同臭名昭著的佩特科·米莱蒂奇勾结，后者在狱中拚命地恢复派别斗争，并公然破坏中央的决议，即1938年春在国内成立的（共产国际知道并在事后批准的）临时领导机关的决议。这一临时领导机关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来对付这伙人。它将所有那些反党分子和可疑分子一律开除出党，采取有力措施，整顿了狱中的组织，撤销了以佩特科为首的南共狱中委员会，任命了党代表和政委，最后把佩特科·米莱蒂奇及其十恶不赦的派别分子开除出党。^①共产国际后来在1938年批准了领导机关的这些措施，并责成它继续坚决清党，把所有异己分子和动摇分子清除出去，这件事在1939年中央的一月决议（经共产国际批准）和1939年3月的中央“公开信”中得到了确认。

这一临时领导机关在1939年6月初召开了党的讨论会，除马其顿省以外，各省均有代表出席。会上同意中央对整顿狱中情况以及清党问题的措施。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又于1939年秋讨论了我们的问题，并通过了共产国际决议，其中指出了党的工作上还存在的缺点，并批准了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我党从1928年四大至1938年期间的简况。

现领导从1937年底至今的工作

现领导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把所有异己分子和危险分子

^① 指南共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狱中委员会，曾受叛徒佩特科·米莱蒂奇的影响。后来，米莱蒂奇被撤职并由中央代表莫萨·皮雅德同志接替他。

清除出党,保证党的团结,以此动员全党积极分子反对任何搞小集团和派别的企图;第二,从组织上巩固党,提高党,使它真正成为劳动群众斗争的带路人和组织者;第三,全力培养新的领导干部,把新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去,把那些屡教不改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组织。

这件事十分重要,办起来可不容易;在实现这些任务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障碍,但是由于正直的人士的帮助和忠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的努力,这些障碍还是克服了。

新领导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竭尽全力在那些还没有党组织的省里(如马其顿、梅托希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我们成功地在上述各省建立了党组织,这样,今天在南斯拉夫,没有一个省是没有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其次,在党的讨论会上还提出了一项任务:领导机关要对一些省的党组织进行改组,如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在克罗地亚,要把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因为情况证实,这个领导机关不重视为如强党而进行的组织工作,它向中央谎报克罗地亚党的组织状况,犯了一系列严重政治错误,如1938年议会选举时,违反中央单独参加竞选的决定,撤回我们的候选人,并命令投马切克的票。这个领导机关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跟在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屁股后面转,这样就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利益效劳。这个领导机关不断抵制中央所制定的党的路线,不执行中央在德奥合并时关于保卫国家的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反对中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估计,站到了马切克、独立民主人士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的消极防御立场上去了。这一切都要求彻底清洗这一领导机关,并将守纪律的、精干和可靠的人提到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

去。克罗地亚的这次改组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今天，我们看到，克罗地亚共产党从那时起在组织上大大加强了，今天在全克罗地亚建立了组织网。南共中央不断给改组后的领导以直接的政治援助，因为这一领导机关的任务相当重，尽管克罗地亚党的工作条件很不错。

我们党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这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无法在那个省做好党的整顿工作，南共中央不得不亲自抓这件事。早在1937—1938年党的第一次清洗时，那里已经开除了一些不守纪律的、搞派别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可疑分子。任命了由正直的和忠心耿耿的党员组成的新领导机关，但它的工作仍很困难，因为被开除的那些人还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们通过这些千方百计地阻挠达尔马提亚党的整顿工作。南共中央在省的党代表会议期间，派了两名优秀的同志去达尔马提亚，指导那里的同志们。此外，南共一名中央委员也去达尔马提亚，在他的领导下，举行了斯普利特的地方代表会议和这尔马提亚省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还邀请了一些不满分子和被开除出党的人的追随者出席，以便听取他们的观点。在斯普利特地方代表会议上，根本无人出来维护被开除出党的人；在省代表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讨论，并一致表示赞同中央在达尔马提亚清党问题上的措施。这样，终于整顿了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在那个组织里，二十年来一直是由那些不喜欢或者不懂得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人所主宰。这些人有意忽视培养新的领导干部的问题，以至我们党成立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尔马提亚仍然异常缺少好的能干的领导干部。

在达次代表会议上，情况还表明，斯普利特的情况很不健康，而达尔马提亚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正常的，党的干部守纪律，对党忠

心耿耿。达尔马提亚在我国具有最好的条件开展党的工作和发展党,但在组织方面却很落后,因为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和破坏在支部基础上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此外,那些被开除的前领导人经常抵制中央的政治路线,时而跟着克罗地亚农民党跑,时而又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极其宗派主义的立场。在这些人身上,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经常兼而有之。在达尔马提亚,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党的组织问题抱有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在达尔马提亚,不少同志身上的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无组织无纪律是由上述这些人助长起来的。

此外,领导机关还力求努力完成建立党的财政基础的任务。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此今天一些省已经完全靠自己维持了。克罗地亚共产党现在还能上缴一部分经费给中央,塞尔维亚在这方面也搞得不错,也上缴一部分经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情况最差,对它不时还要给予帮助,其次是马其顿,对黑山和斯洛文尼亚也要给一些帮助。对斯洛文尼亚来说,我们不得不看到,该组织有一个相当不好的特点:斯洛文尼亚是最巩固的组织之一,多年来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但至今在财政上不能自理,还不能履行它在这方面的义务。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同志应在这里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由于党建立了财政资金,党才能加紧和更为全面地在组织方面和宣传方面开展工作。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按省举行了一系列各种积极分子的会议。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代表会议比南共任何一届代表会议都筹备得要好,甚至比以前历届代表大会都筹备得好。在这期间,南共召开了不少地方的、区的和所有地区性的代表会议,大约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正因为如此,南

共中央及其他领导机关才能在这个时期里以传单、公报、公告、公报和南共中央机关报《无产者》、各民族中央机关报《镰刀与锤子》、《劳动》、《共产党人》等形式出版了各种大量的地下材料。我们现在还不能提出一个精确的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因为同志们还未把所有财政报告送给我们。这件事一定要在代表会议之后立即办，这样才能对各个党组织和全党的财政资金的收支状况进行准确的监督和检查。

在这三年期间，南共中央一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问题，因为这是我党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党如果不从组织上巩固和扩大工厂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建立党的支部，党就无法成为劳动人民的斗争的真正的领袖和组织者。这一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遇到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他们把持了一些组织，千方百计阻挠按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即建立支部和各级领导机构。我们已经谈到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这种偏向，但是许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偏向。如在斯洛文尼亚和贝拉克拉伊纳，有两三个这种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分子直到不久前还在阻挠和公开妨碍成立党组织和支部的一切工作。他们辩解说，出于秘密原因，贝拉克拉伊纳有一个由两三个领导党的工作的人组成的机构就足够了，而实际上党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说，党不时发些指示就够了，大家都会听从的，因为他们说什么所有农民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些人这样干，就是因为害怕被逮捕，如果警察断定他们那里在干些什么事的话。达尔马提亚也有这种情况。在该省的地区代表会议期间，据了解在一些地方如西涅、特罗吉尔等地有一些地方委员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做什么事，甚至还对在那些地方建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1936—1937年开始成立劳动人民党时，所有机会主义者都兴高采烈，以为它将取代共产党，并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把共产党在一些工作部门的职权夺了过去。贝尔格莱德的机会主义分子同党组织发生了冲突，并篡夺了对工会、共青联盟的领导权。他们甚至还召集了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和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公然攻击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等等。在达尔马提亚，机会主义分子同样也想完全取消党，他们想纠集在这个劳动人民党里，利用它来作为一个对党、对一些忠于党和纪律严明的同志进行攻击的场所。他们还规定了劳动人民党的党费，召集过，并且今天还在召集各种会议，作出反对党和有利于被开除出党的反党分子的决议。在斯洛文尼亚，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力求在劳动人民党（工农联盟）里扎下根子，以便对工人阶级施加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从这几个例子就可看到，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都希望通过那个党建立一个反党的基地，并对工人阶级施加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所有他们都主张取消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中央及时觉察了这些人的阴谋，并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动员全党积极分子投入反对这些新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萨格勒布的情况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们想通过这一党派对工人阶级施加小资产阶级影响。在萨格勒布，正是通过该党领导人多次对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中的软弱和动摇分子施加压力和影响。例如，在1938年议会大选时，他们公然反对单独参加竞选，从而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并使克罗地亚的工人阶级蒙受重大的政治损失。从上所述可以看到，那些混进劳动人民党里的人给党造成了极大危险。由于上述一切原因，决定要坚决制止上述情况，

同时鉴于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和越来越大的反应，决定不成立什么劳动人民党，而是将一切力量投入建立一个在目前生死存亡时刻能够完成自己任务的统一的和强大的共产党。

尽管我们通过口头方式和书面形式发了指示，指出了我们对劳动人民党的立场，但是仍有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同志们不明白，这是事关重大转折的问题，是同过去的做法决裂的问题。有人还一直在建立这个劳动人民党的一些机构，成者提醒要建立这些机构。隐藏在劳动人民党里的各种坏分子和异己分子还一直把该党作为一个避风港，并在那里恶意中伤党，同时又在工人中间进行捣乱。应该明白，我们决定只取消这个党的一些不必要的和有害的机构。共产党应该领导一切，并通过现有的一些委员会继续开展建立工农联盟的工作。凡是已经在群众中建立起来的，均应扩大和加强，但这里也要撵走一切坏分子和同我党敌对的分子。

鉴于党在1937年和1938年所处的困境，我们应该指出，在采取行动方面，尽管处境困难，但仍未作出我们可以作出的努力。例如，尽管中央及时发了指示，要求单独参加议会选举，可是仍未做到本未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事。如果我们不算萨格勒布即克罗地亚的破坏活动和尾巴主义，在其他各省也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最好，因为他们那里去参加了大选，有些地方是单独参加的，如在工人聚居区。而在农村，则同劳动人民，同马切克分子一起作为党派集团参加大选的。我们提出了十一名候选人和十八名候补候选人。我们在大选中得票一万至一万二千张。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又处于那么艰难的环境中，我们第一次参加公开投票，这个结果当然不算坏。本来，在克罗地亚如果没有人

叛变的话，也可搞得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领导人的这一破坏行为引起了广大群众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一些地方发来了抗议和要求澄清的信件。劳动群众无法同意和理解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所谓倡议委员会领导人的这种大转弯。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种大转弯是阶级敌人的勾当，当然是间接干的。

在这三年期间，现中央迅速而及时地对变得日益重要的政治事态作出了反应。在1938年春德奥合并时，中央在捍卫国土问题上表明了立场，并以公告形式通报全国。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这一立场，要求所有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捍卫国土，进行反对斯托亚迪诺维奇^①反动政权的斗争。我们的这一立场对党深入南斯拉夫广大劳动群众和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个很重要的公告是关于1938年10月的慕尼黑问题。当时，党也做到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帮助捷克和保卫国土。

这一切行动是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发起的，虽然在我们南斯拉夫，由于有所谓民主反对派的上层和社会民主党反动的领导人，无法正式成立人民阵线。应该指出，尽管如此，党还是能同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联系，在其中产生影响，并使群众相信，共产党人的确是争取人民权利、自由和独立的最彻底的战士。我们且不细谈成立人民阵线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是负责政治问题的人的事，但我们只想还提醒这么一点：不管一些组织和同志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党的正确工作确实不仅大大促进了党的声望的提高，而且从政治上

^① 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是法律系的教授，旧南斯拉夫政府的财政大臣和首相，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他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齐，想把南斯拉夫拉入法西斯联盟，他以自己的理想人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榜样，自封为领袖。后死于国外。

提高了党的干部，并促进了党同劳动群众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开始常常犯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在许多地方，一些同志要去掉宗派主义的老毛病很不容易。这反映在阶级工会的工作上，反映在同非阶级工会组织——克罗地亚工人党、南斯拉夫工人联合会等的合作问题上。^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南共中央立即采取了对这场战争作出正确估计的立场。在战争打响之后，新出现的形势向我党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任务。必须使党的整个斗争和工作转移方向。停止同各种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党派上层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们越来越反动，成了英法反动集团的代理机构了。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各支部都面临这样的任务，如：以从下到上成立人民阵线，组织和领导反对法西斯与反动派的斗争来争取劳动群众，为群众的日常需要进行斗争，反对物价上涨，反对战争，争取南斯拉夫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自由和民主的民族权利。

在我党中央的文件中，再三地要求揭露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作用。要向群众解释战争的原因和英法帝国主义的假民主。必须进行不倦的斗争，揭露那些竭力把南斯拉夫推向战争的各种外国代理人。必须防止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推入这场浩劫。我们党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中央一连发表了四个公很，这些公很对每个重要事件都提出了方针。今年中央还大量散发了几个公告和其他传单。

此外，在这三年期间，保证了《无产者》报在国内的出版。还保证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其他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出版了许多种合

^① 均系反动的工会组织，是由马切克和斯托亚迪诺维奇在民族主义和贩卖行为的基础上建立的。

法的和地下的小册子。我们党从未象近三年来出版过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材料。但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这和以前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相比,确是我们党的一大成就,但就当前的需求来说,还是太少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党在行动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从去年以来。去秋,党成功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今年,也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许许多多的行动和示威,如为了庆祝五一节,在萨格勒布全部停工,电车也不开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周年之时,从九月初到九月底,党也搞了许多大的行动。这些行动是针对世界大战的,主张不要交占领军费的和平,反对涨价,反对战争高利贷者,主张民主、民族自由和民族权利,主张同苏联建立密切的合作和签订互助条约。在以前的一切行动中,也一直不断地突出同苏联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等口号。

最近,正在开展许多行动,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涨价。成立了反对涨价委员会,并动员群众向区级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请愿。组织并领导了许多罢工,要求改善工人困苦的境况。今天,我们党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起到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它的政治威望大增。广大劳动群众恢复了对党的信任。但是,在开展这些行动时,我们一定要强调指出某些组织所犯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调。如在黑山,有些同志在今年5月提出了复员、破坏纪律、开小差和当逃兵等口号。这种口号使黑山的党遭受重大损失,因为它产生了很坏的后果;使党脱离了一部分劳动群众,党的敌人利用这种口号指责共产党人是在为意大利帝国主义集团效劳等等,而意大利当时恰巧开始表露出它对南斯拉夫的野心。因此,许多人受到威

胁，他们被指控为叛国者等等。人民也不接受这种口号，当时人民无法接受这个口号，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感到了外来的威胁。提出这种口号的同志忘记了当时的形势已不同于1939年秋，那时战争刚爆发，反动派的口号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在这方面，这些同志也表现了缺乏纪律性，因为在中央向他们指出这个错误，并要求立即纠正时，他们却同中央进行争论，使用的口气完全不是同志式的。达尔马提亚、斯普利特事先不作充分准备就宣布总罢工也是错误的。在斯洛文尼亚等一些地方，同志们做得就很对，他们开始大力从事组织反对涨价等行动，但是如果不惜代价，硬要组织和发动政治行动，引起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的倾向也是错误的（他们那里已有这种倾向），因为反动派也希望借此打击一下工人阶级，使今后劳动人民的斗争失去领导。此外，外部条件也不适宜于搞这种冲突，党也还没有充分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这场斗争。因此，我们面临的任
务首先是组织经济斗争，反对涨价，争取劳动人民的民族权利，争取国家独立，争取同苏联合作等斗争，并在日常的经济斗争中，通过罢工等来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政治斗争。

中央在这三年期间是全力以赴的。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党的威望这样高。

中央的缺点在于没有充分保证从技术上向一些边远的党组织及时提供材料。在这方面，中央的情况还相当差。领导机关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克服这个缺点。同样，我认为必需提醒一下，中央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党组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心和提供充分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帮助，这是中央的过错。也许代表同志们也会提出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对今后更加注意南斯拉夫各级党组织的所有 these 问题是肯定十分有利的。

我们党的组织状况

如上所述,在这三年期间,我们在各个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机构。特别重要的是要强调在马其顿和梅托希亚建立组织的事,在那里,已多年来没有地下党组织,而在梅托希亚则从未有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1929年以来没有任何党组织,^①因为当时在那里党受到了破坏。今天在马其顿,我们有了地区委员会、若干个地方委员会和区委员会。在梅托希亚也有了地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区委员会。因此,今天党组织在全国星罗棋布。在塞尔维亚有省委员会,在伏伊伏丁那有地区委员会,在黑山有省委员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地区委员会,在克罗地亚有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在斯洛文尼亚有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十二个区委员会和四个临时地区委员会,在达尔马提亚有地区委员会。

1937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共产党都进行了改组。这些党组织都举行了代表大会,并选出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以替代以前的省委员会。成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打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党内敌人手中的武器,他们蛊惑人心,硬说南共也是一个大塞尔维亚的产物;领导机关中都是塞尔维亚人等等。其次,使共产党在那些地区更便于接近有民族主义情绪和受到本民族资产阶级影响的群众。第三,便于教育和提高共产党中的民族干部,这件事过去遭到严重破坏。第四,使党的工作有更大的主动性。第五,打掉

^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党组织(如巴尼亚卢卡的党组织)是通过萨格勒布,而不是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某一个中心同南共中央联系的。

党内分立主义分子手中的武器，他们利用以前和当时领导机关的错误，一直在搞分裂党的勾当。

1936年，斯洛文尼亚曾经出现过很激烈的分立主义和分裂的倾向，这是党的敌人利用一些领导人的某些严重的、罪恶的公开行动搞起来的。如奥斯卡尔（他是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个），他隐瞒了1936年在斯洛文尼亚所发生的破坏，他还通过同党根本没有关系的、不可靠的交通把合法和非法的材料送到国内来。当时，《青年之路》杂志遭禁，使青年组织合法化的工作无法进行。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才得以挫败斯洛文尼亚一些异己分子的这种分立主义的企图。

如果我们估价一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成立之后所取得的成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果是积极的，不论这些党所犯的一切错误和偏差如何，在自身发展上都迈出了一大步。这些党里的一些人还有地方爱国主义的错误和分立主义的残余，而在塞尔维亚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所表现。人们不大重视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国际主义。南共中央一直不断地对这种偏差敲警钟，并对此进行了斗争。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尚未从我们队伍中清除掉。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因为那些尚未摆脱这种影响的新党员把这种影响带进党里来的。1936年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青年中，一些青年领导人不仅搞了分立主义的分裂活动和成立了独立的斯洛文尼亚青年组织，而且还同南斯拉夫的其他青年断绝了一切关系。

青 年 问 题

虽然将有专门报告谈这一问题，可是我还要就这一问题说几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象党一样，也受到过我们党上层内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的沉重打击。我仅举 1936 年的一个例子，当时，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如穆克和戈尔基奇，解散了我国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引起了我国青年队伍的大混乱。到了 1937 年，根据七大精神，中央帮助成立了青年联盟的领导机关，建立了青年联盟组织，以适应新的形势，并清除了青年队伍中的坏分子。此后，青年联盟就大踏步地前进了。今天在组织问题上和同青年一代人的联系问题上，都已取得了它以往从未有过的成果。

妇 女 问 题

关于妇女问题也将有专门报告，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组织的同志对这一问题还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女同志们自己会在这里谈这个问题的，但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女同志们至今在妇女工作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没有男同志的帮助之下，甚至还常常是在男同志的干扰之下取得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人们最不抱希望的地方——黑山，却最关心和最体谅妇女问题。黑山党组织的党性要比其他任何省都强，尽管其他省做妇女工作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一问题今天应在这里好好讨论一下，一些男同志不要再用消极息

工的老办法对待妇女工作了。

我们在西班牙的志愿军

西班牙内战一爆发，南共是最先派遣战士去援助英勇的西班牙人民的那些党中的一个。相当多的南共党员曾是1936年组成的国际旅的第一批核心人物。这个旅在最危急的时刻，向马德里进军，在马德里城下阻击佛朗哥匪帮。我们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在捍卫马德里时牺牲在那里了。以后，南共又在国内和我国侨民中不断动员无产阶级战士，并把他们派往西班牙。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西班牙的人，也是最后一批撤离西班牙的人，他们在掩护受到佛朗哥匪帮攻击的难民之后撤到边境。几乎在各个战场上都有我国的战士，他们高举我们党的旗帜英勇奋战。

在西班牙，共有一千二百名我们南斯拉夫的战士，几乎有半数牺牲了。据马尔蒂和其他许多人说，我们的同志不仅属于最勇敢的人，而且也是最守纪律的人。诚然，有几个取消主义者，他们一到那里，就散布保存干部的理论，想回来。不过，这种人总共才七八个，他们不但不战斗，还搞小集团斗争，给我党丢脸。

众所周知，我国幸存的西班牙战士，现在还在集中营里，情况极为艰险，贝当反动派扣留着他们。我国政府不顾一切抗议，不肯采取措施让我们的战士回国。即使有人挣脱法国反动派的魔爪回来了，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的反动当局又把他送进这里的集中营。因此，我们有责任：第一，采取一切行动，迫使当局采取措施，使我们的战士归来；其次，寄包裹和钱给他们，使他们的境况能改善一些。

组织方面的错误

在组织方面，我们的同志犯了相当大的错误，甚至事至今日，在一些省里还经常有这种事：同志们不能正确理解组织原则。克罗地亚的情况又是最典型的。在那里，一些领导同志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如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等等。当然，这是做得对的，但是，把什么都让这些委员会去管，如把整个克罗地亚农村中的组织问题都让农村委员会去管，那就完全错了。这样，萨格勒布的那个委员会就直接同各村联系，越过地方和区的党组织建立组织。这样一来，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就把对党的工作的领导权和组织方面的问题都交给了各种委员会，而自己却成了某种咨询局。这种行为完全同克罗地亚同志身上取消党组织的思想一脉相承。那些同志曾经想通过各种委员会来领导党，而不是反过来，使那些委员会只作为辅助性和咨询性的机构。

达尔马提亚的情况又不同，在那里，现在已被开除出党的取消主义分子想用如下这种办法来取消党：不仅无视党的全部组织工作，而且还公然反对建立党组织，他们成立了劳动人民党，甚至还规定了参加者的作用，上面已谈过此事。塞尔维亚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在那些地方，西米诺夫之流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党；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过的那样。这一切错误都不是偶然的，一部分是尾巴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结果，一部分是党的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直接干的。这一切错误都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或者撤了他们的领导职位，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而得到了纠正。

.....

培 训 干 部

由于缺乏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受过培训的领导干部，我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为全体党员开办低级党校和训练班，为党的领导同志开办高级党校。直到两年前，在这方面几乎还无所作为。即使做点工作，也不过是自学马列主义，既不系统，也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议论谁要对此负责了，因为这已弄清楚了。可是我们仍得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同志和普通党员对此都不够重视，就是说，他们自己也不注意想方设法去填补自己理论和政治上的空白。我们知道，不少同志，而且还是领导同志，特别是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不很喜欢读理论和政治书籍与材料。我们有相当多的机会看到一些领导同志经常连最重要的中央指示都不看。现在人们倒要问一问，这些人又怎么知道和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呢？这些同志对这么简短的材料都不研究，又怎么能使人相信他们会研究和阅读小册子及阅读列宁主义的书籍呢？在我们的党组织里，狭隘的实践主义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同志们托词说没时间，党的工作够繁重的了等等，好象提高自己就不是党的重要工作似的！甚至今天还有一些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仍低估干部的培养工作，即人的培训工作。如果要暂时使某人脱产，把他送到学校里去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要大闹。这是错误的。只要有机会，就应该使人们有可能，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知识来武装自己。

我们党以及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在一年半前获得了一件强大的理论武器，即得到了《联共(布)党史》。该书描述了联共(布)的全部

英勇历程。联共(布)推翻了资本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今天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学习这一历史，我党的积极分子和南斯拉夫的无产者也应学习这一历史。

由于我们这里所处的特殊环境，在南斯拉夫，这本珍贵的书册数极少，不是所有党组织都能得到的。但是许多党组织的同志们为了学习，还是想方设法复印该书，对这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应予赞扬。在中央尚无法向党员提供铅印的《联共(布)党史》之前，应该继续这样做。

近一年来，开始略为有系统地举办一些党的训练班和党校，但是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中央已举办了一期短期的党校，有全国来的近二十名男女同志在该校学习了一个月，效果甚好。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后，中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在全国各地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因此，中央需要各地区委员会和各民族的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中央的任务是选拔一些有讲课能力的干部，监督全国所有的训练班和党校的工作，制订全国各党组织的所有的训练班和党校的统一教学大纲。

还应再次强调的一点是，同志们对这个问题不要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而是要把它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不管日常斗争和工作多么繁忙，都应百倍努力，培训干部，补足以前不可饶恕的疏忽。因为未经很好培训的干部今天是难以担当得起，或者根本担当不起日常的斗争和工作的。即将发生的事件敦促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要被总的形势弄得晕头转向，希望同志们不要因为一些行动取得某些成就而头脑发热，认为现在不是训练干部和培养干部的时候。

对干部的态度和领导制度

对共产党很重要的一点是，同志之间的关系如何，领导同志之间以及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党的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关系。如果同志之间，特别是领导人之间没有那种热忱的同志情谊将我们联系在争取共同目标的共同斗争中，那么斗争的成果势必会受到影响，因为不可能有这种事：一个人恨自己的同志，同时又真诚地热爱着为之奋斗的事业。也不可能一方面恨一个同志，一方面又能同他真诚共事的。有些同志说：“我才不喜欢他呢”或者“我恨他，但为了事业，要同他共事”。这不是肺腑之言，这不是实话，因为这样的人对党来说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有朝一日可能会出于个人的恩怨，憎恨起他原来似乎是为之奋斗的事业来。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这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带进我们党里来的特征。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里，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应该与之斗争，予以杜绝，否则便会毒害党的健全的肌体。

如果在一个党的机构里大家互不容忍和关系不融洽，这就特别危险。这样的机构根本不可能做出成就和产生效率。在这样的机构里老是扯皮和相互争权。由于相互不能容忍，一些好的建议往往也不能被接受，因为彼此妒嫉。这种现象过去屡见不鲜，也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些同志们合不来的机构是害多于利。发生这种情况，上级机构应立即干预，协助消除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即使把那些用这种办法来妨碍机构正常工作的同志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也在所不惜。

党的上级领导机构中的同志对待下级机构的同志或者普通

党员的态度不应该是命令式的，也不应该是行政指挥式的，而是要同志式地向同志们指出错误，或者耐心地向他们把事情说清楚。

在分配干部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时，不大注意那个同志是否适合于做那个工作，如果那个同志无法适应分配给他的工作，或者犯了错误，那就怪他自己。可是事实上，应由分配他去干不适合的工作的领导同志负责。例如，今年在斯洛文尼亚，同志们派了一位同志到他家乡去做某些事，根本不考虑他可能被人认出来落到当局手中。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位同志中了埋伏，被宪兵开枪打伤，伤得很重。另一件事是在特尔日齐发生的 ST 事件，他被派到那里去工作，同样落到敌人手中。第三件事发生在耶塞尼察，同志们事先已经知道，在那里对某位同志是有危险的，因为那儿的宪兵在追缉他，最后被宪兵抓去，遭到毒打。同志们，他们不但不及时把他召回，送到别处，却硬说，那里需要他，一定要留在那里工作。这说明，对这些同志不负责任，使他们冒着危险。说明不爱惜干部，不关心干部。

经常有个别同志爱在普通党员，或者某个同志，或者下级机构的同志面前显得盛气凌人，他们以为这样会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领导机构的威望，而结果恰恰是这些同志显得滑稽可笑和轻浮得很。布尔什维克与众不同的第一个特点是谦虚。如果某位同志犯了错误，首先应该弄清楚，犯错误是有意的还是出于无意的。同志们特别不应该使用污秽的言语以及其他骂人的话和侮辱人的话。共产党内是容不得这种行径的。这种行径使人敬而远之，特别是那些较年轻和较软弱的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不仅对这样做的人，而且也对领导机构产生对立情绪。这样会使领导人和这些人所在的

整个机构的威望受到损害。

.....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1978年塞文版第1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五月会议

摘自 1941 年 3、4、5 月《无产者》杂志第 3、4、5 期

今年^①五月初，举行了一次党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导同志。由于技术原因，马其顿和达尔马提亚的同志未能与会。南共在国家被占领和血腥恐怖的极艰难的情况下，召开这一会议的缘由是：1. 在我国被占领而造成的新形势下，使我们党在组织上迅速适应新的环境；2. 从帝国主义侵略者袭击我国之前和袭击期间发生的最新事件中吸取有关我们党在当时的作用的教训，并得出结论；3. 在国家被肢解，遭受掠夺和奴役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的时刻，确定我们党当前所面临的任务。

这就是一些重大和紧迫的原因，这些原因要求我们党立即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完成我党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所面临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南斯拉夫各民族被奴役的人民群众都把目光转向我们共产党，把它看作他们斗争的领导者，他们也把目光转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它看作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国家。

^① 指 1941 年于萨格勒布。

造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悲剧的原因

当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遭到帝国主义强盗入侵的厄运，十分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历年来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情况，特别是从奥地利被占领到如今的情况。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公告和出版物中发出过警告，敲过警钟。我们曾指出外敌威胁的可怕的危险。之所以会有这种危险，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这个内部敌人竭力使国家沦亡。多年来我们一直号召一切正直的和爱国的人士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首先是反对这些内部敌人，因为他们二十年来一直在为帝国主义强盗开路，致使这些强盗现在奴役我国。因此，历届政府都对我们进行血腥的镇压。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允许在贝尔格莱德、斯普利特和萨格勒布等城市的大街上枪杀群众，是因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以捍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为此，建立了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工人阶级战士的集中营。为此，我国人民的成千上万的最优秀的儿女遭到逮捕和拷打。

二十多年来，打着南斯拉夫国家的旗号企图维持其掠夺性霸权的大塞尔维亚统治集团，一直对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执行着罪恶的民族政策、残酷压迫和奴役的政策。这一政策无法得逞时，就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作出安排，而且总是牺牲人民的利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的资产阶级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间散播仇恨和制造纠纷，在瓜分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财物时，又利用这一点来满足资本家的利益。二十多年来，对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共产党一直进行疯狂的迫害，同时，还迫害和无情地奴役南斯拉夫的整个工人阶级。从南斯拉夫建国至今的历届执政的所有反动的资本主义集团的统治体系，无论是塞尔维亚的，还是其他民族的，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这就是造成凡尔赛式的南斯拉夫的软弱和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在这样的南斯拉夫内部，人民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进行了斗争，要把南斯拉夫变成一个南斯拉夫各自由、平等民族的真正的兄弟友爱大家庭。

其次，正当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要求在最后时刻，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采取拯救措施，给各族人民以民族的和社会的权利与自由，并在外交政策上使本国依靠一个爱好和平的和强大的国家苏联的时候，南斯拉夫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却用同毗邻的帝国主义强盗缔结什么“永恒友谊”的条约的办法来作出回答。这些强盗过了不久便卑鄙地攻打我国，攻打一个他们与之缔结了条约的国家，他们烧毁城市村庄，野蛮地屠杀无辜的居民。今天，还有谁会不以羞耻之感回忆起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轴心国的侵略者入侵我国的前夕就向他们卑躬屈膝的情景呢？同时，那个集团同英国帝国主义者暗中勾搭，敌意地坚决拒绝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这一集团毫不掩饰自己的仇恨，拒绝做全体人民要求做的事，拒绝做唯一能使国家和人民幸免于这一悲剧的事情。南斯拉夫这些不负责任的统治者这一罪恶的对外政策也是造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今天谁都明白，谁都能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在谈到和写文章揭露第五纵队的破坏勾当时，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共产党人在谈到和写到第五纵队不仅是佛朗哥之流及其难兄难弟，而且在

政府、军队总参谋部、国家机关(警察局等国家机关)里都有第五纵队时,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让人民了解这一点,但是,还得有这一番惨痛的血的教训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士兵满腔热诚地去捍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使其不受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犯,但他们很快就惊恐地发现,军队上层卖国的和间谍的行为盛行,他们作了巧妙的有计划的安排,但不是准备防御,而是准备失败和投降;他们发现,在军队指挥岗位上第五纵队的活动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前线彻底吃败仗的事已是明摆着的事了。这一切都影响了士气,这些士兵不得不经常忍饥挨饿,在缺乏弹药和必要的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因为军队上展叛国,武器都放在仓库里……

党与最近的事态

最近的事态完全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主张共产党人必须全力以赴支持人民捍卫独立的努力,在帝国主义者攻打我国时,派遣其所有的党员、服役军人同人民一道捍卫自己的独立。共产党人完成了自己的这一任务。在这方而,党员从未动摇,大家都是同心同德的。此外,党一定要抗击侵略者的路线得到了士兵、军士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极大同情,他们并表示时刻准备战斗。但是可惜的是,潜伏在司令部和指挥岗位上的第五纵队还是干了他们的破坏勾当,而且干得那么出色,以致士兵们的所有高昂情绪和牺牲精神全都成为徒劳无用的了。那些军官中的第五纵队分子竭力跟军队中的共产党人捣蛋。他们根本不愿接纳许多人参加军队,或者把被接纳的人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还

有这种情况；想用枪毙或逮捕的办法把这些人撵走，但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士兵群众都拯救了他们。

由此可见，党在广大穿着军装的工农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剧增。这些群众响应党提出的捍卫人民独立的号召，就是我们党的巨大政治胜利。当各资产阶级政党卖身投靠、软弱无能和摇摆不定的态度使自己在广大人民阶层中威信扫地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却由于一贯坚持争取人民独立的斗争而享有崇高的威望。

这里我们必须提出批评，指出那些在贯彻执行党的捍卫南斯拉夫人民独立的路线方面的不足和缺点。一些党组织和军队中个别党员的主要的、也是最大的缺点是，不懂得要有组织地贯彻党的路线，不懂得利用各种有利时机有组织地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懂得如何去阻止第五纵队分子的活动，如克罗地亚的贝洛瓦尔发生的事。只有两三个佛朗哥分子就搞了一次驻贝洛瓦尔附近的一个团的叛乱，反对抗击侵略者，并放弃了前沿阵地，使敌人突破了阵线，而那个团里当时有约十五名共产党员，他们对这种叛国行为只是袖手旁观，而不是去挫败这些卖国贼。克罗地亚的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共产党人的缺点在于他们很少关心第五纵队在最关键性的时刻干些什么勾当，在于他们低估了佛朗哥分子的卖国作用及其力量。我们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一些组织在敌人入侵时，处于一定程度的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的状态中。共产党人身上有这种缺点是很危险的，在需要迅速和果敢地行动的关键时刻，可能使党领导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无论在何时何地，一旦情况需要，共产党人都必须善于独立、迅速和果敢地采取行动。党的路线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行动指南。因此他们必须很好地了解党的这条路线。在斯洛文尼亚，在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

同志们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共产党人参与捍卫人民独立的事。他们组织了由共产党人和同情者组成的专门的志愿连队。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这就使共产党人脱离士兵的基本群众，而共产党人必须到这些士兵群众中去开展工作；2)这就使党的干部遭到毁灭；3)这就是放弃在后方的工作地盘，削弱党的组织，而党组织的任务是要领导基层的斗争。党组织的缺点在于情报工作搞得不好。党组织经常对事情熟视无睹，不了解敌人会从内部破坏这种最普通的事情，而共产党人如果稍如留意敌人队伍里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可以预防的。例如，在佛朗哥分子利用克罗地亚市民保护组织策划叛国并为侵略者铺路的时候，一些党组织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看到，这是第五纵队在准备打击共产党人。如果关在牢中的同志已经无法营救的话（可是，这在一开始是可能的），那么，最近一些同志被捕是可以避免的。还必须强调指出，有些地方惊慌失措，这也是一个大错误，共产党人身上不应该有这种缺点。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也发生过不少这种类似的现象，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现象，并在今后从中吸取教训。

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党的一个最大的胜利无疑是党仍然平安无恙，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保存了干部，党的工作的连续性一直保留下来，在这场混乱中，只有我们党没有被打散并继续其工作。党的各领导机关，从中央到支部，都在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党的各种公告的颁布以及传单散发都证明了党的力量。南共在这场血腥恐怖猖獗的时候举行会议，也证明了党近年来为应付这些事件所作的准备并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鉴于存在种种缺点（我们这里提到的只是一部分），党的会议讨论了消除这些弱点和缺点的问题，讨论了全党，尤其是党的组织

所面临的¹任务问题。

都有哪些任务呢？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党组织应该做的是，在各级党组织里批判地彻底检查党在最新事件中的工作，弄清各种弱点和缺点，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由于占领和残酷的恐怖统治而出现的新形势，敌人力求以此来扰乱党的工作，因此，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方法，找到扩大宣传鼓动的新方法。我们各级党组织几乎都有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不保密。尽管我们力求消除这个弱点，可是我们尚无法消除它。然而，今天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敌人不择手段，设立紧急法庭来审判最细小的琐事时，保密问题对我党的成败，对保存党的干部就具有重大意义了。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应该龟缩到狭隘的宗派主义的组织中去，相反，现在应该更加扩大党的组织。应该把最优秀的工农分子和正直的知识分子，把所有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或现在都表现出是无所畏惧和守纪律的战士的人们吸收进党组织里来。另一方面，应该把那些在最近的事件中或现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动摇和不可靠的分子开除出党。当然，在吸收新党员入党时和建立新的党组织时，应该极其小心和提高警惕，不要让内奸和异己分子混入党内。

正因为有这些困难的情况，党组织应该十分重视技术部门。应该由严肃认真的党员来组织和领导技术部门。应该把技术部门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部门如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就能保证党的工作的成功。应该把所有指示和决定发到应发的地方去的技术部门如果失灵，那么一切指示和决定就都白费了。

应该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的干部。应该继续办短训

班,学习《联共(布)党史》。占领者及其走狗力图销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所有书籍,因为这是法西斯分子阻挠传播无产阶级导师的学说的方法。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这些书籍,因为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我们斗争的指南。每本这样的书籍和小册子对我党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

党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队伍和在城市和农村扩大党的组织网的同时,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反对占领者和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上。因此,必须在所有地方同所有那些以前就垮了台的、但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占领者和反对一切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带来今天的苦难和不幸的东西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小组和支持者进行联系。同时,应该向人民指出明确的前景和摆脱目前局面的可能性。

党的重要任务是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反对煽动民族仇恨的行径。应该向各族人民讲清楚,这种仇恨一方面是由占领者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更便于压迫受奴役的民族,另一方面,是由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挑起的,其目的是使人民把今天所遭受的苦难的仇恨从这些人那儿转移到个别民族身上。

应该坚持不懈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代理人,既揭露那些为轴心国侵略者效劳的代理人,也要揭露那些为英国人、为恢复带来今天灾难的旧局面效劳的代理人。在国内的这些占领者代理人已经在努力通过所谓的新秩序,将人民群众绑在占领者的战车上,让人民为了他们的战争机器干到精疲力竭。必须反对这一点,办法是使所有产品都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让人民,而不是侵略者来使用这些产品。因此,应该寻求各种办法来确保人民得到生

存所需的食品,使他们免于饥饿。敌人的目的是要用饥饿和侮辱,用小恩小惠,使人民无法进行斗争,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

工人阶级在被占领地区的境况特别艰难。占领者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竭力通过种种威胁来阻挠工人反对占领者和本国资本家的残酷的双重盘剥。他们想阻挠工人在这样可怕的涨价风中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但是,共产党人必须不顾一切,组织和领导这场斗争。应该寻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新的斗争方法。巩固产业工人的团结是工人争取其日常生活需要的斗争成功的保证。敌人的威胁不能成为工人放弃斗争而任凭剥削者摆布的理由。

还应该反对建立劳动营和迫害失业工人。当然,只有在这一反抗变成群众性的反抗的情况下,只有在这些工人得到城乡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持的情况下,成功才有保证。应该最坚决地反对招募工人去德国劳动,那里等待着工人的不是饿死,就是死于英国的炸弹。

今天,当农民对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当这严酷的现实使农民清醒过来,并要求摆脱这一灾难时,党组织应该十分注意农村工作。在斗争的现阶段,最迫切的事是建立工农联盟。应该向农民指出明确的前景,应该向他们宣讲苏联农民的巨大进步、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和进步,而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保证这种生活和进步。应该向农民说明,谁也不会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也不会把他们赶到我们这里来,而是让农民亲自看到,集体农庄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目前,党在工农和市民群众中工作的条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在事关团结和动员群众进行今后决定性的斗争时,宗派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在我国,使群众革命干劲高涨的

动力是：

第一，(1)残暴的占领者当局及对人民的掠夺；(2)更加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群众对那些造成这一情况的人的仇恨；(3)以前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卖国行径；(4)本国资产阶级的奴才相和萎靡不振；(5)历届政府的罪恶的民族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赤裸裸性质；(6)侵略者强加给人民的沉重负担；(7)占领者和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肆无忌惮的掠夺。

第二，(1)存在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该国的巨大进步；(2)一方面是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骇人的大屠杀和破坏。

我们党在现有条件下的工作成就取决于它对待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取决于党员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和活动，取决于每个党员是否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否意识到这些生死攸关的事件和党所面临的任务。任何苟且偷安和坐待良机的做法对无产阶级的利益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1978年塞文版第2卷)

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

1941年8月10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

总司令部《公报》第1期

第一，南斯拉夫各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桑贾克和达尔马提亚）的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主要宗旨是：使南斯拉夫人民从占领下解放出来，打击那些帮助占领者对我国人民进行压迫和恐怖统治的占领者代理人。

第二，我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死敌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我国横行霸道的所有其他法西斯爪牙。因此，所有爱国志士的神圣责任是，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直到彻底消灭这些法西斯匪帮。

第三，游击队之所以叫作人民解放游击队，是因为这不是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战斗组织——在具体情况下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队，尽管共产党人战斗在前列，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战斗队，一切爱国者都应在其中进行战斗，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都能在其中进行抗击占领者的武装斗争。

第四，在我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整个斗争中，游击队有许多任务，它们必须炸毁一切为法西斯侵略者服务的设施：铁路、桥梁、工厂、商店、弹药和武器仓库。它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占领者掠夺

农民的粮食、牲畜和其他食物。应该用武力把侵略者所抢走的粮食、牲畜和其他食物夺回来，并分给人民，但要为游击队留下必要数量的给养。游击队必须阻止占领者征收各种捐税，因为今天这一切都只会有助于占领者进行掠夺战争和进一步压迫我国人民。

第五，游击队必须手执武器捍卫城乡、城镇，使之免受法西斯的肆虐。它们必须保护人民的财产，使其不受占领者的掠夺。

第六，游击队必须到处消灭法西斯部队，特别是军官、盖世太保和黑衫党人等。同样，应该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在我国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人民的叛徒和內奸，这些人把人民的最优秀儿女成批地交到法西斯刽子手手中，充当占领者的忠实走狗，欺压我国人民。

第七，游击队必须不倦地致力于开展人民的抵抗，发动人民起义并作为战斗核心领导这些起义。迄今的游击斗争的经验表明，全民起义的问题被忽视了；因此，必须立即克服这一缺点，否则就可能使游击队脱离那些愿为自己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群众。

第八，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必须是，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阵线，不管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

第九，在建立游击队时，不应该心胸狭窄；应该让广泛成立游击队的主动精神得以发扬。已经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应该立即同地方和专区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接受它们的领导。

第十，司令部和指挥员必须提高警惕，注意不让敌人的奸细和间谍打入游击队。如果发现这样的人，就应该立即将他们枪决并公布他们的名字。

第十一，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指挥员必须特别注意游击队的纪

律。任何抢劫、背叛或其他破坏纪律的行为都应严加惩处。

第十二,司令部必须关心战士的给养、装备等问题。应该同人民解放阵线各级委员会一起来安排给养,人民解放阵线各级委员会应该为人民解放基金募捐。在一些还没有这种委员会的地方,应该在农民和市民自愿的情况下,保证给养或付现金采购食品。

第十三,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桑贾克的所有游击队及其司令部都归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最高领导指挥。

为了协调斗争和成功地进行作战,各司令部之间必须很好地联系。

第十四,司令部和指挥员必须确保所必需的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以医治伤病员。

第十五,随着人民群众的广泛起义的展开,还要建立必要的指挥部,因此游击队司令部和指挥员必须关心经过考验的和优秀的指挥员和政委,使他们能够领导起义的群众。

第十六,如战略和其他情况有利,为了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可视需要,将几个游击队组成大型的军事单位。

(译自《铁托言论集》1959年塞文版第1卷)

共产党和到底谁是占领者的盟友

1942年3—4月《无产者》杂志第14—15期

许多所谓拥护伦敦和南斯拉夫政府的人公开同占领者及其走狗帕韦利奇和奈迪奇勾结，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共产党人。鉴于这种现象日益频繁地发生，我们不少同志以为，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什么变化所致，据说它们对那些反动分子有影响。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看待事物是不正确的和错误的。尽管英美两国内有不少反动集团，他们作为国际反动派的突击力量还一直同情着希特勒，但英美两国还是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国。但是，不应该忘记，英美两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主张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因此，美、英、苏三国同盟是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集团，它将消灭希特勒及其轴心国的追随者。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近几年来南斯拉夫所有反动分子的表现，那么我们会看到，他们仍然忠于其反人民的政策，他们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奉行这种政策，而这种政策导致我国发生1941年4月6日的浩劫。

1938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并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时候，这些反动分子在保卫我国方面而有些什么作为呢？当共产党号召所有爱国志士结成一条统一战线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加强

了对共产党的攻击,以此来回答南共为了保卫祖国而提出的建议。他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了种种可耻的协定。他们同这些沾满我国各族人民鲜血的敌人勾结得更加紧密了。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作了准备,好让南斯拉夫被占领。他们敞开了南斯拉夫的大门,让数以千计的德国间谍成群结队地涌进南斯拉夫,以便“打好基础”。但是,还在发生此事很久以前,还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还在法西斯这个瘟疫刚开始威胁到全世界的时候,所有那些反动分子(除了一部分独立党派人士^①和左派农民党人士^②之外),不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声嘶力竭地反对当时正在各国,包括我国形成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法西斯瘟疫的人民阵线。他们因而开始更为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拥护人民阵线的人。鼓吹这种反人民政策的,主张把南斯拉夫绑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的政策的,鼓吹抛弃旧盟友,废除当时一切条约和同盟政策的,不用说就是斯托亚迪诺维奇和茨韦特科维奇。但是,领导各资产阶级反对党派的所有反动分子,也都没有反对这种反人民的政策。他们反而赞成这样的政策:把南斯拉夫置于强大的法西斯侵略者、宪兵、保护他们利益的人的庇护之下。他们在损害国家独立,反对本国人民的斗争中,为迫害坚决要求改变内外政策和坚决要求依靠苏

① 指独立民主党,其领导人是斯维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在实行独裁时期,它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合作密切,主张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共同斗争反对贝尔格莱德的掌权者。在国内的领导没有坚决执行本党首领(1929年流亡国外,于1936年去世)的政策,而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1938年的九月选举之后该党开始攻击共产党。它和克罗地亚农民党一起于1939年8月参加了马切克政府。独立民主党代表因不赞同参加轴心国三国条约的卖国行径而于1941年3月退出政府。

② 1940年农民党发生分裂;当时的左翼在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领导下分裂出来,成立人民农民党。该党纲领十分激进,但政治实践却是机会主义的。

联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志士，推波助澜。

捷克斯洛伐克的沦陷，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兰等国的沦陷，都无法改变这些反动分子反人民的卖国立场。他们不仅在南斯拉夫被占领以前，而且在它遭到肢解和被占领以后，仍坚持其反人民的政策。我国人民就是由于他们的罪过才受到法西斯的奴役，可是我国人民的可怕的悲剧一点也打动不了他们的心。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变本加厉，把南斯拉夫沦陷的责任推给英国和苏联，推到共产党人身上，说什么是他们煽动起战争的等等。

这些反动分子在占领以前是否得到群众对其反人民政策的某种支持呢？当然没有。相反，他们日益脱离广大群众，后者主张保卫祖国，对共产党团结一切真正的爱国志士，保卫我国独立的坚定政策怀有好感。当我们这样评价这些反动分子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的、斯洛文尼亚的和其他的反动集团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反人民的和卖国的，不管他们之间在权力瓜分和资本主义利益瓜分上是否存在着民族矛盾。

例如，在马切克参加了茨韦特科维奇政府，稍后又参加了西莫维奇政府的时候，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反动党魁们干了些什么呢？当马切克还在茨韦特科维奇的政府里的时候，他支持后者的卖国政策，即支持把南斯拉夫掘在轴心国集团上的政策。他进而将形形色色为人痛恨的佛朗哥分子安插在克罗地亚的各官办和私办的机构里。他成立了所谓的农民和市民保护组织，而领导这一组织的是最死硬的佛朗哥分子。他们从军火库拿出武器来武装这个农民和市民保护组织，该组织的任务是，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进步的爱国志士。就是这个组织在南斯拉夫战败时促使南斯拉夫军队解除了武装，帮助了后来纠集的顽匪的核心人物。马切克在参加西莫

维奇政府的短短时间内，顽固地阻挠和破坏了保卫祖国的任何措施。

马切克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其他反动老爷们把千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投入了集中营，以便以后交给乌斯塔什分子和德国刽子手，好让后者把他们野蛮地杀死。克罗地亚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落入乌斯塔什分子和希特勒刽子手的手中难道是偶然的吗？不，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罪恶的蓄谋，旨在消灭最优秀的工人战士和企图推卸自己的罪责。以马切克博士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反动党魁们有意识地为弗朗哥强盗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对克罗地亚农民党整个党及其下级领导干部一概而论，都加以谴责，那是错误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他们不能对自己领导的卖国行为负责。

克罗地亚以及整个南斯拉夫被占领和被奴役后，马切克本人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部分党魁并未直接参加帕韦利奇政府。然而，他们的投机行为实际上帮了帕韦利奇罪犯的忙。他们顽固地拒绝在人民解放斗争中进行任何合作。他们拒绝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共同反对占领者和帕韦利奇的人民解放阵线。他们是使克罗地亚民族至今不能象塞尔维亚、黑山和斯洛文尼亚民族那样大规模地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主要障碍。他们也是克罗地亚进行一场反对占领者的广泛人民起义的主要障碍。他们的整个表现实际上表明，他们是占领者的伪装得很拙劣的盟友。他们处身于今天有其他各省反动派组成的集团之内，这个集团对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共产党人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他们从占领者那里获得武器，出于害怕群众和为自身的利益担心，公然同侵略者合作。

让我们以塞尔维亚的反动派为例，其中一部分在占领一开始就为占领者效劳。当塞尔维亚爆发了武装起义，当游击队在对付德国匪徒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当共产党由于所进行的彻底的人民解放斗争而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反动派就公开为占领者效劳了。奈迪奇、佩查纳茨和不少其他的人都成了塞尔维亚的帕韦利奇分子，成了屠杀本国人民的真正法西斯刽子手。让我们看看1941年8月间各党派和塞尔维亚各社团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可耻的反共呼吁书吧。呼吁书指责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罪犯的斗争，就站到了奴役塞尔维亚民族的人的一边。再看看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他“钻进森林”以便从那里不断号召人民不要抗击占领者（因为这还“为时太早”，否则会“引起报复”等）的所谓“爱国志士”吧。所有这些人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即破坏任何针对占领者的人民解放斗争，阻止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我国人民最优秀的战士。这是反动分子的一贯的路线，现在它表现为公开替占领者效劳；成立各种切特尼克匪帮，不是去打击占领者，而是为占领者而战，打击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

占领者对南斯拉夫这些反动集团的情绪作了正确的估计，他们在我国所取得的唯一较大的胜利，一方而是巧妙地煽起民族仇恨，使各民族相互残杀，另一方面，就是集结所有的反动集团，使之联合成一个反对人民的集团。占领者虽然竭尽了全力，但并未能把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锋芒转到内战和阶级战争上去。占领者的这个阴谋诡计只能得到各种反动集团的支持，因为它们多年来一直在为其效劳，现在它们又想借助同一占领者来维护其阶级利益，并为此不惜发动内战。所有这些反动集团也象占领者一样，想把

人民解放斗争变成阶级斗争。它们想把解放斗争描绘成只是共产党人的事，说什么共产党人想利用当前的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这些反动分子甚至只是为了丑化共产党和游击运动，而不惜进行造谣诬蔑。他们非常清楚，在广大群众面前反对人民解放斗争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基本上只攻击领导这一斗争的共产党人，力图从内部破坏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例如波斯尼亚的切特尼克分子在德国和乌斯塔什分子发动攻势前进行的围剿）。

占领者的这些反动走狗正在全力以赴，要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因为他们想以此使人民解放斗争失去领导，并以此消灭其恨之入骨的最强大的对手，因为后者使群众摆脱了他们的有害影响。各种切特尼克匪帮，都是由占领者和这些反动分子组织起来的，他们迄今已对共产党人和许多最优秀的游击队战士犯下了一系列滔天大罪。但这不应该使我们偏离正道，偏离真正的人民解放斗争之路，偏离坚决把一切爱国力量（不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团结在一条人民解放统一战线中的道路。敌人的行径恰好说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挑衅，其目的是要在我国挑起内战，以便在当前形势下完全阻挠真正的人民解放斗争，以利于占领者达到其目的，即继续掠夺和压迫我国各族人民。奈迪奇早在1941年8月就预示要打这种内战，当时他就开始派遣武装匪帮袭击塞尔维亚的人民解放游击队。黑山、桑贾克、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各种第五纵队分子也暗示过要打这种内战。可是，我们不要打内战。我们打击占领者，我们要把占领者赶出我们被奴役的国土，我们要消灭占领者。我们正在把我们的全部努力用于完成我们的这一任务和这一目标。而且，我们也正在消灭占领者

的所有走狗，因为抗击占领者的斗争是同打击其第五纵队走狗的斗争密切相关的。不仅我们共产党人，而且我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坚决反对自相残杀的内战。绝大多数人民坚决主张抗击占领者，他们也主张对其第五纵队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占领者及其走狗没有能够依靠其发动的一切攻势、阴谋诡计和屠杀来搞垮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他们也没有能够消灭我们英勇的游击队。这里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人民——南斯拉夫的农民、工人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边，而在占领者卵翼下的形形色色的反动集团及其嗜血成性的乌斯塔什分子、宪兵、切特尼克分子等其他败类站在另一边。

除了上述原因说明为什么反动集团不管是哪个民族，一致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尤其是反对共产党人之外，还应该指出一些在塞尔维亚特别典型的实例。例如，为什么塞尔维亚的反动集团，甚至那些披着民主外衣的人对共产党那么憎恨呢？例如，为什么所有佩查纳茨、利奥蒂奇、奈迪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武装切特尼克分子恰巧在波斯尼亚人民起义具有使波斯尼亚各族人民（不论其宗教和民族特性如何）接近起来的明显特征的时候相互勾结起来了？这是因为塞尔维亚的所有这些人在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目标方面是一致的。他们的旗帜上并没有写着“抗击占领者”、“打倒压迫我国的人”等口号，而是写着“打倒穆斯林”、“打倒克罗地亚人”等口号。他们恰巧是在我们的游击队在波斯尼亚起来坚决反对切特尼克分子的野蛮迫害和镇压无辜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居民的时候，大搞霸权主义的。这些大塞尔维亚反动分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正是因为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口号，无论是在彻底消

灭占领者的斗争中，还是在未来的自由南斯拉夫中都将坚持这个口号。

德国和意大利占领者十分了解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反动派的这种情绪和愿望，因此力图充分利用这一点来镇压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占领者为了对付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给那些集团提供武器、弹药、金钱以及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希望能通过这些匪帮最终打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而人民完全有理由称奈迪奇、佩查纳茨及其他切特尼克分子为塞尔维亚的乌斯塔什分子。塞尔维亚的所有这些匪帮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什匪帮有何差别呢？毫无差别！他们都使塞尔维亚流血，烧毁塞尔维亚的村庄，和嗜血成性的乌斯塔什分子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村庄和居民的所作所为一样。奈迪奇派代表团到帕韦利奇那儿去，就共同反对波斯尼亚游击队进行商议，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东波斯尼亚的切特尼克匪帮从背后袭击正在同乌斯塔什分子和克罗地亚军队作战的我们的部队，同时大喊：“奈迪奇万岁！帕韦利奇万岁！”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奈迪奇、佩查纳茨的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完全停止攻打帕韦利奇和乌斯塔什分子，并把主要矛头转向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游击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贝尔格莱德的奈迪奇报纸、萨格勒布的帕韦利奇报纸都相互吹捧野蛮杀害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行为，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就是这个奈迪奇，塞尔维亚人民的叛徒，迄今已使塞尔维亚血流成河，他在克拉古耶瓦茨同盖世太保一起，用机枪杀害了近七千名市民和工人，在克拉列沃杀害了一千七百名工人，他又同德国人一起把马奇瓦、波策愿纳和塞尔维亚的其他地方夷为平地。奈迪奇这个嗜血成性的人和臭名昭著的帕韦利奇一样，也是一个罪

犯。帕韦利奇在塞尔维亚杀害了几十万塞尔维亚人。这些人都是占领者无耻的走狗，他们千方百计为侵略者效劳，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打垮人民解放运动，为了保证占领者今后继续奴役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借助占领者维护其自私的利益。罪犯帕韦利奇及其杀人成性的乌斯塔什匪徒同克罗地亚民族的精神，同克罗地亚民族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正如罪犯奈迪奇同塞尔维亚民族的精神，同塞尔维亚民族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一样。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占领者，两个都是占领者的走卒和工具，占领者利用他们来消灭我国各族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和逐步消灭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及穆斯林等族的同胞。

许多人会问：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武装切特尼克分子现在在哪里？德拉扎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建制，这支军队已不复存在，即使象四个月前那个样子的建制也不存在了。它现在同其他切特尼克匪帮同流合污了。它用奈迪奇之名烧杀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无辜居民及其房屋，因为奈迪奇这个臭不可闻的老头子，这个卖国的将军双手已经沾满了本族人民的鲜血，以至他的名字就可以表示其他民族的败类的一切罪行了。

请看，到底谁是占领者的走狗，谁是人民的叛徒和敌人！对付这些败类也好，对付占领者也好，都需要一切爱国志士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直到把他们最后消灭为止。但是共产党人，我们游击志愿都队的英勇战士决不能忘了主犯，因为他网罗这些民族败类，协助他们和武装他们。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打击占领者，直到把他们赶出我国的国土，把他们彻底消灭。

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从现在起，要一如既往，站在人民解放斗

争的前列。他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去同占领者和人民的败类进行斗争，而不管这些人民群众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顽强地和大公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同人民一起斗争，承受这场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切艰难险阻。共产党人一定要争取群众，他们不应该脱离人民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现在起，一如既往，在人民最艰难的时候，同人民站在一起。在南斯拉夫的各个地区建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这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抗击占领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但是要使这场斗争成功，就必须发动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起义，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在这方面做得最少）。必须使克罗地亚的工农群众加入这场广泛的解放斗争。在这场全民的解放斗争中，克罗地亚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克罗地亚民族必须洗刷帕韦利奇罪犯及其乌斯塔什分子给克罗地亚民族带来的耻辱。克罗地亚民族只有同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一起肩并肩战斗，才能抗击占领者及其走狗——帕韦利奇、奈迪奇等人。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组织克罗地亚人民的这场斗争，并站在斗争的前列，用自己的榜样表明，应该如何打击占领者，表明他们是本族人民的真正儿女。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定要顽强地致力于建立所有爱国志士在抗击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的团结，以反对所有民族叛徒和占领者的勾结。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塞文版第2卷）

人民解放斗争和 我们党的组织问题

1942年3—4月《无产者》杂志第14—15期

我们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应起的作用是重大而艰巨的。共产国际早在七大时曾就欧洲各国人民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威胁问题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包括向南共提出了重大的任务。这些任务首先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一条反对法西斯威胁的广泛人民阵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还存在着组织上的缺点和内部涣散的现象，南共还无法完全履行其所面临的任務。应该从组织上巩固党，纯洁党的队伍。只有这样做了以后，只有克服了当时对许多党组织妨碍最大的宗派主义之后，党才会大踏步前进，才会在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方面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只有在党员懂得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之后，并以坚定的信念到群众中去贯彻这一路线，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理解这条路线。

南共在贯彻这条路线时，遇到了不少敌人。一些人说，这是防御主义，它背离了阶级斗争的路线。说这种话的是一些宗派主义分子和空谈家。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党在特定情况下的作用。这些人害怕接近群众，怕深入到群众中去。另一些人则是一

些最主要的和最强硬的人。他们说，这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只不过是混水摸鱼”，共产党人在涉及保卫国家问题上，根本不会认真考虑，他们只不过是煽动战争等等。不用说，所有这些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第五纵队分子，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反对我们的党。由于他们掌握着权，所以他们就迫害党，迫害共产党人——抓他们，杀他们。但是，我们党不顾这一切，在保卫祖国，使其不受威胁方面仍贯彻自己的路线。党知道，法西斯侵略者威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是什么样的可怕的危险。党知道，国内没有第二支力量和第二个政党愿意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者。

· 由于看到了这一危险，南共对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感到意外。它并不是仓促上阵的，而是在各方面都早已胸有成竹，它事先已制定好路线和作出了该怎么办的决定，因此对所发生的事件应付自如。南共在组织上是巩固的和团结的。它有一批无限忠诚的干部，它果敢地应付艰难和生死攸关的事件。

在国家被占领以前，南共不断告诫大家要注意威胁着我国的危险。它号召所有爱国志士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它在人民面前揭露了所有那些为法西斯侵略者效劳的人。当希特勒及其他匪帮对我国进行强盗式入侵的可怕时刻到来时，南共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并派出最优秀的党员和战士拿起武器，同人民一道保卫祖国，打击万恶的侵略者。这样，我党就用行动驳斥了那些人民的敌人对党所进行的污蔑。

在敌人奴役我国面和毁灭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独立的时刻，南共就着手在组织上筹建游击队，并把大多数党员派到游击队中去。南共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服务。

在十个月的艰苦的流血斗争期间，南共始终坚持它在我国最初受到威胁那些日子所制定的路线。南共在这整个艰苦的流血斗争的过程中只追求一个目标，即：对奴役我国的人进行坚持不懈的和毫不留情的斗争；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把占领者赶出我国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今天，当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当反动势力在占领者的指挥下集中力量，给人民解放斗争背后插一刀的时候，我们党并没有背离其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和民主力量，更顽强地反对万恶的占领者及其走狗的路线。人民的敌人、形形色色的第五纵队分子企图用诬蔑我们党的办法来削弱人民解放游击志愿军的队伍。他们想把我们的斗争从人民解放斗争转变为阶级斗争，转变为内战，转到占领者制定的路线上去。但是，党和我国大多数人民不会上这些卑鄙计谋的当，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正义的人民斗争的路线，并同我们伟大的盟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一起继续进行正义的斗争，进行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由于有许多内部的敌人、形形色色的第五纵队分子和反动分子，我们现阶段的人民解放斗争变得更为艰难了。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我们的党组织，我们党的党员严格遵循党的路线，不惜任何代价决不偏离这一路线，决不偏离人民解放斗争的路线。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动员我们全体党员，全力以赴，从组织上加强和巩固党，以便使党在这生死存亡的日子里能继续履行其伟大的使命，即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

我们一向强调，我们党的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

题一时一刻都不能忽视，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党成为强大的和群众性的党，能够完成在这生死攸关的日子里向党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的话。共产党是无产者的党，是一个有机体，它应该不断更新和建设，如果它不想让敌人消灭的话，如果它不想被形势淘汰的话，如果它不愿掉队，不愿被挤在一边，只成为一个目前生死存亡的事态的旁观者和束手无策的目击者的话。共产党，列宁的党，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部分，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而且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的领导和组织者。

我们党近几年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同城乡广大群众建立了联系，今天它得到我国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我们党过去和现在，特别是在组织方面犯有一系列缺点和错误。在保存干部方面尤其如此。不够谨慎和不注意保密，使党损失了成百名领导人和党员，特别是在占领者进攻我国的最初那些日子里。如萨格勒布等地的一些党组织，没有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立即将已暴露的同志隐蔽起来。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个别同志拒不接受要他们隐蔽的指示，认为这纯属个人问题。1941年7月，克罗地亚党受到了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当时乌斯塔什匪徒杀害了九十名党员和领导同志，这件事发生在计划把他们从凯雷斯廷纳茨集中营中营救出来面做的草率和毫不负责的工作的时候。由于一些人从旁插手，当时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存在着不健康的状况，这种状况使我们党遭受了这次沉重的打击。

我们党组织的另一个缺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太注意及时用没有暴露的同志去替换已经暴露的领导同志。已经上百次地提请同志们注意这个缺点，但是得到的总是同样的答复：“没有能胜

任的人”。这种答复是不正确的。确实，同志们经常不大信得过年轻的干部，对提拔新人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总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但是，十个月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和错误的。成百上千的年轻党员和共青团员已经被提拔到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的领导岗位上来。年轻的党员和青年人不仅成了能干的指挥员和司令员，而且还成了有才干的政治领导人。在这里，在战场上，由于他们不受限制，由于他们有发挥主动性的充分可能性，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施展。用新干部来替代已经暴露的干部，用新生力量来替代老的、不能活动的和有时有机会主义情绪的领导人的问题，过去一直是，今天仍然是很迫切的问题。以前曾不断提请党组织注意这一点，但对这一问题往往采取慢慢来的态度，或者采取几乎是无所作为的态度。我们的领导同志时常叫苦，说是没有人。他们一般只看到几个通常都是身兼数职的最积极的人，而看不到许多新生力量，他们当中每日都有人加入党，或者将要加入党，因为他们已在日常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特别是在目前的武装斗争中，他们表现了高度的阶级觉悟、纪律性和对工人阶级与本国人民的事业的赤胆忠心。

南共为什么能组织起游击运动，唤起人民起义，将起义变成占领者过去无法，现在也无法消灭的全民的军队呢？不言而喻，党近几年来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正确路线在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占领者的野蛮恐怖行为和消灭我国人民所造成的悲惨情境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但是，在这方面起基本的和主要作用的，是党组织在组织上的巩固，这些组织是敌人无法消灭的，因为它们有多年来在艰难的地下条件下所取得的组织经验。党的组织力量尽管还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对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一直是清楚的），但它

却是那种能使南共克服一切困难和创造这样一个抗击占领者的强大运动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在我国遭受奴役的初期领导干部遭到的重大损失。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有更大一批同志在这十个月的抗击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牺牲了。许多人由于第五纵队分子的骇人的恐怖行为而在大城市里牺牲了;许多人奋不顾身,战死在疆场;许多人惨遭切特尼克卖国贼的毒手。今天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说明党员和共青团员的牺牲人数,但是可以肯定此数超过了三千名党员和七千至一万名共青团员。这对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惨重的损失。这一损失之所以特别惨重,是因为我党一大批最优秀的党员牺牲了,一大批领导干部牺牲了,二十多名南共中央委员、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牺牲了,一大批省委和区委委员牺牲了,一大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成员;共青团中央委员、省委委员和区委委员牺牲了。这是我们党无法弥补的损失,它迫使我们鼓足干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巨大的损失;它还迫使我们顽强地工作,全力以赴去培养我们党和共青团的一批又一批的新领导干部。我们损失了那么一大批党员,这一事实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任务:(1)竭尽全力,消除在吸收新党员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态度和无所谓的态度;(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立即采取具体措施,接纳新党员,特别是接纳游击队和各无产阶级旅中的许多久经锻炼的战士入党;(3)为了使接纳工作做得尽可能正确,党的各级组织应立即开始有系统地收集预备党员的材料;(4)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立即举办短训班,训练预备党员和新党员,在这样的短训班里,他们应该熟悉党员的基本义务。同时,还应该立即着手研究马

列主义，但这不应该成为那些忠心耿耿的经过锻炼的战士入党的障碍，应该给他们机会在党内，在短训班里获得必要的马列主义知识。《联共（布）党史》应成为这些短训班的最重要的课程。

我们在前面已谈到了我们党各级组织过去的错误和缺点的一些实例，但是必须注意从我们在过去十个月中所取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塞尔维亚，有一些党组织犯了这种错误，因为整个区的领导和地方的领导几乎全都随同游击队开拔了，而无一人留在当地，这样，在塞尔维亚一些省的某些地方就没有党的领导机关了。在游击队不得不撤离一些地区后，这一点今天非常明显地反映在党的群众工作和影响上。在我们控制了一些解放区后，同志们就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包括从这些地区吸收和培养新党员的事都公开化了，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一旦丢了解放区，也就丢掉了我党的根据地，即党组织，因为所有暴露了的同志都得随同部队转移，即使那些偶然留下的人也势必被敌人抓去。这是临时解放区里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典型的实例。相反，在那里必须建立极为秘密的党组织，全由没有暴露的同志组成，这样丢了解放区后，他们仍能留在当地。在非解放区里有党组织的存在，对我们党，对进行军事行动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

让我们重申一下，为了保存党的干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已暴露的同志随同部队转移，或者在解放区里工作；但我们同样要强调指出，应立即着手建立绝对秘密的党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我们一旦撤离某个解放区后仍能活动。在谈到完全撤离一个地区的错误，如在塞尔维亚所犯的错误时，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几乎在各省都犯过的大错误，那就是，同志们太不注意及时将有危险的同志隐

蔽起来，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在当地生存下去和安全无恙地工作下去。这样的同志大部分落到敌人手中，并被杀害，党也因此受到惨重的损失。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是如此，克罗地亚及其他一些省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党组织总是拿出老一套的口实：“没有人替换。”这是毫无道理的。宁可使工作暂时受些损失，也不要永远失去一位宝贵的战士。

干部的培养

我们的党组织在同占领者作斗争的这一年里取得了很重要的实际经验。它们同广大的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扩大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等等，但是在系统地培养党员方面，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高党员方面，做得还很差，或者几乎无所作为。我们党这件重要的工作受到忽视，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如不赶快克服，对我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培养我们的干部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当前向我们党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论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在目前的形势下，在艰难困苦的血流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形势下要解决多么重大和困难的问题，都必须坚决有步骤地着手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培养干部。这是解放区的和非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在解放区，这件工作做起来当然要容易得多，正因为这样，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我们不能说，现在已这样去做了；相反，恰恰在解放区里，培养干部的工作几乎完全不受重视。人们比较重视一般的宣传工作，过多地过问军事问题，而不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高干部的水平。经常得到这样的回答：没有必需的参考书等等。的确，要弄到必需的参考书

是很难的,但对那些现有的东西如何充分地合理利用,如何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材料,如何翻印《联共(布)党史》等,并没有尽一些力。此外,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党员的自学很差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不重视阅读和学习,尽管有不少时间和机会。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同志,应该经常自学,要学习和提高才不落后,不被时代淘汰,要成为有才干的领导者,因为精通马列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当今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

用新生力量,用新战士、在艰苦的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战士来更新和加强我们党的问题,是各级党组织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从组织上加强和提高党员的水平,是我们党,共产党能否顺利地履行作为我国被奴役各族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职责的先决条件。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党在履行自己的伟大使命——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迄今之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就是因为党在组织上是巩固的和团结的。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重大的任务,这些困难和任务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党,使我党能彻底地、顺利地履行其使命,完成其任务。让我们朝这个方向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夜以继日地顽强工作,更加高举我们党的旗帜,使我们党从今以后能光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塞文版第2卷)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 国际意义和隐藏的卖国贼

1942年《军事政治评论》杂志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人民游击队所进行的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要使国际舆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所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还需要许多时间。国外长时间不知道我国的真实情况的原因很多。第一，占领者一味沉默，力求使他们屡遭人民解放游击队击败的真相不要传到国外。他们力求把这种人民的斗争说成仅仅是共产党人和一小撮亡命之徒干的事，这些人是为了不落入他们手中才逃到森林中去的。第二，正如我们游击小分队在初期由于缺少武器，不得不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支又一支枪一样，这些小分队和稍后的人民游击队缺少宣传工具（无线电等）。因此，最高司令部长时间以来无法向国际舆论报道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进程。然而，事情不仅如此。就是在国内，消息也是闭塞的。长时间以来，一个省不了解另一个省里发生的情况，不言而喻，这大大阻碍了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第三，一小撮反动分子，即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一批军官从一开始就同国外，即同设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取得联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不断让其周围的一些人，如

德拉吉沙·瓦西奇、奥斯托伊奇少校、拉拉托维奇、帕夫洛维奇中校不断向流亡国外的政府传播谣言，然后又通过电台向国际舆论传播并编造出有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神话，说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同切特尼克分子一起反对占领者的天才军事将领。

让我们略为谈谈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此人和他是怎样在国外成为知名人物的吧。

在南斯拉夫投降时，南斯拉夫军队的大部分军官都向占领者交了械。占领者把这些人弄到德国和意大利服苦役。另一小部分人同政府一起勇敢地逃到国外。第三部分人，是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他们当中就有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跑到拉夫纳山，跑到了一个安全的防空洞。在那儿，如果塞尔维亚不开始展开强大的游击运动的话，他也许会安安逸逸地呆到战争结束。塞尔维亚游击运动所进行的成功解放斗争和一些城乡的解放，使得这些老爷采取了一些行动，以使他们不被形势淘汰。在游击队员正在夺取武器，砍掉德国人的脑袋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代理人却在贝尔格莱德游逛，为德拉扎招募军官，同德国人和奈迪奇进行谈判，散布什么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如何准备斗争，只不过还不是时候的种种谎话。这种关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准备抵抗占领者的谣言传到了国外。请听英国使团团员赫德逊上尉是怎么说的。他是1941年10月同南斯拉夫军队的少校奥斯托伊奇和拉拉托维奇一起抵达南斯拉夫的。对我提出的关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根本不进行抗击占领者的斗争，以及伦敦怎能把他当作什么英雄的问题，他向我讲述了如下情况：“英国政府对那个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无所知。事情是美国一些报纸闹起来的，一名曾到过土耳其的美国记者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文章谈到德拉扎·

米哈伊洛维奇英勇抗击占领者。”由于国外已经听到过我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塞尔维亚人民进行抵抗的事和我国发生的一些武装冲突，这就被当作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南斯拉夫流亡在伦敦的政府马上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当作某种靠山，以为有了他，就可以奉行其在南斯拉夫建立大塞尔维亚基地的政策了，而且就在目前，在国家被占领的时候就这样做，从而不被形势所淘汰，也就是说，流亡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止人民走自己的道路，人民在浴血的解放斗争中开始开拓的道路。

他们就是这样用卑鄙的手法从英雄的游击队员所流的鲜血中捞取资本，而游击队员是在争取各族人民自由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用不光彩的手法在国际舆论面前隐瞒了事实真相。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背叛行为被当作爱国主义和美德。每当米哈伊洛维奇向我们的人民解放游击队背上捅上一刀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过去是，现在还一直是这样在国际舆论面前把南斯拉夫游击志愿部队的非凡的斗争说成是吸吮了游击队最优秀战士鲜血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的业绩。

这种消息闭塞的情况持续了九个月，直到最高司令部终于能逐渐开始向国际舆论揭穿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的可耻的叛国的真面目。

身受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贩卖之害的我国受尽苦难的人民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注视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伦敦的政府玩弄的卑鄙把戏。我国人民要问：难道伦敦政府看不见事实真相？我国人民要问：难道伦敦政府看不见德拉扎及其切特尼克分子同意意大利人、乌斯塔什分子、德国人勾结吗？可是，

今天大多数真正的爱国志士已经明白，流亡伦敦的政府也十分了解这一点，因为它自己也参与了这一肮脏的叛卖活动。通过伦敦电台嘉奖切特尼克分子中最嗜血成性的军官、剥夺十名参加人民解放志愿游击部队的真正爱国军官的军衔和这一政府所作的许多其他姿态都证明，伦敦政府十分了解这一切，是蓄意这么干的，并希望这种肮脏的行径不会在国际舆论面前被揭穿。但是，国外的这一幕后勾当的面纱已经到了慢慢地、但却稳当地被揭下来的时候了。流亡伦敦的政府企图通过种种辟谣的办法来使这种肮脏的行径不被揭露，但是它很难得逞。我国人民有权要求让所有那些染指于伪造勾当和叛国行径的人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审判。

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的战士和所有真正的爱国志士都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意义，而且对所有被奴役的人民的斗争也有意义。他们认识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及其盟国所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的这场艰苦流血的斗争使全世界都感到钦佩，正在进行这一斗争的我国各族人民决不会允许各种各样伪装的卖国贼这样嘲弄成千上万牺牲了的游击英雄，这些游击队员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更美好的未来献出了，并且每天都在献出自己的生命。

最高司令部和许多爱国志士长期来一直保持沉默，他们以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自己会认识其错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抱着这样的希望，即希望政府只是迷误，并且最终会悬崖勒马，纠正错误。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这个政府顽固地有意继续走那一条路，即反人民的道路，卖国的道路。每一个爱国志士的神圣的责任，无候是坚决起来反对任何一个阻碍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人。必须无

情地揭露每一个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为占领者效劳的人——无论出于其个人的利益也罢，或是出于任何其他利益也罢。

我国的解放斗争在今天整个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事情很清楚，那些肩负反占领者的艰苦流血斗争重担的人决不能容许其他人利用这一斗争和摘取果实。尤其不能容许那些阻碍这一斗争的人，那些为占领者效劳并同占领者一起反对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的人来摘取果实。我国的人民解放游击志愿部队正在为抗击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的占领者及其走狗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奈迪奇和佩查纳茨的切特尼克分子以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而斗争。不用说，所有这些占领者的走狗之间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所有这些都同样是为占领者和今天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敌人效劳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今天赤裸裸地或偷偷地同意大利人合作，这种合作要比同德国人的合作多。但是，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他们是只同意大利人合作，还是只同乌斯塔什分子合作，或是只同德国人合作，或者同时同所有这些人合作，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各族人民的叛徒，对这些叛徒，必须象对所有其他叛徒一样进行斗争。

看来，伦敦的政府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丝毫不考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想法和情绪。看来，它在这整个战争过程中什么也没学到，并且还一直生活在老圈子里，这一圈子散发出欺诈、撒谎和恬不知耻的气味，这就是战前南斯拉夫当权派所特有的。而这也导致了我国在1941年4月所遭到的灾难。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创建

1942年9—11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
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公报》

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由许多突击旅、游击旅和一些较大的游击队组成了正规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它是经过了十八个月的艰苦的浴血奋战后产生的，它是用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和儿女的鲜血缔造的。这样，我们的一支英勇的、受到人民爱戴的、报仇雪恨的解放军就诞生了。这支人民军队的创建是迄今南斯拉夫各地人民起义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这一过程是长期和艰苦的，因为我们的人民军队是由一些游击小分队组成的。它是由赤手空拳举行起义、同占领者及其雇佣军展开斗争的爱国志士、农民、工人、正直的知识分子、城乡青年所组成的。我们不得不用流血牺牲从敌人那里夺取每一枝步枪、每一颗手榴弹、每一粒子弹、每一挺机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门大炮，并打退了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均占优势的敌人的无数次攻势，这些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游击队和游击旅，镇压人民起义。可见，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是从上而下通过一道命令强迫建立的；不是靠兵工厂，不是通过军事后勤部门装备起来的（以前这些军事后勤部门在武装南斯拉夫旧军队中赚了大量金钱）。相反，我们英勇的人民

军的每一名战士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艰苦的斗争，并用自己的鲜血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的。背叛我国人民的卖国贼、南斯拉夫旧军队的各种高级军官和将领在去年4月可耻地向敌人缴了械。

师和军即我国人民军队是在这样的時候创建的：这样做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已有这种需要，许多旅和营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些旅和营用几乎各种武器（除了飞机）武装起来了，已经无法用迄今的办法来领导各游击旅、游击营和游击队了，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领土已经解放，并且最终表明有必要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了。

人民军队的创建为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给占领者及其乌斯塔什分子和切特尼克走狗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创造了条件。但是同时，领导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要求在迄今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几乎只会运用游击战战术的指挥官有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作战本领。我们人民军的战术一定要同我们迄今运用的游击战术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应坚守阵地，又要避开这些阵地；我们要避免让我们的敌人用自己的战术迫使我们在漫长的战线上防守和堵塞漏洞等等。相反，我们的人民军队主要靠进攻精神。不仅我们在进攻时如此，防御时也应如此。

在敌人发动攻势时的进攻精神表现在强有力的、果敢的游击战术上，深入敌后的战术上，不仅摧毁通讯系统，而且还要摧毁敌人的补给中心、敌人的基地，因为这些基地在敌人发动攻势时军事上就会遭到削弱成完全空虚了。我们不必害怕受到包围，正如我们队伍还很小的时候不害怕那样。每当我们失去一些土地，就要夺取新的、更大片的和更重要的土地。

在创建人民军的时候，我们还保留了我们许多地方上的游击队，而且，我们还必须在尚未解放的地区，在全国各地建立越来越

多的新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负有重大的和光荣的任务，就象那些今天已成为人民军的游击队曾负有的任务一样。

我国的人民军是由在浴血奋战中经过锻炼的战士组成的，是由深深扎根于人民中的我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组成的。因此这支军队是战无不胜的真正人民军队。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1942年11月26日于比哈奇

同志们，兄弟姐妹们，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

我谨代表最高司令部、我国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指战员和政委向你们表示欢迎。

我认为，今天，在经过了我国各族人民不得不在这十八个月中进行的艰苦的浴血奋战之后，我有机会在这里，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上向你们祝贺，感到十分荣幸。

我宣布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历史性会议开幕，并借此机会向你们讲几句话。

这场长期的、艰苦的浴血奋战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斗争，因为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投入这场斗争的。这一斗争的结果是我们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集会，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将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最高司令部、同人民解放委员会一道领导我们的斗争，组织后方，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到摧残的我国组织起来，并在这种情况下尽力而为，以便我们能把这场艰苦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同志们！我们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合法政府，因为国际关系和局势还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权做一件事，那就是在这艰难的环境下成立一个政治机构、一个政治机关，它将团结全体人民群众，团结我国人民并领导他们同我们英勇的军队一道继续进行我们所面临的十分艰巨的斗争。在我国的领土上，除了我们的人民自己建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机构。我们不承认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傀儡政府，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自己的洒满了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儿女解血的土地上，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使我国人民也能在这种环境下为人民解放斗争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当我们还是一支不大的游击部队和只有小小的游击队伍的时候，我们要求没有这么高。可是今天，这些小小的游击队伍已经变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它不仅在持久性和士气上可与敌人相匹敌，而且还超过敌人，尽管敌人在装备上占有优势。因此，现在提出了比过去高得多的要求。过去每个村庄，每个县或者区都养得起自己的战士。现在必须组织权力，组织政权，以便能够动员，能够挖掘我国人民中所蕴藏的一切潜力，把它用于一个总的目标，即反对罪恶的法西斯占领者，反对他们的盟友，反对我国的卖国贼、乌斯塔什分子、切特尼克分子等等。

我为今天我能在这里看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最优秀儿女、爱国志士、我国各族人民的真正代表而感到高兴，你们都在这场艰苦的浴血战斗中得到了锻炼。你们不是过去那种由国会选出的代表，而是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从人民中成长起来的，是决心在斗争中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我为我今天能在这里见到确实是我国人民中间最优秀的分子感到高兴。

同志们！我们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身负重任。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用我们最优秀战士的鲜血换来武器。我们的国土被蹂躏，我国的人民惨遭苦难，忍饥挨饿，无衣无鞋，处在切特尼克分子、乌斯塔什分子和占领者的野蛮恐怖统治之中。可是，我们有一样东西——受尽苦难的人民的坚贞不屈和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不仅我们的军队有高昂的士气，这种士气使全世界都感到钦佩，而且我国人民也有这样的高昂士气。看看那烧光的村庄吧。冬天，就在这些村庄附近，男女老乡在破草屋或者在露天里，在树林中烤火，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抱怨，而是说：“亲爱的弟兄们，战斗吧，我们会把剩下的最后一口粮食也给你们的，好让你们打败我们的共同敌人。”这就是罕见的、难能可贵的士气，这是南斯拉夫人民的骄傲。

毋庸置疑，我们在这里创建的、由下而上产生的机构，任重道远。我们的部队需要衣服，可是我们没有服装厂。我们的部队需要鞋，可是我们没有制鞋厂。我们的部队需要武器，可是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部队需要食物。这一切任务都落在我国人民创建的这个作为自己政权萌芽的最高机构的身上了。我认为，你们中间没有害怕这些困难和重任的人。我认为，你们大家都准备在这场正在胜利展开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过去和将来都要打击敌人，尽管他们武器上占优势。同志们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我们最高司令部和你们在一起，就能够较容易地克服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今天，我们对付这些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要比六个月以前容易些。今天，前景是光明的——胜利属于盟国，这一点象太阳一样明亮。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匪帮正连遭失败。英雄的红军已经给予德国法西斯匪徒和希特勒的附庸以致命的打击。斯大林格

勒，这座全体进步人类的堡垒已经守卫住了。数十万名德国士兵在这次攻势之前和这次攻势中丧生于这座坚如磐石的城市城墙下。希特勒的法西斯分子困兽犹斗，但已走投无路。他们在垂死挣扎时，可能要把怒火发泄在弱小的被占领国和被占领国的人民身上，但是我们要正告他们，他们在我们南斯拉夫不会好受的。今天我们有一支军队，有步枪、大炮等各种武器，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较量，请你们放心，他们在我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其阴谋——消灭我们。我们从未丧失信心，今天更谈不上怀疑胜利是否会属于我们。因此，在此时此刻，当各国受奴役人民看到法西斯野兽行将灭亡而高兴得心情激动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和信心，勇敢地去迎接等待着我们的困难，我们相信，通过齐心协力，共同斗争，我们能把这场长期斗争和苦难引向幸福的结局。

同志们！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迄今取得的我国斗争的一切成果，有一部分是我们伟大的斯拉夫兄弟俄罗斯人和苏联其他民族的功劳。对苏联的力量和威力充满信心，对红军的力量和威力充满信心，是我们的精神粮食，它支援我们克服这十八个月所遇到的困难。

我祝你们，祝人民的最高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今后在为人民造福、为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造福和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这是正在形成的基础，兄弟情谊的基础，任何人再也破坏不了的和睦和团结的基础。这次历史性会议证明了我国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穆斯林等各族人民不分信仰和民族的团结。这次会议又是一个保证，保证走向创造我国各族人民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

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万岁!

英勇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盟国英国和美国万岁!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反法西斯妇女阵线第一次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42年12月5日于波斯尼亚-彼特罗瓦茨

同志们！我代表最高司令部及我们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军事指挥员和政委们向你们表示祝贺。我能参加反法西斯妇女阵线这一历史性的会议和看到我们那些在这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和那么多英雄主义榜样的南斯拉夫英雄妇女的代表感到格外高兴，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我们可以自豪地把我们看作是我们伟大的俄罗斯兄弟、苏联人民和英雄的苏联妇女的盟友。

你们今天的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反法西斯妇女运动在南斯拉夫早就存在了，但是还从来未能象今天这样完全以自己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那些抛头颅、洒热血、在我们受难的祖国各地奋战的光荣战士的功绩。南斯拉夫的妇女还在1936年反法西斯妇女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就表现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她们力争站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斗争的前列。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今天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今天，妇女们同男子并肩地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为反对残暴的侵略强盗及其走狗而斗争。她们为本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她们为反对法

西斯制度,为反对在德国存在着的那种中世纪的奴役制度而斗争。她们争取本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她们争取妇女平等的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而在南斯拉夫国内,我们的妇女过去是享受不到这种平等的,她们对社会生活问题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定权。今天,在这场斗争中她们为妇女的平等而奋斗。在这场敌强我弱的非凡的斗争中,她们证明了她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平等,她们在同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侵略者作战的战场上用自己的生命、鲜血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各族人民的女儿站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前列。我们的后方比任何其他地方更能证明她们对于决定全人类命运、决定妇女命运的这一历史时刻,有多么高的觉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这一会议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我国的妇女、我们的女儿、母亲手持武器参加了人民解放斗争。我为我率领这样一支有大量妇女参加的军队而感到自豪。我可以这样说,妇女在这一斗争中就其英雄主义而言,就其毅力而言,过去和现在都是居首位和名列前茅的,我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光荣。

同志们!众所周知,在这场斗争中,妇女肩负着重担——在后方是这样,在前方也经常是这样。诚然,你们的儿子、父兄是战场上的战士,然而,你们在后方同样是重要的因素。今天,我们军队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是我们英雄的南斯拉夫妇女的伟大功绩。我们所进行的斗争要求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这些牺牲的重担全都压在我们妇女身上,压在我们的母亲和女儿身上,她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们迄今的斗争吞噬了许多优秀的女同志、优秀的战士——我国各族人民的女儿。一些人牺牲在占领者的魔爪中,不少妇女牺牲在乌斯塔什分子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的

魔爪中，不少妇女被奸污、凌辱和杀害了。我国各族人民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消灭卖国贼！

但是，我国人民、我国妇女所作出的牺牲并未动摇妇女对这场斗争结局、这场正义斗争必胜的信念。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事情恰恰相反，我国妇女为这场斗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后方，她们最坚定和最先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些被乌斯塔什分子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控制的地方、村庄和地区的妇女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那些使我们充满自豪和信心的东西。我国妇女决不是偶然地、不自觉地和自发地参加这场斗争的，她们是自觉地认识到这一历史事件，认识到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争取我国各族人民和妇女本身更幸福的未来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以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作出如此巨大牺牲并如此顽强地站在人民解放斗争前列的南斯拉夫妇女，今天有权在这里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一斗争也一定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妇女带来果实，任何人再也无法从她们手中夺走这些付出了高昂代价的果实！我国的人民解放军和所有站在伟大斗争前列的全体妇女都将支持我国妇女的这一事业。

也许有人在梦想，战争结束以后，南斯拉夫一切仍将照旧，妇女仍将回到厨房，决定不了任何事情。可是，同志们，妇女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她们表明，她们不仅能在厨房里干活，而且还可以手执武器进行斗争，她们还能够实行管理和掌权。这次会议也证明我国妇女认真地把人民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伟大的斗争目标、为了最终战胜占领者及其走狗西把妇女团结起来的反法西斯妇女阵线的宗旨，是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是为她们取得公民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平等权利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事实是,站在我们一边的绝大多数妇女过去和今后都将促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我们的队伍,战胜重重困难。不言而喻,在我们还必须进行的艰苦斗争中,反法西斯妇女阵线还面临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过去已经表明了你们对斗争、对我们在战场上的同志们的极大的爱戴和谅解。你们献出了你们能够贡献的一切,但是还没把可以利用的一切可能性都利用起来,以使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你们在这里开会,你们将使自己的工作更有组织和更有条理,并努力做到使我们的军队尽可能得到应得到的东西。我们把你们看作是后方的支柱。你们妇女不仅应该关心你们对前方所承担的任务,而且还应该关心后方,用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不要让危害南斯拉夫所有爱好自由的力量们的共同利益的敌人潜伏下来。这一任务也落在你们的肩上。我们的战士需要衣服,需要袜子,冬天到了,还需要手套、食物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同志们,这都得靠你们。你们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助手。你们是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也是后方的一支最大力量,你们能够作出不少贡献,你们能够帮不少忙。

还有许许多多处于占领者统治下的妇女,她们在期待着你们说话,她们在期待着你们到她们那儿去,召唤她们参加共同的斗争。我可以这样说,我为你们在我们解放区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极为满意。你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为了使其他地区的妇女团结在反法西斯妇女阵线的周围,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南斯拉夫妇女有参加斗争的权利和责任,因为她们把她们最亲近的人——自己的儿女送到正义斗争的“祭坛”上。同志们,我相信,我们今天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果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夺

走。我相信，在我们的斗争中，你们还将镇定地继续经得起这种缺吃少穿的情况，不会向任何困难屈服，你们将同我们一起，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坚持到最后胜利，我可以在这儿对你们说，胜利已在望。

今天，你们也知道，法西斯侵略者、法西斯反动分子在辽阔的苏联国土的战场上接二连三遭到失败。英雄的红军正在摧毁和消灭法西斯匪徒，所谓不可战胜的法西斯军队最终灭亡的日子正在日益接近。我可以这样说，在苏联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苏联妇女作出了无数前所未有的英雄行为和顽强精神的榜样。因此，我应在这里再次强调，我国各族人民可以为我国妇女在这场艰苦和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同样坚定不移而感到骄傲。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苏联各族人民了解并珍视南斯拉夫妇女在我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伟大作用。

最后我还想说，反法西斯妇女阵线早已存在，而现在它又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它确实是一个从下而上产生的组织，这是由于妇女常常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顽强精神。同志们，我认为，反法西斯妇女阵线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支力量，我们确实可以同它一起勇敢地迎接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多的成就，祝你们的工作富有成果，以利于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以利于我们的最后胜利和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

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万岁！

英雄的苏联妇女万岁！

苏联万岁！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南斯拉夫青年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2年12月27日于比哈奇

同志们，南斯拉夫的青年们！我谨向你们转达我国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祝贺。

南斯拉夫青年早在战前很久就用行动表明，他们是无比憎恨法西斯主义的。当法西斯幽灵的阴影笼罩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头上的时候，南斯拉夫青年就站在反对法西斯强大威胁的前列，站在捍卫我国独立的前列。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青年由于热爱自己的祖国，由于憎恨暴力和我国人民的敌人而被投入南斯拉夫的监狱。那些使我国人民去年4月遭受灾难的反动家伙把他们投入了监狱。当法西斯幽灵把它的血爪伸向我们祖国的躯体，伸向我们南斯拉夫的躯体时，青年首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起，不顾敌人拥有极大的优势，奋起捍卫自己的祖国。但是，正如你们知道的，当时没有人来带领我国的这支军队，因为人民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去的这支军队是由卖国贼领导的。

当我国受到奴役时，青年又是第一个不顾法西斯侵略者的可怕的恐怖行为，在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我国其他地区的街头，毅然地烧毁敌人的卡车，焚烧法西斯的报纸等等。在我们的年青

战士手中还没有步枪的时候，他们就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当共产党从我国受到蹂躏和兄弟的苏联遭袭击的第一天起，号召人民去捍卫我们孤苦伶仃的生命、我们亲爱的祖国的时候，青年首先参加了我国那支很小的游击队，后来游击队逐步成长壮大，成为越来越大的部队，今天已是一支解放军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中，有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的战士是我国各民族的年轻一代。

在这场艰苦卓绝、敌我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我国的青年人表明，他们不愧为我们光荣的祖先的子孙。他们在各种艰难和浴血的斗争中树立了无数英勇不屈、不顾自身安危和自我牺牲的范例。

我国的青年男女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和其他卖国贼要进行血腥屠杀的最主要对象，是乌斯塔什刽子手要杀害的最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都把青年视为最大的敌人。他们把青年看作自己的敌人是理所当然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的雇佣帕韦利奇以及法西斯走狗奈迪奇无法把南斯拉夫青年引入其法西斯的模子中去，无法毒害青年并把青年引上血和泪的道路，引上摧毁人类所有成果的道路，引上反对我们的伟大苏联兄弟的道路。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南斯拉夫青年在欧洲第一个向法西斯侵略者说：不，我们要呆在我们的南斯拉夫同你们斗，因为你们违背我们的意愿强行进入我们的国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各族人民的青年无愧地走过了这十九个月的艰苦卓绝和浴血奋斗的光荣历程。从我们的十六岁和十九岁的青少年中涌现出我国各族人民历史上从来很少有过的英雄。

人们要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是什么东西激励我国青年，使他们不怕困难，不惜一切力量和牺牲呢？是对法西斯的无比仇恨。

这种仇恨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埋藏和孕育在我国青年心中，因为南斯拉夫青年一直把法西斯当作死敌。是我国青年对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所怀有的无比热爱，是对青年的自由和本民族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热爱；是青年要为更美好的和更幸福的未来、为建立一个比他们过去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和决心。这些都是曾经推动并仍将推动我国青年不停顿地前进的因素。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能解放区举行第一届南斯拉夫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本届代表大会对我国年轻一代有重大的意义。它显示了我国青年的力量。它是你们力量的一次检阅。应该通过本届代表大会更加加强在我们伟大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团结，加强我国各族受奴役人民的青年儿女的团结。应该通过本届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因为共产党一直把青年看作是兄弟情谊和团结的体现者。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没有搞错。

青年同志们，我们仍然面临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还有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斗争已经朝着清楚表明最后胜利终将属于我国和我们的盟国的方向前进了。你们自己也知道，英勇的红军近日来已给奴役伟大国家、奴役青年人有广阔天地的国家的德国法西斯分子和其他法西斯分子以沉重的打击。法西斯野兽想摧毁青年人的国家，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遇到了苏维埃各族人民的年轻一代。这年轻一代正以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进行斗争并正在大雪纷飞的草原上追击法西斯侵略者。今天我们胜利的前景是明朗的。但是，恰恰是现在，我们青年一代的内部敌人愈来愈多：米哈伊洛维奇的形形色色切特尼克分子、原来躲藏在老鼠洞里的现在却钻出来想捞一把的种种胆小鬼。他们都同占领者沆瀣一

气，并企图暗中破坏我们迄今反对占领者的百战不殆的斗争。流亡在伦敦的卖国政府正在帮他们的忙。我们青年一代的仇敌不仅是法西斯，而且也是那些反动的卖国贼，他们在战前就千方百计阻碍我国青年一代的成长，并想把他们变成奴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对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进行社会压迫的工具。我们面临的是一些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是一场事关对付阴险狡猾的敌人的斗争，这些人想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且使我们兄弟不和。因此，打掉所有这些卖国贼的如意算盘的重任落在你们青年身上。我想，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复旧。年轻一代为了自己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流血牺牲，为美好的将来而流血牺牲，他们不愿把已经取得的成果让给伦敦的任何流亡分子或者任何其他入。如果我们不懂得维护这些成果，我们就没有资格享受今天斗争的成果。

我可以强调下列事实：南斯拉夫青年在这场战争中和在这场艰难的斗争中同我国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其他战士一起，在全体进步人类而前取得了我国军队在我国各族人民历史上从未取得过的名声。我国军队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争了光，这是我国年轻一代的巨大功勋。

我可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青年人在迄今的斗争中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更加受到苏联人民的爱戴。苏联各族人民以自豪的心情看着我们，把我们当作亲兄弟和战友。苏联的英雄青年把我们青年一代、南斯拉夫青年看成是自己的兄弟。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巨大光荣。

同志们，我相信，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无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中，还是在后方和敌占区工作中，你们都会百倍努力，使我国各族人民和我国青年一代能更迅速和更彻底地战胜敌人。

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我们英雄旅的战士们,会百倍努力,消灭我们的最大敌人——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匪徒、乌斯塔什分子和奈迪奇匪帮以及米哈伊洛维奇匪帮。我相信,当你们的枪口对准投奔卖国贼队伍的、那怕是你们的亲人的时候,你们的双手也不会发抖。

同志们,我祝本届代表大会取得我国各族人民、我国青年以及世界民主力量所期望的那种结果和成果。那就是:南斯拉夫全体爱国者和青年一代在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的团结友爱。

我祝贺你们,祝你们工作取得成就。

南斯拉夫青年一代万岁!

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万岁!

英雄的苏联青年兄弟万岁!

英雄的红军万岁!

消灭法西斯!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从人民解放斗争角度 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1942年12月《无产者》杂志第16期

我希望，这篇写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文章，能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儿女已进行了十九个月的这场伟大而正义的斗争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我希望所有那些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和对前途惶恐不安的人认识到，存在着一条唯一可行的通往他们更美好的未来、自由和平等的道路，尽管这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民解放斗争，希望他们参加这场斗争，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队伍。今天，任何人都不要感到孤立无援，都不要害怕那些过去曾对我国各族人民和我们全国犯下那么多罪行，以致今日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人讲话的人的种种威胁。在这场艰苦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用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儿女的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指出光明的前景；我们一定会赢得我国各族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南斯拉夫再也不要再有民族压迫和社会奴役。

看来，今天对我国和世界各国正在抗击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者的进步人士——反法西斯分子和爱国志士来说是很明白的事，可是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当权者们却怎么也不明白；

首先，这场战争与上次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是不同的，这是一场卫国的解放战争——正义战争；

第二，几乎在所有被奴役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南斯拉夫，这场反对占领者的战争不是将军、大臣们在打，而是人民自己在打，但这不是这些将军、军官和其他卖国老爷们的意愿，而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

第三，苏联参加了这场解放战争，并担负起这场战争百分之九十的重负，它不允许它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的果实被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反动派摘取，不允许他们再欺压其他国家的人民，策划新战争的阴谋；

第四，正是许多国家的民族压迫和不平等使得法西斯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奴役那些国家；

第五，大西洋宪章并不是要牺牲他国人民来扩大边界，也不要奴役和压迫他国人民，而是应该意味着各国人民的自由自决——因为宪章里写着，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以后，各国人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大西洋宪章是吸取凡尔赛式和平的惨痛教训之后制订的。凡尔赛式的和平，尤其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来说，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凡尔赛式的和平还引起了这场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可怕的战争。

可是，流亡在伦敦的老爷们不想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连同其切特尼克的难兄难弟一起都同占领者合作；因此，他们只字不提必须解决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相反，公然威胁其他民族并策划扩大边界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今天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对待穆斯林、克罗地亚等民族的态度完全暴露

了他们的阴谋。

在科孚岛、伦敦和巴黎诞生的凡尔赛式南斯拉夫，在欧洲成了民族压迫最典型的国家。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和黑山族成了从属的民族，成了南斯拉夫不平等的国民。马其顿族、阿尔纳乌特^①族等也受到奴役和遭到灭顶之灾。穆斯林族、德意志和马扎尔少数民族充当了反对克罗地亚族和南斯拉夫其他民族斗争中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工具。

以国王为首的一小撮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贪得无厌地掠夺财富，统治南斯拉夫达二十二年之久，建立了宪兵政权、格拉弗尼亚奇^②政权、没有社会权利和民族权利的政权。这批老爷对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关于平等的一切正当要求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在萨洛尼卡前线打过仗”，“我们解放了这个国家”，“我们在卡伊马克查兰流过血！”这批当权的老爷、各种投机分子、发战争财的人和贪污腐化分子都利用这种无稽的谎言，并以此来亵渎真正的塞尔维亚农民英雄们的圣墓。这些农民英雄是抱着深切的信念而牺牲的，他们深信，他们是为了塞尔维亚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未来而献身的。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佛朗哥分子，今日的乌斯塔什分子之流把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的罪恶勾当归罪于整个塞尔维亚民族，从而引起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对兄弟的塞尔维亚民族的仇恨。塞尔维亚民族不仅同本民族统治者的这种罪恶的民族政策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整整二十二年来也象南斯拉夫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奴役，受到宪兵的横行霸道之害。何况，他们已认识到，他们上当受骗，在上次战争中几十万人无谓地牺牲了。他们英

① 即阿尔巴尼亚族。——译者

② 贝尔格莱德市一监狱的名称。——译者

勇斗争的果实被那些战争期间曾坐在法国、伦敦、瑞士咖啡馆里和海边的人们攫取走了。塞尔维亚民族以痛苦的心情担受了这样的侮辱和不公正的责难，说他们也参与了其败类对南斯拉夫其他民族进行的民族压迫的罪行。

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的民族政策是：

1) 贿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穆斯林等民族中最反动的分子，利用他们从内部来破坏这些曾为平等斗争的民族；

2) 收买斯洛文尼亚、穆斯林和杰米耶特^①的政党上层人物，并借手于他们来欺压克罗地亚族。换言之，就是利用一个民族来反对另一个民族，即有步骤地分裂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各兄弟民族之间散布仇恨和加深裂痕。也就是说，是分裂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而不是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兄弟的、平等的国家共同体中。

霸权主义集团老是笨拙地喋喋不休，说什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仅仅是同一个民族的一些部族而已，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使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塞尔维亚化。南斯拉夫仅仅是这种塞尔维亚化的假面具，而这种假面具在亚历山大国王和佩罗·日夫科维奇一月六日专政期间已被彻底戳穿了。

克罗地亚族是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当中具有最强烈的民族特性的民族，它最强烈地反抗这种大塞尔维亚的民族政策。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反抗未能产生克罗地亚民族所预期的那种结果。首先，因为领导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某些头目从他们同大塞尔维亚统治者之间瓜分权力的角度，从划分势力范围的角度来对待克罗地亚民族问题的解决。其次，因为这些克罗地亚统治者把克罗地亚

^① 杰米耶特是1919—1925年阿尔巴尼亚族和土耳其族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政治组织。

族的斗争引向反对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而不仅仅是反对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因为他们散布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正如大塞尔维亚统治者散布对克罗地亚人的仇恨一样。第三，因为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层中的老爷们无视其他民族如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等的民族问题的解决。这样，克罗地亚族的斗争就成了孤立的，不仅孤立于塞尔维亚族，而且也孤立于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南斯拉夫的其他被压迫民族当然就把克罗地亚族的愿望看作是大克罗地亚的倾向，看作是欺压其他民族的倾向，正如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的所作所为那样。最后，因为大塞尔维亚的老爷们和克罗地亚农民党中的克罗地亚老爷们都认为，只要通过一纸普普通通的瓜分权力的协议就能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勾消了。

南斯拉夫当权派的这种民族政策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1941年4月发生的南斯拉夫灾难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明确的答复。当时，我国遭轴心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奴役。

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二十二年来在奉行其反人民的政策时，一直依靠那些对建成凡尔赛式的南斯拉夫帮忙的人，即基本上依靠法国反动派以及英国的反动派。但是，一旦腐朽的凡尔赛式的欧洲体系有可能改变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均势，使之有利于法西斯轴心国时，反动的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就转向罗马—柏林轴心，以便维护其霸权，并使南斯拉夫其他民族继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斯托亚迪诺维奇、耶夫蒂奇和茨韦特科维奇等人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

然而，单单指责这些反动分子的这种反人民政策是不对的。走上这条道路的还有以科罗沙茨、纳特拉琴、克雷克等人为首的斯洛

文尼亚的反动分子；走上这条道路的还有以马切克、克尔涅维奇、佩尔纳尔等人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反动老爷们；南斯拉夫其他民族的各种党派的反动上层人物也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共产党忠于每个民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原则，在南斯拉夫存在的整个时期，一直一直坚持反对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的这种民族政策的斗争。南斯拉夫共产党最坚决地站起来反对压迫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阿尔纳乌特人等。正因为这样，大塞尔维亚的霸权主义老爷们把全部狂怒都发泄在我们共产党身上。因此，二十二年来南斯拉夫警察局的监牢里一直关满着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时至今日，流亡伦敦的老爷们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对我们恨得要命，这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自由和平等对他们实现自私的目的，对他们进行掠夺和奴役，是最大的障碍。

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各国的民族矛盾，当然也懂得如何利用我们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竭力煽起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间的仇恨，在斯洛伐克反动分子那里煽起对所谓独立和分离的欲望。这样，德国法西斯分子便可顺利地不经一战就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之亡国。

在南斯拉夫，德、意法西斯分子为了更好地利用民族矛盾和削弱这个国家，以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方法耍尽手腕。一方面，他们庇护帕韦利奇及其一小撮乌斯塔什匪帮，多年来一直豢养他们，唆使他们在南斯拉夫策划列车上的行刺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报纸和宴会上把斯托亚迪诺维奇及其继承人当作伟大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捧上了天，说他们的“内外政策英明果断”。他们一会儿吹捧塞尔维亚人，说塞尔维亚人懂得铁腕政策，从不放手；

一会儿又唆使克罗地亚人不要退让，说他们有权得到他们要求拥有的东西等等。他们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从内部搞垮和削弱这个国家，而后对它实行奴役。法西斯侵略者在这方面也得逞了。促使他们得逞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在南斯拉夫每个民族中都找到了相当数量支持他们的卖国贼。法西斯主义者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是：在各国找到一个或几个卖国贼，再根据民族多少拼凑一个傀儡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奴役这个国家，并把这样的国家宣布为“自由的”国家和所谓欧洲新秩序的盟国。

今天帕韦利奇及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什匪帮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被占领和被奴役的克罗地亚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代理人罢了。今天奈迪奇及其在塞尔维亚的一伙人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被占领和被奴役的塞尔维亚里的占领者代理人而已。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在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分子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无非是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占领者的代理人和盟友而已。但是，所有这些匪帮不仅仅充当了代理人，而且还充当了为占领者效劳的残暴的刽子手。占领者通过这些刽子手惨无人道地杀害我国各族人民，力图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处于受奴役、受欺凌的境地。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各国人民的民族自由与平等的最大和最残暴的敌人。因此，必须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搏斗，必须同所有那些帮助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分子的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今天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斗争和民族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如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中除了看到战胜法西斯之外，看不到战胜那些支持旧统治者的人，看不到战胜那些曾压迫过和妄图继续压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人，那么这一斗争就不

会这样顽强和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人民解放斗争一词，如果除了全南斯拉夫的意义之外，不是对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民族意义的话；如果它除了解放南斯拉夫之外，同时并不意味着也解放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阿尔纳乌特族、穆斯林族等的话；如果人民解放斗争并不具有那种真正把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带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含意的话，那么人民解放斗争这个词就是空话，甚至还是欺人之谈。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质也就在于此。

今天的人民解放斗争如果没有人民的团结，如果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和穆斯林族不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队伍，它就不可能以战胜占领者及其走狗而结束。如果每个民族不是现在就拿起枪，投入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战胜各族人民的所有敌人的斗争，那么就不可能使每个民族都获得彻底解放。

影响这种充分战斗团结的主要障碍是那些向后看的人，是那些企图恢复那些在南斯拉夫亡国之前的旧秩序的人。这些人就是各种前资产阶级党派的党魁们；这就是所谓的伦敦路线：“等一等，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些人就是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他们喊着“为了国王和祖国”的口号，和占领者站在一起反对我国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而言之，这就是那些害怕人民拿起武器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再也无法实现他们关于恢复南斯拉夫旧制度的反动的、反人民的计划了。

流亡在伦敦的人带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前景是十分黯淡的，对于从南斯拉夫一成立起就受到压迫的各族人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如果不幸又让流亡在伦敦的政府重新夺得权力的话，

那么宪兵的枪托和切特尼克分子的屠刀便是这个政府用来团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工具。

马其顿族、阿尔纳乌特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族等都在忧心忡忡地问道：如果复旧，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流亡在伦敦的政府已经在进行威胁，切特尼克分子已经在他们能依仗占领者的地方杀人了，并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更可怕的大屠杀。这是各民族都害怕的事。但是，我们向所有的人大喊一声：不要害怕，这一切是可以挽救的，唯一的办法是大家现在就立即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参加我们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为抗击占领者，为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进行的圣战。这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应该走的唯一的自救之路。

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队伍中，自始至终都是塞尔维亚人占绝大多数，而不是相反。塞尔维亚的、黑山的、波斯尼亚的和利卡的游击队和游击旅几乎全是由塞尔维亚人组成的。这些游击队和游击旅进行过并且今天还在进行一场不仅抗击占领者，而且也抗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其他敌人的无情斗争。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过去受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压迫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可以把塞尔维亚族当作最好的和最可靠的盟友。塞尔维亚族在反抗占领者及其走狗（不仅反抗帕韦利奇、奈迪奇和佩查纳茨，而且也反抗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充分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是流血最多，贡献最大。塞尔维亚人不愿复旧，正象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穆斯林族不愿复旧一样。塞尔维亚人十分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民族悲剧，谁是罪魁祸首，

因此他们如此英勇地进行斗争，蔑视卖国贼。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都负有神圣的义务：至少应该同塞尔维亚人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共同参加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抗击占领者及其走狗。

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1年举起了反抗占领者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这面旗帜同时也是一面争取民族自由，特别是争取各族人民平等的斗争的旗帜。这也是共产党在毫不妥协地争取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由与平等的同时，还在南斯拉夫成立时就举起的一面没有玷污的旗帜。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出的原则，即各民族都有自决和分离权利的原则。但是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决不允许，并反对人民的敌人利用这一权利，即不给人民自由和独立，而给人民带来中世纪的黑暗和殖民奴役。帕韦利奇炮制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就是这样。

南斯拉夫共产党将继续为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般的自由与平等的共同体而奋斗。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但要反对想重新压迫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的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分子，而且还要反对那些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企图挑拨离间和妨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和睦的人。

只有人民自决，才能使马其顿问题、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黑山问题、克罗地亚问题、斯洛文尼亚问题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容易解决，并使大家都满意，而各族人民手拿武器，通过今天这场人民解放斗争定将获得这个权利。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1978年塞文版第3卷）

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是首要任务

1942年12月《无产者》杂志

人民解放斗争进行得越紧张，规模越大，这场斗争在军事方面越有组织性，取得的成绩越大，这场斗争也就具有越来越复杂的特点，也就要求共产党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在每一具体形势下随机应变的能力。由于以上原因，人民解放斗争暗藏的敌人正在日益暴露出来，各种政治派别间的分化日益增强。因此，一方面，一切反动分子和人民解放斗争的敌人正聚集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帮助占领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加入人民解放阵线的队伍，他们认识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大多数今天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行的道路。

由于形形色色的卖国贼越来越多，由于他们同那些一开始就暗地破坏人民解放斗争的卖国贼结为一伙，许多党员就容易忘记主要的敌人——占领者，而只看到那些卖国贼，并因此失去耐心，容易犯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之所以是错误，是因为我们许多党员一方面看到的全是卖国贼，而另一方只看到共产党，却看不见人民的巨大力量，看不见那些已在同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斗争的、正在参加和即将参加这一斗争的广大爱国群众。可是另一方面，许多党员甚至领导者对于无论是卖国贼或卖国贼集团的危害性和

他们的叛变行为又发现得太晚。这些卖国贼亦步亦趋地、十分精心地扮演着他们的叛国角色。我们的许多党员和领导者即使看到这一点，也只把它看作是和占领者没关系的孤立的事情，看作这个或那个政党的事，而不认为这是所有卖国贼同占领者的同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南斯拉夫各政党反动头目和担任公职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为占领者效劳，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则躲在他们的防空洞里观看着人民最优秀的儿女同占领者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渴望占领者们能不费力地清算被这些老爷们视为自己反对者的“狂人”。这也是流亡在伦敦的老爷们的愿望，是马切克先生及其同伙们的愿望，也是其他许多老爷们的愿望。他们出于市侩心理，认为当前的人民解放斗争只是那些要和他们这些老爷们作对、想多捞到些好处并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的事。所以，这些老爷们都不能理解并且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为什么非共产党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去进行斗争和作“无谓的”牺牲，而不是静待俄国人和德国人两败俱伤，然后英国人登陆呢？按这些老爷们的想法，英国人应该到这儿来，并恢复旧秩序。所以，红军在东方和英美在非洲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大的胜利和法西斯侵略者日益临近的失败，使一直躲在老鼠洞里伪装中立或伪装成似乎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同情者的各政党大小头目们跳了出来，并最终决定支持人民的敌人，即法西斯侵略者。这些老爷们希望通过目前同占领者的合作阻止人民起义的浪潮，帮助占领者消灭威胁他们自身利益的人民力量。因此，在我国粉碎法西斯侵略者同时也意味着粉碎那些卖国贼老爷们和他们的反人民计划。另一方面，随着占领者和我国人民的叛徒被粉碎，所有爱国志士日益牢固

的团结即将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立兄弟情谊的条件即将成熟。

在我国统一的进程进行得越迅速，占领者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之间的勾结也越紧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地，在国际范围内反动分子的组合进程也越来越迅速，尽管他们之间进行着战争，存在着矛盾。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样的例子：英国在同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但这丝毫不妨碍英国的反动集团全力帮助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个政府通过它的大臣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切特尼克分子卖力地帮助占领者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作战。归根到底，这意味着英国的反动先生们帮助英国军事上的敌人来反对英美人民真正的盟友。另一方面，占领者正在武装伦敦流亡政府的切特尼克分子，并利用他们反对人民解放军，即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而这个流亡政府形式上是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盟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上最反动的分子之间也存在着靠牺牲人民解放战争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勾结。这意味着国际反动派不顾正在进行的战争，仍然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他们打击为自由面斗争的人们对自由的向往的拳头。这就是说，反动派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必然要利用法西斯主义来反对这种愿望，而在南斯拉夫可以看到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换言之，法西斯主义要为国际反动派长久地盟务下去，一直到新的反动势力来代替它为止，万恶的反动分子已经在暗地里作准备了。这就是说，由于这一原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管我国和世界上的反动叛徒集团要什么阴谋诡计。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是自由和独立的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它还没被粉碎，还是有力量和危险的，

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敌人之间每一个最小的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动员所有的人同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把它消灭掉。因为这也意味着战胜反人民的反动派,意味着人民正义事业的胜利。我们不能忽视法西斯侵略者营垒内部也发生分化。希特勒政权越临近灭亡,这一分化也就越快。然而这种分化不利于法西斯国家和被奴役国家人民追求自由的向往,而是有利于反动派,这些反动派今天就在想办法挽救一切可挽救的东西。因此,这些反动分子在法西斯营垒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也更有必要把法西斯主义连同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祸根一起消灭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无情的斗争,直到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帮凶完全被消灭。

苏联各族人民和英勇的红军正在为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斗争。红军肩负着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最重的担子。其他盟国,英国和美国,也在进行这场斗争。所有被奴役国家的人民都在进行这场斗争。他们与这些国家的各种反动集团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因此,本文的论断只涉及那些反动集团而不涉及我们的伟大盟友——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他们同样要消灭法西斯,铲除产生法西斯势力和导致这场可怕灾难的一切根源。南斯拉夫人民坚信,我们的盟友,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将使他们国家中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将为在欧洲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瘟疫,在人民中建立真正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从这场艰苦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初几天起,南斯拉夫共产党就起领导作用。南斯拉夫一切爱国者不分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民族,都承认我们党的这一作用。爱国者的这种承认和信任是我们党在这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结果。这

种承认和信任是靠我党党员在斗争中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赢得的。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必须继续通过正确的工作来维护我们党迄今获得的信任。共产党人应该这样维护这一信任：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和精力继续献给今天的人民解放斗争，献给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把这一斗争视为今天的首要任务，同时也不忽视对卖国贼进行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一斗争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1943年11月29日于亚伊策

—

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

1. 南斯拉夫投降和人民起义开始。起义在刚开始时采取了成立为数众多的游击队同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形式；

2. 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的部队，发展成为营、旅、师，并创建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3. 人民解放委员会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并成立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

4. 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这就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从一般的政治机构发展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并成立了作为临时人民政府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首先谈谈第一阶段。我国大多数人民对南斯拉夫如此迅速投降以及德、意、匈、保侵略者奴役我国的原因已经完全清楚了。一小撮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如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等民族）二十年的奴役，国内统治集团骇人听闻的营私舞弊和他们为保住政权与国外最反动的集团，特别是与

德国、意大利反动集团的勾结，我国军队，特别是总参谋部空前的叛卖行为与间谍活动——这一切都是南斯拉夫军队遭到灾难性的可耻失败的原因。这一失败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国王和政府连同那帮对我国的这种命运负有责任的人一起逃到了国外，南斯拉夫被肢解，成了那些历史上罕见的侵略成性的掠夺者的猎获物。国内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恐怖，他们不仅要屠杀最进步的人士，而且要灭绝居住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伏依伏丁那的全部塞尔维亚居民，灭绝居住在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文尼亚居民等等。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在克罗地亚把残暴的乌斯塔什分子扶上了台，在塞尔维亚扶植了最令人憎恶的卖国贼奈迪奇，在他们的帮助下实行消灭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罪恶计划。在这样的困难形势下，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各族人民历史上最困难的形势下，唯有这样一个组织能够把握局势，这个组织二十年来处于所谓非法地位，受到南斯拉夫所有的统治者的迫害，而现在它把所有的经验和组织能力及其久经考验的战士都献出来为自己受奴役的人民服务。唯有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武装起义，它没有丧失信心，而是高高举起解放斗争的旗帜，它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坚持斗争直到今天。

最先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了游击队，接着7月间在黑山举行了全民起义，随后游击运动扩大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这一切都表明，虽然我国遭受奴役，但并没有屈服，我国各族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规模很小的、几乎是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开始迅速壮大并发展成大都队，它们从敌人那里夺取了武器并给予敌人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它们表明它们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尽管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

利的侵略军被派往镇压南斯拉夫各地游击运动。

由于游击队击退了敌人的历次进攻并日益发展成大规模的游击部队，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1942年秋季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即创建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斗争的第二阶段于是开始了。建立了旅、师和军，从敌人及其走狗乌斯塔什分子和切特尼克分子手中解放了大片大片的地区。我们年轻的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有能力完成最艰巨的任务。许多城市，如利夫诺、格拉莫契、姆尔科尼契格勒、亚伊策、克留契、比哈奇、克鲁帕尼、斯卢尼等等获得了解放。由于建立了人民解放军，过去相对平静的地区出现了起义的新高潮。

在那个时期里，人民解放斗争具有了越来越稳定的形式，从而在南斯拉夫各地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信任。

在此之前，在解放区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现在在半解放区，甚至在敌占区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因为人民政权的这棵新萌芽在人民中越来越受欢迎，人民对它越来越信任了。起初人民解放委员会更多地是作为游击队进行解放战争的辅助机构而建立的，而在创建人民解放军时，这些委员会就变成唯一真正的人民政权。现在除了帮助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外，对这些委员会又提出了许多其他任务。第三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必然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一般政治性的人民机构的任务，它将成为一个中央机构，把所有这些人民解放委员会统一起来，建立新的人民解放委员会。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比哈奇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伟大而重要的决议。一个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代表组成的中央政治机构在我国被占领后第一次建立起来了。一个从人民中产生的，而且是在其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产生

的人民代表机构第一次召开了会议。最高司令部对自己迄今的工作向该机构负责。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到那时为止的最大成果之一。它的成立为在南斯拉夫各地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制度奠定了基础，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真正的兄弟情谊和平等奠定了基础，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民主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由于全克罗地亚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和在此之前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及其执行机构的成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平等的原则开始付诸实践，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宿愿开始实现。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一年来，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不得不同占领者进行艰苦的浴血奋战。我人民解放军面临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从1943年1月到7月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打退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即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这两次攻势的目的都是消灭我人民解放军和重新占领我解放区。这对我人民解放军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我国人民的儿女们表现出了空前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我国人民将世世代代为此而感到自豪。敌人尽管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有巨大优势，但无法消灭我人民解放军的核心。相反，他们却遭受了重大损失，而我们通过这场艰苦的浴血奋战一方面赢得整个进步世界的巨大同情和钦佩，另一方面，盟国第一次开始承认我人民解放军，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派来了自己的军事使团。在打这些大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敌人第五次攻势期间，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国各族人民成千上万的最优秀的儿子牺牲

了。其中有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努里娅·波兹德拉茨、维塞林·马斯列沙、西马·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这是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让我们向那些为了南斯拉夫人民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我国人民光荣的儿子们致哀。

人民的宝贵鲜血流成了河，我国人民成千上万优秀的儿女在历时两年的敌强我弱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最终使世界舆论了解到南斯拉夫的真相。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小国人民花费这样昂贵的代价，才使世界舆论相信在南斯拉夫流的鲜血是人民的鲜血，而不是那帮无耻卖国贼的血。这帮卖国贼的主子们正在一些盟国中受到款待。

一个欺骗世界公正舆论的骇人听闻的骗局在这一年里被揭穿了。在伦敦的卖国政府两年来一直在欺骗世界，说在南斯拉夫领导斗争的是它的大臣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如果指出这位卖国大臣为首的切特尼克匪帮在此期间一直站在占领者一边进行了并且今天还在进行着反对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争，那是莫大的讽刺。可是，这帮坏家伙还满不在乎地把人民解放军的功绩说成是自己的。在敌人第四次攻势期间，卖国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同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乌斯塔什分子这成一项协议，共同地给我人民解放军以致命的打击。在我们围剿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期间落到我们手中的大量材料清楚地揭露了这伙人民败类的这个罪恶计划和骇人听闻的叛卖行径。就象我国公众已经了解的那样，当我们在奈雷特瓦河和上瓦库夫进行伟大而光荣的战役期间，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塞尔维亚、桑贾克、黑山、黑塞哥维那和东波斯尼亚征集了大约一万八千人并把他们送到奈雷

特瓦,企图在我们背上捅上一刀。我们的战功显赫的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第七师以及第九达尔马提亚师的部队在奈雷特瓦河不仅击溃了德国人、乌斯塔什分子和意大利人,而且向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把他们从奈雷特瓦河赶到了科拉欣,在那里给了他们最后的打击,歼灭了他们的切特尼克匪帮——一股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这一切都是流亡伦敦的卖国政府在世界舆论面前无法掩盖的事实。所以骗局终于被揭穿了。

国外的形势,即光荣的红军在东线的胜利和希特勒精锐部队的瓦解,为其他盟国——英国和美国在非洲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盟军在西西里和最终在意大利登陆以及为希特勒的主要伙伴法西斯意大利的投降创造了条件。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对打败意大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它在整个这场战争中牵制了意大利的十六至二十个师。还在意大利投降之前,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攻势并重新转入反攻后,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就解放了几乎整个东波斯尼亚、中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

由于意大利投降和在我国十个意大利师被解除武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仅得到了大量的装备,而且本身也增加了至少八万名新战士,并解放了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大片地区。从而,一方面为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再打胜仗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盟国当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因素,今天不仅盟国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盟友,而且,法西斯侵略者也把它看作是牵制自己许多个师的对手。意大利投降后,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的人民起义以及克罗地亚

其他地区的人民起义空前高涨。因此，今天南斯拉夫没有一个地区不燃烧起人民起义的烈火。到今年11月1日止，我们又解放了我国的许多地区。达尔马提亚大部分地区及其岛屿、克罗地亚沿海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整个东波斯尼亚、中波斯尼亚的大部分、整个桑贾克、黑山的大部分以及黑塞哥维那的一部分都获得了解放。

我们的几个师已经越过了桑贾克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交界。把塞尔维亚人民从德国和保加利亚侵略者、奈迪奇的军队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匪帮手中重新解放出来的战斗开始了。非常重要的事实之一，是我们在马其顿的游击力量最近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且第二次拿下了基切沃、德巴尔。这样，就为马其顿的游击运动更强有力地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其顿的游击运动与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游击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对保加利亚本身游击运动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的解放是意大利投降后我们人民起义的最辉煌的胜利之一，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尽管法西斯分子作了种种努力，对斯洛文尼亚人民和克罗地亚人民二十年的奴役，未能消灭我们受奴役弟兄的民族特性，未能打消他们同自己的弟兄及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统一的意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和世界的形势，特别是最近一年的形势完全变了。由于红军的胜利，希特勒的战争机器面临覆灭，战胜人类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已为期不远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法西斯阵营瓦解了。意大利被打败了。惊慌和瓦解的气氛笼罩着希特勒的卫星国。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三个盟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牢固。这一点在三大盟国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尤

为明显。所有这些事实对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都有重大意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相信胜利即将到来，相信我国各族人民终将从占领者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种信念表现为大批新战士加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表现为南斯拉夫各地许多杰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参加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又促使帕韦利奇和奈迪奇的傀儡国家机器加速崩溃，从而削弱了占领者在我国的地位。

虽然有我们前面所列举的一切事实，但有一件事近一年来仍然没有变化，那就是卖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个政府现在设在开罗，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盟国面前它仍然被认为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代表。我不想在这篇简短的报告中细谈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为什么盟国能容忍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在我国人民中得不到任何支持，因为它通过自己的大臣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同占领者合作，反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反对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两年半了；为什么盟国容忍一个极其反动的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反动性和大塞尔维亚主义从它的组成中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出，因为参加这个政府的是这样一些人，如臭名昭著的“一月六日专政”分子佩拉·日夫科维奇之流。但有一点我可以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每当想起这个犯有这么多罪行并且应该被列在战犯名单上的政府成员还在我们盟国那儿受款待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痛心，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愤慨。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政府在人民对它的命运作出决定之前想方设法偷偷面国，国王也是这么干的。我们也知道，国外有一些反动集团支持这个政府和国王的阴谋活动。但我们也知道，盟国中绝大多数进步民主分子真诚地希望我国人民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建立自己认为必需建立的国家制度。

我们受到了而且还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 然而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诽谤。所有占领者、他们的走狗——卖身求荣的卖国贼、乌斯塔什分子、奈迪奇分子、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匪徒及他们在国外的主子——都说过而且现在还在说, 我们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斗争纯粹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使国家布尔什维克化, 共产党人企图夺取政权, 废除私有制, 消灭宗教信仰, 毁灭文化, 等等。这些诽谤都是陈词滥调。它们是戈培尔厨房里炮制出来的, 现在又成了戈培尔思想的同路人如法炮制用来供养“新欧洲”居民并企图输出到欧洲以外的食品。但很少有人还相信这些谎言,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更不相信。我们争取生存的斗争是残酷而艰难的, 我国人民在这三年中受尽了苦难, 因此任何人也不能用这些陈词滥调的诽谤使他们离开他们争取独立、争取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道路。一小撮反动派为了使共产党人在人民中孤立, 曾把这些罪名加在共产党人身上, 而且有时还能得逞。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过这场伟大的解放斗争,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相信共产党人是本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 他们时刻准备为人民的幸福作出最大的牺牲。

鉴于这一切, 特别是鉴于全民起义的发展, 鉴于越来越大片的领土获得解放和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越来越重大, 也鉴于国外事态的发展, 有必要及时地采取一切措施, 使人民解放斗争能继续顺利发展, 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我国人民有这样一种国家制度, 这种国家制度应建立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情谊和平等的基础上, 应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真正自由和民主。经过二十三年的时间, 君主制在人民中间已经完全名誉扫地。它不是民主原则

的体现者，而是最反动集团的专制的体现者。君主制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纽带和建立强大的人民国家共同体的基础。君主制是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和对其他民族压迫的体现者。已故国王亚历山大于1929年解散了议会并实行了专政，实行了恐怖和暴力制度。国王彼得二世从一开始就成了给我国带来灾难的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心。不但如此，彼得二世还一贯支持并且现在还在支持最可耻的卖国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将领们。关于这件事铁证如山，而且我国各族人民都清楚。鉴于这些情况，只有共和民主的政权形式才能使我国人民永远免遭类似的不幸。

我们人民解放斗争发展的第四阶段的形势就是这样。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民代表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辜负南斯拉夫绝大多数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信任。鉴于国内外的形势，在这第四阶段中有必要建立这样的人民机构，即政治机构和立法机构以及由这些机构产生的执行机构，它们能够克服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一切困难，在国内外真正代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能力阻止其目的在于妨碍实现我国人民在这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中为之流这么多血的愿望的任何企图。今天有必要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确实成为南斯拉夫人民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今天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形式的执行机构已经是时候了。这个机构将有能力领导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必须从事的一切工作。

今天我们有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一年前就成立了。在这个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代表，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我国各族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来自他们中间的、由他们自由选举的、他们对之的确十分信任的代表选进这个机构。

当然，一个民族采取建立自己最高的执行机构、具体说就是建立南斯拉夫解放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重大步骤，开始可能遇到障碍和产生误解，甚至在国外我们的盟国那里也是如此，尤其是因为在国外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政府。但是，在这两年零九个月的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艰苦的浴血斗争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赢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是完全符合大西洋宪章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盟国不会错误地理解我国各族人民的这个历史性步骤，相反，我们相信，盟国自己会作出一切努力，通过我国人民自己在国内选出的代表机构向我国人民提供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

二

现在让我们谈谈我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人民军队，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一个没有任何武器和兵工厂、没有军火库和各种军粮储备、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任何援助的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建立起一支拥有近二十五万人的军队，而且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南斯拉夫人民从未进行过的最严峻、最残酷的斗争时期。这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可以引为自豪的成果，也是南斯拉夫人民今后世代将引为自豪的成果。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军事学校，没有指挥干部。这一切都是在斗争中创立和产生的。1943年5月1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内授予各级军官军衔的命令。农民、工人、大学生和其他人民知识分子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成

长和壮大，他们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军官。这些军官是战士们自己从自己的队伍中推荐出来的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可以为自己有这样的军官而感到自豪。

我们现在在这里开会，对外国，对我们的盟国，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国各族人民由此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机构明确而坚定地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还必须提醒的是，所有从一开始就加入我们队伍的旧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我军中占有当之无愧的地位。许多南斯拉夫军官被德国人俘虏而未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不然的话这个人数当然还会更多。最高司令部晋升和新任命了五千多名军官。我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在这里请求最高人民代表机构批准1943年5月1日和1943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任命和晋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命令。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通过了关于授勋的命令。勋章有以下几种：1) 人民英雄勋章；2) 一级游击队之星勋章；3) 二级游击队之星勋章；4) 三级游击队之星勋章；5) 人民解放勋章；6) 勇敢勋章；7) 勇敢奖章；8) 兄弟情谊和团结勋章。我请求最高人民代表机构批准最高司令部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授勋的命令。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组建工作还没有结束。到今天为止我们组成了八个军，拥有所需要的全部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但是，入伍的新战士一天天多起来。正在建立新的旅和师，还将建立新的军。迄今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工作主要基于自愿的原则。但从现在起我国各族人民将有自己的执行机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了，这个执行机构也将负有这样的职责：发布关于我国十八岁至

五十岁的全体公民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命令。当然，同时将继续保留在这个年龄限制以外的每个公民自愿参加我们军队的权利。同时，对于那些继续站在德国人一边，无论是留在克罗地亚军队中还是留在任何别的军队中的官兵，南斯拉夫解放全国委员会必须发表一项声明。

鉴于在莫斯科召开三大盟国会议，迫切地需要我们的人民代表机构就我国人民所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表明态度。如：1)战犯问题；2)意大利占领我国期间从我国人民手中抢走的军舰和商船问题；3)我们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里被扣留人员的问题；4)被意大利占领者掠夺的我国人民的财产归还我国人民的问题。这些都是应该尽快解决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正象前面所提到的，1943年5月英国驻开罗最高司令部的代表团来到了我们最高司令部。几天以前一个相似的代表团空降到克罗地亚总司令部。这些代表团的任务是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建立联系并为以一位英国将军为首的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主要代表团的到来准备条件。最高司令部表示同意这样一个代表团来。同年9月，由近东最高统帅威尔逊授权，以菲·麦克莱恩旅长为首的几名高级军官组成的英国军事使团来到了我们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威尔逊在授权书中说明了该代表团的目的是，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和英国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组织向我人民解放军运送作战物资和协同作战。

盟国从7月份就开始用飞机向我们运送了一些作战物资，但数量不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飞机是唯一的运输工具。达尔马提亚沿岸及岛屿的解放使我们有可能接收支援我军的大量物资。的确，盟国用船只向我们运送了更多的作战物资和食品。看

来我们将有可能通过海路获得我们进行战争所需要的更多的作战物资。当然，我们今天还需要坦克和飞机这样的现代化重型武器。在这方面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盟国那里采取了一些步骤。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同盟国建立联系之后，盟国在那些不再是纯军事性的问题而是属于政府权限内的政治问题上越来越多地同我们最高司令部打交道。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也向盟国提出了一些在存在政府的正常情况下属于政府权限的要求和请求。最高司令部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去意大利接收作战物资，组织接收我们的被俘人员和被扣留人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国。最高司令部还向盟国提出了归还意大利从我国人民手里夺走的军舰和商船的要求。最高司令部还提出了我们的被扣留人员和被俘人员的问题，向我军提供坦克、飞机和其他现代化重型武器问题以及在意大利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问题。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经英军驻开罗最高司令部的同意，派去了一个代表团，试图就地解决这一切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组成一个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并在国外作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和真正的代表的临时政府，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最高司令部已同盟国，即英国和美国建立了联系。它们的军事代表正在我们这里，我们现在也正在为苏联代表的到来而努力。尽快地同这个伟大的兄弟国家建立联系，是我国各族人民和我军的愿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这个伟大的兄弟国家有着最大的信任，把它当作自己最大的保护者。

我国各族人民的斗争以及他们在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在战场上取得的光辉胜利,为我们在整个进步世界面前赢得了巨大的同情,为我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建立一个自由的、真正民主的、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创造了一切条件。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 委员会的决议对我国斗争的进一步 发展和联邦国家的建立的意义

1944年3月《新南斯拉夫》杂志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无疑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些决议意味着这场解放斗争过程中的全面转折。为建立一个具有更公正制度的、更幸福的新南斯拉夫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个制度建立在民族平等，兄弟和睦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它为受尽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保证了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这些决议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因此，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以如此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这些决议。

国内外对这些决议的反响很大。在国内，这些决议首先坚定了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斗争中为自己的自由和平等而战的人们的深刻信念，使他们相信，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非凡的努力和牺牲不是白费的；其次，这些决议给那些对未来感到渺茫，而又害怕复旧的人们指出了光明的前景，为他们确定了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应该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的目标；第三，对于所有那些站在一旁观望，等待某一方得势的有利时机的动摇分子和投机分子来

说，决议使他们不可能再以“还不是时候”为借口。他们不得不作出决定，要么同人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人民，非此即彼；第四，这些历史性决议是反对占领者和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和反动分子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些反动分子至今仍在诽谤人民解放运动，说它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

这些卖国贼和反动分子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大部分都站到了占领者一边。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采取了公开的敌对立场。国内的反动分子和某些旧党派的上层人物大为惊慌，并开始秘密地寻求各方面的帮助。他们在国内外都联合起来，而不管是属于哪个政党。他们和占领者们暗地勾搭，妄图借助占领者来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占领者的走狗——奈迪奇·帕韦利奇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竭力借助占领者抓壮丁，并以联合的武装力量阻止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占领者自己则煞费苦心地利用我国的卖国贼和反动分子的一切罪恶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苟延残喘。一方面，占领者慷慨地把东波斯尼亚和黑山让给卖国贼奈迪奇，要他出几万名塞尔维亚士兵替德国人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占领者还答应让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自治。把博卡—科托尔斯卡、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其余部分给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总之，出现了一片混乱，这种混乱从另一方面引起了奈迪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帕韦利奇的“大克罗地亚主义”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反动分子也不明白，他们的自治同帕韦利奇和奈迪奇之间瓜分波斯尼亚有什么关系。正是由于德国鬼子的这些愚蠢行为，我国各族人民不必太担心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反动叛国集团之间的“联合”。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代表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未来制度的决议，在所有民主的同盟国家里得到了同情和一致的赞赏。外国的民主报刊和电台把这些决议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作了报道。情况也只能是这样。这场战争不仅对政治家，而且对每一个普通人，不仅在我国，而且在所有同盟国都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这些盟国今天根据一国人民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是否顽强来衡量该国人民的生存能力和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只停留在指出这些决议在国外得到良好的反响这一点上。人民代表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对我国各族人民负有巨大的责任，对自己的工作负有责任。作为人民政权的执行机构的全国委员会尤其是这样。显然，全国委员会必须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影响全国委员会的整个工作和它所委任的每个机构的工作的正常进行。但是，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也要尽力而为，才能不辜负人民对自己的代表的信任。

此时此刻，全国委员会的头等重要任务，就是解放我们的国家，全国委员会的注意力主要应该放在这方面。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肩负着主要的担子。因此，一切为了前方，一切为了胜利，仍然是主要的口号。食品问题和军队的整个供应问题，是决定我们今后的斗争能否胜利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全国委员会必须对此给予最大的注意。所需的资金的来源就在人民当中，人民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但是，负担应该均摊。因此，应该这样来组织收集资金的工作，即不要使某些地区和农村负担过重。现在就应该关心并且

想办法用种子和劳力来援助解放区的农民，以播种尽可能多的土地。此外，应该寻找供应的新来源，因为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战争的主要负担是由我国最贫瘠地区的最贫苦的人民承受的，这些地区自己都无力养活自己了。自然，这种供应的来源，只有来自国外。盟国答应向我们提供这种援助。但是，全国委员会必须采取组织措施，以便援助一旦到来，就可以迅速而正确地分发下去。应该收集关于各个家庭的状况、牲畜头数、播种土地数量、需要全部帮助或部分帮助的人数等情况的统计资料。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利卡、塞尔维亚、马其顿、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成千上万座房子被烧毁，在房子的废墟上长满了荒草，而居民们住在小土屋或牲口棚里，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传染病和各种疾病会蔓延。这里需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所允许的紧急援助。应立即倡议并帮助农民建造木房。应划出有计划地采伐的林区。应该关心钉子一类的东西，因为农民们无力购买这些东西，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盖房子。

象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我国人民生活在非常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因此需要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使人民免遭传染病和各种疾病的危害。

在整个解放区，在一切办得到的地方，应立即对儿童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为此，我们必须及时地关心教师、课本、校舍等问题。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在这场艰苦的解放斗争中有机会实地了解我国人民的贫困状况。这种贫困不仅仅是占领者造成的，而且也是各种反人民的制度二十年的横征暴敛造成的。营私舞弊的统治制度和妄图靠剥削人民发横财的坑害人民的食利

者的有组织集团的暴虐行为，也是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在塞尔维亚、桑贾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利卡和黑山我们看到人民居住在狭小、肮脏、条件恶劣的茅草棚里，经常同性口住在一起。我们看到的生活条件是可怕的，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些人民是怎么坚持活下来的？他们过去交的各种苛捐杂税都干什么用了？在这里，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如下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今天这些人民如此顽强地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回答是：人民不是为恢复象后娘似的旧南斯拉夫而斗争，而是为建立一个应该保证他们过人的体面生活的新南斯拉夫而斗争。因此，我国最贫困地区的人民今天拿出最后的一点面包，顽强地而且是自愿地忍受着这场战争的一切苦难。因此，他们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这也是对我们如下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国各族人民如此不可抑制地憎恨一切旧的东西。

应该十分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当我国大多数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更美好的未来的斗争中遭受最严重的牺牲，当他们全力以赴地把占领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的时候，有一部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穆斯林、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等仍在公开为占领者效劳。在德国人的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克罗地亚卫乡队，斯洛文尼亚卫乡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德·米哈伊洛维奇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分子和奈迪奇的国家卫队，科索沃的法西斯分子，黑山、波斯尼亚和其他地区的切特尼克分子在进行反人民的战争。他们所干的纯属背叛祖国和人民的勾当。他们如果不马上转到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一边，并通过自己的斗争洗刷背叛的耻辱，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要对自己的叛变行为承担最严重的后果。我国人民的历史将把他们钉在

耻辱柱上，子孙后代也将蔑视他们。

一切继续为占领者效劳的人们，即使没有受到人民最严厉的审判，也无权参加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这样的人无权享受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成果。

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为了祖国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他们甘愿贡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他们继续独自承担这场艰苦斗争的全部重担。必须通过动员，号召所有旁观的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履行自己的义务。谁不接受这个最光荣的义务，我们就不仅有理由痛斥他是胆小鬼，而且还有理由指责他是祖国的叛徒。在我国人民历史上这场艰苦的浴血奋战中贡献自己的一切，是每一个正直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穆斯林、黑山人和马其顿人等的职责。

在国际关系方面，日益表明越来越有必要尽快地从法律上确认全国委员会为南斯拉夫唯一合法政府。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的要求，这些利益由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叛变活动已遭到相当大的损害。

为了自己的需要和在国内的切特尼克卖国贼的财政需要，流亡政府大肆挥霍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存放在盟国的人民的金钱。事情达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一个不负责任的卖国政府利用早先存在的条约和盟国承担的义务，就可以肆意地挥霍和糟蹋人民的财产，尽管这个政府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毫无关系。逃亡者们就是这样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南斯拉夫人民今天进行这场战争正需要这笔钱，明天，在战争结束后，更需要用这笔钱来恢复被破坏的祖国。

流亡政府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人民投入同自己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战斗，并不是流亡政府的意志，而是违背它的意志的。于是这个政府就企图把自己的追随者塞进各个国际委员会，而这些人在那里大概是不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对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漠不关心。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拯救人民的财产，让我国人民信得过的、即让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派去的代表进入那些国际委员会。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经常向国际公正舆论和盟国呼吁，我们认为，在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这场斗争中作出如此重大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有权期待盟国尽快地中断同卖国流亡政府的联系，使我国各族人民收回自己的财产，使盟国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建立正常的关系。

尽管我国内部制度问题要等到我国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以后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但是今天仍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战争结束后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是为了今天解放斗争的顺利进行。我国的许多公民对于联邦问题只知道联邦这个词儿比旧南斯拉夫要好，但是，联邦对我们整个国家，对每个民族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许多人是不清楚的。要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能单靠宣传，还必须做实际的工作，也就是说，今天就要解决一些属于联邦制度范畴的问题。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必须尽力使属于一个联邦单位的内部管理事务的一切机构从今天起不仅要交给这个单位，而且要用自己的倡议和组织方面的建议来帮助该联邦单位。另一方面，全国委员会也应该注意，不要让各联邦单位的领导机关包揽属于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即南斯拉夫中央机关职责范围的职权。现在，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就可以划清这个界限，但同时必须注意，要非常小心，彼此之间要充分协商。

某些地区，如伏伊伏丁那和其他地区经常向我们提出将如何对待该省的问题。它们是否将拥有自己的自治权，或是属于另一个联邦单位。自然，这些问题提得好，它们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人民对我国的制度是多么关心，因为这个制度应该给他们带来属于他们的一切权利。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无疑，伏伊伏丁那和有此要求的其他地区一样，将获得最广泛的自治，但是，自治的问题和该省将归属哪个联邦单位的问题，将在战后彻底解决国家的体制问题时，由人民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由他们的代表来决定。

这只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各族人民机构面临的许多巨大任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不仅不靠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其他人民团体的大力帮助，而且也不要全体人民的大力帮助，那是不对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对人民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它们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就象南斯拉夫英勇的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在南斯拉夫各族爱国人民的帮助下，能够胜利地进行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一样。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也不给别人

庆祝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成立
两周年时的讲话

(1944年9月12日于维斯)

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和二十六师其他部队的战士、军士、军官和政委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最优秀的部队之一诞生的日子，是光荣的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成立一周年纪念日。

首先，让我们向在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生命的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的英雄们致敬！

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是从一些游击小分队中产生的。这些游击队在1941年祖国被占领的最初几天就勇敢地起来反对万恶的占领者。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它是在两年前由一些经过千锤百炼的游击队建立起来的，它屡建辉煌的战功。在许多战役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牺牲是如此之大，以致今天在你们当中那些在突击旅成立时参军的人已为数不多了。利夫诺战斗，亚伊策战斗，波斯尼亚中部的战斗，冒着严寒和大雪沿奈雷特瓦河谷的胜利进军（在那里，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攻势中打了

我国解放斗争中最辉煌的一仗),为了开辟道路和营救伤员而攻打防守坚固的普罗佐尔的战斗,科尼茨那场持续很久的战斗,在缺衣少粮的条件下在冰天雪地的普雷涅冒着严寒进行的战斗,为粉碎万恶的人民叛徒——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在黑塞哥维那和黑山进行的战斗,都使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受到了极大的锻炼,从而成为我们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突击旅之一。在敌人的第五次攻势中,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不得不用自己的身躯铺设横渡波涛翻滚的德里纳河的桥梁。这些英勇的战斗表明,没有达尔马提亚的儿子们不能完成的任务。牺牲在德里纳河的波涛中的不光是小伙子,还有刚刚踏上生活之路的达尔马提亚的年轻姑娘们。姑娘们的缕缕发丝飘浮在波涛之上,这是她们同我们永别的示意。而这永别的示意是:替我们报仇!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在以后所有的战斗中都出色地为自己的同志们报了仇。

第一达尔马提亚旅对达尔马提亚人民的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斗争不仅为达尔马提亚热爱自由的人民增添光彩,而且也使它成为克罗地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因为在克罗地亚率先起义的正是达尔马提亚的儿子们,正是达尔马提亚最先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子们送上了自由的祭坛。

第一达尔马提亚旅的历史是一部史诗,是英勇斗争史。这是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许多旅在这场斗争中的共同的历史,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争取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尽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这场艰苦的浴血奋战中作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不是无谓牺牲的,因为这些牺牲在整个进步人类面前为我国各族人民争了光,因为他们是为了盟国

的共同事业在反对人类最大的敌人——德国侵略者和其他侵略者的斗争中牺牲的。此外，第一达尔马提亚旅象我们人民解放军所有其他部队一样，在这场斗争中体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已深入到我国各个地区，深入到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心中。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人民政权，建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最高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这是这场斗争的伟大成果，是用南斯拉夫最优秀的儿女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不仅证明我国各族人民懂得如何战斗，而且也懂得如何管理自己。在进行非凡的努力和斗争的整个时期里，有过来自各方面的许许多多障碍。有过各种各样阻止我国人民进行这场历史性斗争的企图。但是，我们克服了所有障碍。今天，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夺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成果。

然而，还有投机分子，还有敌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反面是不正常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和叛徒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爱国者。他们仍然是敌类，只不过戴上了新的面具。他们改头换面，变换手法，力图达到他们反人民的反动目的。这是与外国勾结的黑暗的反动集团。现在，在我们就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对候，这帮反动派极力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由于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共同事业而进行这场自我牺牲的斗争，今天我们已经揭穿了联邦的民主新南斯拉夫的大部分敌人。那些反人民的分子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新的手法进行反动活动，特别是披上羊皮混入了人民解放运动的队伍。因此，一切珍惜这场斗争的成果的人都应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性。应当警觉

地注意他们的活动，使他们不可能在我们的队伍里达到他们站在占领者一边进行公开斗争时未能达到的目的。

我们曾一再声明，今天仍然声明我们愿意接受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希望祖国富强的真正儿子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我们不接受投机分子和那些企图实现其卑鄙的反人民目的的人。我们正告这些人放弃这种勾当，因为他们绝不能得逞。我们还没有结束反对敌人、反对占领者和他们的走狗的武装斗争。现在，正当这场斗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诚挚的、希望我国人民有幸福和美好未来的我们祖国的忠实儿子。在这场艰苦的斗争过后，等待我们的是在废墟上把遭破坏的国家重建起来的艰巨任务。我们的村庄和城市遭破坏，许多村庄荒无人烟，因为它们失去了主人，他们惨遭敌人的杀害。我们的田地荒芜了。要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需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团结一切人民力量，以完成这个最紧要的任务。

今天，讨论我国边界问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从未谈论过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必须就这一问题说几句。我国人民曾为自己的自由、独立，为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而战，同时他们也为解放那些在外来的奴役下呻吟数十年的我们的兄弟而战。通过这场斗争，我们在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沿海和科鲁什卡的兄弟们一定要解放，也一定会得到解放。他们将和自己的兄弟们一起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也是所有那些兄弟们的愿望。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也不给别人。

我不得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太谦让了。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从不谈这些问题。可

是，另一方面，我们的邻国对这些问题却谈论得太多了，而且搞了许多名堂。他们呼吁我们要宽宏大量，为了做到宽宏大量，就应该让自己的兄弟们继续忍受外来统治。我们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拉帕尔条约和其他条约中不公正的规定，但是我们邻国中的某些人，而且就是不久前和我们打过仗、进攻过我国，其军队毁掉了我们的村庄和城市，杀害了我国成千上万的儿女的那些国家中的某些人，却把这个要求看成是什么帝国主义，看成是过几年又会引起战争的东西。因此，他们就认为我们应当继续让我们的兄弟们受外国奴役。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们对德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军事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样一来法西斯主义也就被消灭了。相反，在很多国家中还需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是串通一气的，如果不给它以彻底的致命打击，它还会竭力卷土重来。因此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每一个希望制止将来发生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那种灾难的人民必须履行这项任务。在我国有过许多法西斯的同盟者，现在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乌斯塔什分子、奈迪奇分子、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和鲁普尼克的白卫军分子。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效忠于德国占领军。但是最近，在德国人战败已成定局时，我国人民的这些敌人便企图通过他们在国外的关系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再度骑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头上。遗憾的是，这里我不得不说，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一些盟国的某些人士仍然不能够或不愿意相信在我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一些盟国中还有人认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以及我国各族人民的其他叛徒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人民。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在三年半里我们是非常、非常有耐性的。我认为任何人

都不能否认我们的这种耐性，我们当时谅解盟国中一些人的这种看法，并用我们盟国中的一些人不了解情况来说明这一点。可是今天再也不能一言不发了。今天在地球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人们都知道，在南斯拉夫是谁进行了斗争，谁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绝大多数。因此，在今天还抱这种怀疑态度，就有点非同寻常和令人奇怪了。这里我可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解决的。我们将使许多仍在怀疑和动摇的人相信自己错了。但如果有人仍然持怀疑态度，仍对南斯拉夫真正的爱国力量持这种极不友好的态度，如果继续怀疑我们的力量，怀疑我们的诚意，那么就让他知道，这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的胜利和建立强大的、统一的、联邦制的民主南斯拉夫来说，这已不重要了。在这方面谁也阻挡不了我们。

现在就我们同在伦敦的舒巴希奇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谈几句话。为了使谁也不能指责我们阻挠全体南斯拉夫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人民阵线，签订这一协议是必要的。这样做之所以必要，还因为我们要再一次向盟国证实，我们是主张团结和兄弟情谊的；我们要通过签这个协议再一次重申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我们的战斗旗帜上的基本口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兄弟情谊。同舒巴希奇政府签订的协议一开始就不仅使我们的战士，而且使人民有点不理解，更确切地说是有些惊讶：在我们不得不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战胜了最大的困难之后，要这个协议干什么。不，同志们，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个协议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我们的队伍。它不会威胁你们曾为之斗争和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斗争的成果。这一协议是我们力量的证明，是我们政治上胜利的证明。它同我们迄今所作的一切努力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

在我国建立各族人民最牢固的团结，以便使我国对外也能占据自己应得的地位。但是，我们将坚持这样一点：不经我国各族人民的赞同，就不能采取比这个协议更进一步的步骤。我们现在信守、今后仍将信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我们坚持由我国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选择内部制度形式的原则。这是我们的各大盟国所主张的原则，我们也遵守这一原则。这决不是要什么手腕。我们学会了向每一个人公开说出我们想什么和希望什么的做法。

在斗争的这一时期，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们的军队、军事指挥部门、我们的政府、全国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最高机构——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解决许多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天再也不是与世隔绝了。我们同我们的几个大盟国都有联系，我们对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因为为了赢得这些权利我们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我应该说，如果就领土而言在我们的几个大盟国当中我国是一个小国，我们的行动却证明我国人民在精神上是伟大的。因此，在决定各个国家的命运的这些日子里，如果我国被看作是第三等国家，被撇在一旁听候别人的摆布，我们将会感到很不公正，而且也不会甘心。我们要同我们的盟国一道坐在谈判桌旁，来决定欧洲命运和我国的命运。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坚持这一权利。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将得到几个大盟国的谅解，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将得到谅解，因为我国各族人民以最大的牺牲为代价表明了对盟国共同事业的忠诚，所以他们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正在迎接伟大的日子，迎接伟大的自由的日子，同时也是为建立我们的新

南斯拉夫作出新的努力和进行新的斗争的伟大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不仅会胜利地结束这场艰苦的斗争，而且也会在今后为我国人民保卫这些成果，不让任何人夺走他们自己斗争得来的果实。

我们幸福的民主联邦新南斯拉夫万岁！

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万岁！

今天仍然守卫在我国边界上的战无不胜的、英勇的兄弟红军万岁！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自由贝尔格莱德的第一次讲话

(1944年10月27日)

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政治委员同志们：

我对于你们在解放我们可爱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时表现出的英勇行为表示感谢。你们和英勇的红军一起赢得的贝尔格莱德的解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三年半前，在这个饱经苦难的城市里，对所谓不可战胜的德国侵略者进行了第一次抵抗。3月27日，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城市的人民不愿向已经征服了全欧洲的侵略者低头，进行了抵抗。当在欧洲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的德国希特勒匪帮大举进攻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知道斗争的时刻到来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又有了信心，相信解放的一天将会到来。贝尔格莱德青年在伏击贝尔格莱德街道上的德国摩托化部队时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英勇精神。舒马迪亚的青年们第一个行动起来，并在短时间内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几乎整个西部。当德国侵略者和卖国贼把我们光荣的舒马迪亚游击队和塞尔维亚游击队赶出塞尔维亚之后，舒马迪亚的青年们和我们光荣的黑山战士们一起到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传播兄弟情谊和团结，打击妄想消灭我国人民的万恶的敌人。

塞尔维亚、舒马迪亚、黑山的儿子们出征了，他们和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兄弟们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同强大的敌人英勇地斗争了三年半。现在，塞尔维亚的儿子们回来了，虽然人数大大减少了。塞尔维亚最优秀的儿子们把自己的忠骨留在了黑山、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的山岗上，锤炼了兄弟情谊和团结。回来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却更强大得多了。他们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儿子们一起回来，共同解放贝尔格莱德城。在这里，光荣的红军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联合作战。贝尔格莱德的大街洒满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鲜血。在这里也洒下了英勇的红军——苏联的儿子们的鲜血。因此，这一切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现在，你们和所有其他战士的任务，尤其是塞尔维亚儿子们的任务是：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解放我们饱经苦难的国家的其余地区。现在，贝尔格莱德和舒马迪亚的儿子们将和克罗地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战士们一起解放我们的萨格勒布城。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与红军并肩作战，把万恶的敌人赶出我们这个浸透了鲜血的神圣国家。

你们是否记得，一年半以前，敌人为了消灭我们集中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向我们发动猛烈的攻击？那时我们说：“你们不会得逞！我们必将胜利！”我们的盟国苏联、英国、美国现在有可能向我们提供援助了。英、美盟国开始向我们空投武器、弹药和我们需要的东西。今天，苏联的儿子——红军战士们正在和你们肩并肩地共同解放我国这一地区。在贝尔格莱德，在南斯拉夫，凝结了我们各大盟国和我们饱经苦难的国家的兄弟情谊。

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解放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要和盟国一起把敌人赶回他的老窝，并在那里制服这个妄想征服全人类的怪物。

塞尔维亚人民最大的叛徒奈迪奇曾在贝尔格莱德居住过。他和德国占领者一起曾在这里策划消灭塞尔维亚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们的阴谋。在这里，象在萨格勒布一样，策划了使兄弟相互残杀的阴谋，策划了消灭我国各民族——南斯拉夫人的阴谋。但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通过自己最优秀的儿子——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打乱了所有这些罪恶的阴谋。就在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地方，卖国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策划，他让切特尼克分子磨刀霍霍，妄图继续制造克罗地亚人民凶恶的叛徒——乌斯塔什分子1941年开始的血腥屠杀，妄图在德国人失败和被赶出去之后继续制造流血事件，继续挑起兄弟间相互残杀。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的儿子们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建立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团结。我们的军队到现在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正是这个兄弟情谊和团结。

我们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从现在起才真正成为全体南斯拉夫人的首都，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热爱的城市，成为南斯拉夫的所有儿子们都为之流血的城市。曾经指引我们渡过了这些艰苦岁月的指导思想——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思想和建立伟大幸福的南斯拉夫的思想，应该从贝尔格莱德放射出光芒。

你们的任务不仅是打击万恶的敌人，而且要警惕地保卫已取得的成果，为了取得这些成果到现在为止约有二十万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其他地区数十万名被摧残、被杀害、被瓦斯毒死的儿女们要求你们警惕地保卫这些成果，使我国人民的这一灾难和不幸不再重演。在我国仍然还有搞投机的人，在国外也有人企图利用我国的内战搞投机。这些阴谋

永远不会得逞！我们向我国每一个愿意从现在起和我们共同努力振兴和恢复我们这个不幸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正直公民伸出和解之手。现在我们愿意联合一切对于我国有价值的力量，一切愿意、真心地愿意象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战争中那样全力以赴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并努力尽快治愈这场可怕的战争留给我们的创伤的力量。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外的形势以及我国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同时我们要奉劝国内外所有那些搞投机的人，如果以为我们会丢弃我们为之付出许多鲜血的果实，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向任何人交出我们的成果！不然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们有责任保卫我们所赢得的一切。我们必须维护我们民主联邦的新南斯拉夫。在这个新的南斯拉夫，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将有发展的充分权利，每一个人都将有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以及一个有文化的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将不再是被踢来踢去的皮球或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既赢得了和盟国一起平等参加这场战争的权利，也赢得了和盟国一起平等地参加建设更幸福的新欧洲，而不仅是建设南斯拉夫的权利。

我相信，我们的盟国将接受我国各族人民的要求，他们也已经接受了这些要求。我们愿意，而且必须和我们的盟国一道肩并肩地消灭人类最大的敌人，而后，和盟国一道建设欧洲各国人民更美好的未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

同志们，最后，我号召你们，象过去一样，把这场尚未结束的艰苦斗争坚持下去。我们的国家彻底解放的那一天已不远了！

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幸福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万岁！

我们伟大的盟军红军万岁！

我们的盟国英、美的军队万岁！

为了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在欧洲和非洲各个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兄弟情谊万岁！

消灭法西斯！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胜利的节日

1945年5月9日在贝尔格莱德
广播电台的讲话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
指战员、工人、农民和公民们：

今天，5月9日，正好是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的四十九个月零三天，欧洲最强大的侵略势力——德国投降了。5月8日23点零1分德军最高司令部在柏林签署了投降书。

我国人民在四十九个月中作出的非凡的努力和流血牺牲终于结出了硕果。我国人民同盟国一起，首先是同苏联、英国和美国一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曾经不可一世，似乎不可战胜的势力，今天被摧毁了。盟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战胜了曾企图把所谓新秩序，即奴役和灾难的秩序强加给人类的破坏势力。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使欧洲牺牲了数千万人。疯狂的德、意法西斯以及他们在欧洲各个国家沾满鲜血的走狗们屠杀后方的和平居民，杀害所有不甘心屈从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人。成百上千个象马伊达内克和亚森诺瓦茨一样充满恐怖和死亡的集中营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并严肃地提醒全世界人民，决不能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要尽力根除这场悲剧的根源——法西斯。

南斯拉夫军队的指战员，游击队员们！

从1941年战争开始到今天，你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同强大得无法比拟的敌对力量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是欧洲所有被奴役人民的榜样。你们在为保卫自己被奴役的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的鼓舞下，在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必胜的深刻信念的鼓舞下，1941年以来坚决无情地打击了盟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光荣地履行了对自己祖国所负的义务。你们不朽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我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心中。辉煌的苏捷斯卡战役、泽兰戈拉战役、科扎拉战役以及奈雷特瓦战役的战场将成为你们以及你们牺牲了的战友们英雄气概的丰碑。它们将激励我国各族人民的世世代代，教育他们应该怎样爱祖国和为祖国而献身。它们将成为我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斗争中引为骄傲的纪念碑。

新的南斯拉夫军队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队。由你们组成的军队，取得了如此辉煌胜利的真正人民军队，应该是、今后也将是我国在非凡斗争中所取得成果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沿海和科卢什卡获得解放的兄弟们都在注视着你们。他们深信你们能够保卫他们赢得的自由。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穆斯林！

你们如此渴望的、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节日的气氛充满了大街小巷。曾使我国各族人民遭受许多灾难和牺牲的欧洲最强大的法西斯势力德国终于被打败了。企图奴役你们的势力

被打败了。德、意法西斯曾挑动你们自相残杀。但是，你们最优秀的儿女在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你们和热爱人民的感情的鼓舞下，粉碎了敌人的这个罪恶阴谋。今天，你们彼此不再发生纠纷和敌对，而是团结成一个新的和更幸福的南斯拉夫。今天，我们有一个由各平等民族组成的民主联邦的南斯拉夫，取代了那个贪赃枉法的、腐败的旧南斯拉夫。这是我们光荣的南斯拉夫军队的胜利成果，是你们顽强奋斗、自我牺牲和坚信正义事业的结果。

和平和自由的伟大日子来到了。我们被破坏了的国家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正在到来。现在我们必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建设我们遭到破坏的国家，巩固我们的真正人民的政权。我们要更加巩固我们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使任何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摧毁它。要取得这一胜利需要所有人民力量的巨大努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牺牲精神，就象你们的儿女们、兄弟姐妹们在战场上曾经做的那样。只有作出最大的努力，才能缩短重建我们国家的期限。

在盟国人民对共同敌人取得伟大胜利的这个日子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光荣的和战无不胜的红军，想起在这场非凡斗争中作出最大牺牲的英雄的苏联人民，想起为了盟国正义事业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的我们的伟大盟邦英国、美国以及它们的军队。我们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所有曾在法西斯的奴役下进行斗争和遭受苦难的人民。在这一胜利的伟大日子里，我国人民想到，共同浴血奋战的巴尔干战友，他们也经受了同一个敌人所造成的极大苦难，并且对这一伟大胜利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45年5月9日是共同的胜利日，是所有盟国人民的共同节

日。我们希望这个伟大的日子将成为鼓舞所有盟国人民为持久和平和相互谅解而奋斗的日子。如果盟国在战场上取得这一伟大胜利之后，在和平环境中也能象战时一样齐心协力和相互和解的话，那么，我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会感到幸福的。我相信，我这样说表达了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

我呼吁那些受了蒙蔽的、曾经手持武器为占领者效劳的人们，不论他们属于切特尼克、乌斯塔什，还是属于卫乡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向当地政府投降。同时，我声明：我国各族人民，更幸福的新南斯拉夫的建设者不会允许任何人阻碍他们进行建设的努力。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对于继续这样干的人决不留情。

我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就地解除曾为占领者效劳或企图撇开南斯拉夫军队另拉队伍的武装部队的武装。我命令：所有战争物资，包括轻重武器、军备和军粮仓库、军事设施及其他设施立即移交给南斯拉夫军队。

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其国和美国万岁！

盟国人民对共同敌人的共同的伟大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盟邦英、美和所有盟军万岁！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骄傲——光荣的南斯拉夫军队万岁！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万岁！

为解放我们的祖国而牺牲的战士永垂不朽！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塞尔维亚共产党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

1945年5月12日于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你们要建设和铺设你们未来的道路，塞尔维亚共产党人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对建设我们伟大的、共同的祖国——民主联邦的南斯拉夫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里，你们已经谈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请允许我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最重要的事件。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取得的一切伟大胜利，是奋斗的结果，是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自我牺牲和忘我精神的结果。

在这里，肯定有人已经对你们谈过我党战前所经历的各阶段。当我们看到我们党过去的状况，它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時候，我们就会看到党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而伟大。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党不是在庆祝胜利的时候，而是在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在需要党员和共青盟员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时候，同人民站在一起。这就是把我们党同群众、同农村城市各阶层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你们中间大部分人经历过人民解放战争。你们看到战争是何等的艰苦，有过多少流血牺牲，因此，向你

们谈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有必要向新的一代讲述这件事并让他们从中受到教益，以便知道新南斯拉夫是在流了多少鲜血、经历了多少苦难之后才诞生的，使他们懂得珍惜新南斯拉夫。今天，我们有了新的南斯拉夫。诚然，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还需要巩固人民政权，还需要把那些曾动摇过，现在仍在摇摆不定的人吸引过来，使他们投入一场全民运动中去，引导他们朝一个目标前进。要使新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和建设者懂得，为了我们祖国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幸福的未来，每个人都要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遭受到如此破坏和摧残的南斯拉夫，由于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作出了无可比拟的重大牺牲和献出自己的生命，必然感到骄傲的是：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从未获得象我国这样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新南斯拉夫和光荣的南斯拉夫军队，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人民的尊敬和赞扬。这首先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成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培育出来的战士们的成就。因此，必须着重指出：要把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看成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执行的命令。这些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1)巩固我国的人民政权；2)巩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兄弟情谊和团结；3)全力以赴，建设我们遭到破坏的国家。这是三项基本任务。

我们的新南斯拉夫是什么样子的呢？都说它是民主的、联邦的南斯拉夫，但应该很好地理解其实质。首先是我们的党员必须深刻理解这个实质，因为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曾经站在前列，站在最危险的第一线。现在也应当站在建设真正的、联邦的南斯拉夫的前列。我们的南斯拉夫之所以是联邦的，是由于它有许多民族：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我们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那里居住着克罗地亚人、塞尔

维亚人和穆斯林。但是,如果现在 we 想走一条捷径,即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地区内建立一个强大的、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联邦单位,如建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联邦单位,那是错误的。我们建设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其中每个民族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完全的平等。其实质就在于:我们把这些联邦单位建立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产生第二个问题,第二个任务,即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和团结。我们要保卫的正是这样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南斯拉夫。纠纷的因素将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必须成为连结这种团结和兄弟情谊的纽带。他们必须成为把所有人联合成一个整体的因素。共产主义者必须发挥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热爱自己的民族——克罗地亚民族或塞尔维亚民族,并不等于否定我们整个国家——南斯拉夫。相反,热爱自己的联邦,意味着热爱整体的南斯拉夫。因此,我要对你们全体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并通过你们对全体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你们都必须制止任何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残余并未根除,因为我们刚刚开始铲除沙文主义。不允许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村庄或那个村庄愿不愿意归于这个或那个联邦单位,因为都是属于整个南斯拉夫的。的里雅斯特不仅属于斯洛文尼亚,而且也属于南斯拉夫。里耶卡不仅是克罗地亚的,而且也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不仅是塞尔维亚的,而且也是南斯拉夫的。必须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就很清楚了。每个人,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这样工作,都作出努力,这对我们这些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是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愿望,但不是为了把你们的工作和成就归功于自己,而是由于我们看到,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和保证进

一步的发展。由于存在其公民是平等的、内部是统一的、强大的南斯拉夫，所以我们能够赢得并进一步增强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同情和钦佩。对外保持统一和强大，意味着创造我国安全的条件。只有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还需要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在旧南斯拉夫，我们曾经有过一支庞大的军队。认为这支军队如此迅速地崩溃瓦解仅仅是由于指挥战争的作风腐败、营私舞弊的将军们造成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原因在于这支军队不统一。这一弱点导致了：第一，领导软弱；第二，各民族之间发生纠纷。现在我们建立了军队，并将为它供应各种装备。但是，同时必须用这样的觉悟来武装我国人民的头脑，即：人民必须团结，必须和睦相处。克罗地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必须关心马其顿境内发生的事情。塞尔维亚人必须关心伊斯特拉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必须理解目前在我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生活中，也许在世界各国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转折。共产党人必须这样做，必须这样理解这个任务。

现在我想谈谈我国的建设问题。战时曾经非常困难，但是同志们，请你们相信，现在，在建设中，共产党人也不会感到轻松。他们必须又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带领所有其他人。我不必向你们讲些什么新东西，因为你们都看到了苏联，看到它曾经同多么大的困难进行斗争。不过在我国将会容易一些，因为我们有苏联，而且我们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以达到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即造福于我国各族人民。但是，这不会是轻松的。我号召你们，象在战场上站在第一线一样，现在，你们也要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我国的建设进展得越快，新的村庄和城市也就出现得越快，这将使我党的地位得到巩固。这样做不是为了党，而

是为了我国人民的幸福和生活。共产党人的地位必须是牢固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带领人民摆脱遭破坏的困境，就象带领他们摆脱这次战争一样。

我想就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缺点说几句。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巨大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共产党人应当谦虚，应当是精干的，不能在任何问题面前退缩，而是在问题刚一发生时马上就解决，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并防止妄自尊大。和人民的交往必须是同志式的和最亲密的。领导人不能傲慢，不能丧失真正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地方有官僚主义现象和对人民不正确的态度。选举将要到来。我们希望让人民选共产党员，但谁也不会反对人民选非党人士，因为人民有很好的指南针，懂得推选最优秀的人。总之，你们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和人民保持这种个人的交往，使人民爱戴你们。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警惕性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国还有很多内部敌人，他们被粉碎了，但还没有被消灭。诚然，这是我国军队的任务，但是军队自己不能找到那些伪装的敌人。共产党员必须找到这些敌人，必须使他们不能危害人们并受到制裁。不要躺在胜利和战争的结局上睡大觉。现在要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斗争会有各种形式，从小规模破坏、钻空子到暗杀活动。我们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这里的斗争比前线的斗争更艰苦，首先要有警惕性和人民的信任。

党的干部建设是我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必须提高我们干部的水平，但不能仅仅靠学校，而且要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来提高。

要有勇气提拔新干部，要信任干部，在他们的工作中考验他们，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提高。在战争期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难道能够建立起一个拥有一万名军官（这些人从未当过军官）的军队吗？如果我们起用墨守成规的官员，难道能够建立人民的政权吗？我们有勇气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们只要稍加引导，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要给人们工作做，并在工作中考核他们。不要害怕任命干部，不要害怕提拔和帮助年轻干部。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是提高共产党人水平和为正确发展创造条件的因素。不爱听批评，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就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是：具有很好的自我批评精神，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当然，只承认错误而不改正错误是不对的。正确的、积极的、共产党人式的批评应当成为衡量每个共产党员的准绳。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人能够批评你们。不，人民也有这个权利。你们也不要怕这样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不，相反你们将只会得到信任。我们将实行象在俄国一样由人民授予共产党员党证的办法。

另外，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党的建设问题。的确，今天我们的事务过于繁忙，以致几乎没有时间过党内生活。党内生活的意思是：支部定期开会，党员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理论学习班中得到提高。但是，今天我们不再为过党内生活提供场所，没有象战时在旅里过党内生活那样。党内生活包括讨论问题并且在会议上议论国际政策，在一般的群众大会上也要谈到这个问题。如果党员正确地理解党的路线，那么就不必在党的特别会议上研究政策。这就是说，要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但是，联系群众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天天和处处，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不应当有任何与群众的政

治观点不一致的政治观点。

有很多共产党员在考虑下一个阶段，他们认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下一个阶段快到来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下一阶段。我们不应等待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的某种急剧转折。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新的道路走向自己的目标，这是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形势赋予我们的另一条道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并未明显分开。这有点不一样。总有一天会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解释清楚。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亲自与斯大林交谈过。他说，这同列宁主义学说很本不抵触。我们不必寻求其他转折点。这是最可靠的道路——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连我也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可见，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解决当前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也有许多缺点。但是，为此责备我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自己看到了这些缺点。我们同很大的困难作斗争。首先是我国遭到极大破坏，交通堵塞，其次是在领导国家事务中缺乏经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当过部长，也没当过主席。今天的形势逼着我们去担负这些职务。我们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但是，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如果不是从上到下齐心协力地干，我们自己是无法战胜这些困难的。

不久前，我接见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代表团。我问他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很好。我对他们说：“如果真好的话，你们也就不会到我这儿来了。”于是，很多人又说情况不好，并开始讲他们的财产怎样被烧毁和剥夺。我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我们知道你们参加过德国军队，和我们打过仗。但这并不是说现在要追究你们的责任。我们知道你们是受蒙蔽的，不都是杀人的凶

手，你们当中百分之九十是受蒙蔽的，现在我们应该帮助你们，向你们解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希望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二等或三等公民，希望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享受平等，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教师，使你感到象在自己的国家中一样。”在作了这番解释之后，他们表示赞成我们的意见。可是，切特尼克分子却在那里盗窃和破坏财物，这我们就不能赞成了。科索沃的共产党人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这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举伏伊伏丁那为例。我们建立兄弟情谊和团结，可是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不愿承认克罗地亚人，而称他们为布涅瓦人。克罗地亚人申请去贝尔格莱德的通行证，沙文主义者在他的通行证上写上：民族——布涅瓦人。如果克罗地亚人中曾有乌斯塔什分子，那么，塞尔维亚人中也曾有切特尼克分子。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必须根除的错误。必须连根铲除地方沙文主义！我希望我们的伏伊伏丁那真正成为兄弟情谊和团结的省份，各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相互间没有任何分歧。各种分子，如旧文人、旧职员，都说铁托和共产主义者把塞尔维亚弄得四分五裂。塞尔维亚生活在南斯拉夫之中，而我们并不想在南斯拉夫内部建立若干个自相残杀的国家。如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平等的，如果它们有自己的联邦单位，那么我们就没有分割塞尔维亚，而是为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造福，同样，也为生活在那里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造福。这里只不过是行政区划问题。我不希望在南斯拉夫内存在使彼此分割的边界，我说过一百遍，我希望边界能把我国各族人民连结在一起。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几项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和很有意义的。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塞文版第2卷）

在解放后的萨格勒布的 第一次讲话

(1945年5月21日)

兄弟姐妹们，公民们：

我很高兴能够在克罗地亚人民光荣的儿子马蒂亚·古贝茨早年牺牲的这个圣地问候大家，并祝贺你们的解放。

四年之后，我又有机会来到我们大家都感到亲切的萨格勒布。在那些日子里，克罗地亚人民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民族一样，历尽了千辛万苦。四年前，在这里宣布成立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独立”是德国的刺刀带来的，是同盖世太保一起来的，而所谓的首领是同德国将军们一起来的。他充当了占领者在克罗地亚的大刽子手、大狗腿子。但克罗地亚人民很幸运：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他们的儿女，他们同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一道投入了斗争，洗刷了克罗地亚母亲生育的罪魁帕韦利奇给克罗地亚人民带来的耻辱。

现在克罗地亚自由了。她和南斯拉夫其他联邦单位一样，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儿子用鲜血和生命解放的。在斯雷姆的田野上，在斯拉沃尼亚的平原上，在萨格勒布城下，塞尔维亚、马其顿、

黑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儿子们肩并肩地战斗过。我们的胜利不是南斯拉夫哪一个民族的胜利，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胜利。新南斯拉夫不是在谈判桌上建立的，而是在我国各族人民四年的艰难困苦中诞生的。在这个新南斯拉夫里，各民族都将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因为他们为新南斯拉夫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最优秀的儿女。

在这里，在萨格勒布，四年来一直有人造谣说，游击队是大塞尔维亚倾向的先遣部队。同样，在贝尔格莱德，也有人造谣说，游击队是大克罗地亚的先遣部队，因为领导游击队的是克罗地亚人。我相信，很少有人信这种谣言，因为很清楚，游击队所进行的斗争，我们英雄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是共同的斗争，它不仅体现了塞尔维亚人的向往，而且体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向往。

现在，进行新的、更艰巨和更长期的斗争的时候到来了，为恢复遭到破坏的我们国家而斗争的时刻到来了。使我们大家高兴的是，萨格勒布遭到的破坏比较小。但这不是帕韦利奇的功劳，也不是德国人的功劳，而是那些进行过斗争的人的功劳，因为他们曾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个城市，以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利用他们以前创造的东西。但是，其他城市被破坏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斯雷姆以及我国其他地区的乡村被破坏了。我们不得不重建这些城市和乡村。你们的任务，你们的责任，就是考虑我们如何共同恢复被破坏的一切，而不管是在哪个联邦单位里。在建设方面，我们要用共同的力量，在短期内取得良好成绩，就象我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成绩一样。现在，我们有可能在和平时期证明，我们决心不惜最大牺牲保卫我国各民族最优秀分子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成果。现在所取得的一切，将是永久的成果，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从我们手中把它夺走。

请看这个例子。你们看到，德国兵和乌斯塔什士兵在四年战争之后是什么样子，你们看到他们是一些老气横秋的人，是一些感到茫然和十分冷酷的人。请你们再看一看我们的新军队，看一看经过四年战争之后我们的战士是什么样子，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们决心保卫他们和他们的战友洒尽热血而赢来的东西。这是年轻一代的军队，他们是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这是生气勃勃的军队，他们在建设方面继续完成他们在战场上所作出的业绩。

我想谈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这是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没有兄弟情谊和团结，就不会有强大而幸福的南斯拉夫；没有强大而幸福的南斯拉夫，就不会有强大而幸福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说联邦制的南斯拉夫时，指的不是某种分立主义，指的是国家的新体制，新南斯拉夫的体制。在新南斯拉夫里，每个民族都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各民族又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将在全世界面前为这样的国家而感到自豪。今天，我们的国家已在整个进步人类面前享有巴尔干任何一个国家从未享有过的威望。

有人吵吵嚷嚷说，在这四年中克罗地亚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请问：在那个克罗地亚里有哪一点是独立的？一点儿也没有。克罗地亚曾经被奴役，尽管到处都悬挂着克罗地亚的旗帜。它在各个方面都是被奴役的，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

今天，当我们建立了国家内部制度新形式的时候，还应该指出，我们清算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建立起来的形式。当时一个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集团把中央集权制度强加给我们，在这种制度

下，其他各族人民都没有任何权利，塞尔维亚人民也没有任何权利。1941年我和我的同志们同舒马迪亚农民、塞尔维亚人民一道开始了殊死的斗争。我看到过塞尔维亚的农村、塞尔维亚的公路，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克罗地亚某些人所说的那种财富都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到的是公路很不好，学校很少，卫生设施很差，跟克罗地亚的情况完全一样。因为上缴到贝尔格莱德的钱都装进了统治者的腰包。今天，在联邦制的新南斯拉夫，谁也不能再说什么这个或那个民族受到民族压迫。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过去，我们看到过民族压迫的后果。1941年，当南斯拉夫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这种结果。问题的实质在那里呢？就在于各族人民不喜欢那样的南斯拉夫。不仅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不喜欢它，塞尔维亚人也不喜欢它，决不象我国各族人民热爱新南斯拉夫那样热爱它。

对那些还在胡说已建立起来的制度会改变的人们，对那些还在妄想会变天的人们，我要说：这里什么也不会变。之所以不会变，是因为南斯拉夫每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新的、联邦制的南斯拉夫；之所以不会变，是因为我们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之所以不会变，还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真正的统一，南斯拉夫各民族就无法生存，在经济、文化方面就不能得到发展。请看，欧洲的一些小民族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在暴风骤雨到来之际，一个小民族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要对新南斯拉夫的公民说，只要我国各民族进一步团结一致，只要各民族都决心万众一心，那么南斯拉夫就会更加安全，无论什么敌人都不敢进犯它。你们记得，我们的斗争始于塞尔维亚，四年中扩展到我国各地。我们的部队从捷夫捷利亚开始战

斗，追赶着敌人，并在奥地利边界结束战斗。四年中，南斯拉夫各族的儿女汇集成我们新军队的英姿勃勃的行列。为了在亚得里亚海边、在的里雅斯特、在戈里察、在索查结束战斗，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儿子还守卫在那里，肩并肩地战斗，他们团结得坚如盘石。我想指出，在这里，在克罗地亚的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以及各联邦单位的每个乡村和城市都需要这样的团结。

我们的游击队一开始就高举写着南斯拉夫各民族兄弟情谊和团结口号的旗帜，在这个口号下，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同强大的势力进行了斗争。他们不但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你们听说过历史上有赤手空拳的人民在生死搏斗的过程中，在没有工厂和仓库，没有进行斗争所必需的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不仅打败了敌人，而且建立了军队吗？我们的游击队做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都可以为他们所取得的业绩而自豪。这是为我国人民这一伟大业绩而斗争和牺牲的人们下定决心的结果。

你们看见了吗？在那可怕的1941年，德国占领者如何在其仆从帕韦利奇的帮肋下，以后又在塞尔维亚人民的叛徒奈迪奇和米哈伊洛维奇、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叛徒鲁普尼克的帮助下，不仅竭力加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民之间的鸿沟，而且竭力加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鸿沟。你们看见了吗？在旧南斯拉夫为了扩大这条鸿沟而干了什么勾当。如果这一切都照旧，那么这条鸿沟就会永远存在下去，我国各族人民就永远也不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但是，手执武器的战士们填平了这条鸿沟。我们的战士在舒马迪亚、马其顿、在波斯尼亚丛山、在斯拉沃尼亚密林和斯洛文尼亚山岭里一批又一批的战士牺牲了。但是，那些活着的战士仍然高举写着兄弟情谊和团结口号的旗帜。这是军队的成就，是在军队和

人民帮助下取得的成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十分昂贵的。

人们要问：游击队靠什么力量坚持下来？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支持下来？他们在忍饥挨饿，缺衣少穿的情况下是怎么能够顶得住的？在残酷的斗争中是什么东西鼓舞了他们？那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没有兄弟情谊和团结就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幸福，就没有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幸福。无论我们走到那里，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口号都使我们能得到我国苦难而贫穷的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军队是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又是依靠人民支持的。人民拿出最后一片面包，供养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战斗的战士。除赶走占领者以外，我们的兄弟情谊和团结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另一伟大胜利。现在你们大家，以及所有曾受骗上当的人们都要抓紧工作，竭尽全力使这种兄弟情谊和团结永远不受损害。

很多人还不懂得什么是联邦制的南斯拉夫，什么是联邦内的克罗地亚，联邦内的塞尔维亚，等等。这不是说要强调这个和那个联邦单位之间的边界，不是说你在你那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我这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的。这些边界——请允许我这样来形容——就象一根大理石柱子上的白花纹。联邦制南斯拉夫中各联邦单位之间的边界不是分界线，而是联接线。今天新南斯拉夫中各联邦单位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几个小国家的结合，而是一个联邦，有着更多的行政性质，有着自由地管理自己的性质。这就是各联邦单位独立性的性质，在文化和经济自由发展方面的充分独立性。但同时，这又不等于说，你们克罗地亚人就不能关心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这也不是说，如果你们的经济状况好些，就不该帮助塞尔维亚和其他联邦单位的兄

弟们，反之也是这样。这就是常言道：发了财，要帮兄弟。尽管现在兄弟们被墙隔开，但还是在同一个屋顶下。这是我们共同的家，是一个整体，但在家里，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在联邦制的新南斯拉夫里发展文化和经济。这样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不仅为我国各族人民所接受，而且在许多还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里也享有声誉。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自己历史上最艰苦的日子里很好地解决了自己内部问题的一个例子。

我提醒诸位，在联邦制的新南斯拉夫国家里不允许有沙文主义，不允许存在有害的地方爱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对该联邦单位的障碍和损害，而且是对全南斯拉夫的障碍和损害。沙文主义、有害的地方爱国主义的问题，必须从日程上勾掉，不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克罗地亚人无权再提起1918—1941年的压迫了，不能再把这作为反对共同的新南斯拉夫企图的借口了。请允许我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对你们说，1918—1941年对我们来说是个什么时期？这不仅对塞尔维亚人，而且对其他所有人都曾是一个严酷的经历，一次严峻的教训。因此，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必须明白，过去的事情都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最优秀儿子的鲜血冲刷掉了，应该把它从日程上勾掉了。谁胆敢再反其道而行之，他就不仅是联邦内的新克罗地亚的敌人，而且也是克罗地亚人的敌人。请你们看看领土辽阔的国家，伟大的兄弟苏联吧。你们看，那里有多少个民族，又有多少非斯拉夫民族，可是他们象兄弟一样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你们看到他们是这样和睦和团结，他们最先胜利地对付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德国侵略者及其一切帮凶。难道在南斯拉夫，我们连语言都没有多大差别，却还要继续进行过去那种相互争吵吗？这对我国的未来是可怕的危险。我们正处在巴尔干斯拉

夫人联合的伟大历史关头，如果我们互相争吵不休，我们就可能成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最大敌人——德国侵略者的猎获物。在历史上，克罗地亚的儿子们在欧洲各地曾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打过许多仗。过去的事都该结束了！现在这里建立了新南斯拉夫，为她作出的牺牲是必要的，是神圣的。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铭记心中。

现在简要谈谈有关结束战争的问题，以及一些尚未澄清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在和会上得到解决。对当前的形势我只想讲几句。

在这场斗争中，在反对盟国的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我们成为民主力量中最有战斗力、最强大的欧洲盟友。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献出了三十万年轻的生命。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解放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建设更美好、更幸福的社会，同时也是为了解放那些受异族奴役二十多年的我们的兄弟。现在，应由和会作出关于我国部分领土最终归还我国的最后决定。我们解放了这些地区或象人们所说的这些地区被占领，但我们没有要任何人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我们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到达了索查和弗尔拉尼亚，正如盟军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在非洲战胜敌人并抵达索查一样。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到这那里并赶走了敌人而巧取豪夺。因此，指责我们置某某于无可奈何之地，指责我们用武装力量占领了国际法尚未同意归我们的地方，是错误的，是很不公正的。我们来到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索查，不是为了让盟国承认既成事实，不是我们吞并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地区，我们来到这些地方，是为了消灭和帮助消灭德国这个文明的最大敌人。因此，现在指责我们并要求我们离开这些地方，而不顾在斗争的最后十天我们在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斯洛文尼亚沿海牺牲了八千人的代价，这对我国各族人民是极大

的不公道。我们作为盟军有权留在那里，因为我们要求承认我们的盟军权利，正如承认我们已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并正在完成的那些义务一样。

即使事先盟军对占领区有什么协议，但也不能成为我们不去保护我们被奴役的兄弟的理由。亚历山大元帅和我曾达成协议，由他的部队占领这块领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先到了这里，是打到这里来的，为的是保护我们的居民不再受意大利法西斯的屠杀，战败的意大利现在不能靠法西斯恐怖活动欺压这些地区的斯拉夫居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兄弟丢下不管，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因为他们自己也为了自己的自由洒热血。这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用武力去夺取什么，而是我们要求尊重我们的权利。请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盟国的共同事业，我们沉默，我们战斗，我们流血。可是在意大利，在那个时候就提出了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的问题，他们说为此献出了六十万人的生命。如果说他们在反对我国人民的战斗中付出了代价，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我们赔偿这种牺牲呢？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喜欢用斯拉夫居民的生命讨价还价呢？我们等待着和会对此作出最后决定。昨天意大利还在我们的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利卡杀人放火。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和其他败类在我国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抢光了我国各地区，抢光了我们的村庄，屠杀了我们成千上万最优秀的儿女、公民和农民。现在意大利还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不承认意大利的盟国权利，我们要求它赔偿给我们造成的一切损失。意大利人想把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斯洛文尼亚沿海，甚至把里耶卡和扎达尔划归他们。我们要求首先清理我们的帐目，然后我们愿意同意大利人民最友好地相处。我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情终究要解决，我们将同盟国协

商,但我同样可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要保卫我们的权利。因此需要团结,需要兄弟情谊,需要有强大的新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人不能自己保卫自己的边界,克罗地亚人也不能自己保卫自己的边界,塞尔维亚人也不能自己保卫自己的边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自己保卫自己的边界,而要由各民族共同来保卫。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听说南斯拉夫签订了,或者说我代表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互助合作协定,这是一件大事。这个同盟早就由南斯拉夫最优秀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用鲜血建立并签订了。这种兄弟情谊在同我们伟大的斯拉夫兄弟、我们伟大强盛的盟国苏联的共同斗争中得到巩固。这个协议,这个同盟,不是针对哪一国人民的文件。我们签署这个文件是为防患于未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愿望是同我们伟大的盟国苏联在兄弟情谊中最和睦地相处,这是从我国的需要出发的。当我们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时,我们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如何热爱南斯拉夫人民,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德国侵略者动用全部力量扑向苏联的时候,南斯拉夫人民忠于自己的苏联兄弟,尽管没有任何协约或同盟,因此南斯拉夫人民赢得了爱戴。南斯拉夫人民现在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放心了;可以安心地在各方而发展了;可以安心地放手建设自己遭破坏的国家了。我们同苏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两个盟国的利益。由于过去领导南斯拉夫的那些人执行贩卖政策;我国同伟大的苏联长期地隔离。战后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同苏联建立联系,以纠正过去的错误。我国愿意同所有民族、同所有无意威胁我国利益的国家和睦相处。我们的国家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即希望在和平环境下同我们的大盟国和其他受德国侵略者奴役的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

犹如在战争时期建立联系一样。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保持这种联系的障碍,而且我们将保持这种联系。我们希望盟国把这看作是我们真诚的愿望,尽管我必须说,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尊重我们的权利,尊重我们对这一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

现在我就我们面临的任務说几句。军队还没有归来,不应该光是等他们归来,大家都应该各尽所能地干起来。在有些地方创造的热情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阶层都是这样。今天新南斯拉夫的工人不能以1941年以前那种态度来对待国家了。在新南斯拉夫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权利,再没有人能够压迫他们了,在新南斯拉夫,工人们也有自己的一切权利。新南斯拉夫把工人看作自己强大的支柱,因为工人、农民、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必须共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尽快建设我们国家的因素。工人们再也不要担心少付给劳动报酬了。南斯拉夫的工人再也不用担心宪兵会追捕他们了。南斯拉夫的工人有权在精神生活上得到发展,他们有权要求并得到全部劳动报酬。南斯拉夫的农民再也不用担心遭到哪个老爷的欺负了。我们知道,在新南斯拉夫没有、再也不会再有老爷了,只有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公民。城市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城市里有工人、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小手工业者。城市里有经济工作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工作,为整个社会服务。

我还想说一件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一夜之间办到一切需要办的事,使一切都马上富足起来。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应当立即朝这个方向做。刻不容缓,这是我们的口号。应该立即着手工作,我请那些还怀疑观望的人们相信,一切都会象我们说的那样,因为我们是善于斗争的人,我们对那些在深山

峡谷斗争过的人们负有义务，我们对为这个思想牺牲的人们负有义务。我们对他们负有义务，我们必须履行这个义务。

我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说到我们面临的每项任务和所有具体任务。我们的桥梁被炸毁了，铁路和公路被破坏了。为了能够正确地分配生活必需品，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修复铁路、公路和桥梁。为了保障每个国民的生存，必须耕种每一寸土地。如果没有人耕种，那就要组织劳动队去耕种。有面包，有日常生活所需之一切，就意味着完全不依附于外来的任何援助。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的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南斯拉夫。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最短期间内达到这一目的。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人民阵线的任务

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5年8月8日《战斗报》)

同志们：

首先我必须感谢你们今天给我和主席团其他同志的这种巨大的信任。

我希望当我就卡德尔同志的报告中和其他报告中以及讨论中都已经作了很好阐述的某些问题讲几句话时，不要认为我不谦虚。因此，你们不要指望我讲什么新东西。我只想着重谈谈我认为对人民阵线和贯彻人民阵线的任务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这次有所有联邦单位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和大联合结束了我国政治分化的过程。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作为一个战斗的政治联合体，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不仅同南斯拉夫过去的所有党派联合有根本的不同，而且也同其他国家曾存在过的人民阵线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种由某些自愿为实现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而努力的党派和团体参加的大联合为什么能够在我国实现呢？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这一纲领尽管现在才写成文字，却早就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和头脑里，特别是存在于那些不仅为了把占领者驱逐出我国而且也为了更好的制度，为了

争取一个比战前好的南斯拉夫而在 1941 年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和头脑里。这就是说，这一纲领早已成为现实，早已开始执行，而现在以书面形式为某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们所接受。这些代表只是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同曾经构成这些党派的群众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我同时必须强调，我决不是贬低各党派和团体的领导人加入人民阵线的意义。相反，我认为这有重大意义，因为我认为这是迅速巩固和内部和解的保证。而这种巩固与和解对于迅速医治这一伟大解放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创伤是十分必需的，我认为这个事实说明，某些党派和团体的领导人通过参加人民阵线来向人民承担了一部分义务，承担了并不轻而易举的、需要作出重大努力和自我牺牲才能完成的职责。

从民族观点来看，某些联邦单位的人民阵线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大联合，对于巩固兄弟情谊、消除地方爱国主义、防止民族沙文主义等等，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从国家观点来看，南斯拉夫人民统一阵线是我国在各方面都可以依靠的强有力的支柱和给我国这个内部秩序井然的国家打下烙印的强有力的政治因素。

从建设我们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如在所有的报告和讨论中都已着重指出的那样，南斯拉夫人民统一阵线是我们便于加快建设我们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的强有力杠杆。很少有象南斯拉夫人民阵线这样由这么强有力的建设性力量组成的联合体。我们只举出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南斯拉夫青年联盟、工人和职员工会、农民（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农民，那也是绝大多数农民）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阵线中有我国最富有建设性的力量，而且有几百万人。如果

我们再补充一个事实,即阵线中还有我们光荣的南斯拉夫军队,伟大解放斗争成果的忠实捍卫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阵线是一支令人敬佩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它能够实现纲领中提出的一切任务。

这是实际情况。我国的某些反动派以及在外国的反动派都应当对此加以考虑。这些人还妄想不择手段地重新恢复旧制度,也就是让他们回来骑在人民头上。因为一想起他们永远失掉了自己的阵地就使他们惊恐万状并且野兽般疯狂地反对南斯拉夫现行制度。为我国国内外的反动派撑腰的其他国家许多反动派也应对此加以考虑,才会相信他们的勾当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而只会是自讨苦吃,引起我国人民的厌恶。因为我国人民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许多同志在读到国外的反动下流文人污蔑我们国家和歪曲事实的诽谤和谎言时,都愤怒地反对,并对人间竟有如此不知羞耻的事感到惊讶。对此,我作如下的回答:不管他写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他怎样歪曲事实,都只是那些对南斯拉夫策划的阴谋破产,即遭到失败的人走投无路的标志。失败者总是要恼怒的。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管这些诽谤和对事实的歪曲。我们还记得从1941年我们开始斗争到1943年这一期间,对我们的游击队,后来对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我们的人民解放阵线造过多少谣言,进行过多少诽谤,歪曲过多少事实。但是我们当时都不大理采这些。我们打击了占领者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们也打击了占领者的仆从,乌斯塔什分子、利奥蒂奇分子、斯洛文尼亚的卫乡队,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卖国贼,我们打击他们,不管国外如何吵吵嚷嚷。于是他们同占领者一起被粉碎和消灭了。当我们的敌人即国外的反动分子者到用诽谤和谎言

不能战胜和消灭一个为自己国家的自由并站在同盟国一边进行斗争的运动时，就暂时抛弃了那些他们一直大力支持的家伙。从那时起就用另一种的方法来反对我们的解放军，这另一种方法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我们在国内国外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一场反对我们的解放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日益疯狂的运动，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尤其我相信，国际反动派会对我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围攻，但我现在就可以说，这一谎言攻势也要垮台，向我国和我们的运动搬起的石头将砸在搬石头的人脚上。

阵线的国内外敌人指责我们搞一党制，即不怀好意地把人民阵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我想，在国外这样指责的人会很高兴自己有这样一种制度，但谁又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呢？于是他们就觉得这不可理解，或者是不愿去理解。当他们说这些。写这些废话时稍微想一想，他们一定会胆颤心惊，因为他们会看到这个“一党制”代表着几百万成员。

这些人过去向我们建议过，现在还一直在建议以他们的民主为榜样，首先允许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旧党派、反动党派都恢复起来，因为据他们说，只有这些党派才有能力创立他们那种类型的民主。这倒也对，因为那些政党的确建立了他们那种类型的民主，也就是挂起民主的招牌而在背后却是少数人的专政，可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人民不要这种民主。我国人民懂得，只是在选举时用选票来表达的民主并不是最好的民主，而具有平等、群众社会平等的深刻含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没有重大社会改革的民主不是民主。

我国人民为自己争取到自己这种类型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中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充分自由，而同时为数不多的少数人只是受到一定的限制，限制他们不得为所欲为，不得掌权。而他们手中一旦没有权力，就什么也干不成。其次，我们人民认为，真正希望民主，希望人民民主的不同政党和团体联合起来是明智的，就象我们这个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所表明的一样。我国各族人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存在着许多有不同纲领的、相互明争暗斗的党派终究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会听这种劝告。那些听从和将要听从这种劝告的人十之八九会倒霉的，因为其追随者会寥寥无几。

现在谈我国内部制度问题。当我们1944年同在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舒巴希奇先生签署了关于舒巴希奇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之间的某些合作协定时（正如你们所知，这在后来导致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曾同意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把国王的问题挂起来。但是，今天，当选举日已临近，当这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到是建立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制，当这一问题也列入阵线的纲领时，我还想就这个问题讲几句。

当我们为解放我国投身于斗争时，我们提出过一个口号：“绝对不许复旧”，那时没有一个战士、一个人民阵线的成员会想到要建立以国王为首的新制度。特别是从解放战争一开始直到1944年为止，德拉扎·米海伊洛维奇以及奈迪奇都是以国王的名义干了一切卖国勾当的。他们这样做当时国王和反动政府是不是不知道呢。我深信，不是这样的。这也不只是我这样相信，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特别是每个人都看到，每当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者一起向我们解放军和游击队发动了较大的攻势之后，每当大规模屠杀游击队的家属、穆斯林等之后，国王是如何把勋章奖赏给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和士官、刽子手和骇人

听闻的罪犯的。即使没有比这再多的事件，也足够不准国王回国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据此也已通过了在制宪议会召开之前禁止他回国的决定。

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是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不是从个人角度，而是从制度角度提这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即在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中，君主制是否行得通。不行不通，这是由于有许多理由。

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理由是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以及我相信塞尔维亚的大多数人都不要君主制，这不是胡乱想出来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与我们的联邦是不相容的，因为在君主制的情况下，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解放与平等的各民族就会感到重受威胁。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存在同君主制是不相容的，因为流了这么多血才换来这个政权的人民群众在君主制下会感到受威胁。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君主制迟早会为自己建立符合于君主制度的国家机器。

第三，我们的这种民主，人民的民主，正象图纳·巴比奇同志昨天说的那样，同君主制是不相容的。因为我国各族人民对1920年到1941年间在君主制之下搞的那种民主记忆犹新。你们看，这一切都说明人们反对君主制，主张共和制。

因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从现在起有权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它有权把它的这一要求带到群众中去，并作为一个不仅以民主原则而且也以共和原则为基础的政治联合体进行活动。

现在谈谈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今后的任务。昨天我在这里听到好象是来自克鲁舍瓦茨的一位代表说，人民阵线的全体成员都应

致力于消灭各种卖国小集团。我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几句。的确，在我国某些地方存在各种恐怖小集团。审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全国委员会及其一伙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审讯时的文件说明德国人曾派遣恐怖小组到塞尔维亚执行某种任务。但是，现在没有德国人了，那么是谁在支持这些匪帮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这些匪帮就是过去也不只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国内外想以此来在我国制造动乱的各种反动分子也支持他们。在塞尔维亚，这些恐怖匪帮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和利奥蒂奇分子组成，在波斯尼亚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和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组成，在克罗地亚由乌斯塔什分子组成，在斯洛文尼亚由鲁普尼克的卫乡队组成。这些匪帮的主要首领，包括帕韦利奇、鲁普尼克、奈迪奇之流仍都呆在国外，而且遗憾的是，尽管他们是些血债累累的战犯，盟国方面却未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或他们一类的人交还给我政府。我们南斯拉夫是会消灭这些匪帮的，但是，为了尽快结束这桩事，阻止这些匪帮威胁我们和平的乡村、残暴地杀害农村干部或普通农民，从而在国内制造动乱，阵线的全体成员有义务帮助政权机关抓住这些坏家伙。

其次，人民阵线的成员有义务解释和驳斥那些从国外传来并使上当受骗的人感到迷惑的各种离奇的消息，有义务说明这些都是没有的事，所有这些消息都是臆造出来的，人们不要再相信形形色色刽子手的谣言了，这些家伙想牺牲一些上当受骗的人来苟延残喘。我们已经颁布过二次大赦，大赦的面很宽，这证明我们有力量，证明我们希望各种上当受骗的人能够重新回到人民大家庭中来，并为我国人民的幸福从事建设性的劳动。任何人都不要错误地以为这是我们软弱的表示，因为在这次大赦之后，如果谁要重新

听信我国敌人的骗人鬼话,走上罪恶的反人民活动的道路上去,谁的日子就不好过。

在我们国家的建设方面,阵线面临重大的任务。实现阵线的纲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春天和秋天百分之百的田地种上庄稼,意味着盖工厂和增加生产,意味着竭尽全力供应我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利卡、戈爾斯基科塔尔和黑山等城市地区,这是一项紧急工作,不容拖延,因为冬天已临近,阻碍交通的暴风雪也快到来了。

阵线的纲领意味着严格贯彻减缓人民中最贫穷阶层的困境和关心我们在争取今天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面献出自己的健康的残废军人的社会措施。

阵线的纲领意味着消灭民族沙文主义,扩大和加强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和团结。

阵线的纲领意味着打击给贫苦人民的生活造成困难条件的丧尽天良的投机倒把活动。

阵线的纲领意味着加强和巩固我们的人民政权。

阵线的纲领意味着象爱护眼珠一样保护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果实。

最后,阵线的纲领意味着完成在我国消灭法西斯残余的事业。

我认为这些是主要任务,完成这些任务要求一切力量作最大限度的努力。

这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历史意义无须再加强调,因为对这一点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我要号召你们大家走到人民中去,把那些在这里提出的思想移植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上,因为这是我们迅速实

现我们面前的目标的保证。

民主联邦的新南斯拉夫万岁!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万岁!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1卷)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45年8月8日于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

我认为，在向我们这个最高代表机关提出的这个报告中，应该概述从1943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来这个时期的情况。

无论从军事事件或从政治事件来看，这个时期是我国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时期。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在我国斗争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时候举行的。那时敌人发起空前残酷的、以消灭我人民解放军和镇压整个解放运动为目的的第四、第五次大规模攻势刚刚结束，第六次攻势已经开始。在这种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除了通过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决议以外，还成立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它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其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以顺利地继续进行战争，巩固人民政权和使它正确地发挥作用；在解放区组织经济，采取种种措施保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减轻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地区的困难，同我们的各大盟国建立联系，并要求承认南斯拉夫的现状，即承认人民

解放运动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由于解放区的分散和不稳定，南斯拉夫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当然是十分艰巨的。敌人主要打击的对象一直是最高司令部的驻地，因为这通常又是全国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所在地，因此敌人就以更大的力量进行打击，不只是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而且还要把我们消灭掉。敌人在第六次攻势中进犯波斯尼亚西部，即亚伊策，后来在第七次攻势中进犯德尔瓦尔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就不得不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解放区去，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仍能进行有利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工作。

在敌人进犯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迁移到维斯岛以后，全国委员会立即在维斯岛开会并开始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当时，盟国没有承认全国委员会，只承认最高司令部。因此，我能以最高统帅的身分同盟国一起解决很多重大问题。你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问题是通过盟国驻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使团以及我国驻盟军的先是设在开罗、意大利，后来说在英国的司令部的军事使团进行的。这样，我们在盟国的帮助之下，把二万五千多名难民及儿童由意大利转移到了非洲。此外，用飞机把我们一万多名伤员运往意大利和马耳他（这些难民和伤员今天大部分都已回到了祖国）。根据同盟国达成的协议，我们在巴里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除了为我们的部队筹集给养外，还做了上述的事情。现在巴里基地已经撤销，因为已没有在意大利设立这一基地的必要了。

同舒巴希奇达成的协议

随着以韦莱比特少将为首的我国军事使团的派出（先是驻开罗，后来驻伦敦），我们同盟国政界人士建立了初步接触。通过我国的这些军事使团，我们得以使盟国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到南斯拉夫的真相。此外，这使我们有可能会同接受国王委托组织伦敦新政府的舒巴希奇先生会晤。会晤于1944年6月16日在维斯岛举行，双方就舒巴希奇先生的政府同全国委员会进行合作以及由国内派三名大臣参加舒巴希奇政府等事项签署了协定。

同舒巴希奇先生会晤以后，我到意大利同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先生以及其他某些领导人员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晤，借此机会我也同丘吉尔先生进行了会晤。同丘吉尔的会晤与尽速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有关，同时还讨论了一些与协同作战有关的问题。这次会晤时还决定把一支舰队交给南斯拉夫。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协议由于某些不喜欢我们的人的过错，直到几天以前才得以实现。这个问题几天以前才从日程上正式勾销，因为我们驻意大利的代表在同盟国军事当局会谈中已达成协议，使南斯拉夫舰队马上驶回我国港口。船上人员将自行决定是随船到南斯拉夫来还是留在外国。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承担了把这些人送进集中营去的义务。

我的莫斯科之行

为了更快地把占领者从我国驱逐出去，我于1944年9月去莫

斯科请求援助。鉴于红军已几乎到达我国边境，有必要就协同作战问题达成协议。此外，我请求苏联政府让红军部队越过我国边境进入塞尔维亚东部，帮助我部队解放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

当时，德国人在南斯拉夫驻扎了德军的大部队和伪军部队，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不断的艰苦斗争。此外，德国人在希腊和各个岛屿上还驻有大部队，这些部队必须通过南斯拉夫撤退。这一切要求在军事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我国能尽可能早地得到解放，不让敌人在撤退时把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工厂和城市彻底破坏。

特别重要的是，要尽快解放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一切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这对更有效地进行战争和更加迅速解放全国也是必要的。我们达成了如下协议：红军的大部队将越过多瑙河进入塞尔维亚东部，会同我军一起解放贝尔格莱德。同时，苏联向我军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武器，从枪枝到坦克和飞机，我们用这些武器装备了许多个师。在光荣红军的帮助下，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很快得到了解放，在保加利亚军队的帮助下，马其顿也获得了解放。

随着贝尔格莱德的解放，我们已有可能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一切准备，因为现在我军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在装备上大大加强了，同时我们也能够动员更多的新兵入伍了。

除上述援助外，苏联还用自已的内河船只供应贝尔格莱德燃料和食品，因此，贝尔格莱德的照明、自来水和食品也有了保证。最后，苏联政府还向我们提供了五万吨粮食供应贝尔格莱德和其他某些地区。

其他盟国的援助

另一方面，我们的盟邦英国和美国在我军的供给方面，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地区，也作了巨大的努力。这一援助是由飞机送来的，飞行经常是在夜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所有那些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日以继夜地飞行，供给我军战士以军事物资和军粮的英、美飞行员予以表彰和表示感谢。我也要赞扬所有那些不顾生命危险，日以继夜地为我军战士运送军事物资并帮助我们进行艰苦战斗的苏联飞行员。

是的，我们的伟大盟国在战斗中援助了我们，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这是因为对盟国共同事业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和牺牲而应得到的援助，因为我们在没有得到任何人援助的情况下，同侵略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这种援助是正当的，因为伟大盟国的负责人士相信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而其他一切都是谎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在国外的思想同路人用这些谎言欺骗了世界。

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前，我们的部队主要是志愿兵，当时约有三十五万人，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我们立即开始了正规的动员，结果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我们在苏联教官的协助下，建立了强大的炮兵部队、优良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可能在今春，在从斯雷姆到达尔马提亚的全线上发动了有力的攻势，这次攻势以我们的彻底胜利和打到索查和卡拉万卡而告终。最后一次攻势不仅彻底粉碎了德军，而且也彻底粉碎了拥有二十多万人的帕韦利奇部队。由于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我们消灭了大批德军

和乌斯塔什分子，俘虏了二十多万人，缴获了大量的军事装备，成千辆载重汽车和大炮、各种武器弹药等。

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投降以后，敌军还是不肯缴械投降。直到那些只愿向盟军投降的敌人还没有在斯洛文尼亚被围困和被歼灭以前，我们的部队就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来争夺每一寸土地，直到我国的边境。

这是我们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军所获得的光荣而无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由这样一支军队赢得的，它在1941年开始的战争进程中受到了锻炼，并成长为伟大的、装备优良的常胜军队，成为我国人民优秀儿女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的忠实保卫者。今后的世世代代都将为自己的幸福而感谢这支军队。

联合政府的建立

1944年11月1日在我国领土上同舒巴希奇先生再次进行了会晤。我们就联合政府的成员达成了协议。1945年3月7日联合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成立，参加这个政府的有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舒巴希奇先生政府的成员。在宣言中政府指出自己政策的方针是国家的民主化和复兴(政府迄今严格地贯彻了这一方针)，也介绍了三强雅尔塔会议提出的建议。政府提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扩大会议批准的迄今采取的措施和法律草案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全国委员会迁到贝尔格莱德以后和联合政府成立后所而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几乎整个国家机器都必须从头建立，因为旧的国家机器被占领者破坏了或者曾经为占领者服务。组建各个部

和驻外机构的工作由于缺乏自觉的和爱国的官员和专家，迄今尚未结束，或者还没有达到各个部门为了国家利益正确进行一切工作所要求的水平。在各共和国政府和下级机构以及很多国营和私营企业中，同样也有这种情况。占领者和人民叛徒在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政府过去和现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消除这些缺点，使国家机关和国民经济机关能尽快地正确发挥作用。很多居心叵测的人过去没有理解，现在仍然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这个政府必须克服的一切困难。相反，他们却利用这些困难来达到其反对人民解放政权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反动目的。

政府在致力于尽速恢复经济生活的同时，鉴于占领者在币制方面造成的紊乱，不得不以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新第纳尔来代替占领者和伪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在做这项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些缺点看起来好象是对上述几个联邦单位有点儿不公平，但是，这些缺点不是主观性质的，而是客观性质的，政府正在努力纠正这些缺点，而且一定能够纠正。

在恢复我国工业并使其投入生产方面，在恢复我国整个经济和交通方面，我们在各共和国政府的协助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交通建设方面，如架设桥梁、修复铁路和公路方面的成绩最佳。对此，应该特别感谢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妇女和我们的战士，他们过去和现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怀着使我国早日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愿望，经常不计报酬地劳动。许多优秀的爱国者为了造福于整个社会而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那些袖手旁观、只知道批评、甚至干脆怠工的人学习的

榜样。

在解决黑山、达尔马提亚、戈爾斯基科塔尔、科尔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等地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居民的食物供应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尽管缺少交通工具，我们在这方面仍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分发的各种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达四十多万吨，约占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的援助物资总数的四分之一。

由于上述地区的大旱，食品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要求作出巨大努力来使当地居民免于饥饿。我们必须在入冬以前保证这些地区得到必需的食品，因为等到下了大雪，一切交通都要断了。现在政府还做了很大的努力，向这些地区提供大小牲畜，为此目的发放了五千万第纳尔的贷款作为购买二十万头牲畜之用。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购买了十万多头大小牲畜。此外，我们的部队把大约四万五千匹马交给了经济部门，由他们支配。

从所有这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国家为尽速医治占领者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挑起了沉重的担子并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赔 偿

我国遭到了惊人的破坏和掠夺。德国和意大利是这一破坏的罪魁祸首。迄今为止，他们一点也没有归还从我国运走和抢走的东西，更谈不上赔偿战争的损失了。到目前为止，只有匈牙利按照应该偿付给南斯拉夫七千万美元赔款的清单开始履行自己的义务。南斯拉夫在这次战争中遭到损失的总数估计为六百一十亿美元。显然，这个总数中相当大一部分该由意大利偿还，因此使人感

到惊讶的是意大利那些反动分子的厚颜无耻，今天他们从罪魁祸首变成我国人民的控告者和诽谤者，可是正是他们给我国人民带来了这样深重的苦难和破坏。我们都知道，那些在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黑山、黑塞哥维那和利卡等地区被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杀害的成千上万的我国妇女、儿童和成人，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赔偿的。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乡村和被破坏的城市，以及这些地区被掠夺的一切东西应该由这些反动分子赔偿，意大利人民对此应该关心。

德国偿付赔款问题对我国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现实地看，我国只能得到实物赔偿，这主要是指从德国得到我国恢复工作所需要的成套工厂设备。我们的代表团将向盟国提出这种要求。

外 交 政 策

无论是全国委员会，或是联合政府，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使我们同盟国的关系尽可能好。不仅如此，为了消除过去我国外交政策中存在过的一切消极东西，我们坚定地向邻国伸出和平之手，这些国家曾经被本国亲法西斯统治集团拖进了反对我国的战争。早在去年秋天，我在克拉约瓦会议上同保加利亚代表就友好、兄弟情谊、合作和共同进行对德战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它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得到了我国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的极大同情。祖国阵线的保加利亚根据自己的倡议开始在各个方面帮助我们，尽管当时他们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处境也很困难。保加利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共同解放了马其顿。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两国的兄弟情谊日益得到加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反

动统治者人为地制造的鸿沟正在消失。现在我们同祖国阵线的保加利亚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不仅如此,今天这种关系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两国人民能够相安无事地展望他们的幸福未来,相信他们世世代代的宿愿将会得到实现。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我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和遭受的痛苦把我们两个国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南阿关系是非常真诚的,各式各样的敌人想破坏这种关系的一切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我们第一个承认了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同它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开展合作。遭到占领者破坏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和被搞得非常贫困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由于自己在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应该得到最大的同情,得到我国各族人民所能提供的一切援助。而且,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后,阿尔巴尼亚一些部队配合我军,为把占领者从黑山和桑贾克驱逐出去而共两进行了斗争。这一共同斗争在民主的阿尔巴尼亚和民主的联邦南斯拉夫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

1945年4月11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的互助友好和经济文化合作条约是新南斯拉夫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献。我们各族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这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时期以来的宿愿。但是只有现在,即旧南斯拉夫成立二十六年之后,只有在1941年我国遭到这场巨大灾难之后,只有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消除了那些妨碍同兄弟的苏联人民接近的一切因素以后,才最终实现了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即两苏联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这一联系是我国安全的保证,十分有利于我国的发展。

至于波兰，南斯拉夫是最先祝贺波兰民主临时政府成立并同它建立了正常关系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这一举动受到了我国人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希望同与我们具有相似命运的兄弟的波兰人民建立最好的关系，进行兄弟般的合作。

我们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没有什么重大变化。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我们的关系重新恢复正常。这种关系将为了两国的利益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现在正在着手恢复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我国人民对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怀着深厚的感情。

至于我们伟大的盟邦美国和英国，我国同它们也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我相信，如果我说我们愿意并将致力于使我们在和平时同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合作和联系也象在战争时期一样巩固，我是表达了你们的意见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这种合作和联系将会更加真诚。战败国的某些反动分子企图通过诬蔑引起盟国对南斯拉夫的憎恶。南斯拉夫人民遭受的痛苦，他们对盟国共同事业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是如此巨大和无可争辩的，以致我们有理由深信我们的正当要求在和会上不会遭到拒绝。

我国政府现在同解放了的法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爱好自由的法国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建立有利于两国的最友好关系、文化和经济合作的道路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我们同现在已建立了民主政府的邻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建立的某种关系，是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南斯拉夫对那些违背自己意愿而被拖入战争、同德国站在一方的国家的人民所采取的和解的和友好的态度，在这些邻国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一态度为建立一种永久地保证过去惨痛历史不再重演

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结 束 语

由此可见，在二十个月的期间里，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在战场上和在建设国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光荣的军队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它付出了重大牺牲，接连不断地解放了我国的国土，并在盟国的物质援助下，在光荣红军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下，终于解放了全部国土。

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在组织和巩固人民政权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我国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得到全部解放的话。

在国家机构的组建和行使职权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虽然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就绪，需要加以改正。

在重建国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进一步建设的最乐观的前景。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国今天的处境比旧南斯拉夫任何时候要好。由于我国人民对战胜敌人的共同事业作出了牺牲，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朋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尽管我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在物质上被洗劫一空，但我们在精神上却焕然一新，我们决心进行最大的创造性努力。一个团结一致的、和睦相处的、民主的和联邦的新南斯拉夫站起来了。

我国各族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无可估量的牺牲和经受的苦难终于由我国各族人民赢得的从未有过的巨大成果所补偿，这就是占领者和卖国贼企图用散布相互仇恨的手段阻挠建立强大

的南斯拉夫的罪恶计划破产了；建立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建立了人民政权——公正的社会秩序和民主的保障；建立了南斯拉夫各平等民族结成的强大的国家共同体。

（译自《铁托言论集》1959年塞文版第2卷）

解放斗争和新南斯拉夫革命改造 的特点是什么？

194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

如果以为这篇文章的内容能够近乎确切地回答文章标题所提出的问题，那就太不谦虚了，而且是错误的。不！解放战争中的事态和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就其内容和某些特点来说，是如此复杂和丰富，以致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科学的研究，才能给予正确而全面的阐明。写这篇文章只是迈了第一步，只是指出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仅仅举出一些说明事态特点的典型例子。

国外许多人，甚至一些对我国持友好态度的左派人士，不仅把我国英勇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把革命改造或把建立新南斯拉夫、新社会制度中的非凡成就以及我国建设中的成就都说成是某种侥幸和偶然性等。他们过去这样解释，今天仍然想这样解释。对于我们的全民起义和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荒唐的论据，例如说这是因为我国有高山密林，因为旧南斯拉夫时期存在着民族不平等，甚至说因为我国人民对生与死具有一些原始民族所特有的某种宿命观点。当然，这一切论据都是不正确的、荒谬的和带侮辱性的。这些论据是对我国人民的侮辱，因为有人想用这样的论据把南斯拉夫的人民起义说成是某种不自觉的自发行动，

某种近乎冒险和自杀的亡命徒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高度的觉悟，不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其次，这些人忘记了或者是有意忽略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那些侵入我国并奴役我国的法西斯占领者充满着无比仇恨，忘记了我国各族人民有热爱先辈们数世纪来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自由和独立的传统，只要需要，他们就会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他们还忘记，甚至贬低了一个不仅使起义成为可能，而且还保证起义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起义的组织性和对起义的正确领导。这些都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干部们的功绩，这些干部在我国各族人民历史上最艰苦的日子里，一直忠于人民，直至自我牺牲。他们手拿武器，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树立了忠于人民的英雄榜样。还应该知道，我国各族人民从其艰苦斗争的最初几天起就深信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不可战胜的，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苏联一边，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南斯拉夫并非到处都是高山密林，起义是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无论是在山峦起伏的波斯尼亚和其他地区，还是在平坦的斯雷姆地区，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我国人民正是由于热爱生活、热爱自由才投入斗争的。我国青年参加斗争并作出牺牲并不是由于厌倦生活，而是由于热爱生活，相信会有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相信会有更幸福的未来。旧南斯拉夫曾存在的、当时的统治者造成的民族不平等、民族仇恨和偏见，不可能是起义的动力，相反，却是占领者为了轻而易举地奴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而利用的东西。占领者把南斯拉夫搞得四分五裂，在一个地区建立了乌斯塔什的国家——克罗地亚独立国，一大片地区被意大利占领，另外一片地区

被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法西斯占领，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德国人的统一占领下，他们制定了使我国各族人民自相残杀的计划，制定了为所谓优等种族建立一个生存空间的计划。当时我们必须作出许多努力来说服各族人民，使他们相信，只有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只有参加反对占领者和卖国的反动派的斗争，才有可能赢得一切民族权利，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旧统治者的新南斯拉夫。确实，当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展示在群众面前的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时候，民族问题就成了解放斗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杠杆。

南斯拉夫共产党正是由于在战前和战争中，在民族问题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进行了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偏见的斗争，进行了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斗争，才成功地克服了这一消极因素，成功地阻止了继续自相残杀和散播民族仇恨，使占领者没有可能在卖国贼的帮助下长期分裂我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建立了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它今天已成为新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最牢固的支柱之一。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非常灵活和深思熟虑的行动，需要每个战士为达到这一目的具有极大的耐性、自我牺牲精神和极大的顽强性。在战争中作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得来的这种兄弟情谊和团结，是我国人民解放斗争最伟大的成果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如下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南斯拉夫的民族不平等、由旧制度和占领者挑起的民族仇恨，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义的成功起了积极作用。其实相反，这种民族仇恨曾是一个极大的祸害，在战争中人民不得不象反对其他一切敌人一样同它作顽强的斗争。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由于高级军事领导机构吓破了胆，由于它无所作为和卖国，旧南斯拉夫军队进行了几天软弱无力的抵抗之后就投降了。大部分军人被俘，全部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都落入了占领者手中。就是说，由于军事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叛变，人民面对着不仅是来奴役他们而且是来灭绝他们的最强大的敌人，却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

第二，国家机器垮了，以国王为首的政府逃亡到国外，让被奴役的国家听任命运的摆布。

第三，被抛弃的南斯拉夫人民，在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军需仓库，没有将军和军官（只有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进行了反抗占领者的武装斗争，赤手空拳地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进行了殊死斗争。

第四，在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前夕，我们同其他政党没有实行任何联合，因为其他政党的许多领导人为占领者服务，而另一些领导人正在消极观望，等待形势的变化。当时在南斯拉夫的各个地区都是这种情况（斯洛文尼亚除外，那里成立了解放阵线）。而人民则不分党派、民族或宗教信仰，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入了斗争。

第五，一支新的人民军队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受到锻炼，第一批游击部队构成了这支军队的核心，来自人民并在长期的殊死血战的战场上学到本领的新军官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

第六，无论是游击队的斗争还是新的人民军的斗争（这支军队的第一个旅于1941年12月按正规部队的编制创建起来了，之后，又迅速地建立起越来越多的旅和师，到1942年就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都不是暂时的现象。不，这是一场反对占领者和卖国

贼的持久战,是一场具有这类战争的一切后果的血战,是一场拚死的战争。这是一场全民战争,但是,组织得很好,是由一个中心即最高司令部领导的。这是一场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全民战争,由于有解放区而且还建立了大部队、师和军,所以我们有条件进行阵地战。

第七,尽管敌人在人数上和装备上占优势,尽管我们是用比敌人差得多的武器在整个南斯拉夫和尤利斯卡-克拉伊那地区进行这场解放战争的,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不管在哪里,敌人都没能消灭人民的力量。相反,这些力量往往经过许多艰苦战斗之后越来越壮大起来。

第八,尽管这是一场毫不妥协的、要求牺牲大量人力和人民财产的极其残酷的斗争,然而人民丝毫没有动摇,没有放弃斗争。相反,人力和物力的这种巨大损失(常常是整个地区和全部财产被毁灭)更激起了人民坚持到底的决心和顽强精神。

第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仅反对占领者,而且也反对占领者的同盟者,即卖国贼——帕韦利奇、奈迪奇、鲁普尼克和德·米哈伊洛维奇匪帮。尽管占领者和卖国贼勾结起来,我国各族人民在自己伟大的斗争中还是取得了胜利。

这些就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特点,就是这一斗争的伟大之处。在被占领的其他欧洲国家里都没有过这样的斗争,我国人民有权为此感到自豪。

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个新型的国家逐渐诞生并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个国家具有和旧南斯拉夫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个好得多和公正得多的制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代替了旧的无能的君主专制。新的国家在

新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具有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众所周知，这样巨大的改造通常只能通过革命，通过公开反对那些违背人民意志的统治者才能实现。

新南斯拉夫建立和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此。

新南斯拉夫是在解放斗争的进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旧南斯拉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这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在国家刚被占领时就垮了。国家的被占领和反动统治集团的叛卖，使我国人民遭受到可怕的悲剧，但这一悲剧使所有爱国者眼睛明亮了。由于旧的统治集团的叛卖行径和怯懦行为，由于旧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痛恨旧制度，下定决心再也不允许恢复旧制度了。只有这样能够解释如下事实：我国各族人民之所以同德·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卖国贼作如此不妥协的斗争，是因为卖国贼同占领者合作首先是为了要复辟实行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旧制度。奈迪奇、米哈伊洛维奇、鲁普尼克和空前绝后的坏家伙帕韦利奇同占领者的合作，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眼睛亮起来了。人民越来越清楚，只要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保证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即复辟旧秩序，反动派甚至愿意为魔鬼效劳。因此，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仅仅号召人民投入反占领者的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向他们指出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前景。必须立即着手为实现这美好的未来创造先决条件。因为正是为了这美好的未来，人民才能在战争中基本上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考验。如果仅仅号召人民参加反占领者的斗争，而不让他们明白，通过这一斗争还能得到某种新的、好得多的东西，并且再也不会复旧了，那就不可能发动全体人民参加这场斗争，也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关心这场斗争，不可能坚持到

底,也就是说,不可能获胜。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一开始,在1941年,就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抛弃旧的政权形式,并立即开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我们根据这些机构的性质把它们称为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就其特点而言是崭新的、最民主的政权。如果说我们这样做是符合人民意愿的,那么从下而的情况中即可看出,人民不仅在解放区的各个地方立即开始建立这样的委员会,而且在未解放的地区,在城市和农村,也开始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可见,这就是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新国家的萌芽。这不是偶然的和自发的,而是经过扎实准备的、深思熟虑的和有组织的。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和流血的,而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同卖国贼进行了浴血奋战,这些卖国贼为了阻挠人民新国家的建立,维护旧秩序,站在占领者一边同人民进行了拚死的斗争。

走向建立新国家的道路的特点恰恰在于这种双重的武装斗争——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和反对那些同占领者合作的卖国的反动派的斗争。但是,这是一条还没有走完的革命道路,因为我们新国家还有敌人,他们还不甘心,还有反动分子,他们还梦想恢复旧制度,梦想政变我国的现状。这些反动分子中的某些人披着民主的外衣。所有这些反动分子都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反动派身上,他们期待着外来的干涉,尽管他们能够从历史中了解到,这种干涉通常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常常引起残酷的流血斗争。他们只要回想法国革命和最近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能立即看到,建立了新的、更美好秩序的人民,即使付出最大的牺牲,也不允许历史车轮倒转。我国反动派由于抱有这样的企图也为那些对新南斯拉夫怀有敌意

的国际反动派的利益效劳。这些国内反动派反对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利于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们用各种美丽的词藻掩盖着，例如说关心农民、使人们摆脱恐惧心理、民主等等。

当然，我国反动派的这些企图都是枉费心机，因为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人民赢得了这些巨大成果，他们也知道如何来保护它。为此，我们要不断地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而不允许反动派倒转历史车轮。

广大人民群众，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过去和今天都如此团结一致地反对国内反动派，这是为什么呢？其他党派的成员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斗争，而不听从他们党内反动头目要求他们等待观望的警告，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广大人民群众有着高度的、积极的民族意识；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广大人民群众都是热爱祖国、热爱自由和进步的，他们很快地理解到历史事态的全部严重性；这是由于我国各族人民从实践中看到国内反动派都是无民族意识的，而不管它是属于哪个民族；这是由于人民群众从实践中确信，国内反动派的叛变行径不是象某些卖国贼所说的那样；只具有反共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反对全体人民和反对人民实现自己意愿的性质，但是人民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由于人民对那恩赐的假民主早就有亲身体会，而形形色色的格罗利分子、马切克分子、德拉戈留布分子、舒特伊分子以及其他许多人，根据国外反动派的指令，今天还喋喋不休地向人民宣传这种民主。

在战争中，在解放斗争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群众性联盟，一个真正的人民联盟建立起来了，这一事实对发展和巩固新的南斯拉夫共和国有着重大意义。

在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锤炼出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这就是人民阵线。这不仅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且是更广泛的联盟。这是所有爱国者、我国所有进步人士、所有走上建设和巩固新南斯拉夫的新征途的人们的联盟。这是,而且应该是劳动人民的联盟,即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我国其他劳动公民的联盟。缩小这个联盟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这个联盟是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坚实基础。不应该在群众工作中散播宗派主义观点,并以此来缩小这个联盟(我们某些诚实而有功的领导者有时也这么做),而是要扩大并不遗余力地巩固这个联盟。这是所有领导者的责任,无论他们的地位高低,也无论他们在国家机构还是在经济部门中工作,无论是在前线组织,还是在任何其他组织中工作。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动员了一切爱国力量,由于不断地扩大和巩固抵抗阵线,才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克服最大的困难。这在战时适用,在我国的和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即使不是最适用。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在人民解放斗争和这场斗争的结果中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因素。这一规律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揭示的,我们的伟大导师弗·伊·列宁从理论上把它加以丰富和深化并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一历史规律在我们南斯拉夫的发展中过去和现在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形式,这些新形式在战争过程中受到战争的新的性质和这场战争的新后果的制约,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近三十年的存在及其巨大的全面进步的制约。因此,我国发展的特殊性质和这一发展的结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是不矛盾的,相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这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我们伟大导师们的

英明，他们总是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正确的。我们的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用它来指导自己在群众中的工作。如果我们是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出现某些领导者脱离群众的危险，相反，这样做他们就能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认识和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将使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成为牢固的纽带，这些纽带将使这一伟大的人民联盟，新型的联盟变得更加团结一致和坚不可摧。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2卷）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1948年7月21日于贝尔格莱德

同志们：

自从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历史上罕见的事件，但是当我在这个报告中向你们说明我们党遇到的重重困难时，你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召开我们党的代表大会。

这次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在我国进行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下，在新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伟大的解放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之后召开的。在这场斗争中，南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出色地经受了考验。其次，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南共作为新南斯拉夫的恢复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力量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召开的。

这是在我们党空前壮大和团结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团结是在进行了反对多年来分裂党的机体的各种宗派和集团的长期努力和斗争之后，在进行了争取纯洁党、争取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高党员、争取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之后取得

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和艰苦的过程，它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在严密的地下工作的条件下（我们党二十五年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不断进行疯狂的迫害条件下展开的。这种迫害在一月六日专政下尤为残酷，变成对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大屠杀。

我们可以骄傲地回顾南共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道路。二十八年来南共经受住了狂风暴雨，最后成了解放战争和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公认的人民领袖。

这个报告的任务首先是简要地指出我们党在各个发展时期的面貌，指出它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的基本弱点和缺点，指出它在旧南斯拉夫，在伟大的解放斗争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但为了对党的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南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南共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其次，为了便于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弱点，也有必要谈一谈南共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共作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先锋队扎根在何处。为此，我将简短地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即拥有不同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并属于不同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工人运动史。

一、南斯拉夫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①

今天南斯拉夫的各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工会运动，在

^① 本篇第一、五节原著无节题，现在的节题是译者根据正文内容加的。——译者

自己的幼年时期也经历了西欧各国运动所经历过的所有那些阶段。区别仅在于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在文化和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开展的,另一方面,它大部分又是在奥匈帝国的民族压迫条件下发展的,因而它遭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

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期间,奥匈帝国斯拉夫地区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尤为困难。一方面,在这些地区里基本上只有手工业和作坊生产,而且这些生产当时又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通过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加速发展工业来扼杀这种生产。很明显,这种生产即使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每天十四至十六小时,甚至更多)也竞争不过工业生产。因此,早在九十年代,在克罗地亚就进行了争取十二小时工作日和争取提高最低工资的罢工。另一方面,当时资本家无限制地剥削工人,因为年轻的工业资本家希望通过剥削工人尽快地发财致富。当时他们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保护工人的法令。塞尔维亚的劳动条件丝毫不会好些。直到统一的时候,几乎一直只有手工业生产。工业比上述奥匈帝国各区更为落后。因而塞尔维亚手工作坊中的工人的境况也不可能好一些。

这一切都是工人希望由工会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以便顺利地为自己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而斗争的原因。1865年在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爆发了印刷工人的第一批罢工,建立起了所谓“兄弟会”。当时这些“兄弟会”当然还不具有工会组织的性质,然而,这是组织工人为了反对残酷剥削而进行斗争的最初尝试。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当然,这时还谈不上社

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当时就已出版了报纸,这些报纸首先把最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后来,当第一批社会主义组织奠定了基础时,工人也就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以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影响,后来又受到奥地利的考茨基、阿德勒、鲍威尔的影响。然而,有必要指出,今天南斯拉夫所属各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未受到著名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影响和莫斯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很明显,1919年统一前夕,上述各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患了同样的病症。这些病症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以及上层人物的公开叛变和妥协主义。在上层人物中,个别领导人为了拯救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打击下欧洲许多国家中已开始日益动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替资产阶级效劳。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在1871年就开始出版《工人报》,后未又出版了《舆论》、《劳动》、《解放》等报纸和杂志。至于他的追隨者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所出版的其他各种报纸我们就不必去说了。当时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是行会性质的,并且相当软弱;理论上的混乱还占居统治地位;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交织在一起。二十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科学才开始比较有力地渗入社会主义运动,1895年《社会民主党人报》首先问世了,1897年《工人报》也出版了。

在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和R·德拉戈维奇的直接领导下,在1903年着手准备并召开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与爱尔福特纲领类似的纲领。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作为一个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诸如斯凯尔利奇、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等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那些人的尖锐斗争。

正是这些人是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他们开始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觉醒》)。这些机会主义者想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披着民主外衣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普通附庸。在1904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大会决定拒绝同资产阶级合作而使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图佐维奇还同米洛拉德·波波维奇进行了斗争,后者顽固地坚持工会必须自治而不依赖于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图佐维奇则相反,他要求把工会置于社会主义政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围绕着工会的这场斗争进行了多年,即一直进行到1911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对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所谓“直接派”^①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西马·马尔科维奇等就是这种人)没有退让。他坚决地回击了这些人。“直接派”维护了这样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必要的,只要有工会,也就是说只要有无产阶级的工会斗争就够了。图佐维奇说:“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它就应当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仍旧忠实于这个原则。如果谁要从这

^①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主张工人阶级有工会斗争就够了,进行政治斗争是有害的,工人应进行直接的行动,“直接派”由此而得名。——译者

方面要求我让步的话，我可以告诉他，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这么做，因为工会运动如果不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即使不就组织而言，而就思想而言），那是不可能有所进展的。”这是图佐维奇在工会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也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部进行尖锐斗争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党的农村工作问题。拉普切维奇和“直接派”指责图佐维奇把农民引进社会民主党。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图佐维奇击败了拉普切维奇的机会主义派，因而拉普切维奇辞去了党的主席的职务，而图佐维奇接替他担任党的主席。

在这之后，在图佐维奇建议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他关于农村工作和在农村建党的意见被接受了，并被写进党纲。在这次大会后，这一工作的成果立即显示出来，因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在农村中就有两千三百名党员，而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党从农村的三万张选票总数中，获得了二万四千票。

这次清党，也就是说以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为首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最健康的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妥协主义分子的斗争，使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持了阶级本色，并且成为1914年战争前夕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之外唯一能通过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而发出反对战争的呼声的社会党。伟大的列宁也称赞过这件事。当然，尽管有这样一些优点，塞尔维亚社会党仍然继承了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消极遗产。在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死后（他是在

1914年战争中牺牲的),拉普切维奇、穆集克拉维奇之流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重新占了上风,这些人在1919年与其他党统一以前,一直是社会党内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运动

虽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由于奥匈帝国统治者对工人不断进行残酷的迫害,在某些部门(例如印刷业)工人的工会运动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到了二十年以后工人的政治运动才从组织上形成。在这以前,主要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书刊在克罗地亚传播。在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可以感受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各派,首先是倍倍尔派、拉萨尔派、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的影响。1892年才开始在萨格勒布用克罗地亚文出版了第一种社会主义报纸《自由报》。1894年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之后不久,立即召开了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章程,也就是说接受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海因菲尔德纲领。

克罗地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遭到奥匈帝国的残酷迫害。在1896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突飞猛进地扩展到农村。在斯拉沃尼亚和斯雷姆的大庄园里,有大量农业劳动者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运动的壮大不仅使奥匈帝国的统治者感到不快,而且也使本国资产阶级感到不快,后者怀着仇恨与恐惧注视着克罗地亚某些地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当中社会主义影响的增长。在社会民主党人是无神论者和无民族意识分子的口号下,资产阶级成功地使一部分工人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运动,并且建立了名为“克罗地亚工人党”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这个组织接受了弗兰克派的思想影响。这个党还使一些工会处于自己的卵

翼之下。

除了忠于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分裂的手段来阻止克罗地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壮大之外，当局还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消灭工人阶级的运动。1894年以后，奥名远扬的匈牙利伯爵库恩-赫德尔瓦利（1883年他到萨格勒布来当克罗地亚省省长）把奋起反对匈牙利专制的工人和农民关进了监狱和兵营。

其次，当时的群众运动具有反对匈牙利压迫者民族压迫的斗争的性质，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积极参与这一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全体委员被捕，据《自由报》报道，对工人和农民判处的徒刑总数达一百二十五年之久。这些迫害给社会主义运动以沉重的打击，使得这个运动一直到1900年都没有领导。

由于库恩-赫德尔瓦利省长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致使社会党也处于地下状态。它同一些反对派组织达成协议，为反对这个省长的迫害而共同斗争。为了同当时的制度作斗争，社会党于1906年加入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同盟，这就使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同盟于1907年在克罗地亚执政时，允许阶级工会运动的活动。

1906年召开了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很多农民代表出席了大会。当时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合作运动（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相当发达。

必须强调指出，直到1914年战争以前，即社会党被最终禁止以前，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了许多年，共同反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专制。这种合作对党本身不会不带来后果，因为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的影响很大。但为改善工人的经济条件，为争取无记名投票权，为十二小时工作日，以后又为八小时工作日，为集会

结社自由,为言论自由,为出版自由等而经常举行的罢工,特别是在库恩-赫德尔瓦利统治时期规模很大,并从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这些罢工斗争培养了很大一部分工人,他们使布克舍格、科拉奇之流的形形色色改良主义者无法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没有阶级本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普通附庸。这两个改良主义者于1919年在领导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时,为拯救资产阶级免受革命的威胁率先背叛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为此他们获得了内阁部长职位的奖赏,但时间很短。

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运动

斯洛文尼亚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1883年就爆发了矿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第一次罢工。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后来,在八十年代末,当以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变得强大和独立时,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不仅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影响,而且在组织上也与它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出席了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组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是1896年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打破了该党在这以前实行的集中制,而改为联合的组织制度。在这次大会上组织了名为“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南部斯拉夫人对统一的愿望。在这方面工人站在前列。

第一批社会主义报纸《黎明》和《工人报》于1890年和1891年

开始在的里雅斯特出版，不久《工人》、《自由》等报也开始在卢布尔雅那出版。在这以前人们读的主要是用德文出版的工人报刊。领导斯洛文尼亚运动的是埃特宾·克里斯坦。

与其他社会民主党，例如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以及波斯尼亚社会民主党不同，由于当时奥地利的这个省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所以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失去了手工业性质。的里雅斯特、戈里察、卢布尔雅那、采列、耶塞尼采、马里博尔和矿区的产业工人是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和作为党的最坚强支柱的阶级工会运动的主要基础。

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也未能避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损害。莫斯特无政府主义者也企图在这里扎根。然而，最危险的还是工人中间的教权组织。尽管如此，在日常斗争中，该党培养了大批的工人战士，这些人后来使以安东·克里斯坦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未能把较大一部分斯洛文尼亚无产阶级拉入第二国际阵营和为资产阶级效劳。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主义运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阶级的工会运动的开始发展要比上述各地区晚得多。随着1878年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地利资本主义也渗入了这个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各种企业。到1905年和1906年才第一次发生了烟草工人、泥瓦工、制鞋工人等为争取缩减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等的罢工。有必要指出，奥地利政府在这个地区采用了特别严厉的措施来反对罢工和整个工人运动。

在上述各地区，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其他

条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工人阶级争得的八小时工作日、庆祝“五一”节的权利、提高工资、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权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在今天成为南斯拉夫组成部分的各地区里，通过社会党和阶级工会运动所组织的罢工，曾为这些成果进行了艰苦的和长期的斗争。早在八十年代，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在暴君库恩-赫德尔瓦利统治了二十年的克罗地亚，这些罢工就有了很大的规模。特别是在1910年以前，在战前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过群众性的罢工，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正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工会运动积极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民族压迫的斗争，奥匈帝国政府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摧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工人阶级就这样通过斗争得到锻炼。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把这些斗争传统作为遗产带进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如果扼要地总结一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工会运动的考察，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1.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工会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最艰苦条件下，在为改善这些条件进行的不断斗争中，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

2. 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也就是说，还不能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反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因为它没有象伟大的列宁及其战友那样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家来领导，它主要是由大部分是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各种妥协

派(当然,图佐维奇等人除外)领导,也就是说,它受了德国改良主义的影响。

3. 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在于:由于工业落后,在自己的队伍中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因而它更多地具有行会的性质,所以就使它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

4. 有必要明确指出,在组成今天的南斯拉夫的各个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工会运动尽管有自己的各种弱点,但它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几十年来经过各种斗争锻炼的大批工人阶级先进战士,他们没有跟着工人阶级的叛徒、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走,而是依然忠于自己的阶级,建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下面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1918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绝大部分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清除了最顽固的机会主义者和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人,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走上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道路;联合了原是分散的所有社会主义小组和政党,从而建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

5.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很久,组成今天南斯拉夫的各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总的说来对以下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1)民族问题;2)农民问题;3)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例如,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即阿德勒主义的影响下,前奥匈帝国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民族问题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王国范围内给予文化自治。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而社会主义者的事业则仅仅是狭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这种斗争当然也就只能主要是在当时的资

产阶级社会制度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在农民问题上两者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农民中做工作主要是为了在竞选运动中得到选票，并没有把农民看成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对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观点有了改变，但围绕着其他一些问题，诸如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工会问题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中进行了多年的斗争。

虽然早在1918年第一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前社会党就已经分裂，两科拉奇、布克舍格、安东·克里斯坦、穆集克拉维奇之流最顽固的机会主义者早在1918年就公开同当时的统治者合作，即公开与资产阶级合作，但是在统一时，大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党，有些人后来也没有放弃这些观点，因此这些人当中有的脱离了党，有的被清除出党。另一些人则在长期内用这些观点阻碍南共的正确发展。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建立

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各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的统一代表大会是1919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各社会民主党统一的倡议是由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提出来的。

新党的名称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在不愿让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借口下，斯洛文尼亚社会党人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因为右派，即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不愿意统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加入新党的有：整个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整个达尔马提亚社会党和同叛变

了的领导决裂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绝大部分党员、伏伊伏丁那的组织和伏伊伏丁那佩拉吉奇派小组、以及马其顿和黑山小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三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以后一个半月举行的，因此它通过了关于我们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20年6月在武科瓦尔举行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终于完成了统一的过程，同时也最终完成了清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最严重的领导人的过程。

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武科瓦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的基本路线是：1) 为南斯拉夫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2) 建立人民红军；3) 对生产和商业实行剥夺和社会化；4) 劳工保护；5) 征用房屋和住宅；6) 争取人民的健康——药房、医院、疗养院、浴室的社会化；7) 男女青年的义务教育；8) 教会与国家分离；9) 取消债务和免除捐税。

由此可见，武科瓦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有很大的缺点。第一、纲领中根本没有谈到民族问题，而在土地问题上则只提到大地产“社会化”的错误观点。但是，在同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和南共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南共将继续维护民族团结”。这句话的意思表明对民族问题完全不理解。在同一个决议中，与纲领中的“大地产社会化”相反，要求“没收所有大地产和相应的农具，无偿地交给由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农民委员会”。但是这里看不出来，这些“农民委员会”是否将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这正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对农民问题的观点。第二、在谈到取消劳动者纳税时指出，只有富人才必须纳税，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剥夺生产并使之社会化，即要消灭资本主义。总之，完全是矛盾的。

这一纲领的内容是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的反映。但它向我们表明,尽管它有各种缺点,然而我们的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走上了激烈的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而这正是这个纲领中最积极的东西。

二、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国的所有地区,特别是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些地区的经济在战争末期完全停顿了,以至在奥匈帝国崩溃时,从战场回来的工人中,十分之八九流落街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由于国内的政治混乱和一系列其他因素,从1918年起,经济恢复得十分缓慢,这就给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他们遭受了最残酷的剥削,因为劳动十分繁重,而工资又空前低下;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例如在塞尔维亚地区以外的糖厂,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为十至十二或十四个克朗,即两个半至三个半第纳尔,而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天为二十至二十五个克朗,或五至六个第纳尔,而当时一公斤面包就要一个半第纳尔。由于战争破坏了农业,由于当时盛极一时的投机活动,生活必需的食品的价格十分高昂。

1918—1920年期间,工人阶级的这种无法忍受的状况引起了工业和手工业中大量的和大规模的罢工,参加这些罢工的有几十万南斯拉夫的男工和女工。这些罢工大部分是由阶级工会组织的。当时工会会员超过了三十万人。最大的罢工有:南斯拉夫交通和运输工人的总罢工,波斯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矿工的大罢工。延

续了整整十四天的铁路工人总罢工使得国家不得不招募铁路工人，用武力强迫铁路工人上工。当局最粗暴地对待了这些罢工，向罢工工人开火，例如当局曾血腥地镇压了波斯尼亚矿工的罢工；按神父科罗沙茨的命令，在卢布尔雅那的扎洛什大街上向铁路工人群众开枪，打死了十五人。

巨大的罢工浪潮在1919年、1920年和1921年这三年内冲击了政治上仍是混乱的凡尔赛式的南斯拉夫，它把资产阶级吓坏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能彻底镇压这些罢工即镇压工人阶级的地步。它被迫用提高日工资、缩减劳动时间和承认阶级工会运动为工人合法代表，向工人阶级作出让步。当然，这些让步只是暂时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害怕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南斯拉夫出现革命形势。正当南共中央领导就革命形势是否已经出现，就战略与策略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资产阶级通过暂时作出的让步来试探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准备在他认为时机到来时给予反击。我们看到，这样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这倒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特别强大，而是因为工人运动没有一个有能力的革命领导。没有一个懂得怎样估计形势、怎样利用资产阶级的所有弱点来对付资产阶级的领导。

同志们，当时，在所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实行统一时，国内的形势怎么样呢？

当然，许多年轻人无法确切地知道南斯拉夫诞生的历史。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奥匈帝国的君主政体崩溃后产生的，即在塞尔维亚也站在其一边的协约国胜利之后产生的。因此，在这个报告中我将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组成新的共同国家的各族人民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

会的条件和影响下分别地生活了十三个世纪以上。虽然南部斯拉夫人统一的愿望由来已久,但在1918—1920年间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之后,这个新国家孕育着的许多矛盾立刻就表现出来了。由于卡拉卓尔杰维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政府强加于人的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这些矛盾一开始就急剧地尖锐化了。促使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统治集团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它顽固地散布三个民族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是一个民族的说法,而且根本不把马其顿族、黑山族放在眼里。

1918年实现的所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统一,是在开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黑山,打了胜仗的塞尔维亚军队和法国军队的大力支持下实现的。塞尔维亚军队开入上述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这是对的。但是,重要的是它开到这些地区的目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法国军队开到这些地区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为不管在克罗地亚还是斯洛文尼亚都没有一个奥地利或者德国的士兵。很明显,军队开来是为了要保护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保证全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即这些地区内的本国资产阶级能为所欲为地掠夺工人群众,是为了阻止这些地区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于匈牙利事件而开始迅猛地发展起来了。

在黑山和克罗地亚出现了这种民族统一的强烈反抗。但不论在黑山还是在克罗地亚,这种反抗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这就是法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在新合并的地区内的使命。

这个统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的影响下，以及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群众的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在挣脱了奥匈帝国压迫的那些地区里。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吓坏了，于是它就向贝尔格莱德派出代表，请求这些地区与塞尔维亚联合和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因而，这是不分民族的资产阶级联合，目的在于阻止革命运动的扩展和瓜分从城乡劳动人民手上夺来的财物。在那些代表团中有老唯心主义者，有战前就主张建立南斯拉夫即南部斯拉夫人联合的人物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改变上述情况。这些人后来从实践中认识到，国王亚历山大及其周围的集团对新国家——南斯拉夫是怎么想的。宪兵的枪托、民族压迫和疯狂地掠夺劳动人民——这就是亚历山大的统一所给予战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東西。

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必要建立新国家，即实行统一。不，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是必要的和必然要实现的。这是所有被称为南部斯拉夫人的各地区中最先进人物的理想。问题在于这种统一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问题在于不要用一种民族压迫来代替另一种民族压迫，不要用新建立的国家中年轻而又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更悲惨的社会奴役来代替劳动人民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所受到的社会奴役。问题在于要实现各族人民数世纪的梦想（他们早在奥匈帝国压迫的时代就已觉醒了），即在统一起来的新国家中他们将有民族平等与自由。问题在于在新的国家中，不要象在奥匈帝国那样使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任意宰割。

1920年秋天，在立宪议会的选举以及立宪议会本身和通过宪法时，情况清楚地表明：必须与以国王为首的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的立国思想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些霸权主义者得逞了，他们通

过了所谓维多夫丹宪法。这个宪法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而无视新国家中的民族问题。

1920年立宪议会的选举是在恐怖的气氛下进行的。这种恐怖特别是对付共产党人的。米洛拉德·德拉什科维奇大臣的宪兵和警察驱散、逮捕、甚至打死了共产党的宣传员和候选人。在立宪议会中共产党的议员谈到了这一点，但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和德拉什科维奇大臣本人只以辱骂回答了这些质问。

关于新宪法的争论说明了什么呢？

1. 它表明南斯拉夫的所有资产阶级在革命浪潮面前惊惶失措。这一浪潮不仅席卷了工人阶级，而且也席卷了很大一部分农民。

2. 整个资产阶级，不管它属于哪个政党和民族及信仰什么，都完全联合在一起并下定决心要用最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即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阶级工会运动。这充分体现在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讨论宪法草案时的发言中。

内务大臣米洛拉德·德拉什科维奇是新建立的共产党的死敌。在立宪议会的发言中，在回答共产党代表就通过反对共产党和阶级工会运动，即反对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总的斗争的所谓“通告”提出的质问时，他非常成功地为韦斯尼奇政府的非法行动作了辩护。在叙述反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时，他得到大部分议员的热烈喝彩。当时他介绍了1920年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党党纲的路线，他说：

“他们宣布了一条原则，宣布了没收工业和商业，并向城市工人、工业和农业劳动者、共产党人指出，从那时起将用先进的工具和机器来耕种土地，并且作出应当如何耕种土地的榜样，中小土地

所有者从这个榜样中看到，集体共同耕种土地要有效得多。”

为了进一步恐吓资产阶级，从而取得反对共产党的行动的充分自由，他继续说道：

“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首先加入了第三国际。他们加入第三国际比任何一个共产党集团都早。他们把这点叫作光辉的榜样，并把这点看作是自己的荣誉。在加入第三国际时，我国的共产党人接受了第三国际的条件。”

从这位大臣先生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很仔细地研究过南共的纲领，仔细地了解了南共领导的弱点，并利用了一些弱点给予南共和南斯拉夫阶级工会运动以决定性打击。当这位先生在立宪议会上发言时，反动的议员问他是怎样得到这些材料的，他得意洋洋地承认说，他在南共中有奸细和特务网，他就是通过这个特务网密切注视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活动的。当他看到时机已到，即条件已成熟，就在某天晚上向宪兵和警察下令包围工会和党的驻地，没收了所有档案等等，并且还逮捕了自己派进去的奸细，以使他们了解政府需要怎么办。由此可见，这位大臣保卫资本家政权的计划要比当时南共领导想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计划更周密。

制定维多夫丹宪法的目的，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权永存。根据这个宪法，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说得确切些，他作恶多端，根本无需向任何人负责。宪法第五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国王在国家与外国的所有关系中代表国家。他宣布战争或缔结和约。”第五十二条规定：“国王有权解散国民议会，但解散议会的命令中必须包括重新选举的规定。”此外，宪法还规定：“国王的人身不受侵犯。不能追究国王的任何责任，他不受起诉。”

这就是说，虽说有人民可借以实现自己愿望的国民议会，但只

要国王愿意，只要议会不按国王的意愿行事，国王就可以解散议会。也就是说，国王不对议会负责，即不对人民负责，而且正好相反，议会即人民应对国王负责。

此外，那个维多夫丹宪法是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一个民主帷幕而制定的，因为例如宪法中有这样一些条文：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等，但更详细地制定了一系列条款，根据这些条款什么东西都可以赖掉，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是一些空洞的标题了。

因而，1)维多夫丹宪法暂时稳住了国王及其集团即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权。2)维多夫丹宪法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存在，也就是说，它使民族不平等合法化，从而为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提供了条件，致使新国家南斯拉夫无生存的能力。以后的事态也证实了这一点。3)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通过这个宪法使自己完全可以放手最残酷地剥削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4)这个宪法使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不能合法化。根据宪法，1921年又通过了国家保卫法，南共被迫转入严密的地下状态。以国王为首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在民主的幌子下一直统治到1929年。这是伪装得并不好的、以国王为首的占统治地位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专政。当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大大尖锐化时，亚历山大国王便撕下了这副假面具，践踏了宪法，并于1929年1月26日公开宣布了君主法西斯专政。

旧南斯拉夫的政治状况，即当时的资产阶级制度腐败的典型事例是：仅从1918年到1929年1月6日就更换过二十四届政府，也就是说在十年内组阁二十四次。1929年1月6日以后，又十次更换过政府，后来在伦敦组织的政府还不算在内。就是说，到1941年为止，总共更换过三十四届政府。

所有这些在国王亚历山大专政以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更换过的政府，都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反动政府。在所有这些政府的统治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成为非法的。阶级工会运动受到迫害，被托帕洛维奇、克雷基奇、贝利奇之流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袖们所分裂。

现已查明，这些领导人中的某些人，例如叛徒托帕洛维奇等不过是警察和政府的特务。他们出卖了最优秀的工人战士，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工人阶级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

历届政府都违背了宪法和有关社会问题的法令。许多诈骗案和盗窃人民钱财的舞弊经常被揭发出来，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这时，这些案件又突然被掩盖起来。从王室到大臣和普通官吏都参与了这些诈骗、盗窃和贪污。

大量国民财富、矿产、木材等被贱卖到国外。从德国得到的战争赔款装进各种投机分子、将军、大臣和王室成员的腰包，而人民一无所得，国家在经济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

残废者的问题一直在“解决”，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没有关心那些战争的受害者，土地问题更多的是选举投机或搞其他投机活动的对象，而不希望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从波斯尼亚地主手中征用了土地并把它交给了农民，然而是从国库中拨出款项高价收买的，因此总的来说是由人民负担的。

以国王为首的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希望通过收买各党的某些领袖如科罗舍茨（斯洛文尼亚人民党）、斯帕霍（波斯尼亚穆斯林党）等来平息民族斗争，并借助于这些人在议会和政府中取得多数，反对那些同民族压迫进行斗争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

尽管如此,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以国王为首的统治当局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在1925年把以拉迪奇为首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代表请到贝尔格莱德,拉进了议会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领导放弃了共和的特征,并改名为克罗地亚农民党。然而,国王及其统治集团并不准备实际上给克罗地亚人或其他民族以任何民族权利。

鉴于这一切,冲突并没有平息下来,而是越来越尖锐了,以至在议会中有一个当局的代表普尼沙·拉契奇用手枪当场打死了帕维尔·拉迪奇和久拉·巴萨里切克,并且使斯捷潘·拉迪奇和格兰贾受了重伤。议会中由国王周围的反动分子所组织并得到国王同意的暴行,引起了萨格勒布的巷战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极大愤慨。反动分子和民主力量之间的对立扩大并加深了。

在丧失了用民主外衣来掩饰的可能性之后,亚历山大国王践踏了宪法,废除了维多夫丹宪法并解散了议会,宣布了自己的君主法西斯专政。一个假民主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公开的专政、最粗暴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奴役的时期开始了。

国王亚历山大的君主法西斯专政也必然要破产。无论是杀害千百个共产党员、把成千上万个共产主义战士投入监狱,无论是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士和整个工人阶级的迫害,都未能阻止反对独裁的人们的阵线日益扩大,并越来越威胁亚历山大的统治。

在禁止了以前存在过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之后,国王亚历山大同样也未能建立一党制来维持自己任命的议会。所有这些措施都遭到了失败,而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则越来越增长了。亚历山大国王1934年在马赛遇刺身亡,但在他死后,那些想

实行同样专政的人们也遭到了失败。佩拉·日夫科维奇和耶夫蒂奇和斯托亚迪诺维奇，以及后来的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也只好滚开。

三、南共被禁止以及国家保卫法颁布后最初几年里 在非法条件下的发展和工作

同志们！从1920年至1928年的时期，是南共的工作适应非法条件的时期，是我们党受到不断的、根据党的活动而时强时弱的迫害的情况下发展的时期。当然，党的这种活动不会太多，这是因为党当时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有弱点。什么是党迅速发展的最大障碍呢？主要的障碍是当时党领导内部不断进行的宗派斗争，这种斗争主要在中央领导内部进行。然而，个别重要的党组织、工会和个别人也被卷入这些宗派斗争。领导内部的宗派斗争从1920年年初就已开始，并在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问题上，在党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采取了十分尖锐的形式。稍后，宗派斗争围绕着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工会问题等展开，但这场斗争越来越具有无原则斗争的性质，它不仅成了争夺中央委员会内的各种领导地位的斗争，而且成为争夺工人运动各种机构中其他各种领导岗位的斗争。

这个宗派斗争大大地损害了南共的发展，损害了南共的斗争，损害了整个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壮大和斗争。但这个时期也证明，尽管如此，南共已经在工人阶级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且尽管有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困难，它却缓慢地然而一股劲地发展和壮大起来。无论是政府的迫害还是宗派斗争，都未能完全阻碍它的发展。这就证明，在南共内主要是领导的危机，而不是党的危机。

这同样也证明,在南共的队伍中有一个健康的无产阶级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不懈地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终于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取得了胜利。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当局,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于1920年至1921年转入了猛烈的反攻,当局利用了工人运动领导的弱点,首先在1920年用“通告”,稍后又在1921年又用国家保卫法给南共和阶级工会运动以沉重的打击。

当时的领导有哪些弱点呢?

第一,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南共领导是软弱的和不成熟的。在革命形势下,罢工对工人阶级赢得胜利来说是不够的。革命的形势要求革命的手段,首先要求武装斗争,因为必须预计到,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会迅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以相应的措施来与工人阶级对抗。

第二,由于当时的南共领导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结果工人阶级仍旧不仅脱离了强大的克罗地亚农民运动,即脱离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群众,而且也脱离了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当时的南共领导人对这一农民运动(它同时也是克罗地亚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持着完全消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他们甚至还嘲笑这个运动。如果当时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有正确的路线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本来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强大同盟军。

第三,南共对当局用“通告”和国家保卫法给予的打击毫无准备。因而,在刺杀大臣德拉什科维奇和企图刺杀国王亚历山大之后,当共产党的代表被赶出了国会,党的所有主要领袖和议员都被逮捕以后,党不仅丧失了领导,而且遭到了破坏。

还有,当时南共的主要弱点是,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还是不成熟的革命党,从企业的基层组织一直到上级组织还不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上的革命党,而这是一个不得不在艰苦的非法条件下工作的革命党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这样的党当然是容易被破坏的。有人可能会问:当时是否已是建立这样的党组织的时机?是的,经过整整三年的不断罢工和革命浪潮,已是建立一个能应付一切形势的强大的党组织的时候了。尤其是由于已经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宝贵经验、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经验,这一点就更能做到了。

当时列宁曾经写道,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

当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处在革命形势下时,列宁是这样说的。可是南共领导做了些什么呢?它采取了议会斗争的方针,它在议会中呼吁遵守被德拉什科维奇大臣用迫害南共和工会(它们当时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党和工会之列)的行为践踏了的资产阶级法律。

但当时的领导人背上了机会主义的赘瘤,他们无法摆脱从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下来的这个遗产,因而他们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意看到和利用当时的形势所造成的一切可能性。

南共在被禁止以后开始逐渐复苏。建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以代替被逮捕的委员会委员。由于经验不足,建立党支部即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1923年这一工作才在主要的中心取得一定的进展,而到了1924年才在内地,即在小城市和农村中建立了支部。但这样的组织当时数量还很少,它们的活动据点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重新开始活动的工会。阶级工会运动,

即“独立工会”是在1921年恢复的，但它的发展很困难，因为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会。部分原因是分散，部分原因是阶级工会运动受迫害。当局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迫害“独立工会”，帮助工人运动中阻碍工人斗争的那一部分机会主义领导。

到了1923年，当南共中央委员们从监狱中出来时（除西马·马尔科维奇外，几乎所有中央委员都出来了），党在某种程度上从组织上得到了加强，并开始利用合法的可能性，把合法的工作形式（报刊）和秘密的工作形式结合起来。

1923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名叫“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的政党。虽然，在代表会议结束时警察驱散了会议，但在贝尔格莱德法院的初审中，判决该党的纲领和章程不具有非法的形式，于是该党从这时起似乎被允许存在，但它更多地是半合法的，而不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当局不断地在它的工作中制造障碍。在1923年的大选中，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总共得到了一万八千张选票，但到1924年，当局终于又禁止了这个所谓合法的党。这个党之所以被禁止，看来最主要的是由于这时南共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并通过这个独立工人党的合法报刊开展了讨论。当然，民族问题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最大弱点之一，因此它最坚决地镇压任何公开讨论民族问题的尝试。

南共为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1922年，在索非亚举行的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由于民族问题的错误观点南斯拉夫人第一次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当时在民族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是一样的，都

是错误的。这种观点的思想家是西马·马尔科维奇。后来他写了一本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坚持了自己的如下观点：民族问题是一个宪制问题，即是资产阶级竞争的问题，而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的问题，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192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左派”与右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选举了新的领导。但是这些领导全是右派，他们获得的选票是十三张，十一名“左派”退出了会场。虽然南共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认真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因而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宗派斗争具有更加无原则的性质。

1923年又在维也纳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稍为认真地注意到民族问题，但这次会议还是没有民族问题上最终地持正确的观点，虽然“左派”担任了党的领导。

1923年12月在国内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终于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原则的立场，即采取了包括分立的民族自决权的观点。然而，这个观点仅仅为南共领导中“左派”所接受，而没有为右派所接受，但南共和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的全体党员接受了这个观点。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重新审查了对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态度，但右派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老观点，直到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批评了西马·马尔科维奇（谢米奇）后，右派才在口头上改变了自己在1926年维也纳党代表大会上所持的观点。这样，整个南共才最后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基本上是正确的原则立场。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两派之间在革命工

会（右派在革命工会中占领着主要阵地）的党团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右派坚决反对在工会内建立党团，他们希望不受监督地掌握工会。尽管右派反对，还是开始在工会中，最先在萨格勒布，建立了党团，这些党团对南斯拉夫革命工作运动的壮大和战斗性作出了许多贡献。

除上述问题外，在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终于对马其顿问题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即马其顿人民（从而也就承认了它是一个民族）享有生存权利和平等权利。

我们看到，在维也纳举行的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左派”和右派各自准备了这次代表大会），主要任务之一是取消宗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左派”和右派之间实行了和解，然而，在大会以后，宗派斗争立即以更尖锐的形式在完全无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了。

1926到1928年期间，宗派斗争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以致党和（独立）工会内发生了分裂。这次斗争主要是在非常强大的萨格勒布工会和贝尔格莱德的工会中央机构之间展开的。在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中央机构全部为右派所控制。

这个斗争在一些工会代表大会上，如1927年皮革工人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最高峰。工会中的某些右派分子，例如卡列维奇等，竟然无耻地公然在警察面前离间反对右倾的共产党代表。以久·茨韦伊奇为首的“左派”想利用工会组织对右派据理进行反击来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这一切就是党员对两个派别都不满，对安顿·齐利盖（他与左派勾结在一起）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不满的原因。未曾受到宗派感染的党员进行的这次反击在萨格勒布党组织中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个党组织当时在人数上，在该组织中无产

阶级所占的比重上，以及在组织水平上（工厂支部和街道支部）都是最强大的。

工人，特别是党员对这些右派感到非常愤慨，因为他们在许多地方阻挠和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工人的状况由于失业、工资低微等等而开始大大地恶化了。1921年南斯拉夫的经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象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了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所谓暂时稳定。但这种情况只延续了几年。1926年就出现了经济停滞的明显迹象。因此，南斯拉夫工人的状况又恶化了。因为象在所有这类情况下一样，危机的后果首先转嫁到工人身上。资本家首先减少就业工人的人数，关闭企业，降低日工资等。结果，1926年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地方就已出现了罢工。而1927年和1928年期间，罢工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一系列生产部门的工人，如纺织工人、成衣工人、五金工人、以及皮革、木材加工、矿场、理发、旅馆等部门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随着罢工的发展，工人斗志昂扬；无论是当局的迫害，也无论是阶级工会中右派分子的首领的机会主义行径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这一斗争热情。这时对南共和阶级工会的壮大以及它们的工作来说，都出现了最有利的条件。

但是，使党和工会分裂的宗派斗争阻碍了党和工会的这种发展。这就是迫使党内最健康的工人核心坚决起来反对所有党内这些宗派的原因。萨格勒布地方党组织充分表明了这种坚定性。

在筹备萨格勒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时，即在举行区党代表会议时，甚至从贝尔格莱德来了“左派”领导成员，他们企图对地方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施加影响，但他们的企图破产了。1928年2月底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地方党代表会议。早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

之前，地方委员会就在多数人赞成的工作报告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左派”代表希望在工作报告中根本不谈消极的东西，不谴责“左派”，而只谴责右派；少数人则坚持这次要谴责两派，批评并指出两派的消极方面。地方委员会就是这样分成两派和带着两个报告去参加代表会议的。参加代表会议的有三十二名代表。代表会议在激烈争论之后接受了少数派的工作报告，并谴责了两派。会议选出了参加共产国际关于南共问题的会议的代表。

在致共产国际的信中，代表会议请求共产国际干预，并要求大力帮助消灭南共内部的宗派斗争。共产国际根据这封信和根据以前共产国际所了解的情况，发出了所谓致南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南共在1918到1920年战后年代里领导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成千上万拥护者，领导着强大的群众性工会、领导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广大农民群众，在立宪议会中约有六十名议员。正是这个党在战后年代里表现出了在群众中丧失自己影响的令人惊讶的迹象，它丧失了自己以往与大企业之间所建立的牢固联系，使党员人数减少到三千人。联合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减少了，目前它总共只吸收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中大约百分之二的工人。”

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非法状态下党的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白色恐怖等等，而主要是党内的宗派斗争造成的。宗派主义是妨碍南共发展和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祸根。

在传达这封公开信时，右派进行了强烈的抵抗，直到1928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右派才被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制服。由于右派和“左派”进行的宗派斗争，由于这种宗派斗争给党和整个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带来危害，右派和“左派”都从领

导中全部被清除出去。这样,党和工会就避免了分裂。

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由一批新人,主要是工人组成的领导。新领导的灵魂是党中央组织书记久罗·贾科维奇。但几个月之后,于1929年,他遭到国王亚历山大的宪兵的惨杀。从那时起集团斗争和宗派斗争又在领导中占上风,因为在领导中留下了或重新选入了马尔蒂诺维奇、马夫拉克之类的不健康分子。

正当南共开始很缓慢地实行整顿时,1929年1月6日宣布了君主法西斯专政。党内的宗派斗争使得当局有可能派遣象多明库什、马托维奇、尼科拉·佩特科维奇(“塞利亚克”)、贝戈维奇、舒马诺瓦茨等许许多多奸细和特务打进党内。借助于这些人,当局了解了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在这以前,即还在1928年,就开始逮捕那些决心消灭党的上层中存在两派的现象的同志们。这些间谍帮助彼得·日夫科维奇将军于1929年到1930年和1931年处死了一百多个最忠诚的党员和共青盟员,并把约一千名党员和青年联盟盟员关进监狱和判处多年徒刑。

久罗·贾科维奇同志牺牲后,以马尔蒂诺维奇为首的领导逃到了国外,在国外他们继续进行宗派活动,并失掉了同国内的一切联系。

以马尔蒂诺维奇为首的领导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它根本不懂得如何估计局势和力量对比,在党还没有整顿好,在党还脱离群众的情况下,采取了武装起义反对君主法西斯专政的方针。说得轻一些,这简直是冒险,是对为数不多的党员和共青盟员的犯罪行为。

在谈到武装起义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实际步骤时,列宁指出,这时不是以千计,而是应当以百万计。

“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用这个方法使决战时机完全成熟，——用这个方法，（1）使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完全陷于混乱，彼此冲突，互相厮杀，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筋疲力尽；（2）使一切动摇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和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完全丢丑；（3）使无产阶级中间主张采取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情绪产生出来，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注意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约略描写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①

接着，列宁更明确地说，在没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情况下，不要玩弄革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候到这一点，那就连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致胜的。当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②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75—76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这就是列宁关于起义问题和革命问题的观点。而南共在1929年做了些什么呢？虽然谁都清楚地知道没有取得成就的丝毫希望，但还是提出了武装起义的口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中所列举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曾出现过。当时南共领导的确不仅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幼稚病，而且也患冒险主义病。

当时党刚刚开始复苏和进行整顿。它总共只有三千五百名党员，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人数也只有这么多。独立工会拥有两万名会员，而且他们对企业劳动群众的影响也不大。党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小，对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不大。在军队中没有建立任何联系，更不用说在警察局中建立联系了。因此，党是孤立的，它没有得到城乡广大群众任何支持的希望。此外，还有必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还没有开始进行相互清算。虽然在议会中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议员遇刺，农民民主同盟没有也不愿对当局采取进攻的态度。只要当局对它压得重一些，它就准备投降，准备在做些小的妥协下达成协议。但是当局却不愿这样做，因为它知道这个党的弱点，知道它是一支无足畏惧的力量。当局把人数很少的、混乱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看成是最大的危险，而此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即使不能把它消灭，至少也要在许多年内把它变成无害的党，这也许是他们所希望的。

由此，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918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是否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呢？是的，1918年、1919年和1920年存在过武装起义的条件，虽然不是所有的条件，但大部分条件是具备的，不过到1921年已经有点晚了。

当时在南斯拉夫举行起义具备些什么条件呢？

1. 伟大的十月革命,这一革命的胜利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特别是南斯拉夫劳动群众的巨大影响。

2.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匈牙利革命,明显地对南斯拉夫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3. 奥匈帝国崩溃后,一批又一批军队从前线开回来。例如在萨格勒布,这些部队要求共产党员来指挥并把红旗交给他们以便为南斯拉夫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后来南共中央委员、当时的同志和现在的敌人久罗·茨韦伊奇回答他们说,共产党人不愿领导这些乌合之众,也不愿把红旗交给他们。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领导人的回答。驻扎在萨格勒布的由以前在俄国被俘的人领导的某些团的这个革命步骤在耶拉契奇广场被淹没在血泊中。

4. 南共当时拥有六万名党员,参加工会的工人约有三十万工人。

5. 农民暴动遍及整个克罗地亚,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夺取了土地,成了所谓绿林好汉等。

6. 当时资产阶级还很弱,因为国家刚刚成立;国家的武装力量不仅是软弱的,而且如果南共领导能采取正确的起义路线和方针,还有可能把大部分塞尔维亚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

这就是当时使我国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可是却没有能利用这些条件的领导。这和192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然,如果把1918—1920年间领导的这种态度说成是完全无知和胆怯,那是错误的。不,问题在于领导,首先是那些决策的人从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沾染上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病症;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心胸狭窄的病症,总而言之,不相信革命的力量。

列宁所列举的那些武装起义的条件，在1929年一个也没有出现过。可是，象当时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尔蒂诺维奇这样的人，自以为最了解列宁和斯大林，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粗暴的和不负责的决定使得为数很少的党员和共青盟员遭到重大损失，这些党员英勇地就义和被监禁，他们为了党员和共青盟员的光荣称号，即为了服从党的纪律而流血牺牲。

不知为什么当时党的领导把一月六日专政叫做军事法西斯专政，也许是因为国王亚历山大任命彼得·日夫科维奇将军为政府首相吧。然而，其他大臣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不过是以国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的专政。因而，这是君主法西斯专政。

1930和1931年间，国内党的生活停顿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小组分散在各地。党的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包括下级、中级和高级的，都被监禁起来，或被处死，或流亡外国，直到1932年底，党的组织才又在南斯拉夫的较大中心地区恢复起来。在这以前，只是在各地有一些分散的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的小组，它们不时散发一些秘密传单，或者出几期报纸。到了1933年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及其地方委员会开始广泛地恢复起来。1934年以前恢复了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省委员会。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那些被判较轻徒刑的，即被判三、五年徒刑的一些同志从监狱里出来了。这些同志从监狱里出来时，理论水平已相当高，而为南共党员懂得把监狱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当这些在监狱中上过这种学校的同志们从狱中出来时，我们党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直接的好处。这些同志在工作中不仅用上了他们学到的理论，而且也利用了他们已往的经验，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懂得如何从以

往的工作中吸取教训了。

当时领导机关,即南共中央委员会设在国外,1933年以前它同国内的党组织几乎没有取得联系或者联系很少。为了同党组织取得联系,领导机关派遣了各种各样的人回国,结果这些人全都落到警察手中,这些人由于在警察面前的背叛行为,不仅出卖了个别领导人和党员,而且出卖了一个又一个组织。结果,国内的党组织完全丧失了对设在国外的领导的信任,这样一来,许多组织就拒绝与这个领导进行联系。

1932年底,共产国际任命了以戈尔基奇为首的临时领导,而以前的领导,不管是马尔蒂诺维奇,还是后来的马夫拉克都被推翻了。这个领导与国内建立了某种联系,然而党组织不信任它,因为还在不断地出岔子,有时是由于中央委员的明显过错,例如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奥斯卡”等的过错。

1934年12月,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在国内举行了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领导。领导成员中大部分是被临时委任的以戈尔基奇为首的领导的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对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领导所犯的错误只作了部分正确的评价与批评。同样,新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和缺点,例如在选举工人协会问题上的不正确态度,在区选举问题上所采取的不正确的和动摇的态度(即抵制这些选举),其次,在农村和军队中工作不力,忽视建立反法西斯和反战阵线的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决议,但是直到1937年这个决议才得到贯彻。事实表明,通过关于单独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决议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6年,在以戈尔基奇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一些中央委员之

间，特别是戈尔基奇与大部分中央委员之间的冲突激化了。瞒着共产国际，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的非常全体会议，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在无原则的基础上讨论了整个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戈尔基奇的政策。1935年大选时，戈尔基奇的领导表现得最可怜。领导不是让共产党这一次通过合法的劳动人民党独立地参加选举，而是在这一整个时期内，一直做反对派联盟的尾巴。从维也纳发来了各种指示，忽而是单独参加选举，忽而是投反对派联盟的票，但后者不愿把共产党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最后，大部分党员只好投反对派联盟的票，当然，这就引起了党员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大不满。

最后，再谈一谈1932到1937年间党的主要领导人戈尔基奇的政策。

1. 和以往的所有宗派主义领导一样，他也一直在阻碍党的新领导干部的成长，有时甚至以最恶毒的方式，直接打击由工人队伍中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最优秀的同志。如帕罗维奇同志（即在西班牙牺牲的施密特）事件等等。

2. 和以往的宗派主义领导一样，他有欺骗共产国际的恶习，只不过是情节更为严重，他向共产国际提出有关国内情况的不真实的和虚假的报告。戈尔基奇是这样获得这些报告的：例如，在贝尔格莱德有某个所谓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坐在咖啡馆中臆想出或者在城里收集到关于党内的状况等等情报并送给他。戈尔基奇接着就把它当作真实情况报上去。戈尔基奇以及其他前领导人的这种联系就是他们所谓的“同国内党的联系”。

3. 戈尔基奇与斯洛博丹·约瓦诺维奇（他在伦敦）和德拉吉沙·瓦西奇来往甚密。这西人中一个在这次战争中成为流亡政府

首相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手下的头目、而另一个则成为德拉扎在反对我们即反对人民的斗争中的战友。也就是说，他与两个后来成为所谓塞尔维亚文化俱乐部奠基人的最坏的反动分子有联系。人们都知道，他们向这些发出过“指示”，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从这两位老爷那里得到过什么指示。

戈尔基奇于1936年全力以赴地执行消灭党的方针。只是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内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才未能得逞。

但是，尽管戈尔基奇采取了损害党的政策，尽管在领导机关内直到1936年还一直进行宗派斗争和集团斗争，党组织和青年联盟组织还是迅速地发展和加强了，并进行了许多活动。1936年，应南共部分中央委员的要求，共产国际决定把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即中央的组织部设在国内。这就有可能为在国内建立整个领导机构作准备。

1937年开始从我们党内清除各种异己分子。1937年底结束了多年来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占着统治地位的不能容忍的状况。在1937和1938年期间，从党内和领导内清除了宗派主义分子和小集团分子的最后残余，这些人十五年来用自己的有害行动阻碍了南共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1937年，撤销了以戈尔基奇为首的领导，只有一个领导成员除外，他从共产国际得到一项任务，在国内组织新的领导和进行彻底的清党工作。从那时到今天，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国内，不仅在1941年以前，而且就是在以后也一直在艰苦的秘密条件下进行工作，因为一部分党中央委员是在占领区，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1937年进入领导的并在1938年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所有中央委员，在1940年举行的第五次党的代表会议上重新被选入中央

委员会。现在，他们还一直留在自己的职位上。有一些同志则在伟大的解放斗争中牺牲了。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那些还活着的）在这个职位上不断地工作了十二年，在这个时期里，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是由于南共中央委员会是十分团结的。

根据上述的一切，南共的发展应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1919年到1920年：1)1919年各社会党和小组统一为一个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加入第三国际；2)武科瓦尔代表大会，通过南共的纲领和党的章程；3)大部分前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袖脱离新建立的南共；4)革命形势和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党领导不成熟；5)立宪议会的选举和南共参加竞选，在竞选中南共得到五十八个议席；6)颁布“通告”和通过国家保卫法，即禁止南共和迫使南共转入地下。

第二阶段包括1921年到1928年：1)党受到沉重的打击；可以说，遭到彻底破坏，将近两年以后，它才开始缓慢地适应地下工作的条件；2)在整个这一时期里，在党的领导内进行着尖锐的宗派斗争，从而大大地阻碍了党组织的正常发展；3)在发生争论和反对西马·马尔科维奇的观点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在农民问题上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4)右派企图分裂党和独立工会；5)萨格勒布党组织反对两派的坚决行动和共产国际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6)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把右派都从领导中完全清除出去。

第三阶段包括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1937年清党的时期：1)1929年君主法西斯专政给南共第二次沉重的打击；2)武装起义的错误方针；3)亚历山大国王统治当局对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的大

规模屠杀和判刑；南共中央组织书记久罗·贾科维奇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全部领导成员被杀害；4)领导流亡国外和再次掀起宗派斗争和小集团斗争；5)党在受到最后一次打击之后难以恢复元气，直到1934年才在党的发展中出现蓬勃的高涨；6)戈尔基奇的叛卖政策，党内敌人被揭露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清党活动。

四、1934年到1941年间国内的政治状况

在彼得·日夫科维奇离开政府后，博戈留布·耶弗蒂奇不仅继续执行彼得·日夫科维奇和亚历山大国王的政策，而且他的反动手段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当宪兵在克罗地亚、布罗德和西比涅对农民进行大屠杀之后，这个愤怒变得特别强烈。仅在西比涅就有十五个农民被打死。农民民主同盟（即马切克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与独立民主主义者的同盟）与以留布·达维多维奇和约察·约瓦诺维奇为首的塞尔维亚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临时的选举协议。1935年的大选表明，尽管耶弗蒂奇政府进行了明显的伪装，大部分选民还是反对他的政策。他当然垮台了，但反对派联盟也没有取得政权。它在新选的国民议会开会之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谴责了耶弗蒂奇的一月六日的政策，攻击了选举的方式和对选举结果的伪造。

决议的开头说道：“1929年1月6日建立的政权，是在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反对人民的情况下维持着的，它必然在各个方面带来恶果。这个政权不仅没有解决困难的内部问题，其中首先是克罗地亚问题，并且还使这些问题大大地尖锐化了，以致看来无法解

决……”

在决议最后这样写道：“因此，在这样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反对派联盟名单上没有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地位……”这是马切克在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时说的话，可是后来，在1939年到1941年间当他执政时，他干的却是另一套。

当时，根据帕维尔王子代理人的指令，由大资本的代表和后来的“耶雷扎”国家党——南斯拉夫的激进团体——的头目斯托亚迪诺维奇组成政府。斯托亚迪诺维奇之所以能就任政府首脑是由于受了由柏林和罗马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斯托亚迪诺维奇同柏林和罗马有密切关系。

因而，这根本说不上是国家的民主化，而是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影响下的法西斯化。斯托亚迪诺维奇同意、德法西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它们通过自己的“旅行者”控制着南斯拉夫。

当时轴心力量狂热地准备战争。对它们说来，巴尔干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西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这个战略据点。然而，为了便于在最靠近的邻邦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必须首先打破巴尔干的军事政治力量。必须打破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议这些政治因素。斯托亚迪诺维奇得到了这个任务。他首先在1937年1月，即在没有任何小协约国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协商和不让它们知道的情况下，与保加利亚的鲍利斯·科布尔格签订了“永恒”友谊的条约。在1937年8月31日的西奈会议上，小协约国的成员国不得不承认小协约国已不复存在，它们被斯托亚迪诺维奇，即南斯拉夫的反人民政府出卖和欺骗了。

轴心国就这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现在轮到轴心国发动第二个攻势，即经济攻势了。斯托亚迪

诺维奇又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所谓发展德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关系，德国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博士，还有冯·诺依拉特、瓦尔特·冯克博士、经济大臣赫尔曼·戈林等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为此目的，早在1934年就组成了南德经济委员会。在1934年4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1)平衡进出口作为消除结算差额的条件；2)继续增加南斯拉夫向德国的出口；3)在德国规定农产品的最高价格；4)发展旅游。换句话说，现在德国完全击败了掠夺南斯拉夫的竞争对手，第纳尔与帝国马克的比价由德国资本家来决定，这当然只会使南斯拉夫吃大亏。斯托亚迪诺维奇把南斯拉夫献给了希特勒，任其摆布和掠夺。斯托亚迪诺维奇竭力把南斯拉夫拱手送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之后，齐亚诺伯爵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但人民用大规模示威游行来表示了对他的蔑视。但当贝涅什先生来到贝尔格莱德时，人们可以看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朋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朋友，他们通过大示威，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热烈欢呼。

在粉碎了小协约国之后，斯托亚迪诺维奇也破坏了同这些国家的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就这样在慕尼黑事件前夕失去了自己的盟友南斯拉夫。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不是通过巩固上次战争中的盟友关系来消除南斯拉夫面临的威胁，而是相反，他出卖了南斯拉夫的所有盟友，并由于采取了亲柏林—罗马轴心的方针，改变了南斯拉夫的整个外交政策，从而使对南斯拉夫的严重威胁，即法西斯侵略者对南斯拉夫的进攻更加逼近了。

这时，南斯拉夫完全孤立了，在大难当头的时候没有盟友。而这正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目的，那就是从外部孤立南斯拉夫，越

来越多地从内部削弱它，在第五纵队的帮助下使它越来越软弱，从而轻而易举地猎取它。

南共中央 1938 年 3 月就所谓“德奥合并”发表的声明谈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临的危险。关于斯托亚迪诺维奇，声明是这样说的：“希特勒的走狗斯托亚迪诺维奇出卖了人民的利益。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反人民的和霸权主义的政权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最大威胁。他挑起不和并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妨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和解。

“他用自己的叛卖性的对外政策使南斯拉夫失去了自己的盟友，并把南斯拉夫出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他就为法西斯侵略者敞开了南斯拉夫的大门。”

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成一个阵线，推翻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宣言指出：“在这个严重的和决定性的时刻，我们不仅向人民协议联盟的成员，而且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所有爱国力量（他们没有与农民民主同盟和反对派联盟达成协议，但是反对斯托亚迪诺维奇，愿意保卫和平和国家独立），向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政党的所有民主爱国公民发出呼吁。”宣言接着说道：“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以后，使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夹攻。法西斯的飞机在这个国家的和平居民上空轰鸣的时间指日可待。在彻底清算民主，特别是反对民主的堡垒——苏联时，德国法西斯分子逐步地，但是始终如一地执行着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各国人民变成自己的奴隶和炮灰的罪恶计划。”

遗憾的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话是多么正确啊！

由于这一切，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政权受到了无比的仇视，在

1938年12月的大选中，斯托亚迪诺维奇输给了人民协议联盟。在选举中很多人支持了人民协议联盟，希望这些反对派执政后能改变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全部内外政策，使其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这时由德拉吉沙·茨韦特科维奇组织了政府，但他继续奉行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内政策方面有些变化，因为他开始同克罗地亚人，即马切克就解决克罗地亚问题进行了谈判。1939年8月24日茨韦特科维奇同马切克达成了协议。划定了所谓克罗地亚省的边界。马切克以这个协议打败了反对派联盟，并为了瓜分权力，与茨韦特科维奇勾结在一起。所谓变化就是这种变化，而不是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克罗地亚人取得了省长的职位和某种程度的自治。马切克和农民民主同盟的另一些人参加了茨韦特科维奇的政府。但是，以为从此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首先只是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协议。就某些方面说，这只是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与克罗地亚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权力的协议。我们后来看到，选举以前人民协议联盟所提出的民主口号，只是在选举中骗取选票的诱饵罢了。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既没有改变对外政策，也没有改变对内政策，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他们走的是斯托亚迪诺维奇的老路，而后来走得比他更远。

当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南共中央在自己的公告中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立新的政府——人民和谐和自卫的民主政府。

公告指出：“不管我们面临着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如果我们联合所有爱国的民主力量，建立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和协调一致，我们是能够保卫住南斯拉

夫的独立不受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犯的。如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感到满意和协调一致的话，南斯拉夫的独立是可以保卫住的。而这只有在民主和民族权利交给人民，承认工人阶级并保障它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时才能做到。只有人民的政府才能保证南斯拉夫有防御力量，这个政府将立即保证人民的所有民主和民族权利，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国家，这个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将依靠民主力量，首先是依靠小国的最强大的保卫者——苏联，这个政府将同巴尔干所有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保卫自己独立的牢固友谊与联盟。”

公告接着指出：“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不是目前形势下我国人民所需要的政府。它只是一个目的在于延缓赋予各族人民以民主和民族自由的一种手法。这样的政府削弱了国家的防御力量，并且是威胁南斯拉夫生存的巨大危险。”

但是，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顽固地继续进行国家的法西斯化，继续迫害工人阶级，继续采取各种法西斯主义的和“组合国”^①的措施。

1940年12月30日晚上，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通过电台宣布解散萨格勒布的阶级工会组织。这时马切克开始组织自己的包罗万象的工会。他把克罗地亚工人联盟宣布为克罗地亚唯一允许的工会运动，在其他地区，茨韦特科维奇的南斯拉夫工人联盟也被宣布为唯一允许的工会运动。也就是说，这两人都组织了法西斯型的工人组织。

工人的艰难的日子降临了；他们被剥夺了通过自己的阶级工会组织来反抗雇主、资本家盘剥的唯一可能性。这样，茨韦特科维

① 三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译者

奇—马切克政府就在南斯拉夫大难临头的前夕，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的内部力量。

然而，这还不够。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于1月初完全按希特勒集中营的样式建立了监禁反法西斯人士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军事大臣下令组织所谓劳动营，每个营中有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宪兵连。最臭名远扬的监禁反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中大部分人刚服完多年的徒刑）的集中营设在黑塞哥维那的比列奇，另一个臭名远扬的集中营（设在凯雷斯蒂涅茨）是由马切克及其同伙建立的。后来，到了1941年，关押在这个集中营的所有的人都被交给乌斯塔什分子，都被处死。显然，这个政府巴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而使他们后来更便于奴役南斯拉夫。

1940年5月1日，南共中央发表了告人民书，指出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叛卖作用。告人民书指出：“自从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达成所谓协议以来，自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执掌政府以来，已经八个月了。你们曾期望从协议得到什么，而这个协议又给了你们什么？你们曾期望通过这个协议解决克罗地亚问题和使国家安宁、自由、民主和幸福。你们得到这些东西没有呢？没有，你们没有得到。你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是因为这个协议不是塞尔维亚人民与克罗地亚人民之间的协议，而是塞尔维亚的老爷们与克罗地亚的老爷们之间的协议。克罗地亚的工人、农民和公民从这次协议中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而是缴纳了更多的捐税。克罗地亚的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只要农民想自己夺取土地，各种各样的克尔涅维奇分子和其他老爷头目们便立即跳出来保卫地主和大庄园主。为了维持‘秩序’，实行了所谓农民和城市居民保卫制度，然而农民和城市居民对此感到失望，因为通过这种制度实行了恐怖与

棍棒政策，并在城乡居民之间散布不和。这个协议是否使国内平静下来呢？没有，因为这时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老爷之间进行着瓜分那些其命运本应由人民自己决定的地区的无情斗争。这些地区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沙文主义被煽动起来，而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权利则无人关心。人民是否得到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呢？没有。人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得到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集中营，得到的是出版自由及政治结社和工会结社的自由被取缔。

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和改正以往历届政府加在人民身上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在许多方面使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了。”

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是南斯拉夫存在二十年来的历届政府中最腐败的一个。一方面这个政府跟在轴心国后而随波逐流，而在内部制度方面，如迫害工人阶级，实行“组合国”制度等方而以法西斯国家为榜样；另一方面，它同时又玩弄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

这个政府后来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对苏联是不诚心的，是敌意的。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对一位记者提问的回答最好地说明了他们对苏联的两面派态度。记者问：南斯拉夫是否执行对苏联诚意的政策？茨韦特科维奇回答说：“苏联人认为我们是诚意地执行着这个政策的。”马切克说：“我们同苏联的联系是腰带上的空枪。”由此可见，他们对苏联采取了一种投机的政策，面对轴心国家则不是这样。

1941年1月5日，南共中央发表了第5号公告，公告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反人民政府的

斗争。南共中央在公告最后说：“我们呼吁所有不同意把南斯拉夫人民引向灾难的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对内政策的人们，呼吁所有那些准备和我们一起共同斗争的人们进行共同的合作和共同的斗争。让我们共同进行斗争：1)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同这个最强大和最进步的国家，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唯一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其他联系；2)争取国家民主化，争取政治结社和工会结社的自由，争取工人阶级工会活动的自由，争取集会与出版自由，争取各被压迫民族的平等；3)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实现上述要求，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大多数要求的政府”。

然而，这个政府自己也掉进了深渊，因为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1941年3月27日，当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从而想把南斯拉夫完全捆在轴心国家的战车上时，人民的不满达到了顶峰。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作为一个卖国政府，被用武力抛弃了，它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同德国的合作也就完结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坚定地说：“不，宁要战争，不要条约！”它宁愿站着战斗，而不愿跪着死去，因为法西斯是不知道什么叫仁慈的。

五、1937—1941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

工作和路线

同志们！1937年底就已开始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新领导面临着四项基本任务，这就是：1)尽最大的力量清洗党的派别分子和小集团分子的残余；2)坚持不懈地从组织上巩固和加强党；

3) 顽强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党员的水平; 4) 坚持不懈地把全体进步力量团结在人民阵线的周围, 进行斗争, 反对反人民的统治制度和防范法西斯的危险, 保卫国家免受这种外来的威胁。

1937、1938 和 1939 年间, 从党内(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 驱逐出去的不仅有各种旧的、顽固不化的派别分子和小集团分子, 而且还有各种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对发展党的事业有害的分子, 这种清党的斗争不是容易的事。多年来, 宗派活动在党内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监狱里清洗工作很难进行, 在那里, 有名的宗派分子佩特科·米列蒂奇以他自己在警察面前所表现的英勇行为而取得了最优秀的最有斗争性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信任。在作了巨大的努力后, 于 1939 年底, 这个宗派分子被揭发出来了。今天我们掌握了关于他在警察面前变节行为的全部材料。可见, 他不只是一般的宗派分子, 而且还是警察的奸细。这说明一个普通的道理, 即几乎所有的宗派分子都和奸细、和工人阶级的敌人相差无几。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反对反党分子; 为党挽救了大量在狱中的共产党员。

另外一个给党的整顿工作造成困难的事件是在达尔马提亚。那里的领导中盘踞着著名的耶拉斯卡—马里奇—巴里卡斯三人集团。由于这些人, 在那里的绝大部分党组织中存在着极严重的纪律松弛、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裙带关系。这个三人集团把达尔马提亚党组织当作私有财产, 阻碍它的整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是某些人的裙带关系和贿赂。这些情况使得整顿达尔马提亚党组织状况的工作难以进行。只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多方帮助和采取有力的措施之后, 才在使康的党员和党的中层干部的帮助下把党组织整顿好并恢复了完全的

一致。

1939年5月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全国会议的决议肯定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旨在清洗和巩固达尔马提亚党的队伍的措施。

决议指出：“为了捍卫党免受阶级敌人的侵犯，1)采取更有力的清洗措施；2)为了捍卫党的统一，把所有的小集团分子和宗派分子清除出党，对所有党员和党的领导人进行审查。”

朝着巩固和加强南斯拉夫共产党前进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在1937年作出的。这一年夏天建立了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这就大大有助于加强和提高干部，便于当时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工作(不仅仅联系工人，而且还联系了农民和知识分子)。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所有问题一向及时地采取明确的立场。在这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是发动人民阵线的所有民主力量，捍卫国家免遭法西斯的危险。因此，在自己的宣言、传单和秘密刊物的文章中，都坚决号召人民建立民主政权和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

在“德奥合并”以后，当法西斯危险来到了南斯拉夫的边境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加强反对国内第五纵队和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的宣传，而且在后来还加强反对以自己的法西斯措施使国家走向覆灭的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此外，党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为工人的统一阵线(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工会)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党在阶级工会被禁止活动以后仍继续进行这种斗争。这表明党在这方面医治好了宗派主义病症，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

另一方面，在某些组织里，例如在萨格勒布出现了右倾危险、

机会主义。早在1937年，党就建立了政治工作的合法基地，也就是说，建立了所谓劳动人民党发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实际上仅仅在于它可以出版某些合法的刊物，有参加竞选的希望。但是某些同志，甚至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竟产生幻想，以为这个党的组织在克罗地亚能够存在下去，以为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伙伴参加竞选。这就造成1938年选举时犯了大错误，因为萨格勒布的同志做了社会民主同盟的尾巴，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参加1938年大选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

诸如此类的错误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在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

在慕尼黑叛卖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宣传，涌现了成千上万的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志愿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此表明他们仍然忠实执行自己的兄弟盟邦的义务。正如1936年和1937年在反对西班牙法西斯侵略者的志愿军战士中站在前列的是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一样，这一次也是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首先表示决心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为争取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940年底，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队伍已相当巩固和壮大了，以致能够在同年10月，在极其困难的秘密条件下举行了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历史性代表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一百零五名代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秘密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能够有这么多的代表参加。这是我们党的重大胜利，它表明党大大地壮大了，并纯洁了自己的队伍，终于取得了统一，成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真正战斗队伍。

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党的工

作、关于党的成就以及仍然存在的缺点的报告。这些缺点必须尽快克服，以使党完全有能力完成每一项任务。代表会议批准了党领导的工作和在所有问题上采取的路线；确认了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巨大进展和成绩，肯定了党的力量的巨大增长。

南斯拉夫共产党怎么能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南共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因为：1)把宗派分子和阶级敌人的间谍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2)党的队伍中有党的健康干部，他们这时能不受阻碍地发展自己的全部首创精神，也就是说，党的健康因素出现了；3)这时率领党的是统一的领导，没有任何内部冲突；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4)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建立了牢固的组织上的一致；5)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因此，逐渐被公认为群众的领导者；6)领导懂得正确地估计每一个具体事件的形势，党的路线没有发生动摇；7)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路线反映了所有真正进步力量的愿望，而共产党人的言行是一致的；8)党在发生决定性的事件之前大胆地执行保卫国家免受行将到来的危险的方针，并执行反对把国家推向深渊的叛徒和第五纵队的最坚定的方针。

在这里我没有叙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最后四年，即从1937年到1941年的全面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斗争。关于这点我们有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而在另一报告中还将谈到它。在这篇报告里，我只是简要地谈谈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个时期里的工作和路线。在这一整个时期里，党发行了大量的传单、公告、公报、决议和其他刊物；通过这些刊物坚决而彻底地为执行党关于同苏联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路线而斗争。后来，党坚决地要求和苏联签

订互助条约,当时在群众的压力下,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不得不这样做。通过刊物和生动的演说,党不断地和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南斯拉夫人民真诚地信任、爱戴和忠于苏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这些刊物,为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反对反人民制度而努力发起运动,要求组织人民政府。通过这些党的刊物对法西斯侵略者——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阴谋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和揭露,指出这方而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巨大危险,同时也指出消除这种危险的途径。要求通过刊物和演说不断地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成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首先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进行斗争。

因此,当我们现在阅读党的这些刊物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党是如何坚定、彻底和毫不动摇地迎接伟大的时刻。因此,凡是读到这些刊物的人,就会明白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更美好未来的斗争的领导者。

由于第五次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整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历时三年的时期就结束了。

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特别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党的其他领导机构对党的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给予很大的重视。在代表会议后,即在同年11月,立刻开办了直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秘密的高级党校,在这个学校里听课的有中级甚至某些高级的党的领导干部。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外,特别重视对《联共(布)党史》的研究。党由于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的经验,全力以赴地准备应付迅速到来的伟大的和决定性的日子。

1941年3月27日,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连同王子帕韦尔着手进行如入三国条约的卖国行动,也就是说,不顾我们党的反

对,向轴心国靠拢。这一天,在贝尔格莱德的大示威中党完全掌握了局势。在群众的压力下,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垮台了。西莫维奇政府上了台,该政府被迫马上答应给人民一定的自由,并从集中营中把被关押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释放出来。但是,同志们,在马切克统治的克罗地亚却拒绝在这方面作任何政变,因为乌斯塔什分子在马切克的党里控制得很严。1941年4月6日,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法西斯匪帮开始进攻并占领我国。

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南斯拉夫 共产党的解放斗争时期

同志们! 我们国家被占领之后,我们党的工作中出现了新的、更加困难的条件,但是党已经经过斗争,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地下工作的考验,准备承受一切困难。那时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坚强的。斯托亚迪诺维奇和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的反人民的统治制度没有能够消灭它,尽管他们都竭尽全力(特别是马切克)使党失去领导和消灭党。有二百多名克罗地亚的党员积极分子,其中约有九十名党的领导人被马切克交给了乌斯塔什分子,因而惨遭杀害。确实,这是党的很大的损失,但尽管如此,克罗地亚的党仍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占领初期,党的全部领导,从南共中央委员会到共和国中央、省、专区和地方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工作。即使在占领之下党也保存了若干地下印刷厂,其中有一些印刷厂,如贝尔格莱德和斯洛文尼亚的印刷厂,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因此,从1941年4月被占领的初期起,党就在南斯拉夫的斯有省印发了地下刊物、公

告、传单、公报，甚至用多种文字印刷了《联共（布）党史》。

早在战前，即 1938 年，在对南斯拉夫发动进攻以前，当战争危险已接近时，党就指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习掌握武器和军事技术。在贝尔格莱德开始组织对进步青年以营为单位的应征前的训练，尽管政府当局不喜欢这种做法。其次，根据党的指示，全国城市甚至农村的进步妇女和女青年都参加了护理训练班。此外，南共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党在军队中占领阵地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中央委员会派了米塔尔·巴基奇同志做军队的工作。在萨格勒布建立了空军军官支部，在某些警备部队中有按照党的指示工作的小组或个别人。但是，要在法西斯分子进攻南斯拉夫的时刻阻止军队瓦解并组建部队，这一切就太不够了。

在德国军队进入萨格勒布前两天，南共中央委员会（当时设在萨格勒布）同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派代表团去第四军司令部要求发给工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武器以进行反对乌斯塔什分子的斗争。乌斯塔什分子这时已经从马切克手中公开接收了政权，实际上，马切克是心甘情愿地把政权交到他们手中的。军队参谋长奥尔洛维奇两次拒绝了以克拉什同志为首的我们代表团的要求，而且在抵抗已毫无意义的借口下，差点儿要把整个代表团逮捕起来。

在德国人进入萨格勒布的那天，南共中央委员会开会作出决定，让大部分中央委员步行到波斯尼亚、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以亲手抓党和人民准备起义的工作。后来证实，尽管有很大的困难，所有同志都到达了目的地。曾经作出决定，成立以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南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贝尔格莱德作为自己的驻地，因为那里比较便于领导各地区的准备工作。

作。

如所周知,南斯拉夫的军队由于军官的叛卖和胆怯,在作了十二天的微弱抵抗之后便投降了。西莫维奇政府和国王一起乘飞机逃到国外。留在国内的,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和忠于人民并不惜牺牲来准备战斗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另一方面是占领者。5月,乌斯塔什分子就开始大规模屠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利卡和科尔敦的塞尔维亚居民。老百姓为了逃命,上了山,进了森林。党派出自己的人去领导这些不幸的人民,抵抗野兽般的乌斯塔什刽子手。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早在苏联遭到攻击之前就举行了起义。这是武装很差或完全没有武装的人民反对装备精良的敌人的初战。在上述地区人们用土制大炮,而主要是铁叉、镰刀以及人民自己制造的其他简陋武器同乌斯塔什刽子手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从4月中到6月22日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上述地区已经展开了斗争。国内所有党组织利用了这个时间为起义作最后的准备,进行破坏活动和收集武器等等。从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省、地区和地方委员会到支部都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党在新条件下的工作、关于如何以最积极的办法更好地保护干部的决议,讨论了全国人民总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对待各旧政党的态度等等。

南共中央委员会同原来的反对党的某些领袖进行了关于合作和共同斗争的谈判,例如,同里巴尔和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进行了谈判,前者对一切都表示同意,后者在口头上同意,但对他的追随者没有做什么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躲在贝尔格莱德。在斯洛文尼亚,根据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倡议在5月就建立了以斯

洛文尼亚共产党为首的解放阵线。

总之，党坚持团结一切诚心诚意准备反对占领者的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向苏联发动卑鄙的进攻。南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同一天召开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新形势以及我们党对此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决定南共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中央和省委员会发表号召武装斗争和全民起义的告人民书。

在立即印发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中说道：“在占领者铁蹄下呻吟的你们，热爱自由和独立、反抗法西斯奴役的你们，要知道为争取你们从法西斯侵略者奴役下解放的斗争时钟已经敲响。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你们自由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吧！苏联的斗争就是你们的斗争，因为苏联也在反对奴役你们的那些敌人。不要上替法西斯强盗效劳的国内各种反动分子的当！你们的岗位就是站在为自己的和你们的真正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前列。这个斗争决定着你们和你们孩子的未来。如果你们热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不愿当外国人的奴隶，如果愿意解脱法西斯奴役，那就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伟大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正义斗争，团结自己的力量反对奴役和掠夺你们国家的压迫者和法西斯侵略者吧。”

在给南斯拉夫工人的公告中还说：“南斯拉夫所有地区的无产者！各就各位，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来吧！把自己的队伍牢牢地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周围！各就各位吧！坚持不懈而又有纪律地履行自己无产阶级的义务吧！准备立即投身于最后的决定性战斗，不要让英雄的苏联人民由于你们没有参加战斗而流出宝贵的鲜血！你们的口号应当是：任何男工或女工都不要到法西斯德国去用自己的劳动加强法西斯强盗的力量，不

要因你们的帮助而让一支枪、一门炮、一辆坦克、一颗子弹、一粒粮食等等落入法西斯罪犯的手中！动员你们的全部力量去反对把我们国家变成法西斯匪徒的供应基地，这些匪徒象疯狗一样进攻苏联，我们敬爱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希望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满怀希望地注视着灯塔！”

这一公告中向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发出呼吁说：“我们在我们的斗争中预见到的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我们知道法西斯罪犯为什么要反对苏联和整个劳动人类。奴役本国人民和欧洲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法西斯血腥统治者向我们发起毁灭性的战争，并通过广播电台宣告要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我们迎接这场战斗，因为我们预料到了，并作好了战斗准备。法西斯刽子手喊叫：‘在这场斗争中不宽恕一个共产党人。’而我们对他们说：‘在这场斗争中不宽恕罪恶的法西斯首领及其忠实的走卒，在这场斗争中不宽恕法西斯金融寡头及其暴吏们。’”

这是我们党关于起义和武装战斗的坚定不移的和有力的战斗号召，它满怀胜利的自信，但也深深意识到我们党及我们人民在这场斗争中的巨大困难。

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南共黑山省委员会等等，也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向人民发出了公告。在6月27日召开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派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到各地去组织和领导游击队。当时成立了总司令部，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司令部还扩大到某些高级领导同志和军事人员。当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即党的书记开始兼任南斯拉夫所有游击队的军事统帅的职务。

早在7月就颁布了关于游击队的行动和组织的军事命令。在1941年9月中旬以前，这个起义和破坏活动的组织是由贝尔格莱德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在那以前一直留在贝尔格莱德，那里虽然工作条件极端困难，武伊科维奇和科斯马亚茨之流的盖世太保和通敌奸细分子不断地搜捕以及大肆进行其他活动，但是他们却仍然能在贝尔格莱德直接组织了破坏活动。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制定了在塞尔维亚开展游击活动以及在西部塞尔维亚建立解放区作为更顺利地领导和发展全南斯拉夫武装斗争的基地的整个计划。当7月7日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开始武装斗争时，总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就同这些游击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通过通讯员传递通知，并通过同样的途径向游击组织和地方游击队发布指示和命令。

1941年8月10日发布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第一号公报，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这份公报一直定期发行。

请看这份公报中关于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说了些什么：“1) 南斯拉夫所有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桑贾克和达尔马提亚的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主要目的是：从占领者那里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帮助占领者对我国人民实行镇压和恐怖行为的国内代理人；2) 我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最大敌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掠夺我国的一切法西斯党羽；因此，每个爱国者的神圣义务是进行无情的斗争，直到完全消灭这个法西斯匪帮；3) 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是因为这不是某个政党或派别的战斗组织，具体说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组织，尽管共产党人斗争在最前列，而是南斯拉夫人民的战斗队伍，那些能够进行武装反对占领者的所有爱国

者，不管其政治信仰怎样，都应当参加这些战斗队伍；4)在同我国人民的敌人进行的这场总的斗争中，游击队有许多战斗任务；他们必须破坏为法西斯侵略者服务的一切设施：铁路、桥梁、工厂、作坊、弹药和武器仓库；他们必须尽一切力量阻止占领者掠夺农民的粮食、牲畜及其他食物；应当尽力夺回被占领者征收的粮食、牲畜及其他食物，并分给老百姓，留出必要的数量供养游击队；游击队必须反对征收苛捐杂税，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一切都只会为占领者进行侵略战争和进一步压迫我国人民效劳；5)游击队必须手执武器保护居民点、城市和农村，使其免于法西斯的暴行，必须保卫人民的财产，使之不受占领者的掠夺；6)游击队必须随地消灭法西斯军队，特别是军官、盖世太保、黑衫党徒等等，同样，应当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在我国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人民叛徒和奸细，因为他们把大批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交给法西斯刽子手，象忠实的走狗一样为占领者效劳，并镇压我国的人民；7)游击队必须不倦地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发动人民起义，领导这些起义，成为战斗的核心。游击斗争的迄今经验表明，人民总起义的问题被忽视了。所以必须赶紧克服这个缺点，因为否则游击队员就可能脱离准备为自己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群众；8)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应当是南斯拉夫的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全体人民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阵线；9)在建立游击队时，不应当心胸狭窄，而要为建立游击队发扬广泛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已经建立的游击队应当立即同地方指挥部和专区指挥部取得联系，并接受它的领导；10)指挥部和政委对敌人向游击队派遣奸细和间谍要警惕。如果出现这种人，应立即把他们枪决并公布他们的姓名；11)游击队的指挥部和政委必须密切注意队伍的纪律，任何掠夺、贩卖或粗暴破坏纪律的行动必须受到严

惩；12)指挥部应当关心战士的伙食、武器及其他问题，应当同筹集人民解放基金的人民解放阵线委员会共同搞好伙食。在还不存在这种委员会的某些地方，应当由农民和公民自愿保证供应伙食或以现金购买他们的食物；13)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桑贾克的所有游击队及其指挥部都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最高领导的指挥。为了协同作战和顺利地进行战斗，指挥部必须彼此密切联系；14)指挥部和指挥员必须关心伤病员所必需的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15)在组织人民群众起义的同时，还要建立必要的指挥系统。因此游击队的指挥部和指挥官必须关心那些能够领导起义群众的、受过考验的优秀指挥人员和政委；16)在有利的战略形势及其他形势下，在进行大战役时，可根据需要由若干游击队组成大型的战斗部队。”

南共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规定了游击队的任务和作用的。在这个公报中还部分地报道了全国反对占领者和通敌分子的斗争情况。如果我这里详细地介绍这些情况，那就太多了。但是我至少要提一下在最初几天即1941年8月10日以前的一些最为典型的行动。因为从8月10日起我们就开始发布战报了。

以下就是这些战报中报道的关于一支游击队攻打贝尔格莱德医院的情况。总司令部是这样表彰这支游击队的：“我们向1941年7月30日打入贝尔格莱德医院并从盖世太保魔爪下救出一位领导同志(兰科维奇——马尔科)的游击小组表示感谢。这个游击小组表现了模范的勇敢精神和沉着，还表现了执行任务的机警。”

公报还说：“我们向青年游击队员表示称赞，他们在同亚戈迪纳附近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遭遇战中用机枪击毙十一个法西斯士

兵并打伤七个，他们这种勇敢行动值得授予人民英雄的最高称号。”

公报接着说：“在罢工和破坏活动中，塞尔维亚游击队员迄今已经取得许多重大的胜利。我们在这里只谈谈某些胜利，因为统统列举出来会占很多篇幅。炸毁斯梅德雷沃的汽油库，烧毁塔什马伊丹的弹药和汽油库，烧毁贝尔格莱德的车库和八十辆载重汽车，炸毁奥布雷诺瓦茨附近的铁路和汽油库，炸毁拉利亚附近的货栈，炸毁马拉—伊万恰附近的铁路桥梁，炸毁恰恰克的弹药库，破坏克拉古耶瓦茨附近的火车，使德国军官和士兵死五十人左右，伤一百二十人，用炸弹袭击尼什军官俱乐部，使高级和低级军官死伤约三十人。在亚戈迪纳附近炸毁了五架飞机和一座机库，在那里还烧毁和破坏了许多载重汽车，破坏了铁路线和交通联系，同德国部队打了遭遇战，一名德国大尉和一名中校死亡，一名将军受伤。烧毁贝尔格莱德的汽车队，整幢楼房都被烧毁，两次火烧《新时代》报馆和《复兴》报馆；不断地切断电缆、电话线，破坏电灯和电报，不断地毁坏交通线以及其他许多给敌人沉重打击的行动。

在黑塞哥维那，几个月来游击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黑塞哥维那游击队有一万七千人。近来由于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的恐怖活动，又有几千名塞尔维亚居民逃进森林。帕韦利奇匪帮出动了全部陆军和空军对付这些游击队。仅仅在奈维西尼耶附近就有四千克罗地亚士兵、一千乌斯塔什强盗和一千意大利人。

由于对塞尔维亚居民实行恐怖活动，人民起义在波斯尼亚开始迅猛发展。成千的农民跑到森林并接受我们游击队指挥部的指挥。在德尔瓦尔附近帕韦利奇匪帮轰炸了工人住宅，妇女和儿童死伤二百五十名以上。这个罪行是报复行动，因为乌斯塔什部队

在同我们的一个强大游击队的战斗中遭到了失败，死了许多乌斯塔什士兵和一名大尉。在波斯尼亚的许多地方，如亚伊策、留比亚及其他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战斗，一些地方已经在游击队手中。希帕德伐铁路线也在游击队的手中，而萨拉耶沃—布罗德铁路受到严重破坏。经莫斯塔尔通往达尔马提亚的联系也中断了。

克罗地亚的利卡、科尔敦及其他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游击战。斯普利特的铁路已有十多天不通车了，因为有好几处被破坏了。同样，萨格勒布—布罗德铁路线的许多地方也被破坏了。在利卡，游击队截住了装运食品的开往意大利的列车，把食品分给了居民。

在从卡尔洛瓦茨到格利纳的途中，游击队截击了帕韦利奇的一个流动战地法庭，并处死了一些人。就是这个法庭在卡尔洛瓦茨把十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判处死刑。

格利纳周围村庄的居民几乎都上了彼特罗夫山，他们带着牲畜和食物，决心拿起武器反对万恶的乌斯塔什刽子手和德国强盗。

在萨格勒布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烧毁了二万三千里制造德国降落伞用的丝绸，还破坏了地下管道；此外，萨格勒布的青年袭击了帕韦利奇法西斯青年小组，炸伤了约三十名法西斯分子。

在斯洛文尼亚各地，强大的游击队也已经行动起来。集丹桥附近的铁路由于隧道里埋了地雷而不能通车了。同样，通往耶塞尼察的铁路也截断了。

伏伊伏丁那的游击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虽然这里地势极为不利，但游击队的破坏活动仍不间断地进行。游击队员破坏了一列装有战争物资的火车，毁坏了十台机车和约一百节车厢，烧毁了德国人的大量粮食。仅在大基金达附近就有三十个车厢被烧毁。

在黑山，7月13日爆发了人民总起义。除了在策蒂尼耶和波

德戈里察，几乎全部意大利驻防部队均被俘虏。共俘虏全副装备的意大利人四千名以上，还有许多人被击毙。为了镇压黑山起义，意大利人从自己和阿尔巴尼亚部队中抽调了增援部队……”

这只不过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伟大解放斗争的最初几天进行的无数战斗和行动的一小部分。

在1941年8月19日印发的第二期公报中刊载了关于人民游击队员为什么要进行斗争的社论，还刊登了游击队员的誓言。

誓言的内容是：“我们，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员，拿起了武器同奴役我们国家和屠杀我们人民的血腥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真理，我们宣誓，我们将守纪律地、顽强地和无畏地进行斗争而不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直到完全消灭法西斯侵略者和我国人民的叛徒。”

在这一期公报中还谈到乌斯塔什刽子手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地对塞尔维亚居民进行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其次还谈到游击队员在我国许多地方的活动。通报说：

“在弗尔京桥附近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缴械和消灭了约二十名帕韦利奇匪徒，他们挨村地屠杀无辜百姓。彼特罗夫山的游击队在不断袭击和破坏公共设施 and 桥梁。在同乌斯塔什分子作战中游击队员炸毁了载有三十五名乌斯塔什士兵的载重汽车并杀死三名乌斯塔什军官。大克拉杜沙附近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游击队几乎打到了托普斯基，乌斯塔什分子在撤退。下拉帕茨县和波斯尼亚—格拉霍沃县以及四十个区在游击队手中，游击队员控制了克宁附近以及戈卢比奇、普拉夫诺和迪纳拉的阵地。在格拉查茨市附近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除城市外，都已在游击队员的手中。库伦—瓦库夫被游击队员围住，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波斯尼亚—佩

特罗瓦茨被游击队员四面包围，正进行着巷战。这里的游击队员在使用缴获的大炮轰击城市。乌德比纳被游击队员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在乌德比纳和霍夫尼察之间的普洛查村已在游击队的手中。游击队员牢固地掌握了查巴尔，敌军即意大利人不断地炮轰它。

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员毫不留情地消灭所有宪兵站。塞尼矿井被炸毁。在巴格尔丹占领了邮局，破坏了所有器材，宪兵站被缴了械。拉伊科瓦茨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截获了运德国兵的列车，打死了许多德国兵。在泽蒙破坏了‘兹马伊’飞机制造厂的设备，‘伊卡卢斯’飞机制造厂也遭破坏。贝尔格莱德五金厂也被破坏……”

这证明人民起义在日益扩大，敌人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最明显地表现在内务委员在8月19日出的《新时代》所作的如下声明中：“号召居民凡交出或打死共产党员游击队者悬赏三千第纳尔，凡打死或交出游击队头目或共产党员者，悬赏二万五千第纳尔。保证对打死或交出共产党员游击队的人的姓名严守秘密。”

总司令部在公报中对此回答说：“我们特此声明：既然这些人民的叛徒已经使用前所未有和前所未用过的手段，他们必然会感到十分软弱和孤立。其次，他们答应严守秘密，而我们要说：我们要警告想这样干的每一个人，我们会知道这些叛徒的姓名的，从阿契莫维奇本人、德拉吉·约瓦诺维奇到其他叛徒，有朝一日我们要好好地收拾他们。”

1941年8月26日的第三期公报报道了关于大规模战斗和巨大胜利的情况。这里举一些当时游击队员的战斗和胜利的例子。

“……约有八千名游击队员参加了几天前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进行的战斗。在德尔瓦尔、奥什特雷列、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洛腊霍沃和格拉莫契附近进行了最大的战斗。敌人在这些战

斗中使用了各种武器和飞机。我们队伍的损失不大，而敌人的损失却很大。在普里耶多尔附近激烈的战斗已进行了好几天。这里只有城市在敌人手中……亚伊策附近这几天来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这里参加战斗的既有德国军队也有乌斯塔什部队。经过亚伊策的铁路已经有十多天不通车了。萨拉热窝—布罗德铁路有许多段又不通车了。有大量的德国士兵和乌斯塔什士兵被打死……游击队在弗拉塞尼察附近从宪兵那里救出了十个农民；打死两名宪兵，俘虏了六名，此外还俘虏了一些乌斯塔什分子。游击队员占领了弗拉塞尼察，组织了人民法庭，审判了所有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个地方附近，游击队员袭击了一百名克罗地亚士兵，把他们缴了械。除了弗拉塞尼察，游击队员还占领了汉-皮耶萨克，但是又不得已撤出……同样在马耶维察也在同各宪兵站进行激烈的战斗。

塞尔维亚的游击斗争日益壮大。某些地区的宪兵站被全部缴了械。阿契莫维奇、利奥蒂奇及其他匪帮没能纠集足够数量的地痞来充实宪兵站。德国人把部队调到内地，同利奥蒂奇分子一起对付游击队，而游击队在塞尔维亚日益发展成为全民起义。

在伏伊伏丁那，游击队员袭击了一支德国部队，在战斗中打死了四名德国兵，打伤了多人，而游击队员只有一名受伤。此外，在基金达、莫克林等地的游击队击毙了几名宪兵，以及一名下级德国军官和十四名士兵，受伤的人数不详。在这场战斗中两名游击队员牺牲，两名受伤……”从这一些仅仅是部分的公报中可以看出，人民起义十分广泛地发展起来并日益壮大。

这里让我们看一看总司令部给所有指挥部和游击队指挥官的一道命令：“鉴于寒冷的天气快到了，游击队的人民解放斗争不仅要在整个秋天继续进行，而且还要过冬，所以必须从现在起就采取

紧急措施保证足够数量的冬鞋和冬衣。必须增加大量厚大衣及皮袄。每一个游击队指挥部都要关心添置这些东西，如果资金不足，要立即报告南斯拉夫游击队总司令部，准确地提出需要多少金额的帮助才能保证供应。指挥部和指挥官现在就要关心使每个游击队员至少有一双备用的结实的冬鞋或简便皮鞋。应当增添厚毛袜、毛衣等。应当组织地方上的农民编织这些东西。在添置所有这些东西时，人民解放资金筹集委员会应当最积极地参加。”

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南共中央委员会是以长期斗争为方针的，由于这些或那些原因，南斯拉夫的人民起义并不是某种自发的暂时的起义。上述情况表明，南斯拉夫的人民起义是按计划发展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坚定的决心坚持到底。

9月3日的第四期公报谈到奈迪奇叛国政府的成立和占领者及通敌分子的许多大规模军事活动和恐怖活动。

9月8日和18日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公报就已报道了占领者的困境及其惶惶不安的状况，因为奈迪奇政府没有能够靠占领者匪帮来保证对塞尔维亚肆意掠夺。9月18日公报的社论说：

“德国占领者已经不满意奈迪奇傀儡政府。德军指挥丹凯曼将军说：‘你曾向我们保证，你要在最短的期限内在全国建立起秩序。你对我们说过，所有塞尔维亚人将团结在你的周围，说你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以致逃到森林中的所有人都会应你的召唤而回来。而你现在却在诉苦，看上去象是已无条件投降的人。’叛徒奈迪奇在向德国人诉苦说没法对付游击队。他请求德国人调给他更多的部队来对付塞尔维亚人民，或者全交给德国人办——即任凭德国人屠杀塞尔维亚人。对此，叛徒奈迪奇说：‘您给我们用来动员和挑选可靠的人（请读为：叛徒）的时间太短了，而这种工作是不可能

如此迅速地完成的。共产党员想潜入我们的警察部队，然后把我们的全部队伍拉到叛乱者那边去。请您相信，叛乱者就会消灭我们的队伍，我们就不得不撤退。警察部队的名誉就将受损害，那时就不能组织任何新的机构为您帮忙了。我们会丢掉最后一张王牌和抵抗无政府状态(即人民)的最后可能性。想一想科斯塔·佩查纳茨吧，必须从中为未来吸取心理上的教训。他的形象是如此不受欢迎，以致今天他再也不能以谁的名义说话了(科斯塔·佩查纳茨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百万，但也是徒劳的)。无论用通告还是沉默，我们都没有能消除人民的痛苦感受。而您却坚持要我们政府用武力镇压游击队的斗争。’为此，奈迪奇的主子对奈迪奇政府很生气，愤怒地指责他辜负于他由于叛卖其人民而获得的那些钱。”

法西斯军事首脑图尔纳在向柏林申述无法对付塞尔维亚人民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试用了一切手段，我们劝说、谈话、威胁，但都无济于事。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中靠奈迪奇的威信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我们想把人民引到一种建设性的方向去，并使之离开共产党人的一切尝试都落空了。在塞尔维亚人中间连一个小问题都不可能象在克罗地亚搞得那样出色。共产党人成功地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他们的口号下。有些人走得很远，他们宁要布尔什维主义而不要占领，甚至那些正是我们指望与之合作的人也这样。剩下的只有一种手段：武装行动。警察很难解决问题，意大利人更不行。游击队员在森林中的阵地牢固，不可能击中其心脏。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分子不上前线的做法无济于事。我的印象是，宣传苏联投降的消息也不能使这些匪徒投降，他们象魔鬼一样顽固不化。他们组织得好极了，这也许是最秘密组织的典范。很多人，甚至十分警长这种斗争的波兰人也要向他们学习。”

上面就是这个匪徒所谈的他们在塞尔维亚所处的困境。

柏林对这种情况向军事机关和傀儡政府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塞尔维亚政府应当知道，这是战争时期，德国人没有时间，巴尔干的和平今天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我们一定要赢得和平，即使付出最大的牺牲。在这方面出现了愈来愈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建立秩序与和平，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对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极坏，例如对保加利亚，那里一张传单也没有印发，更不知道英勇的塞尔维亚人民了。”

在这些公报中谈到了游击队的大量战斗和胜利。从最后几期公报中可以看出，人民起义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成千名的新战士参加了战斗。

第六期公报是在贝尔格莱德印发的最后一期公报，因为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在9月间迁到地方上去了。从在贝尔格莱德印发的公报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面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的高潮；可以看到我国各族人民遭遇到的可怕的恐怖和痛苦；可以看到占领者因南斯拉夫起义而不安的情况，等等。所介绍的有关占领者和通敌分子在我们全国采取的恐怖手段的这些情况，是战士和人民仇恨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公报中关于全国的战斗和胜利的报道，对于提高前方战士以及在占领者恐怖下生活的人民的信心和士气都有巨大的意义。

1941年9月中旬，随着占据克鲁帕尼而建立了第一个大片的自由区，它从沙巴茨到乌日策附近。总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贝尔格莱德到达作为我们部队攻占乌日策的据点的克鲁帕尼。因此，建立自由区的工作按照计划准确地进行。早在解放战争的初期，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是：

1. 为了更顺利地发动起义，首先必须消灭完全替占领者服务的旧南斯拉夫的机构。除了袭击占领者以外，摧毁宪兵站、警察局、区管理机关和档案馆、纳税者名册库等等（这也是游击队员的任务）表明都是极有效的，因为占领者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在农村以及小地方的立足点。凡是游击队消灭旧政权的地方，占领者掠夺人民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2. 通过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宣传和生动的演讲，制止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沙文主义基础上的自相残杀。游击队员受过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教育，是兄弟情谊和团结的体现者，并通过整个战争来为其实现而斗争。3. 尽可能多地发动起义和进行破坏活动，以便在我国牵制更多的占领者的兵力，从而帮助红军的英勇斗争。

同志们，为什么我要稍多地谈谈人民起义最初几个月即 1941 年 9 月上半月以前的情形呢？我所以要详细地谈，是因为我要更明确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的人民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是因为我要强调，只有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这个起义；这个起义的目的，除了求得自身解放外，也是为了对当时挑起全部斗争重担的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的帮助。换句话说，我要向那些在今天企图低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所有人明确地回答并证明，他们是不对的，这样做完全是侮辱我国各族人民的心灵。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要证明，只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了斯大林同志在 1941 年关于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号召，他们不仅响应了，而且在这个号召发出之前就投入了战斗，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换句话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领导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肩并肩地同红军一起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我强调这一点，也因为我要再次提醒西方的前盟国，它们在和会上

没有象对一个盟国那样对我们持友好的态度，它们无视我们伟大的贡献和我们巨大的牺牲，它们不愿看到，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即人民解放运动）从1941年5月到战争结束，为反对共同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连续进行了整整四年。

1941年9月末，在克鲁帕尼地区的斯托利策召开了军事会议。中央委员、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以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地某些大部队的指挥官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志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对南斯拉夫全民起义具有巨大意义的会场。

在这个会议上所有指挥部的指挥官都作了汇报。汇报说明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游击运动不仅席卷了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且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也开始蓬勃发展。同时汇报也指出在游击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着许多缺点。不仅是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有宗派主义，而且在最初几个月中还表明在这些地区的某些党组织中有一些动摇。然而，由于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干预，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就被完全消除了。例加，克罗地亚在准备起义期间几乎造成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因为有些人从旁插手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指控最优秀的领导同志是间谍等等。其次，当时马其顿还没有武装起义，因为马其顿党组织领导机构的书记沙尔洛竭尽全力破坏建立游击队的工作，为此，他被南共中央委员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

根据这些汇报，通过了若干具体决议。

1.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部队的总司令部获得了新的名称：南斯

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及塞尔维亚等地的指挥部按这些地区的名称命名这些地区的总司令部。

2. 详尽地讨论了在所有地区建立自由区的可能，象塞尔维亚已经做到的那样。这次会议就是在塞尔维亚的自由区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并制定了建立自由区计划和作战计划。

3. 通过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加强人民解放阵线来扩大起义的基地；还作出了关于如何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安置伤员等决定。

4. 决定逐步向正规的军队编制过渡，并利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游击队由三到四个营或四个营以上组成，而营则由连和排组成；这就大大便于进行大战役的指挥，特别是在1941年9月即军事会议期间，在敌人向塞尔维亚自由区发动的初次攻势时，情况表明这样做是有效的。

5. 会上最高统帅提出了关于在斯特鲁加尼克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会谈和德拉扎拒绝让他的切特尼克分子参加战斗的报告。会上决定作出一切尝试，想方设法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以协同作战。

这次会议不仅在领导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方面有巨大意义，而且我们党在这次会议上对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采取了明确路线，使其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斗争胜利的保障。

在这次会议以后，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以及整个中央委员会立即迁移到解放区乌日策。当时塞尔维亚的胜利起义取得了伟大成果，解放了克鲁帕尼、洛兹尼察、科维利亚查、留鲍维亚、巴伊纳—巴什塔、查查克、波日加、阿里列、伊瓦尼察、上米兰诺瓦茨、乌日策及其他地方，也就是几乎解放了整个西部塞尔维亚。

在乌日策开始大力开展政治工作，无论在这个自由区还是在国内其他一切有可能这样做的地区都开始了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那时在某些地方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生活和日常斗争要求在自由区建立人民政权新机构以代替被消灭的旧政权。

1941年10月19日的《战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解放委员会应当真正成为人民政权的临时担当者》的文章，文章说：

“我们的某些盟国（我想是西方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这样的委员会，而不是保留原有的区管理机关和宪兵站（当然要更换人员）？理由很简单，这些政权机关正是占领者用来压迫塞尔维亚人民和其他人民的政权网……”

人民解放委员会今天还不是到处都具有政权担当者的性质，但是它们必须取得这种性质。它们今天确实是政权的担当者，当然是临时担当者。它们的义务是执行有利于人民解放斗争的职能。

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任务是十分复杂而多种多样的。除了战争时期的军事管理委员会的职权外，它还拥有该地区政权的全部职能。这些委员会的义务是：1) 组织全体人民的活动，以便向我们前方战士保证供应所需要的一切。委员会在它的这种活动中将同我们部队的指挥部密切配合；2) 保证后方的秩序，通过人民自己的警卫队来保持这种秩序，进行反对掠夺、盗劫、投机、第五纵队活动等一切现象的斗争；3) 组织对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和军烈属的供给和提供食品，安排尽可能正常的经济生活、商业、交通（军队直接管理的部门除外）等等；4) 想方设法来巩固而前方和后方的联系、全体人民和作为胜利的基本保障的人民战士之间的联系。”

文章接着说：“人民到处在自发地期望和欢迎人民解放委员

会。人民感觉到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自己的人民政权，是解放自己的有力武器。这些委员会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个特殊组织的机关，因此，所有那些今天站在反对占领者一边的政治派别、组织和人士都应当参加这个委员会。”

文章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人民解放委员会是政权的临时担当者。它们应当真正地成为政权的临时担当者，即使在某些地方还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使全体人民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动员起来以及把国家变成战斗营垒的唯一方式和唯一途径……人民解放委员会同我们的武装力量一起是争取我们人民正义事业胜利的基本武器。”

同志们，我们党在 1941 年起义初期就这样奠定了人民新政权的基础，以代替愿为占领者效劳的、并已竭力为它效劳的陈旧而又腐朽的战前政权。

正是由于早在 1941 年建立了这种人民政权，即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才使持续了四年的不断斗争得以顺利地进行。正是由于建立了这种人民政权，才有可能保卫伟大解放斗争的成果。

南共中央委员会即最高司令部通过人民解放委员会采取的最初若干重要措施是：9 月初在德国人进攻开始以前，从整个波萨维纳、马奇瓦和波策里即西部塞尔维亚最肥沃的地区向克鲁帕尼、佩茨卡附近的山村向乌日策运去了大量粮食和其他食物。装满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望不到尽头的车队日日夜夜地运行。农民们赶走了牲畜以及德国人可能用得上的一切东西。当第一次攻势开始时，这些地区的大部分生活用品和粮食基本上已经运走，因此德国人和通敌分子大大地失算了，因为他们本以为能够找到许多东西，而这也是他们急于发动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以乌日策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为例。决议发表在1941年10月19日的《战斗报》上。决议指出：“乌日策人民解放委员会，即自由的塞尔维亚人民在我们城市自由选举的政权担当者，除供应我们英勇的游击队外，它始终关心的是，在目前情况下首先尽一切可能保证我们城市的贫困劳动居民的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向乌日策和乌日策地区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宣布，乌日策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对劳动居民即那些只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宣布无限期地延缓偿付他们所负的全部债务。

2. 在工厂、作坊、交通部门和机关工作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将得到工资和薪金。由于财政情况困难，人民解放委员会保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级官员薪金的权利。薪金将立即支付。

3. 对没有领到十月份工资的生活困难的国家官员和自治机关的官员也付给同样的薪金。乌日策解放前几个月未发的薪金，由于财政情况困难，人民委员会现在无力支付。

4. 未就业的无力自己维持生活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将立即得到一定的现金补助。将尽快为所有未就业的人开办公共食堂。

5. 对难民的救济和对其他失业居民的救济基本上一样。

6. 为一定数量的失业难民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在有助于保证供应前线 and 居民的工作中就业。

鉴于所有这些措施都要求大量资金，因此人民解放委员会呼吁我们城市和专区的居民给以热心帮助并广泛开展筹集人民解放基金的活动。同时，人民解放委员会号召全体工人、职员、官员及其他公民忘我地和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我们神圣的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里列举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起义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投机、抓卫生工作等问题上的若干措施是很有意思的。

以下是乌日策人民解放委员会发布的登载在报纸上的一些布告：“拉多萨夫·约瓦诺维奇少校向一个农妇出售二公斤半盐要八十第纳尔。人民解放委员会罚了这个投机分子一千二百第纳尔，这笔罚金上交作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金。其次，由于不卫生而受罚的有：由于不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卫生的条令，前天罚咖啡馆老板伊夫科·库尔拉吉奇五百第纳尔，罚拉多耶·科亚迪诺维奇一百第纳尔，因为他们店铺不卫生。”

或者以斯洛文尼亚为例。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对公债和税收问题是这样说的：“把所有爱国的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各政治派别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发行了二千万里拉的自由公债。对所有认购公债的人将在斯洛文尼亚解放后归还这笔金额。人民对这种公债的反应很好。同样，委员会实行了人民义务捐税制，有正常收入的每个斯洛文尼亚人都要缴纳这种税。税款最低额是每月一里拉，按收入多少累进，最多为百分之十。”

这就是人民政权即人民解放委员会在1941年就已采取的具体措施。当然，在人民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履行义务和权限方面有过许多错误。这些权限常常被缩小，而委员会本身也没有成熟和成长到足以充分领会自己的真正意义的地步。但是尽管这样，在1941年南斯拉夫武装起义的最初日子里为自己奠定了基础的新政权，仍然在全国逐渐加强和扩大。这种政权的力量在于它是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政权。因此人民欢迎它，因此我国各族人民在解放后还把它当作南斯拉夫政权的长期形式。

起初,主要是同个别的规模小的占领军或通敌部队作战,而9月底和10月初则发展到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德国人准备了向西部塞尔维亚自由区的第一次攻势。参加这次攻势的是德国的联合部队——两个师,此外是两团克罗地亚卫乡队,奈迪奇、利奥蒂奇以及佩昌奇匪徒。德国人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和飞机。

请看帕韦利奇第三步兵团第三战斗队参谋部1941年10月4日颁布的第325号文件中是怎样说的:“1941年9月23日克罗地亚卫乡队密字第2988号文件说,同年9月初叛乱分子占据了科维利亚查、兹沃尔尼克、洛兹尼察附近以及德里纳河右岸的一部分。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守卫这些地方的德国连队由于叛乱分子的很大优势而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德国人不得不要求我们在德里纳河左岸、贝利纳和兹沃尔尼克附近的卫乡队支援。我们第三团和第四团的部分卫乡队在格鲁姆上校率领下出色地渡过德里纳河,同德国部队密切合作粉碎叛匪之后,迅速地缓和了目前的形势。”

这些强盗集团于9月间在马奇瓦的各和平村庄和波采里纳实行烧、杀、抢;乌斯塔什、奈迪奇、利奥蒂奇、佩昌奇分子——所有这些强盗同德国法西斯野兽一起对马奇瓦、波采里纳和亚达尔的和平居民干尽了恐怖的兽行。在亚达尔山谷发现被杀死的八百六十名塞尔维亚农民、妇女、儿童和老人。强盗们在他们的尸体上撒面粉,好让猪啃他们。他们是德国人以及乌斯塔什、奈迪奇、利奥蒂奇、佩昌奇强盗这些有组织的野蛮匪帮的牺牲品。但是德国以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败类尽管勾结在一起,在这次攻势中仍然不能战胜英雄的游击队。在这次战斗中,德国人损失约十五辆坦克,死亡约一千人,近三百人被俘虏。

请听德国法西斯记者V·格鲁贝尔关于塞尔维亚起义当时是怎么说的：

“塞尔维亚仍然在动荡，动荡不安的局势在继续发展。我视察了马奇瓦的某些地区及塞尔维亚的某些地方。我们的军队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到处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和死亡。这是塞尔维亚人罪有应得，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森林里的人不是孤立的。全体塞尔维亚人民几乎都在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全面援助……任何恐怖行为都不能使塞尔维亚人离开他们已经走上的道路。沙巴茨的情况也同其他地方一样，但是塞尔维亚人将坚持战斗。我们的行动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涌往森林，而在森林中我们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

德国人只好再次向贝尔格莱德方向撤退，因为他们知道，游击队不是某些乌合之众的匪徒，而是坚决向占领者和卖国贼进行殊死斗争的有组织的武装人民。

塞尔维亚游击队的第一次大战役大大地促进了国内其他地区起义的更大高涨。

我们党意识到，敌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消灭这个对全国居民有感染力的自由区。因此我们党竭力通过最高司令部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同德拉扎的第二次会谈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十二点建议：

“1. 共同采取反对敌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奈迪奇集团）的军事行动。为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共同作战司令部是必要的。

2. 共同装备和供养我们的战士和你们的战士，这可以通过共同作战司令部来进行，这个司令部可为此目的确定专门人员或成

立某种军需机构。

3. 共同分配战利品,而且要按前线的需要进行,同时恪守一条原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斗争。

4. 共同的地方指挥部,即你们和我们两个指挥部,它们彼此最密切地合作,如在查查克地方。

5. 在地方指挥部下设立联合常务委员会,在共同作战司令部下设中央委员会,以采取最紧急的步骤解决所有的争执问题。

6. 组织临时政权机关,来承担有关居民的给养、组织经济、筹集战争所需的资金、建立维持秩序和安全的机关等工作。我们的意见是,在当前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由县的长官、旧的区管理机关、宪兵站等等作为这样的政权机关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团结全体人民进行这场反对占领者的艰巨斗争,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机关,它们最适应这种形势,最接近人民,并且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担负起全部责任。过去的宪兵、警察、县机关以及区机关在今天都不适用了,因为许多敌对分子钻进了这种机关,因为这种机关过去是为占领者服务的,敌人通过其代理人仍然对这种机关有着强烈的影响。此外,这些得不到任何人信任、特别是得不到人民信任的机关,在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是不适用的。我们认为,人民自己确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目前是我们依靠的最合适的机关。这些人民解放委员会应当由不分政治信仰的人民自愿选举产生。而在技术上不可能进行选举的地方,由所有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立场上的政治派别的代表任命。除了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之外,我们主张在整个解放区建立一个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为了代替宪兵维持秩序和安全,按乡村和城市建立人民警卫队。

7. 关于强制动员问题,我们原则上是反对的。动员应当是自

愿的，通过说服使每个人自行决定是参加切特尼克部队还是参加游击队。强制动员只能在一些地方，在敌人已经入侵这种十分危急的具体情况下进行，而且应当经共同作战司令部批准。通过自愿参加而组成的志愿军有一个优点，即由这些战士组成的部队在质量上比强迫动员组成的部队要好得多。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战争装备来冒把武器交到各种不可靠分子手里的危险。

8. 我们主张所有的队伍、指挥部和司令部，无论是我们的游击队还是你们的切特尼克部队，都要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最高司令部。根本谈不上允许下级指挥部按自己的方式擅自活动，或者在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上反对这个或那个盟军。双方最高司令部一旦获悉有某种擅自活动的情况时，应立即承担起全部责任，它必须采取最紧急的措施来消除这种情况。

9. 我们认为，为制止在双方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发生争执和冲突，双方最高司令部必须各自有一个城市和自己的地方指挥部，而且任何一方都是各自司令部的代表。

10. 为了有效地反对德国占领者这个主要敌人，我们认为必须同在我们后方阻碍人民解放斗争的各种第五纵队分子和间谍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我们同意建立联合军事法庭，逮捕和审判人民的这些敌人。在犯罪现场拿获的间谍和第五纵队分子，应该由发生事件的地区的指挥部就地处置。处置是否正确由处置案件的指挥部或指挥官负责。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个人报复或整人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11. 为了消灭在后方阻碍人民解放斗争的各种敌对的切特尼克部队，应当进行共同的行动，或者由双方各自进行。

12. 我们认为，不能容许这样一种现象，即各种第五纵队分子

和间谍得到切特尼克部队或游击队的合法身分，从而在一方或另一方的名义下进行反人民的破坏活动。必须把这些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交给军事法庭。带有游击队或志愿队身分证的可疑分子，应立即予以逮捕，由共同委员会审问。

这就是我们的建议和要求，这仅仅是应当作出最后决定的主要方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把它们包括进去，因为我们认为，代表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941年10月27日在布拉伊契的谈判中，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代表拒绝了第1、2、6、7点，即拒绝了保证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斗争中团结一致的最重要的几点。实际上也就是说，协议从那时起就已经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方所破坏了。

但是，正如以后在贝尔格莱德的审讯中所证明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早在上述谈判之前就同德国人和奈迪奇进行这种谈判了。他同我们谈判不过是为了蒙蔽我们，麻痹我们的警惕性，以便同德国人一起更轻易地把我们消灭。他的叛变在布拉伊契谈判后的两天就已昭然若揭了。那时他的残暴军官在波日加从列车上扔下并残忍地杀害了舒马迪亚游击队的英勇的指挥官布拉戈耶维奇同志。同时，在很多地方德国部队开始向自由区进攻。从德里纳到瓦列沃，从鲁德尼克到克拉列沃，德国人开始以小股部队连续不断地进攻，因为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一方面是首先消耗我们部队的弹药，另一方面想以日夜的战斗使我们的战斗部队精疲力尽和士气低落。当然这种战术对我们是相当危险的，但是德国人有一点是搞错了，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和人民的士气。至于弹药，我们的乌日策工厂在日日夜夜地生产弹药、枪枝和手榴弹以及我们前方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轻武器。在那些最初的大阵地战中，我们

的部队经常给德国人和奈迪奇匪徒以沉重打击。可是，德拉扎·米哈伊维奇即他的切特尼克部队却从背后给了我们以背叛性的打击，因此我们被迫缩小对德国人的战线，被迫以此来制止第五纵队背地里全面执行其叛变计划。

请看 1941 年 11 月 7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公报是怎么说的：

“乌日策游击队指挥部根据最高司令部 11 月 1 日的命令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明显地说明，这是一个进攻乌日策的全盘计划，是当时被逮捕的声名狼藉的第五纵队分子和奈迪奇的军官们所策划和所指导的计划。波日加的指挥官已公开同德国人合作，地方指挥官伊格尼亚托维奇大尉公开宣称，他更喜欢乌日策的德国人，而不喜欢游击队。

11 月 1 日夜间发生的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些事实的确切性，那时波日加的切特尼克分子在特雷什尼察附近离城市总共几公里的地方向乌日策发动了总进攻，而伊瓦尼察的切特尼克分子则同鲍热·雅沃尔斯基匪徒一起对伊瓦尼察的游击队进攻。这些进攻是为了消灭游击队而发动的总进攻的一部分，即 11 月 2 日确定的进夜的一部分，进攻的目的是要为敌人打开通向乌日策、波日加、查查克、巴伊纳—巴什塔以及整个塞尔维亚解放区的道路。但是第五纵队分子和敌人想不到我们游击队有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敌匪从伊瓦尼察撤退了，并遭到了极惨重的损失。夜特雷什尼察附近接近乌日策的地方，波日加的切特尼克分子的进攻被完全挫败了，而游击队则乘勇迫穷寇，并于 11 月 3 日进入了波日加。

应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他已被游击队压到布拉伊契附近极狭窄的地方）的请求，最高司令部命令停止敌对行动，以便夜第二

天举行游击队一切特尼克部队联合委员会会议并调查整个情况。

但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及其部队事先拒绝达成这种协议，并向游击队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我们的部队在11月3日夜晚以前从波日加撤走。同时切特尼克分子从克拉列沃包围圈中撤出自己的部队（那里大约有三百名切特尼克分子同游击队在一起），把他们投入反对自由区游击队的战斗。这样，他们就完全公开地把自己的兵力变成希望消灭游击队和挑起内战的敌人手中的武器了。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拒绝了这种敌意的最后通牒，命令自己的部队继续全力反对前方的占领者，保证后方解放区和人民战士的部队不落入第五纵队分子的这些圈套。游击队以自己胜利的武装行动回敬了每次进攻并粉碎了进攻者。因此，进而清除了波日加和乌日策县的切特尼克分子，缴了查查克、留鲍维亚、巴英纳—巴什塔等地的切特尼克部队的械。

人民解放游击队继续以高昂的斗志同万恶的占领者进行斗争，为自己的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他们下定决心要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到底。游击队员将在这场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继续为争取人民团结而奋斗。他们将用一切手段，需要的话，就手执武器，反对那些望破坏这种团结并从背后给人民解放斗争插一刀的人。因此，人民解放游击队向所有诚实的切特尼克分子，向所有不愿充当敌人的工具，只希望体面地、彻底地为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伸出了兄弟般的合作之手。他们号召所有爱国者牢牢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并同他们一起反抗所有的第五纵队分子和卖国贼。”

同切特尼克分子的这场斗争以他们在斗争中的彻底失败而结束。但同时敌人利用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分子

的叛卖行为，并利用了当时他们在塞尔维亚所掌握的全部力量以及自己的部队和通敌部队来打击自由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最后十天战斗特别激烈）之后，大部分游击队不得不撤离自由区，退到桑贾克。

如果我们看一看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接受南斯拉夫的伦敦逃亡政府的授意拒绝了我们建议的那几点，就不难看出他为什么反对人民解放游击队。问题是，切特尼克部队作为旧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武装力量的残渣余孽，无论如何是不想反对占领者的，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在敌人占领下保存这种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反对在同占领者作斗争的同时，也在开始建设自己的政权的人民。

为什么我们这样顽强而耐心地主张同切特尼克部队达成共同反对占领者的协议呢？难道我们当时幻想他们最后会同意这种合作吗？当然，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幻想。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希望什么。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坚持要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我们要在人民面前揭发他们反人民的叛变行为。他们背着枪在自由区晃来晃去，却不愿意打仗；他们对人民说，要好好准备，但还不是时候。当时有很多人还相信他们说的是对的。当然，我们在前线流血的战士看到这些武装的切特尼克分子在自由区大摇大摆，靠农民养活，蒙蔽和恐吓人民，是不愉快的。后来，当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这个叛徒从背后捅我们一刀时，在乌日策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的战士对切特尼克分子的全部愤恨都迸发出来了。

在发生了对塞尔维亚人的可怕的迫害和屠杀之后，在贝尔格莱德的特拉集亚绞死了人民的儿子之后，在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

德、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古耶瓦茨附近、克拉列沃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大批屠杀进步分子之后，这种叛变对于我们的战士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来说就更加可怕了。

请看 1941 年 11 月 15 日《战斗报》的社论关于上述情况是如何报道的：“塞尔维亚将是自由的。只有塞尔维亚的队伍是团结一致的，自由才会来到。克拉古耶瓦茨的五千人被害将会促使所有破坏人民解放斗争团结的人猛醒。每个诚实的切特尼克分子和所有诚实的爱国者都要想一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要把他们引向何处。他们应该知道，塞尔维亚人民唯有团结才能免于灭顶之灾。这是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切特尼克兄弟们，受骗的农民们，不要再把自己的枪口对着兄弟，要对准希特勒的疯狗及其走卒，要为这五千人报仇……”

社论接着说：“在屠杀前几天，德国人搜查了城市的一些住宅区，但是在奈迪奇分子来到之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些匪徒是经拉波沃过来的。他们不到三百人，由奈迪奇很快授以军官衔的军士带领。奈迪奇分子吵吵嚷嚷地进入了城市，到处安营扎寨，并开始招募志愿兵。奈迪奇分子的指挥官叫来了县长官，命令他们给他们的区议员下命令，让老百姓修复公路和桥梁。这就是把农民和市民大量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借口，从而在那里把他们残忍地杀害。这个期间在拉波沃和拉波沃附近都进行了枪杀。这里有二百多名牺牲者倒下了。”

克拉古耶瓦茨的大屠杀是以逮捕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性公民开始的。这样总共逮捕了大约一万人。在这一万人左右的大批群众中，共产党员表现得很英勇，他们激励人民鼓起勇气，提高他们的斗志。

面对枪口，冶金工人托扎·德拉戈维奇发表讲话：‘法西斯疯狗们，你们喝饱了塞尔维亚人的鲜血，但是红军和我们的游击队将很快消灭你们！’最后高呼：‘自由万岁！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游击队员万岁！苏联和斯大林同志万岁！’几百名工人呼喊同样的口号死去。冶金工人杜尚·鲍坎从人群中冲上刑场高呼：‘杀吧，疯狗，但是塞尔维亚终将获得自由！’他最后高呼：‘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受重伤的南共党员大学生娜达·娜乌莫维奇用最后的气力高呼：‘苏联万岁！’一个奈迪奇分子走来用手枪杀死了她。德国人和奈迪奇分子用步枪和手枪把成年人、妇女、老人和儿童统统枪杀了。克拉列沃的情况也差不多。一千七百名工人和进步人士被德国人和奈迪奇及利奥蒂奇叛徒分子杀死。”

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就在这之后公开站到德国人一边反对人民解放运动。这就不仅在一个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决定了切特尼克运动的命运；凡是有这个运动存在或企图建立这个运动的地方，人民都鄙视和唾弃它。

游击队在塞尔维亚的失败不过是局部性的暂时的失败。人民起义仍在整个南斯拉夫发展和继续扩大。10月间，在斯洛文尼亚，意大利部队对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第一次发动攻势，其任务是消灭诺特拉尼斯卡和戈列尼斯卡的游击队。这种所谓清剿持续了近三个星期；有三个师参加了这些战斗。自然，这对斯洛文尼亚游击运动在1941年的继续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不可能阻止和扼杀它在1942年重新迸发出来的力量。

同样地，当时在克罗地亚，起义也在发展，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当时起义席卷了几乎整个利卡、科尔敦、达尔马提亚、斯拉沃尼亚以及扎果列的一部分地区。因此，1941年11月我们在塞尔维亚

的失败并没有使南斯拉夫起义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

这次失败只对波斯尼亚的游击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切特尼克分子在那里大肆宣传反对游击队，说游击运动由于在塞尔维亚的失败而被消灭了。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旅来到波斯尼亚，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重又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切特尼克分子由于看到自己领袖的叛变而转向游击队，这些新战士的到来稳定了已动摇的游击队伍。

同志们，从塞尔维亚撤走之后，党全力以赴地采取措施，以壮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塞尔维亚的斗争经验表明，武装斗争的发展不仅要有广泛性、群众性，即不仅要有数量，而且还要有质量。事实表明，一定要建立这样一支名副其实的部队，这支部队能够离开自己的地区，需要在哪里打仗，就能在哪里打仗，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虽然游击队从一开始就是按军队编制即营、连、排、班建立的，其中也有严明的军纪等等，但是更多的是地区部队，它们基本上是保卫自己的地区、自己的村庄和自己的家园，也就是带有地方性质，不能为开展运动战离开本地区而在我国的其他地区作战。另一方面，我们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继续发展和建立地区游击队。然后再从这些队伍中把一般已经经过战斗洗礼的新战士不断输送到正规部队中去。

因此，最高司令部从塞尔维亚撤退后便立即组成了第一支无产阶级突击旅。

下面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的决定：“经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1941年12月21日由游击部队的若干最优秀的部分组成了第一支无产阶级人民解放突击旅。该旅

包括南斯拉夫的所有民族，因为这体现了我国所有民族在从万恶的占领者及其国内走狗那里争得彻底解放的斗争的战斗团结。

迄今，这个旅的组成是：1) 克拉古耶瓦茨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一个营；2) 克拉列沃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一个营；3) 舒马迪亚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一个营；4) 萨瓦河沿岸人民解放游击队的贝尔格莱德营；5) 黑山的洛夫琴营，其中包括科姆人民解放游击队一个连；6) 第二黑山营；7) 由波斯尼亚人民解放游击队的几个连组成的一个波斯尼亚营。其他的营应在近期尽快组成。”

两个月之后，即1941年3月1日在查伊尼查成立了第二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这个旅是由12月份撤到桑贾克并在那里不断地同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分子进行战斗的游击营组成的。此后建立了第三桑贾克无产阶级突击旅、第四黑山无产阶级突击旅及其他一些无产阶级突击旅。

在第十四和十五期公报中，最高司令部颁布了无产阶级突击旅的条例：

“1. 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人民的军事突击队的编制，它的战士是在反对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斗争过程中，在我们英勇的游击队伍的行列中受过锻炼的。

2. 参加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队伍中的战士是个人和集体自愿参加的，因此要履行无产阶级旅的全部义务。

3. 无产阶级突击旅是有效地反对占领者及其本国走狗，有效地反对民族奴役和经济压迫的保证。因此在这些旅中服役是每个战士的最大荣誉。

4. 无产阶级突击旅还以其自我牺牲精神指出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切爱好自由的和先进的人民阶层，从两成

为未来的人民军队的核心。

5. 旅是运动的部队，它必须时刻准备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此外，旅下面的所有部队都必须善于完全独立行动。

6. 旅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这种纪律不同于资本主义军队的纪律。这是建立在每个战士的觉悟和政治信仰之上的自觉的纪律。这种纪律是建立在深信整个集体的基础上的，深信为了有效地反对一切敌人，这种纪律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纪律的基础是对城乡劳动人民正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即对战胜所有人民敌人的最后胜利的向往。

这就要求严格地和无条件地执行军队首长和政治领导的一切命令。对违反纪律、有意识地抗拒命令的行为要予以严惩。

在战士之间以及指挥员和战士之间应当发扬真正的同志关系，而在队伍和服役中应当发扬真正的军人精神。

7. 旅及其部队由指挥部领导。指挥部是纪律的保护者；它们准备和指挥战斗；它们关心给养及一切物资和军需品的供应问题。

8. 在旅指挥部下设固定的军事法庭，由三人组成，即副政委、副旅长和一名党员战士。

如果营脱离旅独立活动，营里便设置由五人组成的军事法庭。这些军事法庭不是固定的，而是临时的。

9. 每个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应当有自己的旗帜。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镰刀和斧头，中间有五角星并绣有自己的番号。

除旅以外，营也有自己的旗帜，只是小一些，印有同样的标志和旅里各营排列顺序的罗马字体数字。

10. 每个无产阶级旅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指挥部；

——至少四个突击营；

——警卫连；

——炮兵部队；

——摩托机械化部队；

——辎重队；

——医疗队；

1) 指挥部的组成是：

——指挥系统，它由旅长和政治委员、副旅长和副政治委员组成。

指挥系统共同通过一切决议。在战斗过程中旅长和政治委员步调要一致。

各级指挥官是部队的首脑。他们同政治委员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努力提高部队战士的水平。在通过决议和制定计划以后，他们独立地领导作战。

政治委员是部队的灵魂。他们是部队中人民的代表和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是提高部队政治、军事和思想水平的倡议者和领导者。

——骑兵排，约有三十名骑兵，由排长领导。

——通讯排，由若干专业化的班，即通讯班（滑雪通讯班）、电话班和无线电发报班组成，由排长领导。

——突击手排，由若干专业化的班，即突击手班、爆破班组成，由排长领导。

——文化队，在战士的思想建设方面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由队长领导。它根据政治委员的指示，准备所有的文化活动、娱乐、晚会、表演，草拟各种文告，编写和发行政治材料。

2) 突击营拥有不到三百名游击队员的兵力，编成三到四个突击连，每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二到三个班。必须力求连里的每个班至少有一件轻型的自动武器。每个营要有辎重队，每个连要有两头牲畜运载轻型自动武器、弹药、炊具和其他作战必需品。

营由指挥部领导，指挥部由营长、政治委员、副营长和副政治委员组成。

连由连长、政治委员和副连长组成的指挥部领导。连政治委员在每一个排里有一名从事政治工作的代表。

排由排长领导。

营的领导机构的职责和旅指挥部的领导机构的职责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局限于营、连、排的范围。

3) 警卫连的组成为：

——机枪排，每排至少有两挺机枪，机枪排的数目视旅中有多少营而定。在领取武器时，必须坚持每一个营自己要有拥有四到八挺机枪的机枪连。

——轻迫击炮排。它在战斗打响后，原则上归营或连指挥，如警卫连增加装备，则这些迫击炮划给连支配。

——重迫击炮排。重迫击炮的使用由旅指挥部领导，如得到更多的武器，则这些迫击炮划给营支配。

4) 炮兵部队可以由几门大炮或炮兵连（每一炮兵连有四门大炮）或炮兵营（有三个炮兵连——十二门大炮）组成。

5) 摩托机械化部队根据可能和需要建立。

6) 辎重队由班组成，有多少营就建立多少个班。旅指挥部的部队有一个以上的辎重队。辎重队可以是马车、马车或者机动车辆。

营在执行独立的任务时要护送其辎重队。

在旅发起总行动时，各辎重队可以合并在一起。

11. 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的战士帽上带有镰刀与锤子的五角星标志。

军官的标志和游击队员的标志一样。

称呼和在游击队一样（同志、班长同志、排长同志、指挥官同志、司令官同志、政委同志）。

附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也必须按照本条例创建和组织。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司令部”

我们党就是这样在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艰苦流血斗争的高潮中创建和教育了新的革命军队的。

我们之所以用无产阶级旅这个名称，是因为：第一，参加这些旅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是来自城市、工厂和矿山的工人，他们在当时的斗争中不仅表现出高度的阶级觉悟，而且还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第二，我们之所以用这样的名称，还由于在当时的严酷日子里，这个名称意味着生死存亡的不妥协的斗争，由于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人民通过实践相信只有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是反对占领者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战士。此外，我们称这些旅为突击旅，还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失败，是不会被消灭的，因为他们在艰难的战斗以后总是更加壮大；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有时不得不撤退。

无产阶级突击旅是一批又一批新部队领导干部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产阶级旅是培养新部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学校。它们的巨大作用就在于此。同时，它们的巨大作用还在于教育党的

干部。因此，无产阶级旅对参加无产阶级旅的一批又一批新战士来说也是一所政治学校。无产阶级旅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由于它们是第一批真正的军事组织，是由于我们党派遣了大批最优秀的党的干部到那里去，在那里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儿子成了核心。

在到达波斯尼亚以后不久，在1942年1月初，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就决定创建人民解放游击部队和志愿部队。

为此，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如下命令：

“1.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其他地区则根据需要）立刻着手建立人民解放志愿部队。

2. 这种部队由那些决心同占领者及乌斯塔什分子作斗争，但无意加入游击队、也无意加入切特尼克部队的爱国者组成。

3. 人民解放志愿部队的组成为：

（1）四个排组成一个连，每一个排至少二十名战士；

（2）四个连组成一个营；

（3）人民解放志愿部队的旅至少由四个营组成；

（4）人民解放志愿部队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部队的最高司令部指挥，或由各该地区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部队总指挥部指挥；

（5）人民解放志愿部队的指挥官和司令官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部队的最高司令部或各该地区的总指挥部任命。

（6）人民解放志愿部队设有自己的专门指挥部，由最高司令部任命之。

（7）人民解放志愿部队战士必须在军帽上戴有三色民族旗

的标志。

4. 人民解放志愿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在人民解放军组成中还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及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队。”(1942年1月1日公报)

就这样，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从低级类型到高级类型、人数越来越多和实力越来越强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1942年1月15日德国人和乌斯塔什分子开始对东波斯尼亚自由区发动第二次联合攻势。这一次切特尼克分子的首领又叛变了，他们从背后捅了我们一刀，但这对德国人无济于事。攻势没有成功，虽然我们暂时失去了部分自由区，即失去了从东波斯尼亚到萨拉热窝这一片土地。在这次攻势中，充分表现了我国第一无产阶级旅的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支由五个营组成的无产阶级旅在零下二十五度到二十九度的严寒天气下从萨拉热窝出发越过伊格曼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行军。这个地区的切特尼克部队终于看到了自己首领的叛变行为，并大批地加入人民解放志愿部队。

此外，在1941—1942年的几乎整个冬天，我们的部队在黑山和不断地联合进攻我们解放区的德·未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及意大利部队进行残酷的战斗。这次战斗不仅使在齐腰深的雪地和高山日日夜夜同敌人拚搏的我国战士陷于精疲力尽的境况，而且使游击队的弹药几乎全部耗尽。

同志们，你们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间接渠道按一发子弹八个里拉的价格购买弹药。因此在1942年春天，德国人、乌斯塔什分子、意大利人、切特尼克分子对我们在黑山、桑贾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相当大的自由区发起第三次联合攻势时，我们不得不撤退，但这不是由于敌人强大，而是由于缺少弹

药。你们想想，我们的战士的士气有多么高，他们每人只有五、十、十五发子弹就投入了战斗！同志们，请你们想想，当时我们的战士不得不怎样从一场战斗投入另一场战斗！敌人有坚固的工事，我们部队的战士必须向敌人进攻并战胜他们，以取得弹药和军事装备，发给新战士，装备他们，使之在敌人发动攻势时能保卫自由区。

在整整三年的战斗中，我们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过弹药、军事装备或者粮食等援助。除去乌日策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兵工厂，但是我们的军队发展了，增加了成千上万的战士，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军事装备武装了新的旅和师。

1942年春天，人民起义在南斯拉夫各地都有了巨大的规模。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规模更大。在当时，即使不把地方游击队计算在内，我们的正规部队也已经很强大。

请看1942年9至11月的最高司令部公报发表的一些关于建立旅、师的命令，关于把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司令部改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这种名称和当时我国解放军的新编制相适应。

1942年11月1日第八十八号命令是：

“……兹命令：

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无产阶级突击师，

该师的编制是：

(1) 第一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

(2) 第三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桑贾克突击旅)，

(3) 第三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任命原第一人民解放无产阶级突击旅旅长科查·波波维奇同

志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无产阶级突击师师长。

任命原人民解放第一无产阶级突击旅政治委员菲力浦·克利亚伊奇同志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无产阶级突击师政治委员。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无产阶级突击师司令部根据本司令部的决议在最短时期内进行扩充。

本命令应立即执行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司令”

第九十号命令:

“按照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决议,成立第三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的编制是:

第五黑山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十黑塞哥维那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一达尔马提亚人民解放突击旅。

任命原第一达尔马提亚人民解放突击旅旅长佩罗·切特科维奇同志为该师师长。

任命原第五黑山人民解放突击旅政治委员拉多米尔·巴比奇同志为该师政治委员。

该师指挥部的机构要扩充,以便能够正常地行使职能。

本命令立即执行。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司令员

1942年11月9日”

1942年11月9日第九十三号命令指出：

“……成立第四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的编制是：

第二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五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六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任命原第五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旅长绍沙·马扎尔同志为第四师师长。

任命原第一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旅长米林科·库希奇同志为政治委员。

指挥部的机构要扩充，以便能正常地行使职能。

成立第五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的编制是：

第一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四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第七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任命原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作战参谋部副司令员斯拉夫科·罗迪奇同志为第五人民解放突击师师长。

任命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原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作战参谋部副政治委员伊利亚·多申同志为该师政治委员。

参谋部机构要扩充，以便能正常地行使职能。

由波斯尼亚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组成第一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指挥部。这个军的编制是：第四和第五人民解放突击师、第六东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旅。受第一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指挥的还有波斯尼亚地区的所有游击队。

任命原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作战指挥部司令科斯塔·纳吉同志为军长。

任命原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作战指挥部政治委员奥斯曼·卡拉贝戈维奇同志为军政治委员。

任命原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作战指挥部司令布朗科·波良纳茨同志为军参谋长。

指挥部的机构要扩充,以便能正常地行使职能……”

按照 1942 年 11 月 22 日第九十五号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司令的命令,建立人民解放军三个师和一个军。命令宣布:

“根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决议,在克罗地亚总司令部管辖下的地区,成立人民解放军三个师,即第六师、第七师和第八师。

第六师的编制为:第一、第二和第九人民解放旅。

第七师的编制为:第七、第八和第十三人民解放旅。

第八师的编制为:第四、第五和第六人民解放旅。

任命斯雷契科·马诺拉同志为第六人民解放师师长。

任命拉德·日吉奇同志为第六人民解放师政治委员。

任命帕夫莱·亚克希奇同志为第七人民解放师师长。

任命久罗·克拉达林同志为第七人民解放师政治委员。

任命弗拉迪米尔·切特科维奇同志为第八人民解放师师长。

任命阿尔杜尔·杜尔库林同志为第八人民解放师政治委员。

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成立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任命伊万·戈什尼亚克同志为克罗地亚第一军军长。

任命维切斯拉夫·霍列瓦茨同志为克罗地亚第一军政治委员。

本命令立即执行。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关于更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名称的命令如下：

“鉴于建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司令部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司令

1942年11月20日”

1942年12月18日命令：“根据上述军事需要，在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下设立克罗地亚海军部作为作战区指挥部的机构……”

根据1943年5月11日命令，成立第二波斯尼亚突击军，命令说：

“……根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最高统帅的命令，成立第二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

(1)任命原第一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第五师师长斯拉夫科·罗迪奇同志为第二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军长。

(2)任命韦廖·斯托伊尼奇同志为第二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政治委员。

(3)为了使第二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指挥部正常地行使职能，尽快地为它补充一些必要的人员。

(4)第二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的编制为：

第四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由第六、第八和第十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里布尼克和格尔梅克部队组成。

第十二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由第五和第十二人民解放突击旅、巴尼亚卢卡和科扎尔部队组成。

第十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由第九克拉伊什人民解放突击旅、

库普雷什科—扬斯基、格拉莫契科—利万斯卡和特拉夫尼克部队组成。

(5)第一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突击军的编制为：第五人民解放突击师，该师由第一、第二和第四克拉伊什旅、第四马耶维克旅、斯雷姆、比尔昌和舍科瓦茨部队组成。”

根据1943年10月14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命令，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下设立第一个空军基地。

根据1943年10月5日最高统帅的决定，委任了人民解放军八个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根据1944年3月1日最高司令部的决定，又成立了人民解放军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

同志们，无产阶级旅的行军不仅对西部波斯尼亚，而且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起义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些旅在1942年6月出发，经过泽伦戈拉、特雷斯卡维察、伊格曼、科尼察、普罗佐拉、杜万、利夫诺等地。在这次行军中，无产阶级旅走了二百五十公里的行程，在方圆七十公里的地方清除了敌据点。这正是我国各族人民武装斗争开始后的一年。

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第一年是极其困难的。这有许多原因：

第一，在这一年里，共产党为了在南斯拉夫各地开展武装起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这一年里，我们党的领导人牺牲的最多，因为他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人民起义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这个时期里，南斯拉夫共产党损失了数千名党员，他们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最高司令部通报中提到的牺牲了的南共中央委员及党的其他民族的领导成员中，有如下的同志：“……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南共中央委员和

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他牺牲在变节的第五纵队切特尼克分子手里，当时他为组织利卡的游击队、为反对意大利占领者及其走狗帕韦利奇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帕夫莱·帕普，南共中央委员，游击队的不辞辛劳的组织者，他在达尔马提亚指挥游击队作战时英勇牺牲；安卡·布托拉茨，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她是在同占领者及乌斯塔什匪帮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她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个最有才能的女领导同志；约西普·克拉什，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工会运动中最有才干的工人领袖之一，他是在组织克罗地亚游击队的忘我工作中牺牲的；扎亚，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她多年来一直从事工会运动的领导工作，在和凶残的乌斯塔什匪帮的斗争中英勇牺牲；斯拉夫科·什兰德尔，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在凶恶的盖世太保手下英勇就义；约扎·弗拉霍维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他是在萨格勒布遭乌斯塔什分子杀害而英勇牺牲的……”此外还有：布多·托莫维奇，黑山省委员会委员，黑山人民青年联盟书记，他死于叛徒切特尼克分子的手中。为秘密警察杀害而英勇牺牲的还有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委员武基察·米特罗维奇。我们党最杰出和最受人崇敬的领导人之一、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德·康查尔同志在同年英勇牺牲了。同志们，对我们党来说，这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在同一年里，由于马切克及其帮凶的叛卖行径，我们党在克罗地亚损失了大部分领导人。在战争的头一年里，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党员牺牲了，正是这一点最清楚地证明这一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斗争使我们党和青年联盟的队伍中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宝贵生命。

第二，正是在这一年，南共必须在赢得人民的信任方面表现出

自己的全部能力。正是在这一年里，党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使人民对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有信心；正是在这一年里，那些由于暂时失败而产生困难局势的地区的一部分人民发生了动摇，如黑山、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西部和波斯尼亚东部。

第三，正是在这一年里，最难得到大量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因为部队还太弱小，还不能对强大的敌人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这一年里，占领者和通敌分子仍然十分强大。

这是对我国各族人民严重考验的一个年头，同时对我们的游击队及其他部队来说也是一所严格的军事学校。在这一年里，我们的人民军队壮大了，受到了锻炼，起义稳住了脚跟，人民政权在许多地区牢牢地扎了根。

在这之后进行的许多艰苦斗争对起义来说不再是那么危险了，因为全国都是战场，敌人也没有强大到可以一下子、即同时在全国各地的辽阔地区里进行全面进攻，并使进攻坚持到底，尽管在南斯拉夫有大约五十万占领军和通敌分子的军队。

到1942年底，波斯尼亚、利卡、科尔敦、巴尼亚、这尔马提亚广大的彼此相连的解放区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斯拉沃尼亚、塞尔维亚（托普利契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着自由区以及武装斗争根据地。到了这个时候，最高司令部已经不可能进行并监督人民政权的工作了，不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区里领导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行政工作。因此，召开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政治代表机关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最高政治机关。

1943年1月10日《战斗报》社论谈到这个新机构的任务时指出：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人民政治代表机关，同时也是人民解放斗争的最高政治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后方，巩固并加强前方和后方的团结，从政治上动员解放区及非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斗争。

无疑，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乡村被烧光和抢光，城市被烧毁和被洗劫，房屋和工厂被破坏，经济生活被破坏，学校被毁坏，教师被杀害，无数的难民，失去父母的孤儿，缺少有能力的专业干部，卖国贼的第五纵队式的暗害活动——今天必须在占领者及其仆从乌斯塔什分子和切特尼克分子遗留下来的所有这些废墟上和困难中，建立起人民政权……

摆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及其机构即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在一部分解放区（克拉伊纳、利卡、科尔敦）进行选举。人民应当选举自己的政权机构。在还没有进行选举的地区，要尽快进行选举。执行委员会将尽一切努力使人民政权的民主原则尽量充分地实现……

关于经济和经济问题。显然，今天解放区的经济生活应具有战时经济的性质。这首先是因为必须安排好经济生活，以保证军队的供给，其次是因为解放区处于包围之中，缺乏一切必要的原料和机器设备，因此除了满足军用生产外，不能满足其他经济部门的需要。执行委员会在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时必须考虑这一事实。

交换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了。活跃交换，使不同经济结构的各地区之间有可能进行交换，使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有可能进行交换。居民的粮食问题是同活跃交换密切相关的。为了做到

这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来调节、组织交换，但是原则上不触动自由市场……

为了使军队的供给有助于活跃交换，执行委员会会同最高司令部发行了一种票证，用这种票证购买部分军用物资。这种票证有一定的期限，可以当作支票和交换手段。

执行委员会面临的重要经济问题是官吏问题和房租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实事求是的决议，即官吏的工资和通休者的养老金无法支付，理由很简单，没有财政资金。但是，由于人民政权是关心人的，它不可能把大批官吏的命运置之不理。一切有能力的官吏都可以申请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家属如果不能劳动将得到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补助。其次，大批官吏将在学校、扫盲班及人民大学训练班中就业，等等。至于房租问题，宣布普遍延期交付。房东不可以收房租。那些目前有收入的房客，向人民解放委员会缴纳低房租，作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金。完全靠房租生活的房东从这项基金中或者得到货币，或者得到实物的救济。延期交付房租在这种情况下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合理的措施，这种做法丝毫不触犯私有制的原则。

其次，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若干决议，这些决议修改并取消乌斯塔什强盗政权时期的不公道的做法。例如决定在某些地区成立处理退还被夺走的牲畜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一些农民在其他农户那里认出自己的牲畜，这些牲畜或者是直接抢走的，或者是从乌斯塔什政府那里买来的。为了使被抢者领回自己的牲畜，并避免可能发生的争吵，所有与牲畜有关的问题，由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及军事当局的代表处理……”

当时的《战斗报》就是这样描述已选举出来的最高政治机构的

任务的。

但是，还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以前，最高司令部和人民委员会就尽力帮助遭受掠夺的人民。下面举一些例子。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部队最高司令部于1942年11月18日决定从自己的军用款中拨出二百五十万库纳^①救济下武科夫斯科、上武科夫斯科、亚尼、波德戈列、普列瓦以及其他村庄，因为乌斯塔什分子和德国人在卖国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以及德雷诺维奇、拉迪奇等帮助下烧毁和掠夺了这些村庄。其次，拨给比哈奇人民解放委员会五十万库纳用来救济城市孤儿，拨给德尔瓦尔城及近郊区二十万库纳，等等。

1942年11月13日《战斗报》在谈到救济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灾民时写道：

“委员会的工作是艰巨的，整个地区几乎全部被烧光。牲畜和粮食被抢走……最高司令部对上武科夫斯科及下武科夫斯科的救济成为人民团结的激动人心的表现……姆尔科尼契郊区的一个农民在大会上说：‘南斯拉夫存在二十二年来，我们连一个第纳尔的救济也未得到过，而现在，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却从军队中拨款帮助人民。’”

请看人民如何热爱自己的人民军队：

“第四克拉伊什突击旅在经过乡村和城镇时，受到全体人民的如此热烈的欢迎和接待，致使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我们在农村休息时，不能得到休息，但这种新的疲劳对我们来说比每次休息都更可贵。唱歌和跳舞代替了睡眠，青年人和我们在一起，团团地

^① 当时克罗地亚的货币单位。——译者

围着我们,而老年人望着游击队员,流着眼泪诉说乌斯塔什分子的罪行,诉说发生过的事和他们的遭遇。同时,母亲和姐妹们拿出牛奶、奶酪、奶油、水果、手帕和毛巾来招待我们,他们把厨房里的所有东西以及他们所收藏的、未被乌斯塔什分子搜查到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每进一个村庄都出现同样的情景。”1942年10月22日《战斗报》的一篇报道就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1942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因为我们的军队迅猛地成长和壮大,而且还因为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蓬勃的发展。例如,9月召开了游击队军医代表大会。12月召开了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2月27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举办了党的各种训练班及青年训练班。在解放区的边界,十分重视收割的组织工作,这种收割是在敌人枪击、炮轰及空袭的情况下进行的。进行了选举人民政权机构即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地为我们部队赶制军服及其他用品,因为必须供应约十五万以上的战士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能全部从敌人那里得到。这是人民解放阵线、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人民青年联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伏伊伏丁那等地区的农民和工人的职责。

1943年1月22日,联合的占领军,即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整个乌斯塔什军队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他们在奈雷特瓦同德国人及意大利人会合在一起)的支援下,对我们解放区发动了当时最大的所谓第四次攻势。在装备上和人数上都占有很大优势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的部队进逼。战斗不断地进行,

从卡尔洛瓦茨开始，包括全部利卡、科尔敦和巴尼亚。在连续后退几百公里以后，我军主力在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下，在奈雷特瓦，普罗佐尔、科尼察及亚布拉尼察附近顶住了，在那里为了挽救随军的四千名伤员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由于和平居民遭到骇人听闻的摧残，和我们的部队一起撤退到利夫诺的有五万名老弱妇幼，他们不断地遭到空袭。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政府极其艰难地尽力拯救了大部分老百姓，使他们免遭死亡。

在奈雷特瓦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就这样，四千名伤员得救了。

最高司令部连同五个师（其中有三个是无产阶级师）承担起全部重担，使得其他师和游击队能在波斯尼亚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站住脚，从而使得我们能重新从敌人手里夺回我们曾放弃的所有地区。

德国人、意大利人、乌斯塔什分子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在奈雷特瓦溃败以后，我们那些因苦战而疲惫不堪的师团（带着四千名伤员）越过高山，穿过峡谷，继续追击和消灭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一直把他们赶到利姆河畔。第四次攻势的战斗就这样延续了足足有两个半月，即从1943年1月22日到5月中旬。

但敌人不给我们的部队有休整和恢复伤员健康的时间，他们估计我们的部队疲惫不堪和所处地形不利，就疯狂地准备用比第四次攻势更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以便包围和消灭我们。

同志们，你们中间有些人还很清楚记得在所谓第五次攻势期间的那些日子和战斗。我也不想谈这点，因为这会在我的报告中

占去过多的篇幅和时间,可是我必须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钢铁般的人——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共产党员和青年,才能在这种战斗中坚持住。在第五次攻势的战役中,我们损失了大约八千名同志、优秀的战士、指挥员、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他们大部分是党员和南斯拉夫共青盟员。但是,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铁一样的包围圈,我们不顾饥饿和疲惫,很快地从敌人手里夺回了波斯尼亚东部。这样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培养出来。

由于意大利的投降及十二个意大利师团被解除武装,我们有可能装备几万名新战士,建立起新的师和军,几乎全部达尔马提亚及其所属各岛屿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部队在全南斯拉夫向敌人展开进攻,我国新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由于新的地区被解放,成千的新战士加入人民解放军。到1943年末,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的南部和东部、桑贾克、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整个利卡、科尔敦、巴尼亚、大部分斯拉沃尼亚和大部分斯洛文尼亚都解放了。这样巨大的胜利迫使德国指挥部把一些师从希腊和德国等地调到南斯拉夫来,于是10月份,在保加利亚和帕韦利奇、奈迪奇、鲁普尼克的部队以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志愿队帮助下,发动了极其猛烈的第六次攻势。这次攻势不再是只朝一个方向的攻势,它在全国各地进行,并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即一直延续到1944年1月底。德国人最猛烈地进攻的地区有斯洛文尼亚的意大利占领区、克罗地亚的沿海地区和达尔马提亚,以及意大利在投降前所占领的地区。在这次残酷的战斗中,德国人只取得部分的胜利,绝大部分的解放区仍在我们手中。所以,这次攻势遭到了同历次攻势一样的命运,就是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在许多地区内又转入了反攻。

1944年4月初，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策略，组成突击小分队，在全国各个战区不断袭击我们的据点，其目的是要拖垮和各个击破我们的主要领导中心，以便突然而迅速地深入解放区来瓦解我们的后方。

鉴于这种战术，我们被迫分散大量兵力，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分配兵力，分散在敌人可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这次敌人使用了我们对他们使用的相似战术，也就是说迅速突破和分散兵力的战术。德国人调来了冯·韦希斯元帅的“巴尔干兵团”作为增援部队。

在第七次攻势中德军统帅部计划对德尔瓦尔进行空袭。在这次攻势中，德国人使用了自己的十八个师、保加利亚的九个师、兵力在十五万人左右的帕韦利奇部队、奈迪奇部队、鲁普尼克卫乡队等等，这是德国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次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也同样没有成功。人民解放军以高昂的斗志打退了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

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了，意大利投降了。英勇的红军不停地追击法西斯匪帮，离自己的国界愈来愈远了。希特勒在不久将来的失败势在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关心使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得到保障。这就有必要考虑建立作为国家政权最高机构的第一个国家机关。1943年11月29日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南斯拉夫人民全国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执行全国临时政府的职权。这就是对那些希望在战争结束后一切立即照旧的人们的回答。

在整个战争期间，流亡在伦敦的政府竭力阻挠人民解放运动。

他们甚至公开地和占领者合作，把切特尼克分子的武装力量让他们调遣。必须提防流亡政府、国王、国际和国内反动势力加紧活动。因此，必须尽力巩固人民政权。虽然，最后的内部制度问题有待全国完全解放后解决，但是新选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必须在全国解放以前采取种种措施，以使国家管理机关能正常地运转，尤其是要解决把占领者从本国赶走之前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底，德国人还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势。但是这两次攻势的成功希望比所有过去的攻势更小了。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尝试，但也只是尝试而已。而且，在德尔瓦尔的空降行动事实上只是报复性的绝望的行动和消灭起义首领的尝试。由于第六利卡师及最高司令部的军官学校迅速采取行动，这次绝望的行动可怜地失败了。在六百多名伞兵中，活下来的只有一百三十人，其余的都被我们的部队消灭了。

当时能否设想会有某种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能消灭最高司令部（空投部队时，在德尔瓦尔只有最高司令部的一部分，当然是较大的一部分）呢？虽然，这一次最高司令部所遇到的危险，比方说，和在第一次攻势时，或者和第四次及第五次攻势时在乌日策所遇到的危险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的军队拥有三十多万名战士，有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师及其他师组成的十一个正规的军，他们在全国各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的时候，难道希特勒能够取得什么重大的胜利吗？当然，希特勒再也不能取得什么特别的结果了，因为当时的希望比以前小得多了。现在，我们的部队通过空运从苏联和盟国得到了援助。

在对德尔瓦尔发起进攻后两天，就决定把最高司令部的主要部分迁往岛屿上去，这些岛屿自意大利投降后就一直掌握在我们

第二十六师手中。关于这次迁移到维斯岛的问题，最高司令部以及中央委员会早在对德尔瓦尔进攻之前就讨论过了，因为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人民的最高代表机关、主席团、全国委员会以及最高司令部找到一个能够不受阻碍地执行其职权的地方。

尽管敌人在第一次空袭时给我们造成了损失，最高司令部还是在当天完全脱险了。苏联使团团建议苏联提供援助，即用苏联的飞机把最高司令部送到维斯岛或者送到意大利。在德尔瓦尔遭到进攻后两天，苏联飞行员萧尔尼科夫驾驶飞机，载着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最高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于夜间在离德尔瓦尔七十公里的库普雷斯地方着陆。此外，当天夜间把伤兵送到意大利的一些盟军的飞机也降落了。最高司令部的另一部分和一些部队留下，因为最高司令部在那里仍有三个师。我们的领导机关迁往维斯岛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战争行将结束，这样一来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在解放战争过程中诞生的新南斯拉夫的地位。

同志们，我们常常谈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的攻势，因此，国外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所有的攻势。无疑，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只谈在我国被占领的四年中敌人的七次攻势呢？

第一，因为敌人在这些攻势中通常使用了最强大的力量和所有种类的武器；

第二，因为所有这些攻势的矛头都是对着领导起义的最高司令部和我国中央民政机关所在地的解放区；

第三，因为在这些攻势中，敌人表现得极其顽强和凶猛。在这些攻势中，战斗通常持续两个月到四个月；

第四，因为敌人的这些攻势的矛头是针对我们的精锐部队；

第五，在这些攻势中，敌人通常在人力上和物力上遭到极大的损失。因此，这些攻势差不多总是以我们转入反攻并解放更大片的土地而告终。

但是，在我国各个地区敌人都发动了许多攻势。每次这样大的攻势(我们在这里列举了七次)之前在各地都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攻势。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斯拉沃尼亚、塞尔维亚(在黑特拉瓦、托普利察和亚布拉尼察附近)、黑山、马其顿等地，这些攻势都相当凶猛。在这些攻势中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战斗。敌人企图尽量有把握地扫荡较小的起义中心，以便在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便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以科扎拉为例，德国人和乌斯塔什分子花了两个多月进攻西部波斯尼亚的起义堡垒。甚至匈牙利的军舰也开进萨瓦河，并参加袭击科扎拉游击队阵地。这些都是大规模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和敌人通常都遭到很大的损失。

在斯拉沃尼亚，这些攻势尤其激烈，因为我们在斯拉沃尼亚的部队不断地破坏通往南方、通往希腊的主要铁路线，并且以这种方式扰乱德国人向非洲输送部队和武器。例如，在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占领者用几个师攻击我们的游击队和其他部队。但是，即使在这些小型攻势中，敌人几乎从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连小的起义中心都不能消灭，更何况消灭那些集中着我们最精锐部队的主要中心。

这里还必须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认为1941年12月我们从塞尔维亚撤退后，塞尔维亚的起义在一个长时期内被消灭了的看法是不时的。不，塞尔维亚的游击斗争在继续着，只不过是规模

比过去小。不仅许多小规模游击队仍然留在塞尔维亚各地，而且最高司令部在撤退时还从桑贾克送回了三百多名战士。在西部塞尔维亚仍然有一个部队，他们在1941—1942年的整个冬天都在进行着英勇的战斗。在亚布拉尼察、托普利察和黑特拉瓦地区逐渐发展了日益强大的游击队运动，并且也有自由区。后来这里成立了突击旅。黑特拉瓦、托普利察和亚布拉尼察的自由区是保加利亚游击队（特尔恩游击队）的基地，而1944年由逃跑过来的士兵和工人在这个地区成立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旅及其他旅。同时在马其顿地区，也成立了保加利亚游击队，包括“赫利斯托·鲍特夫”营。因此，东部塞尔维亚地区（特别是在丘陵地带）的游击战争也几乎同样地开展起来了。

在马其顿，虽然稍许晚一些，但游击运动也同样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在1943年初人民起义就在这里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这表明，对占领者及其帮凶来说，在南斯拉夫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人民起义不只是一个地方，或者在几个省和某些地方爆发和发展，而是在整个南斯拉夫的土地上遍布游击队和其他起义军部队。这就使敌人不可能在消灭南斯拉夫的起义方面取得任何较大的胜利。

敌人所有这些攻势的目的，是想在该地区消灭游击队或者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扑灭起义。在这些攻势中，激烈的战斗总是给战区的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敌人通常采用了极其残酷的方法对付老百姓：烧毁村庄，杀害所有没有来得及躲进森林里去的人，抢劫财物，等等。因此，我们整个国家经常成为生死斗争的战场，因为战斗还在尚未解放的城市和乡村中进行。共青盟员、工人和所

有其他真正的爱国者在敌人的后方，说得更确切些，在敌人的心脏进行着战斗。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以及其他城市中经常有我们的地下人员和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许多党员和共青盟员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真正的爱国者(工人、青年、人民知识分子)牺牲了。

同志们，我在这个报告中，根本无法详细地谈及我国的战斗情景。假如我要在这里列举统计资料，那会占很大的篇幅，会成为整整一本书。因此，这里我不能谈占领者和通敌分子的恐怖行为和由此而造成的牺牲的详细情况，也不能谈到帕韦利奇、奈迪奇、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鲁普尼克这些匪帮造成的牺牲的大概情况，更无法谈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占领军造成的牺牲了。所有这些匪帮都留下了大量屠杀居民、夷平村庄和城市及洗劫人民的血腥痕迹。这些都是事实，我国各族人民的子子孙孙将永远铭记在心中。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国人民的英雄行为和遭受牺牲的见证。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不管他在这方而花费多少气力。

现在，谁有权利指望我们对我们的这些牺牲保持沉默，指望我们沉默并否定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在希特勒奴役的欧洲的心脏（当时我们远离我们的所有盟国数千公里）作出的非凡的努力呢？不，谁也无权指望我们这样，因为这不仅对我国各族人民，而且对这次战争的牺牲者也是极其不公正和不人道的。自觉地付出这么大幅性的人民，有权利要求珍惜和尊重这些牺牲，有充分权利要求承认自己在解放战争中对盟国共同努力所作的伟大贡献。

1944年秋，英勇的红军在追击溃败的希特勒匪徒的辉煌进军中开到了我国的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塔斯社于1944年9月28日发表了关于苏联指挥部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之间达成的如下协议：

“几天以前，苏联指挥部为了同在匈牙利的德国部队和匈牙利部队作战，请求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允许苏联部队暂时开进与匈牙利接壤的南斯拉夫领土。值此机会，苏联指挥部声称，苏联部队一旦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即从南斯拉夫撤走。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同意满足苏联指挥部的请求。苏联指挥部接受了南斯拉夫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在南斯拉夫的领土内，在红军部队将驻扎的那些地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民政机关将行使其职权。”

《新南斯拉夫》杂志13—14期在发表苏联通讯社塔斯社的这篇报道时写道：

“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发展中的重要步骤是签订上述协定所依据的事件。在相隔遥远的地方各自战斗的两支军队，在这场战斗中为了人类的解放都作了最大的牺牲，现在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肩并肩地投入彻底消灭法西斯恶魔的战斗。

苏联军队是在恪守民族平等原则下开进南斯拉夫领土的。

南斯拉夫不是单纯被占领的国家，南斯拉夫创立了强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从这个运动中诞生了新的扎根于人民的政权。南斯拉夫拥有自己的人民军队，它解放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国土。一年多来南斯拉夫已成为使敌人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特殊战线。南斯拉夫战线长期来是唯一从苏联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敌人陆地兵力的战线。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成为反希特勒联盟战斗计划中的重

要因素。

苏联指挥部充分注意到这些事实。苏联指挥部对我国人民政权和军队的高级机关的态度表明了对一国人民的尊重，这个人民从不企望别人恩赐自由，而是亲身为自己的解放而英勇地战斗，同时还因此而对自己伟大盟国的胜利作出贡献。这特别表现在苏联指挥部在南斯拉夫国土上作战期间没有要求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归它指挥。

所有这些情况，对进一步巩固两国军队的兄弟情谊和达到苏联及南斯拉夫军队的共同目标来说，都是最好的保证。”

英勇的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东部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苏联政府当时还向我国军队提供了军事装备，给我们以巨大的帮助。我们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已发展到五十二个师。

早在这以前，即1944年年初和年中，我们在意大利就有自己的基地，我们通过这个基地从盟国得到了军用物资。盟国的飞行员用飞机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全国各地的部队。后来，参加运输的还有苏联飞行员，他们用苏联政府专门为此派往意大利的飞机运送。

1944年秋，保加利亚祖国阵线代表团来到了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我们和代表团达成协议，即保加利亚的部队也参加把从希腊撤退来的德国人从马其顿赶走的战斗和参加尼什的战斗。

鉴于德国军队从希腊撤退时要经过桑贾克和波斯尼亚，我们的部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在我国消灭更多的敌人。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到普里耶波列，在同德国人的战斗中，还有两个阿尔巴尼亚师参加了战争。

我们在这些最后的战斗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里我只想指出，我们在斯雷姆前线，后来还在部分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几个月战斗中就有七万名伤员。这说明仗打得十分激烈。特别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乌斯塔什分子、切特尼克分子以及其他匪帮的残渣余孽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猛烈的战斗。在斯雷姆、斯拉沃尼亚，以及在波斯尼亚、伊斯特拉和其他地区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部队这时已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它们清扫了西部塞尔维亚、桑贾克、黑山、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伊斯特拉（包括的里雅斯特）等地，消灭了二十多万敌军，并俘虏了同样数量的敌人。当我们的师团向伊斯特拉发起进军时，从已经停战的意大利开来了德国的整整一个军，援助在那里被包围的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大部分都被俘虏或被歼灭。就这样，到了1945年5月15日，冯·莱尔的全军，连同其司令部和武器在斯洛文尼亚被消灭或被俘虏了。因为德国人怎么也不愿向我们的部队投降，所以战斗一直延续到5月15日这一天。

这场艰苦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整整四年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极其不利的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参加这次战争并不断地进行战斗。因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其他被奴役的人民如何争取被奴役国家的自由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的国家和我国的各族人民的伟大就在于此。

你们可能会说，我过多地谈到战争、游击队、人民解放军等等，而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路线则谈得少。可是，创立游击队，创立新的人民军以及对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正是党在四年战争期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党整个历史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之所以是最

重要的部分，是由于这场解放战争同时也就是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我国人民大众的社会解放战争。这是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奠定了新南斯拉夫的基础。没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也不可能在解放战争中起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在上世界上享有如此大的声誉。

由第一个任务即由争取全国解放的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建立从人民解放委员会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人民政权。没有人民政权，今天就不能想象能领导战争，实现和巩固伟大解放战争的成果。没有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也就不能想象实现我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

这就是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争期间的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任务，而且，它光荣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现直气壮地、不是悄悄地和虚伪地履行了自己的领导作用。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农民甚至每一个敌人都知道党，因为党员和共青盟员总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得到我国人民的极大拥护，战后党仍然受到这种拥护。

同志们，这里我必须谈谈在战争期间某些党组织犯的一些错误。我只想谈谈在战争头几年所犯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在马其顿所犯的错误是最严重的了。在那里，马其顿共产党省委员会书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沙尔洛千方百计破坏成立游击队，即开展武装起义。马其顿党组织领导的一些正直的成员也被他拉下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批评了马其顿党领

导的这种状况，并把沙尔洛从党和领导中开除出去。

此后不久，即在1941年底，马其顿党领导中来了一位保加利亚党的代表，他在马其顿起义问题上和沙尔洛的观点差不多。他顽固地坚持在马其顿没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观点。同时，他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领导。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持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位代表最后同意只建立一些人数不超过十至十五人的小分队，但这些小分队不能称之为游击小分队，只能称之为“造反”小分队，当时，这些小分队的日子不好过，靠藏藏躲躲度日。事态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即这些小分队拒绝接收新战士，因为据说“我们自己现在都没饭吃，怎么能收你们呢！”其次，这位代表要求把人民解放委员会，当地简称作委员会，称为“全国委员会”，而把“人民解放”的字样去掉。此外，在“我们要留在城市，让敌人到树林里去”的口号下，要求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转入城市。

这种有害的立场对大量的党员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开始以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路线在马其顿不能实现，因为这里不具备条件，即没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如果现在读一读1942年以前马其顿省委员会的党报和通告，你们就会看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在这些文件中从未提到，这时就会明白为什么来自保加利亚的这些代表要破坏马其顿的起义了。他们认为，马其顿并没有被占领，而是从鲍里斯皇帝的军队手中解放出来，而德国军队起了“积极作用”，因为他们帮助“解放”马其顿。

因此，直到1943年初，当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泰波同志到马其顿去以后，才开始有力地消除这种错误的观点，游击运动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这样，马其顿的解放斗争就在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象沙尔洛和那位代表这

样一些人的观点，妨碍了马其顿的游击运动，使它不能一开始（1941年）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使它有气无力，停止不前，脱离人民群众。

在战争开始时，即1941年，在黑山也犯了同样大的错误。1941年7月13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黑山爆发了全民起义。但这次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做得差，因为没有一开始就建立起某种固定的军事组织。因此，起义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而不是具有长期的有组织的人民起义的性质。黑山起义的领导正确地估计到有可能发动全民起义反对占领者，但是没有预见到使起义继续发展下去并得到巩固需要做什么，而不管发生什么事，如在初次遇到严重的困难即遭到失败后，如何使做万起义者不要回老家去。这些错误的后果在后来，即1941年12月对桑贾克的普列夫利亚城的总进攻中也表现出来了，这是党领导所犯的另一个大的军事性错误，而这次所犯的错误是违反最高司令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的，因为最高统帅曾命令，没有很好的准备是不能进攻坚固的普列夫利亚城的。进攻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七百名最优秀的战士，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还有几百名战士受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游击队伍的士气低落，使得大部分士兵都回老家去了。这被当时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动派和切特尼克分子的宣传人员所利用。第三个大错误是用生硬的和宗派主义的态度不正确地对待那些脱离斗争的人。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而是用强制的手段，这就更加触怒了后来受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影响的那一部分人民。

黑塞哥维那党的领导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那里对还没有决心走上武装起义道路的那部分人民也表现出宗派主义和不正确

的态度。各种帕韦利奇分子、切特尼克分子以及其他分子都利用了这一切来实现自己的反人民的目的。

在斯洛文尼亚，虽然在1941年4月就已成立了解放阵线，但游击运动在这一年的头九个月里进展得很慢。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中存在机会主义。这与1941年7月和8月最初日子里在克罗地亚的情况相似。

在克罗地亚，当赫布朗从集中营放出来并成为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后，出现了相当不健康的情况。赫布朗不仅不正确地对待中央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而且对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态度也不正确。这种态度是沙文主义的。这就使得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积极分子感到不满。

下面请看当时视察了克罗地亚的卡德尔同志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写的内容：“问题首先是，只要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仍然是安德烈·赫布朗，或者说，只要他还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克罗地亚的情况就不会好。他的秉性和品质有一种不断地削弱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之间联系的倾向。在这方面还有证明这一点的许多具体事实，而更能证明这一点的的事实是，在克罗地亚我们正在不断地同这种消极的因素打交道。首先，在安德烈·赫布朗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中都散发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气味……”

在克罗地亚也表现出这样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并在党内形成了不健康的气氛。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意开除赫布朗，并要他完全离开克罗地亚。在他离开克罗地亚以后，党组织和克罗地亚的整个整顿工作进展得非常快，这一事实说明他对那种状况应负主要罪责。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警惕地注视我们党的路线的贯彻情况,帮助党组织改正自己的错误,耐心地说服那些背离党的路线的同志,但是也坚决地撤销那些有意歪曲党的路线或者一般说来危害工作的人的职务。

耐心地 and 不断地纠正战争期间的各种错误和缺点,就更加巩固了我们党的力量和团结。无论是斗争的最困难时刻或是经常的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都不能动摇我们党的队伍,而这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能够在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顺利地起领导作用的主要东西。

同志们,这里我们必须谈谈我们党从1939年起及在整个战争期间就对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兄弟般的援助。早在1939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派米拉丁·波波维奇从科索沃到阿尔巴尼亚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同志组织和巩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战争一开始,就派了杜尚·穆戈沙同志到阿尔巴尼亚去,他和米拉丁一起帮助组织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我们还通过自己的建议和直接的帮助,尽一切努力帮助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使阿尔巴尼亚的发展能走上正确的道路。1942年夏天,杜尚·穆戈沙同志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从阿尔巴尼亚步行来到了格拉莫契,也就是说步行了约五百公里。他带来了关于阿尔巴尼亚状况的详细报告。在这一年里他两次进出阿尔巴尼亚,第一次是和布拉若·约瓦诺维奇同志一起去的。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援助,这就使我们在战时及战后头几年能进行最好的合作。这种合作大大地促进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建立最好的关系。

我们党把消除所有那些曾引起阿尔巴尼亚人民对南斯拉夫不

信任的东西看作自己的职责。我们党作了一切努力，以使这种关系在战后更加巩固，并努力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政治和道义上的援助。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阿尔巴尼亚才能够最终摆脱过去纠缠着它的痛苦命运，摆脱外国的无情剥削，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我国人民高兴地对自己的邻邦阿尔巴尼亚提供这样的援助，尽管我国由于占领者的破坏，由于战争的结果而处于困难状况。

同志们，我在报告中结束关于四年战争时期的叙述时，我必须强调指出下列几点：

1. 南斯拉夫共产党之所以能组织南斯拉夫人民武装起义并成为领导者，只是由于党坚强团结和党员守纪律；其次，还由于它和人民群众有联系，而由于南共在重大问题上执行正确的政策，这种联系还在国家被占领以前就建立起来了。

2. 无论是战前或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不遗余力地教育党员和所有劳动群众要忠于伟大的苏联，宣传苏联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所起的巨大的解放者作用。没有苏联的这种作用，就不可能有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胜利，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南斯拉夫的解放，不可能建立新的南斯拉夫。

3. 南斯拉夫共产党得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无限信任和爱戴，是因为它不仅在于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证明它忠于自己的人民，因为它在我国各族人民历史上最艰苦的日子里，毫不动摇地领导工人阶级，组织人民起义。

4.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能够组织，而且能够胜利地举行人民的武装起义，因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为第一批游击队输送了自己的最优秀的儿女，因为工人阶级构成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旅和突击

旅的核心,而这些旅都成了培养起义领导干部的学校。其次,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在最艰苦的斗争过程中采取了建立正规部队的正确方针——即建立了人民解放军,党依靠这支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不但能够解决胜利地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问题,而且能够解决政权问题,即战胜反动派和建立新南斯拉夫的问题。

5. 南斯拉夫共产党之所以能这样顺利地开展武装斗争,是因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南共的政治路线丝毫没有发生动摇,是因为南共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指出了明确的前景:(1)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未来国家组织的基础问题;(2)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民族问题;(3)解决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一切问题。

6.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公民的无限信任,因为早在战争期间它就已经表明自己是言行一致的,它用事实证明它为了城乡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路线,它用事实证明它同人民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7.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早在1941年就已经表明,他们把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即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看作是光荣的事业,他们把争取解放祖国的问题,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义务。因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了争取盟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的胜利,为了争取本国的自由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想引斯大林的下面一段话来结束报告的这一部分。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说:“但是这次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次战争暴露了后方和前线的一切真情

实况,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使它们不戴面具、毫无粉饰地登上舞台,显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①

“……要是在别的时期,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党的代表人物的演说和报告,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两相对照,作出总结等等。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并且还不能担保这中间不犯什么错误。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况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战争本身已经检查了我们各个组织和领导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总结。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并做出正确的结论,就容易得多了。”^②

因此,对我们、对我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对我国各族人民来说,战争尽管带来各种灾难和牺牲,但它也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它表明我国劳动人民能够做什么和决心做什么。战争表明我国各族人民的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场战争用事实而不仅用言论表现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

七、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建立新国家——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方面所做的工作

战争结束后,我党面临的任务,就其重要性来说,并不亚于我党在战争中所担负的任务,因为必须彻底实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果实。

早在战前,尤其在解放斗争期间,事实表明,战前那样的南斯拉夫没有能力继续存在下去。资产阶级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争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② 同上。

期间都已完全威信扫地，它不仅懦弱无能，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叛国，公开同占领者勾结来反对人民。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反动资产阶级，在伦敦建立了以国王和他的政府为首的中心，而在贝尔格莱德则建立了以奈迪奇为首的另一个中心。一方面，伦敦的国王和政府，通过卖国贼德·米哈伊洛维奇间接地同占领者合作，反对南斯拉夫人民；另一方面，贝尔格莱德的奈迪奇将军公开同占领者合作，竭尽全力反对人民解放运动，他调遣自己的武装匪徒去反对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同时极其野蛮地迫害和屠杀城市中的民主分子和爱国人士。可见，无论是流亡于伦敦的国王和政府（通过他们的德·米哈伊洛维奇），还是贝尔格莱德的奈迪奇，都干着同样的勾当，即不择手段地反对人民，以便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地位。

其次，乌斯塔什刽子手的首脑、万恶的法西斯罪犯帕韦利奇，在克罗地亚纠合了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以斯特皮纳茨大主教和沙里奇主教等人为首的大部分天主教神甫，这些人和帕韦利奇一起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合作；而以马切克为首的另外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则间接地同帕韦利奇合作，因而也就是间接地同占领者合作。

斯洛文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最反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以鲁普尼克和罗日曼主教为首的绝大部分天主教神父，公开地同占领者合作。

可见，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不仅由于自己无能和在战争期间叛国通敌而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而且也在反对人民的武装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武装部队不论是和占领者在一起，或者是他们独自向我们进攻，都被人民解放军所击败。

由此可见，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过程中，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南

斯拉夫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因此，整个资产阶级不仅丧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而且在战争中，也就是在武装斗争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也具有革命的性质，在解放斗争期间凝聚成了南斯拉夫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团结，这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同甘苦、共患难的结果。这些目标是：

- 1) 驱除占领者，解放国土；
- 2) 消灭卖国贼——占领者的走狗；
- 3) 建立比过去，即比旧南斯拉夫更好的国内制度。

这种政治团结获得了愈来愈巩固的组织形式，即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阵线。

同志们，在这里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就，也就是全体人民进行斗争和希望得到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因为西方盟国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我国人民不同。西方盟国想方设法来挽救南斯拉夫的旧制度。先是至少要局部恢复旧制度，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全部恢复。这就要求我党提高警惕，保持灵活性，因为南共在争取正确地解决有关新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重要问题上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根据西方盟国的建议在到达维斯岛以后立即同流亡伦敦的舒巴希奇博士领导的王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寻求合作的某种途径。我们达成协议，舒巴希奇政府承认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承认它有权在国内行使政府的全部职权，而我们也同重舒巴希奇政府在征得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完全同意后执行外交方面的职责。

同志们，下面就是全国委员会同舒巴希奇博士的政府之间达

成的协议的本文：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同王国政府首相达成如下协议，

1. 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应当由一些没有在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中败坏名声的进步民主分子组成。这个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支援人民解放军，支援今后将和我们一样坚决反对祖国的共同敌人的一切人们，但要把一切力量都联合在一个人民阵线中。这个政府也有义务努力解决南斯拉夫居民的粮食供应，并且还使它驻外国的代表机构的工作和在盟国委员会中的工作同捍卫我国人民权利的工作、同人民的需要以及国内的人民解放斗争相一致。

2.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舒巴希奇博士先生的王国政府将成立一个协调对敌斗争中合作的机构，这将有助于尽快地建立国家统一代表机构。

3.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提出和强调国王和君主制度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今天并不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舒巴希奇博士先生的政府之间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双方都同意，国家制度问题将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人民来作出最后的决定。

4. 舒巴希奇博士先生的政府将发表如下内容的声明，

(1) 承认南斯拉夫人民在他们三年的斗争过程中取得的民族和民主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我国的民主联邦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且通过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组织及其执行机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对国家实行临时的管理；

(2) 完全承认在南斯拉夫元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中所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惩办一切公开或隐蔽地同敌人合作的人民叛徒；

(3)向全体人民发出号召,要求一切武装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结成一条统一战线。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南斯拉夫元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将宣布同舒巴希奇博士先生的政府合作,并且重申,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将不提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问题。

这项协议的内容将在舒巴希奇博士先生组织政府时宣布。

1944年6月16日于南斯拉夫自由区。”

由于盟国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个协议,因为盟国把这作为承认南斯拉夫出现的新形势的条件。这种新形势在战争中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民解放运动战胜为占领者效劳的卖国反动势力——德·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和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匪帮以及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的奈迪奇和鲁普尼克的事实已日益明显了。

舒巴希奇博士的政府和全国委员会都根据协议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舒巴希奇博士的政府发表声明如下:

“王国政府认为,王国政府的成立反映了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和抵抗敌人的斗争中所表达的愿望,同时也是克服所犯的 error 和清除有碍于维护和加强我们同伟大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各种阻碍的前提。

王国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将考虑到这些事实,并且将全部履行1944年6月16日王国政府首相伊万·舒巴希奇博士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解放

区所签署的协议。

王国政府在着手改善我们国内外局势时，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向死于抗敌斗争的数十万牺牲者表示哀悼。

同时王国政府承认全民的抵抗运动，这个运动的最高代表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在三年来的斗争中取得和保持了宝贵的民族成果和民主成果。

政府承认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临时管理机构，认为在国家的统一代表机构建立之前，这个临时管理机构对于保持国内安定和秩序以及对于动员人民支援解放军战士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敌人和他们的帮凶在我国所犯的一切罪行，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要审判所有那些在我国任何地区公开地或暗地里同敌人合作的人，因为他们犯下了背叛人民和人民的神圣事业的极严重的罪行。他们将作为叛徒送交人民法庭审判。王国政府作为南斯拉夫王国在盟国的合法代表，负有下列双重职责：一是共同作战并达到共同的战争目的；二是执行各项任务，以使我们国家共同体今后在实现和保障未来的和平方面能够成为发挥应有作用的因素。

因此，王国政府将努力使南斯拉夫国家的战争与和平政策的发展符合我们伟大的盟国和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的政策。

政府尤其要努力团结和联合国内的一切民主力量，以便从敌人和他们的帮凶手中尽快地获得解放。

政府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团结在铁托元帅领导的斗争的统一战线中，以便尽快地战胜敌人和着手恢复国家的和平的和有成效的工作。政府将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愿

组成的未来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国内和平。

政府将竭尽全力更好地组织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国内全体居民的供应工作。

政府将特别关心在盟国的有关机构和组织的配合和协助下，为战后我国的重建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政府坚决主张，根据既定的战争目的，解放我国人民所居住的、而至今仍未成为南斯拉夫组成部分的一切地区，并且把这些地区并入南斯拉夫，同时保障这样一个南斯拉夫享有充分的国家独立和主权。

王国政府认为，现在应当把有关国内政策的其他一切问题放在一边，并且认为全体南斯拉夫公民都必须从事纪律严明的工作，以利于我国在同我们的盟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充分配合下战胜敌人。

1944年8月8日于伦敦。”

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如下：

“人民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反抗占领者的时候起，就力求实现一切人民力量的团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始终认为，从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的枷锁下解放我国的事业，高于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其他一切利益。因此，在反抗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浴血斗争的最紧要关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以求把热爱人民和热爱人民自由的人们都联合在一个人民解放统一战线中。这些努力获得了成功。包括南斯拉夫绝大部分人口的人民解放统一战线，成了武装反抗占领者，发展游击队和发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全民的政治基础。

两年半以来，南斯拉夫真正的武装力量不能不愤慨地看到，历届流亡政府都没有帮助南斯拉夫人民为争取自己国家的自由而进行的非凡斗争，而是对人民解放运动采取顽固的敌对态度，并且通过自己的大臣德·米哈伊洛维奇站在占领者一边，武装反对自己的人民。在1943年11月29日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代表在自己的决议中谴责了历届流亡政府的这种背叛行为，并且为了表达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愿望，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历史性决议。

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全民的、民族的和民主的运动。因此，我们再一次着重指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反对占领者和他们的走狗，建立民主的联邦制的南斯拉夫，而不是象敌人诬蔑我们的那样要建立共产主义（注：作这样的声明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其次，正如在1943年11月29日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在这场艰苦的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可以根据民主原则自由地确定内部制度的形式，我们反对认为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会用武力阻止人民充分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任何想法，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最优秀的组成部分。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认为普里奇政府和军事大臣德·米哈伊洛维奇的下台是一件好事，并且宣布愿意同这个流亡国外的、确实抱有帮助反对占领者的全民斗争的目的的政府实行合作。

6月16日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以王国政府代表伊万·舒巴希奇博士为一方，以我领导的南斯拉夫解放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为另一方举行了会议，商谈了合作的可能性和方式，就许多问题达成

了协议。协议的内容已经公布。这一协议的目的是：加强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抗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浴血战争中争取解放的力量；动员一切至今尚在袖手旁观的人们参加这个斗争；收集尽可能多的物资来支援我们的前方战士和后方人民；不允许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样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叛徒利用合法政府的威信来掩盖自己的背叛行为；进一步巩固我们的解放斗争同盟国反对希特勒的整个战线之间的联系，更多地支援盟国为消灭人类的大敌而作的努力。

协议维护了我国各族人民三年多来在反对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民族方面和民主方面的全部成果。由于有了这些成果，我国各族人民也就有了今后不再发生任何违背他们的意志的事情的保证。同伦敦流亡政府首相伊万·舒巴希奇博士达成的协议，恰恰是我国各族人民战胜占领者及其帮凶的结果。无论奈迪奇和帕韦利奇还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各种公开的和隐蔽得并不巧妙的阴谋家们，都从占领者那里领取武器，用以反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因此，协议也是在彻底粉碎这些阴谋家的卑鄙的罪恶阴谋方面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毫无疑问，这个协议对于加强我国各族人民在他们反对占领者及其帮凶的艰苦斗争中的团结，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对于那些仍然旁观和动摇的人们来说，这个协议是最后一次号召，呼吁他们参加人民解放运动，并且履行自己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负的职责。

对于在奈迪奇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手下为占领者服务并且反对本国人民的一切受骗的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个协议是一次最后的响亮号召，呼吁他们参加人民解放军。

对于三年来站在占领者一边反对本国人民，反对我国各族人民的盟国，从而使自己的克罗地亚祖国蒙受巨大耻辱的一切克罗地亚人，尤其是卫乡队和正规军来说，这个协议是最后的响亮号召，希望他们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这也适用于由卖国贼鲁普尼克组织起来支持德国占领者反对本国人民的斯洛文尼亚卫乡队。

在人民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刻，谁也不能以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袖手旁观甚至为敌人效劳的人既不能以党派为借口也不能用其他的借口替自己辩护。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阵线相当广泛，凡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并且真正愿意拿起武器为人民的自由而战的人，都可以在这个阵线中各得其所。

最后，我们强调指出，我们的盟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对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物质援助，是非常宝贵和有效的，我们对这种援助表示感谢。我们希望盟国今后仍然给予我们一切可能的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在彻底战胜万恶的占领者的共同斗争中能够作出最大的贡献。

1944年8月17日”

由于西方盟国再三要求，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个协议。它们想用自己的力量把国王再次强加给我们，也就是想把威信扫地的旧君主制度，连同君主制度的一切渣滓即最坏的反动分子强加给我们。国王是某种特洛伊木马，通过它来悄悄地恢复旧制度，如果那样的话，人民就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来争取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同意这个协议，是因为我们了解自己的力量，并且知道绝大部分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只要有必要，他们总是

会支持我们的。此外，我们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它的威力是我们的敌人意料不到的，而国王和他的政府却一无所有，因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不仅因为他是占领者的帮凶而威信扫地，而且已被我们的部队所粉碎。因此，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接受了这个协议，因为它丝毫不能损害我们，只要我们做得对，我们还可以利用它。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舒巴希奇博士的政府到达 贝尔格莱德和成立联合政府

在建立新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必然严肃地考虑到，这个国家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应该是新的国家。既然我们把新南斯拉夫称作完全不同于旧南斯拉夫的新型国家，那么只进行某些改革——社会、政治和民族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在我国着手进行深刻的变革，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变革，以便使我们国家能够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新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不想半途而废，不想在废除了国王、推翻了君主制并取得了政权之后，同那些继续剥削南斯拉夫劳动群众的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分享政权。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民都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我们决定勇敢地走上完全消灭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在解放斗争过程中已经为这一工作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凡是成为主人的地方，我们都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我们解散了宪兵和警察，废除了区、县和市等管理机构。我们建立了新的人民的政权机关和保安机关。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全

南斯拉夫境内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其次，我们在解放斗争过程中锤炼了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它不仅与旧南斯拉夫军队有质的区别，而且决心为人民服务，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在战争中受到锻炼的，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工农子弟，其余则是来自正直的人民知识分子队伍。我国军队的指挥员有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我党在战争中或在战前培育的。今天，有八万五千名共产党员（不算青年团员）在我国的军队中工作，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和伟大的解放斗争的成果他们不断提高自己和新一代战士的军事素养。

同所有其他走上新型民主即人民民主道路的国家相比，这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具有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正因为这样，新南斯拉夫才能在战后立即被称为新型民主——真正人民民主的国家；正因为这样，新南斯拉夫在战后才能立即走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民早在战争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旧的社会制度不好，它已经过时了，需要建立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在斗争过程中锤炼出工人阶级、绝大多数贫农和中农以及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团结。正因为这样，才能在反对占领者的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给予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代表以决定性的打击；正因为这样，战后才没有必要用筑街垒的办法再来解决政权问题，因为人民已经把政权当作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解放斗争的最重要成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志们，¹由于我们在战争过程中已经为建立新型国家来代替旧国家的工作创造了主要的前提并指出了明确的前景，所以我们

在联合政府时期，不能对政府中的那些实际上代表被推翻的君主制度、资产阶级及其外国庇护者（即国际反动派）的利益的人作任何让步。在联合政府存在的期间，即只要舒巴希奇、舒特伊和格罗尔还留在政府中，西方盟国就会对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有人要求我们对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作出不能容忍的让步，一再要求享有西方民主式的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实际上将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南斯拉夫挑起内战，从而使国家重新陷入混乱和贫穷。这是企图威胁解放斗争的成果，企图威胁这些成果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企图阻挠新南斯拉夫的建立。

我们在这一场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于是舒巴希奇、格罗尔和舒特伊就不得不辞职。在某些西方盟国施加压力的时期，苏联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充分的支持。

此外，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场斗争的考验和反动派的这一最后的严重挑战，尤其是因为有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作我们的后盾。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力量，在目前和平时期，在新制度还是旧制度得胜的问题上，象在战时在我国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一样，表现得既团结又坚定。我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广泛的政治组织——人民阵线，在1945年11月11日的大选中表达了他们保卫人民解放斗争成果的决心，在这次大选中，百分之九十六的选民投票拥护新南斯拉夫，从而对一切想借助外部力量来重新骑在我国人民头上的反动分子给予了最后的坚定的回答：“不”！

因此，1945年3月8日根据外国的建议成立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符合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团结一致的政府。这只不过是新南斯拉夫内部整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我

们的国内外敌人对“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抱有幻想。可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种幻想。我们清楚地知道,整个事态的结局将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不利于我们的敌人,不利于我国各族人民的敌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同舒巴希奇的合作,同格罗尔的合作,还是同舒特伊的合作,都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必须迅速地走上自己明确规定的道路,而他们之所以被派到政府里来,是为了阻碍我们走这条道路。结果我们没有搞错。格罗尔由于确信留在政府中无法阻碍我们前进,便于1945年8月20日提出了辞职。当然,就是他一个人离开了,并没有出什么事。他走了之后,过了两个月,舒巴希奇和舒特伊也提出了辞职,还是没有出什么事。

他们是在立宪议会的选举前夕在外国的压力下这样做的。当时国内和国际的一切反动派用种种谎言来破坏我们国家的秩序,想使选举无法进行。这是企图引起西方列强所谓干涉的最后一次重大的阴谋,但是它也没有得逞。象以前格罗尔离开一样,也只不过是舒巴希奇和舒特伊离开了,人民政权依然屹立,并大踏步地向前迈进。的确,我们的敌人不了解我国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件和变化,不了解我国各族人民对过去一切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因而拟定了各种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当然注定是要落空的。

这些人退出政府之后,政治形势就比较明朗了。这样,反动派又一次道到了失败,他们不得不看到,在我们这里再不会有任何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即人民政权绝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他们相信,跟在他们后面走的,只是城乡一小撮反动分子,而跟我们走的,则是全体劳动人民。

1945年11月29日,人民代表机构在立宪议会上宣布成立南

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时决定在南斯拉夫彻底废除以彼得二世卡拉卓尔杰维奇和整个卡拉卓尔杰维奇王朝为代表的君主制。

由于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大厦的建设终于完成了，并为实现我国的全面经济改造创造了条件。

同志们，1946年1月31日立宪议会通过的宪法，在法律上肯定了我国解放斗争的成果，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权利，规定了我国公民的真正民主的权利。

我们就拿宪法第一条为例吧，这一条规定：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形式的联邦人民国家，是各平等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在自决权，包括分离权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愿意在一个联邦国家中共同生活的意志。”

请看，民族平等在我国就是这样解决的，就是这样在法律上加以肯定并在实践中彻底付诸实现的。

其次，我们在宪法中和实践中又是怎样解决政权问题的呢？

第六条中规定：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全部权力来自人民并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自由选出的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人民委员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些委员会从地方人民委员会到各人民共和国的议会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都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是这一斗争的主要成果。”

可见，宪法只是确认了，即在法律上肯定了战争过程中已经争得的东西——人民政权、真正人民民主的政权，这同时也是我国向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一发展今天已经达到

了如此的地步,以致我们不得不首先部分地修改我们的宪法,特别是关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第四章。

我们早在1945年秋就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对解放战争中的军属进行迁移。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交通还处于破坏状态。我们把近六万户军属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利卡、科尔敦、达尔马提亚、黑山、扎果列、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地迁往伏伊伏丁那、巴契卡和斯拉沃尼亚。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它要求新的国家机关、党员和人民阵线的成员作出最大的努力。国家拨给这些移民四十五万多公顷的土地以及住房和牲畜,此外,我们还必须关心供应他们种籽,帮助他们耕种土地。

我们的另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说,要彻底解决旧南斯拉夫存在的二十四年当中一直是历届政府玩弄种种花招的对象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

“耕者有其田。法律规定不从事农业的单位和个人是否可以拥有土地和可以拥有多少土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私人不得拥有大量的地产。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由法律规定。国家通过一般的经济政策、低息贷款和税收制度,对贫农和中农予以特别保护和扶助。”

我们在这方面通过的法律,证明我们是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办事。例如,土地改革法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没收了大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并把它分给农民或者用来建立国营农场,而且没收了富农超过三十公顷的土地并把它分给贫农。同样也没收了教堂的土地,只留给它们最多不超过十公顷的土地,但是,这些留给教堂的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拨农民所削减。

这样就给予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富农第一次十分严重的打击，同时帮助了贫农。因此，这已经十分有力地证明，在我国农村也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贫农和中农的利益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来排挤资本主义。

当然，我国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曾幻想，甚至人民阵线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曾幻想，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已经消除了农村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危险。不，在这方面我们在推行各项农村措施中，如收购粮食、羊毛等，在富农对这些措施的各种反抗中，已经有了不少的实践经验。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说过：“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投机小贩和奸商进行投机活动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①

难道这一段话不是完全适用于我国吗？当然是，因为从我国农村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段话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正因为我们学习了列宁的著作，我们懂得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过去采取了，而且还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制止农村中这类搞投机和诈骗的资本主义分子，不让他们阻碍国家各种措施的实施，不让他们阻碍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壮大，不让他们威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采取的第三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就是对所有矿山、工厂企业、交通运输等等实行国有化。不久以前，决定对第一个有关国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89页。

化的法律所没有包括的东西继续实行国有化，例如：其他工业企业、各种印刷所、大仓库和贮藏室、旅馆、疗养院等等。这样，在我国，不仅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即掌握在人民手中，成了人民的财产；而且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一切基本设施（它们过去是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也成了人民的财产。

实行了这样彻底的国有化和使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掌握之后，我们就能够过渡到计划经济，就能制定我国工业化和电气化的五年计划。这一切使得我们只能到1947年才开始执行上述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的国家完全改观，使它变成幸福和富足的国家。

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基本因素是什么：

1. 代替旧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出现的国家政权，从最低级的村委员会到最高级的国家机关——联邦和共和国的议会、联邦和共和国的政府，都是真正人民的政权。这一政权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而为它是由人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如果它不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人民可以罢免它。

2. 军队是崭新的人民的军队，它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和平发展，保卫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争得的果实。

3. 国家保安机关、民警机关、国家保安局等等，都是人民政权机关，其任务就是警惕地保卫和关注国家和公民的安全，特别是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破坏我国的和平发展和我国各族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热情的种种阴谋。这些机关的任务是不让任何敌人以任何方式来损害我们的国家。

由此可见，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国家机关，这是我们继续

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为这一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4. 实现了彻底的国有化,从而使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即劳动者的手中。

这样,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立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即经济条件。

5. 在反对占领者和南斯拉夫旧社会制度体现者的共同斗争中,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常活动中,团结在人民阵线中的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切基本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团结在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为领导、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阵线中的绝大多数人民的事业。

同志们,这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解放之后马上就完成了从第一个任务中产生的第二个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完成了组织新南斯拉夫国家的工作,它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建立在联邦原则上的、实现南斯拉夫各民族完全平等的、真正人民民主的国家。

现在应该毫不犹豫地着手执行第三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恢复国家的任务。正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南斯拉夫人民阵线这一有组织的力量,我们党才能够满怀必胜的信念去解决这一任务。人民阵线中包括作为先导者的整个工人阶级,包括我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包括我国的青年、我国的妇女、我国的人民知识分子和爱国的公民;没有这样的人民阵线,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期限里修复我国的交通,恢复和建设我国被毁坏的农村,局部地恢复我国的城市,恢复我国的工厂和其他企业并开工生产(在这里我国工

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勤劳勇敢的好榜样)；没有人民阵线，我们就不能在最初的几年里立即播种，并保证供应居民食品，等等。

在这方面，在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中，正象在战争年代一样，我国各族人民，即我国工人、我国光荣的青年、我国妇女、我国人民知识分子、我国男女劳动农民以及所有团结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中的人，都表现了坚定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成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巨大的工作母机。

我们以空前的速度修筑了新的桥梁和铁路，恢复了交通；而没有交通，就不可能有任何更大的行动。工人和专家的灵巧双手，迅速地修复工厂，并开始生产，为我国城乡人民提供了第一批最急需的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的速度修建被烧毁和破坏的农村，清理城市，重建家园等等；恢复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耕种我国的每一块土地。但是，这种巨大的建设热情使我们能完成更多的新的重大任务。我国光荣的青年，在劳动热情的鼓舞下，要求并接受了修筑布尔契科—巴诺维契、沙马茨—萨拉热窝铁路线的任务。这两项巨大的工程，被我国青年在空前短暂的期限内完成了。这是向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新南斯拉夫的第一批不可估价的献礼。我国人民不仅要求进行恢复工作，而且要求接受新的任务，并且满腔热情地完成这些任务。

正是我国人民、我国工人、我国青年、参加人民阵线的我国劳动农民、我国人民知识分子的这种空前的建设热情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决心在恢复的过程中采取重大的行动——实现我国工业化和电力化的五年计划。事实表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战争结束两年之后就着手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没有搞错。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执行情况表明，我国各族人民的干劲是无穷无尽的，他们意识

到这一行动对于我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我国工人在三年的期间里大大地提高了产量，降低了生产费用。我国的青年献给了国家许多宝贵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热列兹尼克工具工厂。今天，他们正在建设新贝尔格莱德，修筑公路和其他许多工程。我国人民阵线的成员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劳动任务，修建合作社的房屋、道路、各种住宅，并为社会做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同志们，我只是粗略地提到我国经济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是其他同志报告的题目。我只是想在这里着重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实现五年计划的可能性悲观失望。我想强调指出，当我们决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我们并没有犯错误，因为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目前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就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看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创造热情，看到了我国蕴藏着尚未开发的资源时，我们就满怀必胜的信心，决定着手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第四项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活将比今天更幸福、更富足和更文明。

同志们，在我的报告的最后部分，我觉得有必要哪怕是简短地谈一谈情报局的决议，谈一谈对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的骇人听闻的指责，同时也谈一谈四面八方对我们国家的疯狂攻击和污辱，而且这些攻击和污辱恰恰来自我们过去最想不到会这样做的那些人。

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今天突然犯了什么错误，以致给我们扣

上这么多无中生有的罪名？（这些罪名，不但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而且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知道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的国家今天突然犯了些什么错误，以致对它发起了这样猛烈的攻击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可以对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对我们的国家和它的人民采取这样的态度吗？难道那些同我们不仅曾保持正常的关系，而且曾保持友好的结盟关系的国家，仅仅由于情报局决议提出了指责（即使这些指责是正确的），就可以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进行如此恶毒的诽谤吗？

同志们，这不仅是对我们党的领导的攻击，这是对我们党的团结的攻击，这是对我国各族人民鲜血凝成的团结的攻击，这是在号召一切破坏分子起来摧毁我们为了造福我国各族人民迄今已建设起来的一切东西，这是在号召挑起内战，这是在号召消灭我们的国家。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指责我们背离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责我们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下面，我只对这三个罪名进行答复。

首先，在我国战后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处处都表明同苏联的对外政策完全一致，因为这一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的这种立场是举世皆知的，因为我们在国际会议的许多讲话和在国内的许多讲话中都谈到或表述了这种立场。我们的这种立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忠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并同它们团结一致的立场——不仅见诸于言论，而且见诸于行动；而这一点，不仅我国的每一个公民，而且我们在

全世界的朋友和敌人都是十分清楚的。

我国解放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正是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尽可能紧密的联系。缔结友好互助条约，进行全面合作，签订各种经济和其他合同——这一切都是我们倡议的，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正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巩固和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民主制的最正确的道路。至于阿尔巴尼亚，我们同它缔结互助、友好和全面合作的条约，正是为了帮助它保卫自己的独立。我们同它签订了经济协定，这些协定基本上是使南斯拉夫吃亏的，但是我们还是签订了，因为我们希望阿尔巴尼亚今后不再成为那些企图剥削和威胁它的独立的人们手中的武器。为此，我们在它感到最迫切需要的时候，给了它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从战后最初的时日起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我们迄今仍然信守自己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义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有必要同其他国家合作，因为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巩固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遭到如此惨重损失的南斯拉夫是有利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越过我们严格遵守的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我们的朋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原则界限。同时我必须强调指出，我国对外政策同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政策中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南斯拉夫才遭到国际反动派的最恶毒的诽谤和攻击。我们的这种立场，不仅为我国的每一个公民所了解，而且为全世界所了解。因此，今天指责我们离

开了民主阵线,这是对我们,即对我们国家的极端不公正的态度。

其次,今天攻击我们的那些人,也正是我们过去曾给予最大援助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只要稍微还有一点正义感,就不会作出这种无中生有的、骇人听闻的诽谤,如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即不再是国际主义者云云。我们勾消了兄弟的保加利亚共和国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赔款,我们不要求归还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从南斯拉夫抢走的大量国民财富,并且既往不咎,向保加利亚人民伸出了兄弟之手,难道这是民族主义?不,世界上谁也不会说这是民族主义。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是某种深刻的国际主义的东西,是人道主义的东西,是舍己为人的东西,其目的是希望以南斯拉夫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牺牲,以我国人民今天对保加利亚所作的这种物质牺牲,来证明他们不计较过去所受到的各种苦难,不仅向保加利亚人民伸出兄弟之手,而且给予物质支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不断地解释这种兄弟般的和宽容的政策,可是今天他们竟受到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如此无耻的诽谤和污蔑。

再其次,大家知道,我们在1946年遭到了严重的干旱,收成不好,但是我们突然接到了罗马尼亚同志的请求,在他们的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运去了两万吨粮食,而当时我们的居民的粮食供应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也没有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归还,而把粮食送去了,并等了两年,希望他们有了好的收成就会开始归还我们。这些粮食是我们党的领导即我国政府在牺牲我国劳动人民利益的情况下提供的,但是我国劳动人民是很愿意向那些更需要粮食的人提供粮食的。难道这是民族主义?不,这是行动上的国际主义,而不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

我们在1947年对波兰，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也这样做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十五万吨粮食，虽然那一年我国人民几乎处在饥饿之中。我们之所以提供粮食，是因为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请求，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困难。

可是，这些国家的代表今天在情报局会议上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决议上签了字，而这个决议装出一副假慈悲的面孔，指责我们在我国居民的粮食供应方面采取错误的政策。他们谈到我们实行的某种粮食税等等，这也是欺骗外国人的一种惯用手法，因为在我国谁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粮食税，在我国根本没有实行过粮食税。他们利用了由于我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种种困难，来污蔑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委员会。这些在决议上签字的人不愿看到，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期里，也就是在战后三年的时期里，克服所有的困难。况且他们在克服困难方面比我们还要差，虽然他们的困难比我们要小得多。因此，他们是在恶意地把毫无根据的事情硬扣到我们头上。他们忘记了，在1921—1922年，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导也曾不得不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苏联在居民的食品供应方面存在着困难，而且1929年苏联在这方面又出现过严重的困难。那么为什么突然就不承认我们面临的困难呢？所有这些在决议上签字的人这样做是不是太不诚实了呢？另一方面，我们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援助，难道不是国际主义，难道不是那种不是靠花言巧语，而是在实际上、行动上的国际主义？难道今天无中生有地、不公正地攻击我们的那些人不想一想，有朝一日他们的人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时，他们不脸红吗？

在这些人看来，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我们为我们在战争中的牺

性而自豪，就是我们为我们在国家建设中的成就而自豪，就是我们为我国的工人、我国的青年、我国的人民阵线而自豪，就是我们为那些确实使全世界正直人士感到钦佩的一切而自豪。他们把这些看成是民族主义。不，这决不是民族主义！这是谁也不能反驳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确实可以为这些事实引为自豪。难道我们仅仅因为情报局决议中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就可以推翻一切事实并承认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们当然不能把说明在我国存在着的和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的情况的事实说成不是事实，而把决议中写的东西说成是真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情报局决议这样写而且别人签了字就承认这些东西。这些签字的人根本没有考虑到客观真理。可是这些人是十分清楚什么是客观真理和什么是主观真理的。他们不仅把自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的态度，而且把自己对整个南斯拉夫采取的态度，也就是对那些说明客观真理的事实采取的态度，统统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恰巧相反，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际上这起码是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最不诚实和最不客观的态度。这是严重谬误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闹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以便这样来毁坏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的威信，以便这样来抹煞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英勇斗争中获得的荣誉，以便这样来践踏我国各族人民用严重的流血牺牲而换取的一切伟大成果，以便这样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西党的团结正是在我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使我国人民过更幸福的生活的保证。

同志们，我不打算在这里同情情报局的决议作很多的辩论，因为其中充满了谎言。这一点是我国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的，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我国的每一个

人都知道，我们这里并没有滋生资本主义，而是相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以相当快的速度进行着。不但我国，而且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战后时期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不仅每一个党员而且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清楚地了解我们党的合法地位，这一地位是我们党拿起武器在反对占领者和反对那些在1921年迫使党处于非法地位的人的伟大解放战争中赢得的。

同志们，谁都不难发现情报局决议的词句矛盾百出。一方面指责我们是机会主义者，说我们允许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滋长，说我们把全体农民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说我们沿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前进，也就是说，我们把新南斯拉夫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等等；另一方面，又指责我们对农民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就象这些大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今天所说的那样。总之，他们捏造出种种罪名，就是想在已经无法再使他们的群众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的时候，在这些群众中制造更大的混乱。其次，他们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太快了，说我们一夜之间就通过条例和法令，等等。由此可见，他们把米兰·格罗尔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曾指责过我们的东西，统统搬来指责我们。

这个决议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指责我们向群众隐瞒苏联共产党(布)对我党领导的批评，说我们害怕群众。不，我们并不害怕发表这些东西，而是害怕这样做会激起人们对那些无理指责我们的人的更大愤慨。在决议上签字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发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给我们的来信，因为信上注有“绝密”的字样。可见现在这些在决议上签字的人竟把这一点当作我们的罪过。

同志们，如果说，这些攻击我们的人要想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

级面前诋毁我们，污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党，那么他们只是部分地得逞，而且是不能持久的。真理必将得胜，因为这个真理包含着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不能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长期隐瞒的。其实，参与捏造这个决议所捏造的种种罪名的人所代表的多数国家，战后时期的发展要比南斯拉夫慢得多。这些批评家回过头去批评自己，批评自己的工作，岂不是更聪明些吗？因为他们所犯的种种错误和缺点多得不胜枚举。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需要诋毁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同志们，现在四而八方都有人想给我们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ABC，可是这些教员是在无的放矢，他们摘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语句，却不看一看，我们早已实际运用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运用着这些原理。他们现在否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党，到底依据什么科学才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呢？我们在1941年站在苏联一边投入了殊死的战斗，到底是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呢还是由于我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那个在苏联已经和正在付诸实践的理论？逻辑表明，我们之所以投入战斗，是因为我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中起巨大的作用，它之所以能顺利地克服种种困难，正是因为我们在最艰苦的形势下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善于以这一学说为指针。由此可见，只有在我们的党这样久经锻炼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精通社会发展规律的党，才能够实现我们党的这样的团结，才能够建立起象我们党这样的光荣的党，才能

够解决我们已经解决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建立我们在南斯拉夫所建立的这样的人民团结和兄弟情谊，才能够最艰苦的条件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才能够建设我们在战后所建设的一切，才能够着手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当我们做了而且切实地做到了这一切之后，有人不承认我们是走上了实现这些任务的某种新道路，这就等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为教条，宣布为某种即使出现新条件也不再会有发展的东西。这是非辩证的观点。我们在这方面则坚持列宁的学说，列宁引证恩格斯的话说：“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指马克思——铁托注）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接着说：“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接着，列宁又说道：“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客观形势，改变了密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2、25页。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和这样教导我们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想强迫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死死地守着某些信条。

同志们，至于谈到迄今我们党的工作中是否有错误，当然在我们党里谁也不会断然地说，不曾有过错误。大家知道，我们自己不仅在党内，而且在我国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地、无情地批判我们的错误。我们从来没有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错误过去有，而且今后也许一直还会有，不过我们努力而且一定要努力使我们党尽量少犯错误。我们天天揭露错误，并且努力改正错误。我们有时改正得快些，有时纠正得慢些，但是这是同别人对我们的污蔑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看得见，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群众看得见，因为这些错误是同我国日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错误常常敲我们一棒子，因为我们有时没有揭露它们，没有及时发现它们。但是，有哪个党能够不犯错误呢？这样的党是没有的，在工作中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也是没有的。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我国情况不了解。这些批评家、这些在决议上签字的人只要读一读我们的任何一篇讲话或文章，马上就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指责是信口开河。正因为我们了解到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才能建立起象我们现在这样的坚如磐石的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在自己的实践中取得了继联共(布)之后的最大成就。

同志们，由于情报局决议揭出了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国外掀起了反对我们党和我们整个国家的诽谤运动，我们的党处于严重的考验中，处于党的历史上最严重的考验之中。除了联共(布)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而不会象

纸糊的东西一样立即被毁灭。当然，这样重大的考验也会从我们党内清洗掉那些不配在我们这样久经锻炼的共产党中的人。他们是以伪装的面孔隐藏在党内的个别动摇分子、不健康分子和敌对分子，如朱约维奇和赫布朗之流。这些人总是在党的最困难的时刻抬头，以各种方式来公开反对党，以为现在时机已到。这些人通常会从革命的大车上掉下来，而且今后不可避免地会掉下来，因为他们不仅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来说是有害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今后发展也是有害的。在这方而，我们要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教导的那样，采取毫不留情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同志们，我力求在自己的这个比较长的报告中使我们的年轻的干部更多地了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发展和工作，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能够说明我们党的团结对党取得各项成就起多么大的作用，那么，我的收获就已经不小了，因为只有消灭派别活动和建立我们党的坚不可摧的团结，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在1941年领导受奴役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中领导斗争，直到战胜占领者和卖国贼。这种团结是一切胜利的保证，这些胜利在我国国境之外也具有历史意义。但是这种团结并不是其他的政党、甚至法西斯政党能实现的一般的团结。这不是为团结而团结，不是为神的世界而团结，不是为了某种作为自我目的的纪律而实现团结。不，这是革命政党的革命团结，它使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够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因此，我们必须维护我们党的团结，防止一切对这种团结的危害，因为党的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

今天，我们党再一次面临着各种隐藏的反党分子的严重威胁，这些反党分子响应情报局的号召，纷纷抬头，威胁党的团结。不

过,这一次这些反党分子不仅威胁党的团结,而且威胁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一切企图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和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企图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我们党的团结是同我国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所以,同志们,我们将以无情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党内的偏差,保卫党的团结和纯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发扬共产党人的基本特点——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它当作共产党人在日常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最后,同志们,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将竭尽全力使我们党同联共(布)的关系重新得到改善。我们希望,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脚踏实地地证明决议中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我们认为只有在这种场合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弄清真相。

同志们,在结束我的报告时,我要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至今一直无愧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深信,它今后一定也会无愧地取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将以自己的坚定的立场和团结一致,以自己_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切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没有离开这一科学的道路。

(译自《铁托言论集》1959年塞文版第3卷)

我国社会变革的意义 和科学在建设中的作用

1948年11月11日在塞尔维亚科学院的讲话

院长同志,院士同志们:

在接受你们授予我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这一崇高荣誉的决定时,我对你们给我的这种高度赞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授予我这个称号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意义,是由于这样做恰恰是在从各方面对我和我的同志们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的时候。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的工作的赞扬,而且也是对我是其中一员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赞扬和信任。我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高度赞扬以及今天我所得到的其他赞扬,不仅是、也不能仅仅是由于我的个人的功劳。因为我认为,我的功劳就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你们的决定同时也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国科学界不但理解而且赞同我国所进行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他们也赞同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个事实是对我和所有其他同志,对我们这些现在和将来都忠实地为我国各族人民服务以创造他们的幸福未来的人们的最高奖赏和赞扬。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我国社会变革的意义和科学在这些变革中的作用。

当谈到我国社会改造时,我指的是,这种社会变革是通过革命道路进行的,完成这些变革是不容易的,不是没有牺牲和痛苦的。我国各族人民的胜利的解放斗争和在同一时间里推翻旧的、无能的政权(说得确切些是制度),是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为首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这个最先进阶级进行顽强斗争的事业。

这一事业早在战前就已开始。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曾为争取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而斗争了二十多年。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牺牲。在我国革命改造的准备工作中凝结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最优秀儿女的鲜血和苦难。南斯拉夫共产党曾处于地下状态的这场漫长斗争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单独地,在远离我们的盟国的情况下,在希特勒欧洲的堡垒中进行解放战争,进行殊死的战争。长达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通过革命的道路摧毁、或者更确切地说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并为新的社会制度打下了基础。如果象某些方面对我们指责的那样,认为我们贬低苏联在我们这一解放斗争中的巨大作用,那就完全错了。不,我们没有贬低在反对希特勒联盟的战争中挑起最重担子的苏联的这种作用,而是相反,我们认为,苏联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就是把世界从可怕的悲剧中拯救了出来,使世界上的许多人民,包括我们的人民,免受奴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要成为公正和客观的人,那就应该也承认我国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也作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这是根据我们的最大可能性作出的一份丰富的贡献。谁也不能向我们要求比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为盟国的共同事业而作出的和牺牲的更多的东西。要是我们没有从1941年开始在我国进行斗争,坚持下来,并建立了新南斯拉夫,那么今天在南斯拉夫和邻近国家的形势

会是怎样呢？我认为不难想象谁在这里统治，这对邻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任何关于谁为解放我国做得多、谁做得少的叫卖，都是荒谬的。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在1941年就已有了解放区并在解放区里有了人民政权。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不断地扩大了解放区，并在那里巩固了人民政权，尽管在我国有为数众多的占领军和伪军。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觉悟，证明了我国革命的生命力和力量。这使我们有可能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就已为新的人民南斯拉夫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在我国解决了政权问题，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但是，认为我们这里的革命过程已经完全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不，我们这里的革命过程还没有结束，所完成的仅仅是主要的东西：夺取了政权，为我国胜利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切条件。

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对革命的理解不正确。一些人认为，在我国什么事都已经完成了，和平时期已到来，在这个时期里，一切都按部就班，在这个时期里就应当充分地享福等。这些人希望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真心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不够耐心，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一建设中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些变革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不理解这一切在时间上的延续既受到主观的、也受到客观的许多因素的制约。另外一些人则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暂时的，会由于某种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情况而复旧。旧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这是众所周知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意味着人剥削人，意味着民族压迫，意味着贫困和一无所有。

为什么这些反动分子不理解我国的革命改造呢？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的概念被曲解了。他们把没有使社会关系的实质发生丝毫变化的任何一种对制度的暴力变革都称之为革命。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只有能带来新的和更高级形式的社会制度并废除那种阻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发展而不是使其向更高、更完善形式发展的过时的旧社会形态和形式的变革，才能称之为社会制度的革命或革命性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称之为革命性的，而其他一切都是一般的政变或者甚至是反革命。

各国人民通常在革命中认识了自己，了解自己的价值，了解自己的创造性力量。在革命中，各国人民变得年轻，得到改造，从萎靡不振中觉醒起来，并在自己的革命高潮中发展这种创造力，在短期内创造出过去旧社会所不能想象的业绩。因此，当旧的形式已显示出是行不通的，表现出是进步的障碍的时候，革命便是社会发展中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社会的进步力量是通过革命来建立更高级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

我国的反动资本主义分子不能理解革命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价值，他们认识到，为他们创立更美好的生活、更好的合理的社会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用自身的力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是由于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了解革命的力量，我们南斯拉夫的反动分子才期望甚至相信，有可能再次恢复旧制度，也就是有可能使历史车轮倒转。

卡尔·马克思说过，任何新社会制度的诞生都伴随着分娩的痛苦，而革命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这是天才的思想，它说明新的社会制度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萌芽）是在旧社会的卵翼之下

产生的。因此，旧的社会制度的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想要在发展中前进，而不是后退，这就是必然的事。

我已在前而说过，我们的革命时期还没有结束。只要我国的资本主义剥削分子还在进行反抗，还在阻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革命时期就将长久延续下去。只要这些资本主义分子还未完全被战胜，革命时期就将长久延续下去。我国的这一阶级斗争，每天都以各种形式在城市和农村进行着，因为资本主义分子进行着激烈的反抗，保卫自己尚存的阵地，尽管对他们来说这种保卫是完全无望的。这些反动分子残余还相信，他们的“黄金时代”将要再现。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不能理解我国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他们只看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看不到共同体的利益。

但是，我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在胜利地前进着，因为我们南斯拉夫有这样一种幸运：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多数已经现解到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幸福和福利，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旧制度好。这种觉悟已成熟到这种程度，以至我国的千百万劳动者正在自觉地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这种觉悟在我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中愈益广泛和深入。它表现在我们的工厂、矿山的每天的创举中，表现在我们青年的劳动中，表现在我们许许多多的农村中。因此，还以为能够从社会主义道路上倒退的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所有希望都是荒谬的。因此，某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关于南斯拉夫正在回到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荒诞的和愚蠢的。

为什么我国能够取得迄今的这么伟大的成就呢？

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我国工人、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及所有劳动公民有高度的觉悟,认识到我们在我国建设并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的某些盟友由于不了解我国人民,不了解他们的高度觉悟和创造能力,指责我们骄傲自大,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我们强调自己的成就和我国劳动群众的创造能力。

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它们是看得见和摸得到的,它们说明,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和将建成社会主义。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它们说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重要的是我们在建设什么,而不是怎样建设,即以什么方式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的这种方式显示出很好的结果,那么要求我们按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工作,显然是无稽之谈。要求我们半途而废,不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尽快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同样是无稽之谈。我们是以较快的速度还是以较慢的速度前进的问题,取决于我们的现实可能性和我们的策略。所有这一切不仅不损害任何人,而且只能有利于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进步运动。

我国的新社会制度是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之上的。在毫不偏离这一科学基础的同时,南斯拉夫按本国的特殊条件和可能性在建设并将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将根据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利益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建设中,科学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科学机构应同我国当前实际最紧密地联系起来。有一些人,特别是科学界人士,认为科学是某种自为的东西,它应当是中立的,除了“纯”科学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种人通常仇视任何社会变革,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变革妨

碍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与进步的概念相对立，它是违背这种科学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从属于个别人的利益，一小撮人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属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科学的成果用来维持自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以便进行剥削和发财。

但是，科学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帮助最先进的社会阶级，具体地说帮助工人阶级通过革命的途径完成过时的旧社会制度掘墓人的事业。

许多搞科学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要用自己的科学成果在革命的改造中帮助先进的力量。不管他们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这样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这样的科学家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他们个人的信念是旧的社会概念，他们害怕新事物，但却在自己的科学工作中寻求愈来愈新的道路，取得愈来愈新的成就。在资本主义的旧社会中，这些成就是不能取得的，即使这些或就能够取得，那正如我们前面已说过的，它们则是作为个别人或剥削集团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都服从于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家竟不惜毁坏多年科学研究的成就和成果；只要这有利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话。在所有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群众需要的国家里，都发生过、正在发生、今后还将要发生这种事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在我们国家里，在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里情况怎么样呢？在我们这里科学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仅仅是为我国所有劳动者创造尽量好的生活条件服务，以便把生活提到更高水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繁重的科学工作的果

实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有益于科学家所追求的目的——这就是以自己科学工作的成就造福于人类社会。

我应当表扬我们的许多科学家,可以说是表扬大多数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把全部力量都献给科学工作,以便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努力中作出自己的宝贵贡献。他们在自己的这一工作中,今天已为我国做出了巨大的宝贵的成果。所有愈来愈新的发明减轻了我们在从国外为我国的电气化和工业化取得各种物品方面遇到的困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国的大多数专家、科学家真正地理解了自己在社会主义新南斯拉夫中的任务。

要把我国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主要靠我国从事这门科学的科学工作者。这对我们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在本国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创造条件。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但还没有充分开发。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重大任务是,探明这些矿产资源,供我国各族人民享用。

我们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技术人员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负有重大的任务,因为他们的责任是通过科学研究工作把我国宝贵的矿产变成一个文明工业国所需的、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轻松所需的、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所需的日益完备的工具。我没有提到的所有其他科学领域对我国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这一概述,我想强调的是:未来属于科学,科学属于社会主义,科学应当为人民服务。对我们南斯拉夫来说,科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新南斯拉夫,科学有发展的一切条件。我想强调一下,我国科学家负有伟大而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尽一切努力为我们的共同体谋福利。

我借此机会号召我国所有科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服务，为建立我国人民的更幸福的未来服务。同时我可以保证，我国的人民政权对所有从事科学工作造福于人民的人们将给予最大的关怀。我们的责任是为我国科学工作者创造一切条件，以便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于自己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译自《铁托言论集》1959年塞文版第4卷）

论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1948年11月11日在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院士同志们：

我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言来向你们表达我对授于我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这一崇高称号的谢意。

请允许我只向你们说一声谢谢，并表示今后我将努力贡献自己的微薄的力量，以不辜负你们给我的崇高称号和信任。你们科学院是迄今授给我以荣誉院士这一崇高称号的第三个科学院了。我自问：我作了什么贡献而得到这一荣誉？我能做什么事以不辜负这一切？过去，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决心献身于革命工作以利于工人阶级、以利于本国人民的人所能做的事。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我只能继续做自己的这项工作。对此我将不遗余力，因为这是我的终身目标。

今天，在这个科学集会上我照理要谈谈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作用，谈谈他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中的当前任务。但是，正象你们已经知道的，两天前我在塞尔维亚科学院会议上已经略为谈到了科学工作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因此，今天在这里我可以随便地谈谈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搞政治的人们

或搞社会科学的人们，而且使每个公民、特别是使所有科学工作者都感兴趣和必然感兴趣。这些问题是：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问题；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其他关系的发展，换句话说，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什么而国际主义又是什么的问题。不言而喻，我决不认为我能够在这里对这些问题作出什么透彻的分析或下什么明确的定义。不，我涉及到这些问题，仅仅是由于这些问题同我国当今现实有关，是由于有这个必要，以便于理解我们今天遇到的某些现象。了解了这些现象，我们就能更容易地克服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许多多困难。了解了这些现象，我们也就能够对今天和明天有更明确的前景，使我们明白，我们不寻求任何特殊的新道路，而是沿着我们过去走过的同样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密切注视那些日常生活向我们提出的、我们经常遇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要谈的第一个题目是民族问题，这并不是由于现在我国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不，民族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好，我国所有的民族都感到满意。这个问题象列宁所教导的那样解决了。在我们这里，民族问题的解决反映了我国革命的性质。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成就，最有力地证明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性。如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即不按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内部的团结，没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建设性的团结和兄弟情谊，就不可能恢复国家，就更谈不到实现五年计划和许多其他的措施，并取得迄今这样的成就。

没有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象我们国家这样有这么多的民族。唯有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两个相似的民族，而其他一些国家里只有

少数民族。因此，在这些人民民主国家里没有必要象我们这里所要求的那样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在他们那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我们这里复杂。在他们那里基本的问题是阶级问题，而在我们这里既有民族问题，又有阶级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是由于它是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通过革命的道路得到解决的，在这场战争中，我国的所有民族都参加了，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可能，在为从占领者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作的共同努力中，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不论马其顿人，也不论以前被压迫的其他南斯拉夫民族，都不是靠命令获得民族解放的。他们都曾拿起枪来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共产党的作用首先在于它领导了这个战斗，在于它曾是战争结束后使民族问题象共产党人早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提出的那样得到彻底解决的保证。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共产党的作用在于使积极的民族因素能够刺激而不是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今天，共产党的作用是，警惕地注视着，不允许在任何一个民族那里出现和发展民族沙文主义。共产党应当努力并正在努力使民族主义的一切消极现象消失，并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们。

民族主义都有哪些表现呢？这些表现是：1) 民族利己主义，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其他许多消极特征，例如侵略别国的企图，压迫其他民族的企图，经济上剥削其他民族的企图等；2) 民族沙文主义，由此同样产生民族主义的其他许多消极特征，例如民族仇恨，贬低其他民族，贬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科学生活和科学成果等，颂扬自己历史上消极的东西、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消极的东西。

究竟什么是消极的东西呢？侵略性的战争是消极的东西，剥

削和压迫其他民族是消极的东西,经济剥削是消极的东西,殖民奴役是消极的东西等等。马克思主义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消极的,并谴责过它。诚然,所有这些历史现象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从我们的观点看,任何时候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现象应该消失,而且将会消失。在旧南斯拉夫,大塞尔维亚资本主义集团实行的民族压迫意味着加强对被压迫民族的经济剥削。这是那些受到民族压迫的人注定的命运。在社会主义新南斯拉夫存在着的民族平等使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任何经济剥削都成为不可能。这是因为,现在在我国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霸权了。任何霸权必然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带来经济剥削。这是与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原则相违背的。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平等,才能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我们共同体的这些巨大努力愈益得到巩固。

我们各民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一直试图达到上层的统一,而不是各民族的统一。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南斯拉夫人已取得了的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由于经济剥削等,民族纠纷愈来愈大。

只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才把民族间他关系置于另外一种新的、更牢靠他基础之上。我们表面上分开,是为了真正地更好地统一起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共同体中,不论大小民族,其权利一律得到承认。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霸权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变得如此巩固和团结一致。

如果看一看我们的五年计划,或者看看我们的预算,那么就可以看出,我们力求尽快和尽多地建设的正是最落后的共和国,就可以看出,比如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正在尽可能地

帮助象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样的落后共和国。现在正力求使它们尽早接近其他先进的共和国。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有着巨大的意义，我国各族人民很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以前在旧南斯拉夫，曾把各种官员和管理人员强加于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则理所当然地把他们视为压迫者，因而仇视他们。然而，今天，例如正是这些民族的共和国不断向最先进的那些共和国要求派领导干部和专家。事情的变化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今天这些领导干部和专家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在经济部门、在国家机关中帮助他们，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培养自己的干部，而某些共和国正是由于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而缺乏自己的干部。这种援助带来了巨大的成果。我国各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量正在被发掘出来。我们只举马其顿为例，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我国各族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民族离开另一个民族是不行的。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共同体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全面发展的条件。他们看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他们看到，这是保卫自己的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条件。

当然，认为我国已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达到了完全一致，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这里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这种完全的一致就不可能长久。但是主要的一点已达到了，这就是：我国大多数劳动者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它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院士同志们，我在前而已简要地谈到了我国的民族问题，谈到了我国内部发展的进程和我们国家共同体的发展。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

依我看来，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解决了作为一个制度和新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和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这一制度正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根据自己的条件而付诸实现。但是，至今没有、也未能从理论上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后来又在苏联实现了的是，社会主义有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实现。他在这里首先指的是苏联，但是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谈过，除苏联以外任何其他地方再也不可能了。且不谈其他国家，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南斯拉夫，这已证明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各种聪明人反对我们的这种说法，他们一个劲地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著作，以便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错误观点。除此而外，还有这样的下流文人，他们摇头，光是空喊，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这样说，就希望事情真会这样。但是，现实胜于空想，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这些雄辩是怎样顽固和不怀好意。我们仍然在顺利地 and 稳妥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出于任性，而是出于历史的必然性，深信这不仅将对我们各族人民有益，而且也是为其他民族作出榜样。

我应在这里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如果人民民主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不为我们制造障碍的话，那么我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会更快、更容易些。当然，负责的共产党人今天所采取的反对我们的立场，是一种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立场。

我应该承认，在攻击我国时所表现的顽固性和肆无忌惮，使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尤其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因此而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的巨大损害。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害的倒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在我国建设并正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各种不可理解的反对

我国的行为和正在加紧散播的、但很快被揭穿了的种种谎言。因此，他们不能因而归罪于我们。

不应当这样来对待在战争中遭受过巨大苦难的我国。应使饱经苦难的民族有可能尽早摆脱贫困，而不是阻碍他们摆脱贫困。只有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国劳动人民在摆脱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后，有权考验和检查一下自己的能力和生命力。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看到自己有能力建设和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这种创造性的热潮中，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渐提高，一切与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消极东西正在消失。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问题是件复杂的事。这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问题，即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这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这应该至少在多数劳动人民的头脑里如此成熟起来，以至无论从自己的民族观点，还是从国际主义观点来看，他们都看到这种需要和好处。同时，在建立这种团结以前，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所基于的和借以发展的基础，起着特别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今天还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基础之上。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显然，这种关系不能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加接近。如果考虑到，这所谈到的多数国家在战争中受到重重灾难，并力求尽早摆脱这遭受破坏的状况，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却不可理解，这就是在换货方面，也就是在贸易方面，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态度，比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还坏。我们并没有要求任何人在这方面对我们采取某种例外，因此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便摆脱存在的种种困难。在这方面，我们没有

做什么不同于我们东方盟国的做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并无两样。如果谁不喜欢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应该从上面这些问题中去找到攻击我们的借口，而不应臆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各种事情。

对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问题，就是应该着手解决，并果敢地予以解决，如果不能完全解决，至少应该部分地解决。

一切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于什么我们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谈谈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说，谈谈同攻击我国有关的、近来常常提到的课题。

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必须基于行动之上，而不是基于口头之上。国际主义基于实际行动，基于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或者是已走向社会主义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理解自己的利益，是否把自己的利益理解为共同利益的一部分，还是理解为自己狭窄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这个阶级或国家是否关心别人——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事，其他类似国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是否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什么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我们在前面已谈到了，而什么是国际主义，这在实践中每天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要看一个最先进的阶级或者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否支持或者援助那些需要援助或支持的进步运动或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这一援助或支持。给予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需要援助的进步运动以力所能及的援助，这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经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同时又不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断言举一个真正的理由。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是怎样的呢？当然是国际主义的，因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民族义务，而且也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当然是国际主义的，因为我们全力援助了那些需要我们援助的人民民主国家，不管他们是否向我们要求过这种援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忽略向那些需要我们援助的其他国家的进步运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管他们是否向我们要求过这种援助。我们至今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这种立场。

关于我们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我能够说的是，我们恰好是能在必要程度上发扬我国人民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并不要求我们放弃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放弃对自己各族人民的热爱。社会主义并不要求我们不竭尽全力来尽早地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便为我们的劳动人民创造尽量好的生活条件。我们在建设自己国家中的创造性劳动热忱，即我国工人、我国青年、我国人民知识分子以及我国所有劳动农民、所有在人民阵线中为这一建设自愿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的公民的创造性劳动热忱，都不应该是、也不可能说成是什么民族主义倾向。不，这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它实质上是深刻的国际主义，因此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在前面只扼要地谈到这些问题，就是说我只举出了一些例子。我没有具体地指出人民民主国家，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些人为我国设置的各种障碍和所做的不正确行为的实质。这一切我将留待另一次再说；尽管现在这样做会使全部事情更加清楚，但是在当前形势下这样做不会有利，而只会有害于共同事业。

院士同志们！可能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恰恰谈这些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有必要在这个崇高的讲坛上谈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同我国的当前现实，同我国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不仅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建设，而且同世界上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紧密相联。进步的世界注视着正在建立最进步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样也注视着这些国家彼此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不仅世界上最进步的力量在关切地注视着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什么，而且世界上的反动势力也同样在密切地注视这一点，这些反动势力毫无疑问力图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出现的一切消极现象。这些关系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使人们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关系到它们本身，即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事情，或更正确地说不仅仅是关系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事情。不，从国际主义观点看，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现阶段，当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还有一些民族仍遭受民族压迫的时候，当还有丧心病狂的殖民奴役等等的时候，应当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相互关系，在世界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关系应鼓舞所有民族、特别是小民族去为自己的民族自由、社会自由和平等而斗争。这些关系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榜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推动而不是阻碍这种发展。

最后，我想对你们说，你们的作用，科学家的作用，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有重大的意义。认为这是我们少数领导人的事的想法是错误的。不，我国全体劳动公民，特别是你们科学界的人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我们用自己的

行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即只有我们不顾一切困难地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去执行五年计划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做到这一点，即当我们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公民的生活创造了更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在完成这一事业中，你们科学家负有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不但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主义。

你们科学家的巨大作用是：不但使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不致受干扰，而且使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继续朝着我国各族人民日益加深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尽早地打消和摒弃那些仍然妨碍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的努力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种种预言。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4卷)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和人民青年联盟 合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8年12月15日于贝尔格莱德

青年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名义向你们表示祝贺。我还要表扬在座各位，以及你们所代表的青年迄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顽强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要谈一谈你们所建立的这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意义和它的任务。

统一的青年组织问题，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人民青年联盟合并的问题，总的说来提得正是时候。就是说，这一组织上的统一已成必要，条件也已完全成熟，我国青年的双重组织形式已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新南斯拉夫青年组织继续正确发展的障碍。我国政治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决定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必要性。

建立一个新南斯拉夫青年的统一组织的条件是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在我国解放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我国全体进步青年，我们新南斯拉夫的共青盟

员和人民青年联盟盟员都参加了战争和战后的国家建设。我国有这么多的青年响应号召,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我国的解放和建立更美好的未来承受了一切痛苦和牺牲。在这方面,当然,我们决不会忘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巨大作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男女盟员的功绩就在于:他们第一个响应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号召,和党员一道参加了斗争,以自己的榜样向我国进步青年指明了道路,并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自我牺牲精神对其他青年起了教育作用,使其他青年向自己看齐,使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这一历史性的代表大会有可能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人民青年联盟正式合并为一个组织。

对我国大多数青年的这一再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的教育,是在一场艰苦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严酷条件下进行的。它要求有极大的毅力、深刻的信念和对我国青年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我国青年是自愿地进行斗争的,他们懂得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懂得自己是在为新事物进行斗争。早在战争期间他们就已经懂得什么是新事物了。在这点上,我国人民青年在考试中是合格的,并且表明他们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的称号。战后,当需要把我们遭受破坏的国家从废墟中建设起来时,我国青年在行动上又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于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之牺牲于战场的事业的忠诚。在这方面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也通过自己的榜样为我国全体青年指明了道路,向他们指明应该如何工作和献身,以便尽早地治愈由于占领而造成的创伤,尽早地为我国劳动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条件。我不打算一一列举我国青年迄今作出的一切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他们作出的一切使他们有权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社会主义新南斯拉夫的青年。

同志们，出于很多原因，我国真正人民青年的统一组织具有重大意义。它的作用及任务绝不是轻松的。在这个组织里应该以新南斯拉夫的精神，以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我国青年。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统一组织里的教育，才能使参加该组织的越来越多的新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顺利地、不断地得到提高。

我国青年一代没有不同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共同的。就是说，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伟大事业的青年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和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排除了存在两个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人民青年联盟的必要性，因为这两个组织是按照同一精神进行教育的。这两个组织都是人民的青年组织，都具有真正人民的性质。在我们这个有着新的社会内容，即正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民的”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各种反动政党和组织为了欺骗人民也经常自我标榜是“人民的”。在我们这样一个通过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人民的”这个词具有这一新社会制度的含义。这里，“人民的”这个词不再是没有内容的或是民族主义的词藻，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它不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

而此，现在你们建立的这个统一组织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并且必然会继续得到发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新的青年组织必然会成为青年男女的真正的学校。它将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部门、行政部门、我国人民政权机关和我们党输送干部的源泉。我国有句民间谚语说“世界属于青年人”。如果说这句谚语是我们祖先创造的，那么今天它才具有了自己真正的含义。我国青年只有今天才懂得以饱满的热情和顽

强的精神去建设他们曾为之奋斗的社会，只有今天他们才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你们迄今的行动和你们的纲领清楚地说明我国的青年是什么样的青年，你们今天建立的这一组织又是怎样的一个组织。但是，也许还会有人说（因为现在这已成为一种积习），我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人民青年联盟合并说明我们转向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同志们，你们对此不要过于愤慨，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已经听惯了形形色色的批评家对我们进行的许多污蔑和说的种种坏话，而且今后我们也还会听到对我国的更加难听的谩骂和诽谤。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妨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努力，也不能使我们离开明确确定的道路和目标。如果有人自作聪明（这也是可能会发生的），利用这一情况，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的话，那么，同这种人进行辩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迄今情况已表明任何论据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不管这些论据多么有说服力，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给我们脸上抹黑，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谎言哪怕有一点点是真理，希望有人相信这种谎言。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么我们要问，这种民族主义算得了什么？当然，他们是不会回答你们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回答，而是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既然他们知道我国青年是劳动青年，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表现出高度的觉悟，这些青年不是剥削阶级的青年，而是被剥削阶级的青年，他们又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在我国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且建立了新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正在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以极大的努力

顽强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谈不上有民族主义，更不用说发展资本主义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掌握权力的我国劳动人民已经体会到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决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因此，说这样的国家里有什么民族主义，是极为愚蠢的，因为它排除任何一种民族主义，只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才会否认我国存在这些事实，因为事实本身有力地批驳了所有这些诽谤。我国青年受到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教育。这一点你们自己清楚，我国每一个正直的公民也都清楚。不仅我国每个正直的公民清楚这一点，我们国内外的反对者也清楚这一点。国内外那些不仅丧失了政权，而且失去了奴役我国劳动人民的任何可能性的人也清楚这一点。但是，你们要知道，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也是清高的，然而，他们说的和写的却相反，这才是迄今工人运动史上所有消极现象中最不光彩和最可悲的了。

青年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比较详细地讨论你们青年组织面临的各项任务，不过我愿意在这里谈谈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任务。

毫无疑问，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专业上教育自己和其他青年，以便能够在经济部门以及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其他劳动部门中尽快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经济部门和国家机关中有相当多的人，不能说是真心实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还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极力地破坏，而不是努力做有益的事。还有些人想做好交给他们的工作，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需要我国青年，需要在斗争中受到教育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受到教育的社会主义青年，又快又好地完成学业，以便参加经济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我提到那些不是真心实意地工作和有意

怠工的人,是为了让你们认识到,在实现我国五年计划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同多么巨大的困难进行斗争。我们看不出把他们大多数人改造过来,使他们老实地工作的前景;更谈不上使他们满腔热情地工作和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同许多共产党员和我国优秀的前线战士那样象一团烈火似地投入工作。因此,我们非常重视的是,让你们,我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尽快奔赴工厂,在那里增长才干,让尽量多的人奔赴我国的矿山及其他企业,奔赴学校、贸易机关和我国各级人民政府机关等等。我相信,你们是真心实意和满腔热情地工作的人们。这些人知道自己是在为人民、为社会、也为自己工作;知道自己是在为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工作。而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能否尽快实现,完全取决于你们。

谈到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中小学、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我必须指出一些必须克服的缺点。据我所知,有时对大学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正当他们应该准备考试的时候,号召并派他们去参加义务劳动,以致影响了学习。这里人们忘记了,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和顺利地通过考试,这点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大学生参加某项义务劳动或随便什么活动,不应影响他们的学习,否则,我们从学校得到的将是所受教育水平低劣、不能胜任各种工作的干部。每个学年结束后,大学生们可以,而且应该干一段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有关的工作。当然,也有这样的大学生,他们恰恰想逃避义务劳动,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参加这种劳动,不能说,这些人当中多数是因为想学习,想尽快成才。恰恰相反,这种人不仅影响义务劳动,甚至干扰学校本身的教学。我们曾经不得不开除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一小部分学生,以保证学校的教学不受干扰。

我国的技术劳动青年——学徒工，不要因参加各种义务劳动而脱离学习，这一点同样也很重要。脱离学习会有很坏的后果，因为如果学徒工离开企业或所学的工种，比方说一个月，那会对他们的专业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对经济本身也有害处。在发展的现阶段，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尽快培养出更多的我们需要的低级和中级专业干部。我们非常需要各种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但在一个短时期内，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进修。而在短时期内，大量培养出低级和中级的专业干部是有条件的。你们青年组织应该特别重视这一点。你们有可能从你们青年组织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中动员几万人，派到经济部门去进行技术培训。

一些青年集体在建设象布尔奇科—巴诺维奇、沙马茨—萨拉热窝公路，新贝尔格莱德等这些大工程中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加赞扬的。在这些工程中青年们从自己的队伍中向我国经济部门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专业人员。同志们，朝着这个方向加紧工作吧。请给我们的经济部门再输送几万名年轻的技术工人或派青年到经济部门去学习吧。

你们青年组织面临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在理论上、政治上教育人民青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必须完成。你们的组织现已有上百万名成员。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青年的工作，需要付出许多智慧和努力。成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青年们应该看到，在这个统一组织中，青年人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同。还要看到加入这一组织的还有受各种落后思想影响的青年。对待这样的人应该耐心。不要搞宗派主义，而要坚持不懈地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因此，应该制定各种学习班的相应计划。

迄今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青年们，曾有机会受到一些马列主义教育，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搞好对那些迄今没有机会受到这种教育的为数众多的青年人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是请你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全力以赴地去进行你们组织中的这一政治和理论教育工作。

你们面临的第三项重要任务，是青年们的体育教育和服役前的军事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是还不够广泛，离我们能够做到的和必须做到的还差得很远。我国体育教育应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这对我国青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完成各项艰巨的工作任务，我国青年也需要有相应的体力和抵抗力。而且，体育教育对加强我国的国防能力也有很大的意义。我们设了服役前的必修军事课，而且体育教育同服役前的必修军事课是紧密联系的。我认为至今在这方面做的宣传工作太少了，没有足够认真地理解其意义，没有广泛深入农村和各工业企业。这一缺点应该尽快克服。

你们组织面临的第四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青年参加义务劳动。青年同志们，我把义务劳动作为第四项任务提出来，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不很重要，而是因为我要强调上述那些对你们青年来说最重要的几点，而如果对你们青年是最重要的，当然对我们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你们青年人在义务劳动中用自己年轻人的干劲创造奇迹，但我们还是要从今后更大的长远利益来提出问题。显然，这并不涉及全体青年，而只涉及那些正在学习和进行专业训练的青年，我们大部分青年是能够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关于义务劳动，自愿的行动，我想说几句。今年，也就是1948年，同去年和前年一样，我国青年在义

务劳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对我国五年计划的宝贵贡献。但是，要实现我们的五年计划，我们还面临着艰巨的斗争。去年，我们对你们以及我国全体人民说过，在我们所作的努力中，1948年将是我们五年计划中最艰苦的一年。的确，这一年是十分艰苦的。即使没有臭名昭著的情报局决议，这一年也是困难的，当然我不得不说，对我们和我国的这一攻击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然而，在1948年里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提出的1948年计划基本上能百分之百地完成。但是，青年同志们，1949年等待着我们的困难也少不了多少，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采取各种措施，以便更有准备地去迎接这些困难，因为1949年我们也必须完成我们的年度计划。不仅要完成，而且在很多方面还要超额完成。明年，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去建设那些对我们的计划来说最重要的工程。

在今后将要遇到的困难中，我们还要接望你们，我们英雄的青年。我们指望你们的劳动热情，你们的顽强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你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明年我们对你们的要求不会多于今年，但我相信，你们将会完成我们交给你们的任务。在企业、矿山、各建筑工地和学校的我国劳动青年，在1949年里，要把自己全部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我希望我们的劳动青年永远站在为实现五年计划进行顽强的和忘我的斗争的工人队伍的最前列。你们青年人应该使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活动开展到这样的程度，使它成为每个男女青年的骄傲和荣誉。就象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样，英勇行为是我们每个战士的荣誉和自豪的问题。

同志们，如果我国有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就不会让你们担当这

么多的各种义务劳动了。可是，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够。这正是我们1949年的主要困难。在这方面，你们青年人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又要请你们帮忙。我国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正处于高潮，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工厂、矿山和各大建筑工地是真正的战场，在这些战场上，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实现五年计划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你们青年人在你们的战斗岗位上也会成为胜利者。你们还要动员和率领那些今天仍受新南斯拉夫的各种敌人的消极影响，对伟大的义务劳动袖手旁观的所有青年，投身到这场劳动斗争中去。要告诉他们，这场劳动斗争是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更美好的生活，也是为了他们自己。青年同志们，你们要懂得，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努力中，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在这些努力中，除了我们的坚定的必胜信念，除了我们的决心和顽强精神之外，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能帮我们的忙。

各方面的人们都预言我们不会成功。他们臆想和伪造出各种数字，说我们某个项目完成了多少，计划中哪些指标没有完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别有用心地欺骗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就是扼杀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的信念。但是，这样一些歪曲事实、谎报我国情况的坏人欺骗不了我国人民，因为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仍将现实，同各种下流作家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下流作家就是不希望我们顺利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而实现五年计划就意味着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实基础，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

同志们，今天我在这里又向你们谈了我们面临的和必须克服的困难。当然，这既不会使你们感到害怕，也不会使你们感到意

外,因为你们自己也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且你们自己也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之所以大谈特谈这些困难,而不谈成绩,为的是让每个人事先作好迎接最大困难的准备,同时,也为了让每个人都清楚,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需要的就是维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和党的团结,需要的就是维护我们必胜的信心。我们不怕公开谈论困难,让每个人都听听,甚至让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也听听。就让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也听听吧,让他们为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高兴得手舞足蹈吧,但他们不会高兴得太长久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擦擦眼睛,那时他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正是在这些困难中,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我国青年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因此,明天你们将作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公民,自豪地回顾你们在年轻时所走过的历程。你们将会因为自己曾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最前列而感到自豪。我们大家明天都可以说,我们为今天的一代和下一代创造和实现了更幸福的生活。

祝你们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祝你们在贯彻这次大会即将通过的决议中取得许多成就!

我国英雄青年团结的代表大会万岁!南斯拉夫人民的英雄青年万岁!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4卷)

全体进步人类都应当了解我们 为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而斗争

在塞尔维亚军事演习结束典礼上的讲话

(1949年10月4日《战斗报》)

各位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两天前的军事演习以及今天的阅兵式可以说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是我两年来参加的我国年轻的人民军第二次军事演习。我认为，自1947年以来这支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想借此机会指出，根据看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这支战斗队伍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这首先表现在它的高度战斗素质，面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充分表现出其高度的政治和道德素养。由于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在整整一个月的拉练中与这一地区居民的关系处理得好，从而给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此，我应当大力表扬我们的战士、军官，因为他们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留下这样好印象，尽管这样庞大的部队，特别是在庄稼尚未收获之前进行军事演习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同样我还应当表扬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的指挥人员。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坚信，我军的指挥员已经掌握了指挥用现代化技术

装备起来的部队的本领，他们在完成最复杂的战术任务中表现了高超的艺术。在此我应该指出，这是我军的荣誉。这次军事演习表明，我们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中完成最艰巨的任务，它有资格和有能力捍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我们的军事演习是在一种特殊的形势下举行的，即我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各方面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对我国施加压力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袭来的时刻，一句话，有人企图吓唬我国人民，破坏他们的团结，使其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举行的。我们举行这次军事演习不是针对各类恐吓而采取的反措施，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它对于一支想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且希望证实自己已达到这一水平，即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现代化部队来说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同志们，我们的军队肩负重任。它的任务首先在于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捍卫它的和平发展。这是我们英雄军队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其次是警惕地捍卫我国的完整和独立。这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任务，而是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捍卫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保障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公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军队没有威胁其他国家的目的。因此，它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性质，它具有很深刻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管谁说了些什么，不管人们议论些什么，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不会威胁任何人。我们的军队迄今没有、将来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尽管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为满足我国的正当要求，为使属于我们的东西归还我们而作过徒劳的斗争。尽管没能如愿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争得我们应该拥有的权利，但是，自从大战结束后，自从我们开始和平建

设以来,我们从未想过用武力攫取什么东西或设想威胁什么人。我讲这一点,是因为在对我国进行攻击的现阶段,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企图把我国描绘成是侵略的国家。难道一个面临强大的对立面的孤立无援的小国,当它没有任何理由,尤其当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会走上侵略的道路吗?同志们,众所周知,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至少是因为,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他们却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干扰我们。但是,在现阶段,当我们今天成功地完成了半个五年计划时,事实表明,他们反对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和经济封锁等均未得逞。随后他们又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和使用更恶劣的手法。结果闹到什么地步?最近几天布达佩斯迈出了最后的一步。同志们,这件事我在后面还将谈到,现在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一个小国,特别是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的嘴巴,它不应不吭声。任何人,不管他是谁都无权威胁一个在不久前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流过无数鲜血的弱小民族,这个民族不允许他人毫无理由地对它诽谤和破坏其名誉。任何人,不管他是谁都不能仅仅因为某国人民不愿沉默地忍受种种污辱和诽谤,并用铁的事实加以自卫,就用战争来威胁这样一个国家。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难道什么人在道义上有权利要求打我们的耳光,破坏我们的名誉和诽谤我们,对我们进行最卑劣的诽谤而我们还要对此保持沉默吗?当然没有。因此我们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有权指出,假的就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我们在捍卫和维护真理的同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冷静地展望未来。同志们,你们知道,宁愿光明正大地捍卫正义和真理而在斗争中牺牲,也不要成为任人践踏、象奴隶一样直不起腰来,并眼看伟大的

马列主义原则遭践踏而不进行抵抗。

现在，我向你们略为谈谈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这种关系。当联共(布)中央给我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向我国发起第一次攻击时，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心情是轻松的并且会简单地说：“我们不听你们的。”不，同志们，我们对这封信进行了深思，同时对信中的不真实内容感到吃惊。但是，当我们作出答复之后，(我认为你们会同意这一答复是正确的)又寄来了第二封更恶劣的信。这使我们更加相信，这里事情要比信中所提到的那些事情糟糕得多。第三封信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不公正批评我们的人的目的不在信中所说的东西，信仅仅是为达到他们的其他目的——把我国置于从属的地位，把它变成隶属于他们的一个省份而使用的手段。同志们，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今天我把所发生的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你们，我们曾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和怎样处理这件事的。我们总是对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说：“同志们，我们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只要需要，我们就和你们一起到任何地方去，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还对他们说，南斯拉夫人民是他们最忠实的盟友。对此他们却回答说，这一点在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已表现出来了。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除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能使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以外，他们更相信在这里从白匪和其他堕落腐化分子当中招募的间谍喽罗们，而不相信我们，不相信那些其中很多人多年来甚至在狱中也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为了宣传苏联而斗争的战士。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相信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争取劳动人民美好未来的人，却更信赖阴谋家和堕落分子，这在一个共产党里算得了什么道德。遗憾的是，他们不信任我们，而信任其

他那些人。请看，现在这已到了何等地步。

同志们，如果今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确没什么可惭愧的，我们履行了真正国际主义者的全部义务，履行了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人们的义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当前所出现的一切倾向，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你们已看到，那些信件是否有根据。真理已变成了其他东西，因为事实证明，信中那些说法的背后掩藏着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些信已暴露了它的真面目。

情报局作出了决议。为达到其目的，他们还动员了其他一些共产党，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不仅要在物质上而且要在道义和精神上使人类发生变化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以达到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目标的那种目的。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一年半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为了反对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态又是怎样发展的，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他们的最粗暴攻击。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让他们明白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你们看一下我们迄今就此所写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使关系紧张起来。你们也可看到，我们作了我们能作出的一切努力，同时你们还可以看到，当他们打我们耳光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他们的手，不让他们打我们。我们不想使事态恶化，因为我们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有理智，会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但是，暴力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纵容自己干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不容许自己干的事情。从共产主义的道德观点看来，暴力根本无权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方面作出决定，而要由共产主义道德来决定必须采

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难道我们能对这一切表示沉默吗？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不能沉默。如果我们随波逐流，为了过轻松的日子而低头，那我和我们大家就都不是共产党人，就不是革命者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发生可怕的悲剧，将会产生同社会主义道德毫无共同之处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观点。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我们接受了这场斗争，它不仅是我们的斗争，不仅是我们党和我国的斗争，而且也是整个进步世界的斗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假如走他们走的路，即用红军刺刀送来自由，那么实际上也是压迫，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罢了，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就被断送了，而已建立起来的所谓新社会关系则同旧关系没有多大差别了。同志们，我们接受这一场斗争。接受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要为不仅对社会发展现阶段，而且对遥远的将来都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事业而斗争。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这一斗争。它是一件超越我们的国界和将进一步发展的事业，因为这是真理。尽管他们利用所有电台加紧对我们进行造谣和诽谤，真理终将胜利，真理会在东方、也在西方越来越快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同志们，请你们原谅，我有点动肝火了，但你们应该理解我是有理由发火的。现在我打算用几句话说明这些事情的发展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他们从第一封信开始就说我们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当我们就此向他们作出回答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象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知道托洛茨基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同时我们也知道，他的活动在思想上是有害的。而在他之后发生的事情则完全

是另一回事，多少正直的共产党员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下受害，尽管他们与他毫无共同之处。当他们看到用这一着不奏效时，他们就逐个地宣布我们为间谍，这个是间谍，那个也是间谍，并试图以此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从而破坏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

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这一事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和团结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少见的。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有二千三百名代表参加，他们是从全体党员中通过最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我们党五大的呼声没有对他们发生什么作用。他们没有停止对我们的造谣攻击，而是相反，这一攻击更加猛烈了。他们开始谈论民族主义，谈论所谓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倾向。从前他们称我们为同志，而今天发展到称我们为“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了。

同志们！头脑清醒的人，特别是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的人很容易了解和看到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再愚蠢不过了。人所共知，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们自己也给它下了个定义。法西斯分子有其物质和思想上的基础。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大资本家的思想基础，这些资本家用新的方式剥削本国人民，实际上这是一种最反动的方式——“组联合国”的方式等。破产了的中间阶层成了法西斯思想的群众基础，这种思想成功地使中间阶层转向对别国人民进行最卑鄙的侵略和奴役。我国的法西斯主义在哪儿呢？我们已把它消灭了。那么，这一新的谎言只剩下什么了？只剩下了愚蠢的废话。其次，法西斯主义有其帝国主义和侵略的思想体系，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只有我，舍我别无他人。”法西斯主义也就是种族主义。只要我们对此稍加剖析，就会发现是谁有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特征。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我们。其次，我们不想

侵略任何国家。我们不会因此说对自己已经满足了。我们用热爱全世界人民的精神教育我们自己和我们全体人民。我们赞赏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他们所取得的其他成果，我们高度评价其他民族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就越赞赏他们，而不是嫉妒他们。那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这一切说法还剩下些什么呢？剩下的只有愚蠢的废话，不负责任的胡说。从第一封信起就一直不负责任地胡说，其目的是使不了解情况的人把谬误当作真理。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些为消灭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而真正贡献出一切的人称作法西斯分子呢？同志们，他们的根据是什么？是我们把政权送到资本家手里吗？没有，我们夺了他们的权。在我国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我们不要别人的任何东西，而首先只是希望我国人民享用本国的财富。我们愿为我国人民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对他们来说这便是法西斯主义，便是民族主义，还有什么不是呢？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象过去那样逐个地指控我们是间谍，而开始把我们大家统统称为间谍。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大家是团结一致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同志们，对他们来说我们所有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战士都是间谍，就是集体间谍。在他们看来，明天我们全军都将成为集体间谍，后天我国全体人民也将成为间谍，但我不知道我们对谁搞间谍，为谁搞间谍。

同志们，这里发生了某些颠倒是非的事情，这里有些东西被歪曲了，致使我们完全不可理解。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货色？他们真的认为别人会相信他们的话吗？我不相信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需要尽快地炮制，以便哪怕让鬼相信他们，以便把我们同其他国家人民隔绝起来，并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及

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为自己的敌对行动作辩解。但是，进步世界终究了解什么是真理。而我们将为真理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证明真理就是真理，假的就是假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进行诋毁，不管他是谁。

他们曾希望，当他们肆无忌惮地用鞭子抽我们和打我们的耳光时，我们会蜷缩在联合国席位上默不作声，我们为什么要沉默不语呢？我们不是替面方反动派说话，因为他们也不好，而是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指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面干的却是反对我们的勾当。我们有权捍卫我们的国家，不使我国人民遭受孤立，不使他们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我们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今后我们在所有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机构里仍将这样按原则办事。如果苏联在某些方面做得对，那么我们就赞同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不对或耍两面派，我们将说出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应当怎么办。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能迫使他们尊重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向全世界表明和证明，他们是言行不一的。请看，这就是我们这场斗争的实质。我们应当为世界上每一个进步的人而斗争，使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整个进步世界应当了解我们为全世界的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而进行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同志们，我们为此而生是值得的，但如果需要，为此而死也是值得的。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布达佩斯审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以前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审讯，采用过类似的欺骗手法，但象这样不道德和拙劣的手法还未曾有过。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了这样拙劣的编造，是前

所未有的。为什么苏联需要搞对拉伊克及其同事的这一审讯呢？譬如说，他们为什么不在苏联搞这样一个审讯呢？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在本国或任何一个东方国家搞这种审讯，回答将是同样的，那就是自我控告。但他们不这样做，他们首先从匈牙利开刀。这是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那里领导人的思想最叛逆、最腐败；其次是因为匈牙利人民出于各种原因对苏联很不满和无好感，需要以某种方式把这种不满情绪转移到南斯拉夫身上，并把南斯拉夫说成是对匈牙利独立的巨大威胁。此外，有趣的是，也受到指控的布兰科夫为什么一开始就赞成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有名的盗窃犯和营私舞弊者，关于这一点以前曾有人写过。这个骗子曾认为，他高举的是那些在围攻我国中他所依靠的、和他同流合污的人们的旗帜。现在这个骗子怎么以这样的角色坐到被告席上去了？拉伊克又为什么坐上了被告席？我想不必使任何人相信我们恰恰同拉伊克打交道最少，而与拉科西、法尔卡什及其他人打交道最多。拉伊克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们不只一次地到我们这里来过。当时他们都说，我们是他们的榜样。他们谈到在罗马尼亚的情况，说他们到那里去是要看看什么事不该做，说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是要看看工作应当怎样做等等。在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是一字不差地这样说的。他们说，罗马尼亚人民阵线和工会对他们不适用，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非常好。就在那时他们就有了最后的打算：他们想欺骗我们，要我们放弃赔款，公然要求我们原谅他们，我问道，这是为什么？法尔卡什解释说，我们应当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我回答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你们可以和平地发展，但要给我们赔款，因为我国的确遭到霍尔蒂军队的很大破

坏。我们要赔款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补偿我们的巨大损失。此外，如果我们的部队装备好了，你们也不必害怕。他们对我的这一答复并不高兴，我向他们解释说：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受了多大的折磨，我国人民还要为此作出多大的努力吗？请想一想，你们的法西斯分子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因此，现在你们得帮助我们。如果你们不想把这看成是赔款而是援助，那也好，就不要把它看成赔款好了，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存的需要。然而，当时他们来我国卑鄙地欺骗我们，要我们正式同意放弃这一赔款，就在那时他们手里就抓着石头要砸我们了。我们没有放弃赔款，但在此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同其他人一道作出了反对我们的厚颜无耻的决议，在决议中他们把我们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还散布了其他一些谎言，事情就是这样的。

是谁导演了布达佩斯的这一审讯？根据我们从别人而不是从拉伊克本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一开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就发生动摇，虽然他与我们的人打交道时表现得目空一切，因为他害怕有人会说他对我们的人怀有好感。他之所以动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对待南斯拉夫。他是个胆小鬼，不敢把它说出来。由于动摇，1948年他去莫斯科进行“深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进行了“深造”，但他是到那里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由内务部长改任外交部长。他的内务部长职务由另一位部长担任，以便组织对拉伊克的审讯，这都是由莫斯科策划的。后来拉伊克被捕并同布兰科未起再去莫斯科进行“深造”。在那里按照他们的某种办法来安排这一审讯。你们看到了，在那里他们为所欲为。他们用什么办法去达到让人们自己更多地责备自己，这我不清楚，但有某种奇怪的办法，这是肯定的。他们需要用这些办法来吓唬南斯拉夫。然

而，在这一审讯中，除了被点名进行诽谤和污蔑的人外（这些名字不总是准确的），所说的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谎言。整个这一审讯以及这一审讯中所提到的事情都是卑劣的谎言和莫大的耻辱。此外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应当停止这一审讯，因为它只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最大的污点和莫大的耻辱——苏联却利用臆造的理由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互助条约。

请看，这说明他们多么不明智：给南斯拉夫发照会，并用布这佩斯的审讯为这一照会辩解。苏联在那边，而匈牙利在这边。苏联为什么要断绝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呢？非常清楚，因为在那里这一审讯正是为此目的，即作为恫吓的新手段而组织的。同志们，你们看到，诽谤我们的那些人是多么赤裸裸呀？所以，这一审讯是一个针对我国的精心策划的卑鄙行为，其目的是在今天或明天把我们说成是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人等。事情是怎样继续发展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利用报纸和广播喋喋不休地鼓吹，以期就此给某些人留下某种印象，也可能已给某些人留下了一些印象。人们会自问：南斯拉夫这里也许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一方面，这是那些不了解情况的老实人说的话，另一方面，西方的战争叫嚣的机器却会说这里是这么回事，但不是全部，他们还要插一手。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而绝不是另一个样子。

同志们，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军队里，对待这场捍卫真理斗争的现阶段都不能也不应该等闲视之，而必须反击对我们及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所有诽谤，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今天，当我们观看阅兵式时，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公民和农民对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多么的高兴和感到惊讶。我们是白手

起家的。我们创建并正在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正如我说过的，我们创建这支部队，不是要威胁别国，而是作为我们捍卫真理的堡垒。我们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宣传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和我们的立场。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我国人民，热爱我国的每一寸土地，因为它用我国人民最优秀儿女的鲜血浇灌的。我们准备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战斗到最后一息，不管这种进攻来自何方。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那些给我们及我们的国家制造谣言和进行诽谤的人的真面目，为世界社会主义道德的胜利作出贡献，恢复对开始动摇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恢复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并且有权利为自己的解放、为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而不是等待别人来解放他们。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我预祝你们在搞好我军战备的辛勤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特别希望政治干部在目前形势和我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现阶段，要站得高，要向我们的指战员及时地和准确地解释在我国及在我国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以使我军做到情况明，以使我们的战士和军官都懂得事情是怎么回事，使他们晓得，他们必须提高警觉，使我国能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完成五年计划。

我们英雄的人民军队万岁！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4卷）

论经济企业的工人管理

在人民议会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
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
基本法》前发表的讲话

(1950年6月26日)

人民议员同志们：

人民议会今天将审议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一个极其重要的法令的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草案。这一法案的通过，将是人民议会在通过《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法令》之后具有最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行动。国家接收了生产资料，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并不是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口号。它们包含着关于社会所有制、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想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一口号就能够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关于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劳动集体管理的这一法令，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逻辑结果。它是我国人民政权在坚定不移地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延续。实现这

一法令的条件已经部分地成熟了。我国劳动集体每天都表现出他们的成熟性,表现出他们的高度觉悟,这种觉悟在他们为完成计划任务而作的英勇努力中显示出来了。

为什么我国劳动者在竞赛中和提前完成计划任务中有这么高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呢?这是因为他们懂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他们所作的辛勤劳动的果实应由他们来享受。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权对他们有充分的信任,并且关怀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决心克服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我国劳动者正在作出这样大的努力,正在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努力生产尽可能多的各种产品,正在用这样大的干劲建设着新工厂和新铁路等,正在努力通过技术革新来改进生产工具,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些工厂的热爱。难道说这些劳动人民就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些工厂吗?当然有能力,他们有能力管理,而进入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新工人将会向他们的同伴们学习如何管理。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法令通过得太早了,工人是不能掌握管理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复杂技术的。这样想的人是错了,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看法意味着不信任我国劳动者和看不见我国劳动者有多么大的创造能力来进行这一管理。这一法令将为我国劳动人民的来来和我国整个社会的未来开创新的前景。因此,这个法令不是通过得太早了,而是晚了一点。之所以晚了一些,是因为直到臭名昭著的懂报局决议公布以前,我们的党对苏联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抱有太多的幻想,并毫不加批判地接受和照搬,甚至对那些不适合我国的特殊条件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东西也加以接受和照搬。曾有人要求现成的药方,有人想把它强加给我们,或者是我

们自己追求这种现成药方。曾有过走阻力较小的捷径的倾向。

但是在今天，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生搬硬套的做法迄今已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其严重后果仍然能感觉出来。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已自发地进入人们的实践，现在很难摆脱掉它，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采取了措施，以终止这种实践。所以我们在建设中每天都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科学在我国实践中的胜利实现；使我们能够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作斗争，并为争取真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胜利而斗争。我们通过本国的实践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如何有力而深刻地阐明了一些最模糊不清的问题。凡是愿意和能够理解并抓住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神的人，是不需要权威的，不需要任何监护的，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代用品，这种代用品只能使人们离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基本上对各种原则问题都作了回答。至于这些原则在个别国家的确定和应用，只能由那些在该国人民中成长的，熟悉本国问题的，熟悉本国历史、风俗习惯、它的弱点和长处，能够警觉地注视在国内发生的一切现象，同时又懂得马克思主义科学，即懂得这一科学的精神，并善于以这一科学为指针和将它付诸实现的人们去做。我将列举一些最重要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什么事、我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和我们正往何处去。

第一，在解放斗争期间，我们摧毁了作为压迫工具的旧国家机器，这包括：1) 行政机关；2) 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警察和宪兵；3) 以

切特尼克分子米哈伊洛维奇为代表的流亡政府的残存军事组织，帕韦利奇的乌斯塔什军事组织，以及鲁普尼克军事组织即所谓白卫军。我们是一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确定的原则的精神来进行这一革命工作的，因为我们充分地应用了他们的学说。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从士兵到军官都是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它的指挥员，从军士到将军，全是参加过战争和人民革命的工人、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民兵和公安机关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管理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是由工人、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组成的。经济部门的行政职位主要也是由经过考验的人民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来担任的。因此，的确可以说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我国劳动人民手中。

对此情报局分子肯定会说，这是不真实的情况，是红军解放了我们。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事实证明我国人民政权的基础在1941年就已经奠定了……事实证明，我们自己摧毁了统治阶级即南斯拉夫亲法西斯反动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我们不是在批评我们的人的帮助下，而是在违背他们的政策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事实还说明，在红军于1944年秋季到达我国边境以前，我们自己就已摧毁了旧国家机器。事实说明，我国各族人民把他们自己武装起来了，这样就组成了一支由七十万武装起来的工农组成的武装力量。事实说明，与占领军和卖国贼作决死斗争中，我国成千上万的公民牺牲了。

第二，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宣布南斯拉夫为民主的、联邦的人民共和国。事实说明，我们早在战争时期就解决了民族问题，这就在我国消灭了民族压迫。这是通过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黑山人民共和国、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共

和国、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来实现的。这也是为此目的已奋斗了二十年的我们共产党的事业。我们如此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因此我们的确可以成为榜样。因为在我国，各民族真正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是从所谓领导民族中把某些领导者硬塞给他们。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领导民族存在。如果允许某个领导民族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垄断领导权的强大民族进行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第三，在宣布共和国的成立和通过宪法之后，我们随即完成了最重要的历史行动——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奠定基础，我们把生产资料从私人资本家手中拿过来交到国家手中；我们把一切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水陆运输工具、大庄园、商业，不仅大商业，而且所有商业、旅馆、疗养院等等，全部收归国有。我们把这件事做得很彻底，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企业或矿山或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是掌握在外国或本国资本家手中的。情报局分子关于所谓外国资本家已重新渗入我国的叫嚣，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卑鄙谎言和恶毒的诽谤。现在，当我们在本院通过关于劳动集体参加管理工厂、矿山、铁路等等的决定时，这是对所有诽谤者的最肯定的和最有力说服力的回答。今后，我国劳动人民将通过在他们管理的工厂和企业中发扬更大的创造力，来回答这些诽谤。他们自己将说工厂和矿山等是属于谁的。

第四，我们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富农最多只能保留二十五公顷土地。从国有化的土地、土改时没收富农和教會的庄园和土地中，把七十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贫农。

第五，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中，若不事先创造物质条件，就不能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因此，我们

把政权和生产资料拿到自己手中之后，就开始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创造条件；我们通过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的五年计划。这的确是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正在顺利地执行这一任务。数以百计的新工厂和企业、新铁路、现代化公路、新学校和各种科研机关等等就是明证。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它说明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其他一些法律说明了什么？例如对于一切违犯者均予以严厉惩罚的关于禁止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和纠纷的法律说明了什么？任何法西斯国家有过这种法律吗？此外，关于没收敌人占领时期获得的战利品的法令、关于私人经济企业国有化的法令、关于把敌人财产交给国家的法令（这里所说的敌人，不仅仅指与占领者合作的人，而且包括阶级敌人）、关于把敌人财产收归国有和实行剥夺的法令、关于征用土地的基本法、关于合作社的基本法、关于在农村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法令、关于土地改革和垦殖的法令、关于全部勾销农民债务的法令、关于职工及其家属保险的法令（他们全由国家来保险）、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人民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关于五年计划法”。这些法令都说明了什么？这些法令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我国的全部法律或多或少都是根据这一精神制定和实施的。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法令会使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吗？当然会；同时它们也是驳斥一切对我国的攻击和诽谤的事实。

这就是几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革命和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它们证明我们的道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是成功的道路，胜利的道路。当我说我们的道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时，我并不是说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和所有

国家都必须和我们南斯拉夫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样。不，我们认为，这只是对南斯拉夫来说是唯一的道路。各国的不同经济、文化和其他条件，要求有不同的工作形式。任何现成药方或固定的套套都是不适用的。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作为指南，但是必须懂得如何在实践中以这一科学为指针，把它的精神和它的意义付诸生活。我们在这一科学的基础上取得的经验是最好的学习。自然，别人也可使用这种经验，但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需要看看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已取得的积极结果，然后再寻找取得那些成就的最适当的方法。同样重要的是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消极的现象和结果，并尽力避免这种消极的东西并寻找更好的方法和更好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批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弱点和缺点时，必须首先从存在于该国家的特殊条件出发来提出批评，而不是从他们自己国家的条件出发来进行批评。他们必须看到这些缺点的根源，把主观的弱点和客观的弱点区别开来，然后对主观的弱点给予批评，如果该国的领导人自己看不到和没有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话。我提醒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不犯许多国家（不仅是东方国家，而且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同样错误。

让我们以我们的经验为例。当我们党从国外得到它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指示时，我们党是一个弱小的、人数很少的党，它被内部派系斗争搞得四分五裂，它不仅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脱离大部分工人阶级。但是，从1936年以来，国外的指示减少之后，我们党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当我们准备起义时，我们没有从外面得到指令，而是极据我们对于形势的估计自己作出决定。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错误。我们没有问

过任何人我们是否应当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而是根据我们自己对于形势的估计，在我们看到时机已到时，立刻举行起义。1941年我们在乌日策开始成立我们的人民政权时，我们同莫斯科并没有联系，因此我们能够不受阻碍地奠定我们现在借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始基。当我们1941年撤出塞尔维亚后，开始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旅时，我们并没有请求什么人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未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当时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在我们一旦有可能把这件事通知莫斯科时，他们立即对我们已做的事加以攻击和批评。他们不愿了解我们的起义在一些重要地区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才组织无产阶级旅的。他们不愿意了解我们为此要更加强调工人阶级参加起义和共产党在起义中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实践深信，没有工人阶级群众的参加和实行工人阶级的自我批评，起义是不会成功的。在这些无产阶级旅中，人数最多的恰恰是工人、共产党员和青年。工人阶级把这些无产阶级旅看成是自己的突击队；他们和农民一起解决工人阶级的前途问题。事情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样。那样做并没有吓住我国各族人民，正好相反，它使人民更加信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党和人民更加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并不在乎那种批评，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当我们筹备在亚伊策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我们没有请求任何人允许，因为我们知道有人会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没有搞错。当一切事情都办完时，我们将既成事实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在他们背上捅了一刀。可是，这是我们完成的我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历史性事业，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同占领军和卖国的统治集团即反动资产阶级作非凡的斗争的结果。这样，我们就保证了人民在战争中的胜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果实。可是他

们却把这称作在他们背上插一刀。这种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但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对形势和时机的估计采取了越来越重大的行动。

由此得出我们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不考虑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企图歪曲和按照他们自己意思来解释，或者否认我国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人们，才会这么说。当然，我们有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有时我们却吃了苦头，因为这样做有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首先我想弄清楚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不是什么新东西需要从理论上作解释，不然的话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在现阶段的正确性，或者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的正确性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说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实质可以用几句话来下一个定义：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现阶段的实践，把它同存在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我们说来，这一科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的指针，不论情况是多么复杂。我们力求把这一科学的精神贯注到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去，因为我们深信这是正确的，因为实践已经证实：由于我们伟大导师的天才的科学预见，这一科学的各项原则，在国际发展的现阶段，都是完全适用的。不管有什么借口，任何背离这些原则的做法，都是修正主义和不仅对工人阶级而且对全体进步人类的背叛。

我们自己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在理论上的分歧何在？即使要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来观察他们的实践和我们的实践。这就是：1) 党的作用问题以及党同国家

的关系；2) 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或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问题；3) 国家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让我们先以我国为例。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了新的人民国家机器，没有它，我国劳动人民就不能够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剥夺了生产资料和采取其他许多革命行动。如没有这些行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则是不可思议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①列宁引证马克思的话说，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

列宁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剥削阶级，需要国家作为一个把被剥削阶级即大多数人民置于屈从地位的永恒力量，资产阶级不想削弱自己的国家机器，更不用说国家的消亡了，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它的制度、剥削制度是永恒的和完善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论它怎样披上民主的外衣，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区别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人即剥削者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压迫人民多数并有日益加强的倾向。在我们这里国家虽然有镇压少数剥削者和新南斯拉夫的敌人的任务，但它却在逐渐消亡，因为它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职能，正在逐渐地被转到劳动人民手中去。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当阶级消失，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92页。

当再也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去镇压别人时，国家就会消亡。

在我国，国家消亡的起点在哪里呢？我只举出下面一些例子。第一、国家管理，特别是经济的分散管理；第二、把工厂和经济企业普遍交给劳动集体管理等等。经济以及政治、文化和其他生活领域的分散管理不仅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质，而且包含着中央集权制和作为强力机器的国家消亡的萌芽。这些都是事实，任何到我国来的人哪可以看到这些事实，只要他愿意来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教导我们，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开始消亡。当然，这是说无产阶级应当在各方面都真正掌权。国家的这一消亡首先是从其“经济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到工人集体开始的，不过不是跳跃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可是斯大林在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对于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5—306页。

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公式加上了两个条件,他说: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一个条件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①

紧接着他又说,国家作为“经济的组织看”的职能仍存在着,苏维埃国家对内的职能不存在了,只存在着对外的职能。他说:“这个时期(指苏联发展的第二个时期。——铁托注)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②他接着说:“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末他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国家机关底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③

斯大林就是这样提出国家消亡的问题,就是这样描述苏联在1939年的情况的。在1939年,的确可以说苏联是完全被资本主义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02页。

② 同上书,第705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705页。

国家包围着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邻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无论如何不能说苏联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了。说国家作为武装力量——不仅指军队，而且也指所谓惩罚机关——的职能是针对外国的，确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说法，是完全脱离苏联今天的实际的说法。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提出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呢？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他把党的作用归结为领导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的地位。因此，苏联的党越来越同官僚国家机器融合为一个整体，即日益变得同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一模一样，自己变成了官僚机器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了。因此苏联的党失去同人民的联系，失去了同它有责任承担的那些事物的联系。这些职责是：党作为全部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参加者，作为群众监督的组织者和各种社会活动的直接参加者，用自身的榜样来提高群众的创造热情。把党和党的作用归结为官僚机器，归结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归结为执行各种强制性措施——这一切都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在第一个时期即过渡时期是作为领导者和教育者，而不是强制者的作用的学说。这种死板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被采用，但是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并将严防这一实践在我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科学从未提到要用跳跃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虽然它曾提到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是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整体。这里说的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向共产主义这个高级阶段的逐渐发展。

请看马克思是怎样给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下定义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认为，只要任命最优秀的工人担任厂长和经理，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让信得过的人，把劳动人民的国家信任的人放在这些岗位上，因为通过这种由劳动人民队伍中选拔出来的工人厂长，一方面人民国家能够对于企业的管理进行更好的监督，另一方面这样的厂长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工人的各种需要，并更加关心工人和国家的即人民的财产。这是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时采取的最紧迫的措施。当然，事情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想避免在一个长时期内可能由此产生的许多弊病的话。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工厂归工人”的口号还不能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涌亡的思想也不能实现。

如同我在前面说的，我们应该在这里通过的法令草案，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它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它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迈出了一步。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各项职能还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它们已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它们由于劳动人民被吸收参加管理而削弱了。劳动人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页。

民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全部地获得作为生产者也能管理生产的权利的。为什么劳动人民要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获得这个权利呢？这一过程会延续很久吗？会延续多久？无法回答会延续多久，因为这取决于各种情况。这取决于文化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工人的全面教育，使他们能够为社会的利益在各方面成功地管理工厂、矿山和运输等等。不然的话，工人就不能够实行管理和监督。如不提高文化，工人就不能够全部掌握管理的技术。这还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及其他因素。

因为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我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就更加重要了，而且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国的工业刚刚开始迅猛发展。因此，我国经济管理的所有职能转到劳动人民手中的速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又首先取决于工人自己，取决于他们对尽快和尽量多地生产消费品以及他们对实行节约而不是浪费等的关心程度。

列宁说过：“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是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①

为什么我把提高文化的必要性摆在第一位呢？如果我们看看旧南斯拉夫产业工人的数字、今天产业工人的数字以及明天产业工人的数字，那么，就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是谁正在进入工厂企业和其他企业呢？是农民。就是说，今天有大量的农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9页。

民、半农民进入企业，首先必须把他们训练成工人，然后把他们教育成工人管理者。这既不是一件短时期内能完成的轻而易举的事，这是必需以最严肃的态度、耐心和精力来进行的工作。在教育这些新工人方面，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做不少的工作，来消除很大一部分工人脑子里存在的关于他们作为工人的职责，关于他们对国家财产即人民财产等的态度的种种错误思想。

我们只举一个事实为例：我们是在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如波斯尼亚、桑贾克、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利卡、黑山等等地方建设许多工程，甚至是最大的工厂和矿山等。在这些地区，迄今只有很少的工业，或者几乎完全没有工业。是谁将在这些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里工作呢？是来自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这些落后地区贫苦农民应该到这些工厂和矿山去工作，他们将会这样做。他们将从世代处于最低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贫苦农民变成有觉悟的工人，变成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建设者。这将不会是一个轻易的和迅速的过程。我们懂得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把一个半农民半工人教育成为有觉悟的、守纪律的产业工人是多么艰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向这些半工人反复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将不仅成为工厂、矿山等的生产者，而且还将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进了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也就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的那一小块贫瘠土地永远不能使他们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而能使他们比他们的祖先们生活得更好的，是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为什么这些半农民一半工人必须变成有觉悟的产业工人呢？之所以必须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正在建设许多工厂和企业，愈来愈多的矿山要开

工,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使它更加富足,使我国全体公民能享用尚未开发的财富,以便使人民能够利用这些财富等等。为了使这些工厂、矿山等等能够开工,我们需要能够掌握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人。半农民是不能够掌握这种先进技术的,他们更多地想到他们那一小块贫瘠的土地,而很少想到已经不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公共财产的先进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由资本家或由忠心于他们的高薪厚禄的职员和官僚们来管理,这些人只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即只关心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给资本家,这些官僚们当然也因此得到一些好处。今天在我国是由工人管理这些工厂和矿山。他们将自己决定如何进行工作和工作多少时间,他们会知道他们为什么工作,他们的劳动成果要用到什么地方。为了在全国各地甚至在落后的地区实行这一制度,必须坚持不懈地克服落后状态,使半农民提高到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他们将懂得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义务和权利。

由此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等到全体工人都成为一样聪明和一样能够管理企业的人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就要无限长久地等待下去。在管理过程中,在管理工作的不间断的过程中,全体工人都将获得必要的经验。他们不仅要熟悉工作过程,还要熟悉本企业的所有问题。劳动者自己通过实践能够学会如何登记造册,懂得可以消耗和节省多少材料,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如何使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即把剩余劳动用在什么地方。他们将懂得他们企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以作为总计划积累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拿出多少剩余产品来提

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应当懂得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多快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他们无条件地必须懂得劳动纪律，因为从劳动者承担起参加经济管理的责任的时候起，劳动纪律的问题就成为他们首要的职责。

对劳动集体的委员会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使劳动力的分配尽可能合理，不允许不必要的和不利生产的劳动力呆在他们的工厂里。这就是说，不允许在行政机构中有官僚主义，否则就会提高生产成本和降低企业的赢利，从而损害整个劳动集体。必须懂得区别什么是对专门人材的需要，什么是多余的、非生产管理机构。

把工厂、矿山等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防止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传染病在我们这里发生。这种传染病极其容易地和迅速地从资产阶级社会传染过来，而且在过渡时期是危险的，象水螅一样用成千上万的吸盘吸住并阻挠正确的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这恰恰是因为它悄悄地渗入了社会活动的各方面，人民在开始的时候是觉察不出来的。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国不是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错误的。它已经钻进各个机构、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去。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为此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官僚主义。光用运动的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和教育人民。

列宁说过，技术和文化的落后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最肥沃的土地，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应如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才是最容易的和唯一能够取得成功的办法。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现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

这是由于列宁所说的文化落后造成的，管理工作官僚化的危险也就在于此。

从列宁的话中可以看出，官僚主义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地方容易滋长。这些话最清楚地向我们指出我们应当到哪里去找官僚主义的根子。难道这不是表明，恰恰是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有监督和坚决反对一切官僚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地方，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东西的地方官僚主义最盛行吗？官僚主义是不能单靠上面的命令来根除的，每一个有觉悟的人必须在日常实践中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不应认为官僚主义只会高级机关滋长而难以渗入下层机关。如果不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它就会渗透到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经济行政机关。当然，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来，如果从最高级的机关到最基层的机关都沾染上了官僚主义，如果最高机关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那是一个悲剧。为了成功地消灭官僚主义，单靠在上面靠最高主管机关采取措施而在下面则认为没有这种危险，这是不够的。我们的经验向我们表明，它在下面同样是很危险的。因此，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56页。

共和国、地区、县的行政机关中，在各种商业和其他经济机构的行政工作中，官僚主义都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不能让这种对社会主义有害的现象蔓延开来。

今天，当不只是国家行政机构而且是整个经济都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人民有权对那些被任命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们进行监督，行使他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职责。将要管理工厂、矿山等等的劳动集体和它们的委员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不允许在管理工作中使用官僚主义的方法。

工 会 的 作 用

在劳动者参加管理经济的新情况下，工会的作用有了某些变化，因为现在工会的职能主要是因向工会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全面提高他们的文化。工会工作的方向是：通过工会的努力工作并在党的领导下，使新进厂的工人，即从前的农民尽快丢掉小私有者的旧习，尽快地提高到以新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生产资料、对待工厂和矿山、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的最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必须尽快教育这些新工人，使他们成为不屈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成为全体劳动人民更美好和更幸福生活的建设者。

随着工人参加管理企业即管理生产，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任务总的说有所削弱。因为现在工人们通过自己的委员会即通过生产管理委员会自己来决定这些事情。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工会的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必须保护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必须考

考虑到人民国家的利益,全局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工人在管理生产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全部问题,包括积累、生产消耗以及经理或者原管理机构和工会曾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各种困难,工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了。无论如何这将大大有助于加强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劳动纪律。

从这一法令草案可以看出,劳动者用最为民主的方法接收自己的管理职能。工厂、矿山和企业的职工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工人委员会。工会必须全面支持这些工人委员会及其委员们从自己当中所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管理委员会还必须包括该企业职工工会的会员。它们因此也负担起它们应负担的管理的一部分责任,而不是作为没有任何责任和职权的谘询机构。

这一法令是我们迄今提出的最为民主的法案之一。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让我们看看工人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利吧。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工人委员会批准企业的基本计划和最后帐目;对企业管理和完成经济计划作出决议;选举、罢免和撤换企业管理委员会或其个别委员;在上级经济组织或主管国家机关的同意下,拟定企业各项规章;讨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就批准该报告作出决议;讨论管理委员会的各项措施,并对此作出决议;对留给企业即劳动集体支配的那一部分积累进行分配。”

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企业管理委员会的职责:“企业管理委员会提出对企业基本计划的建议;拟定每月执行计划;关心企业的经营是否正确;拟定有关企业内部组织的计划和关于劳动岗位系统化的建议;草拟企业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措施加强劳动纪律;决定企业行政领导人员的任命;对职工提出有关解雇和分配工作方面的

申诉作出决定；采取措施来增加企业生产，特别是促进生产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厉行节约，减少废品；决定有关企业的工作定额问题；决定评选突击手，并处理合理化和革新的建议；采取措施提高职工的技术，并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劳动岗位；关心企业劳动关系、薪金、工资、职工晋升、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企业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条例的正确实施；通过企业职工年假计划；采取措施来保护和正确利用企业管理的全民财产，并制止和消除对全民财产的损坏、浪费和其他恶劣的态度。

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计划和正确经营企业。

法令的这两条规定说明哪些生产职能转交给劳动集体。这些职能从前是由国家履行的，是通过它的代表并由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参加的情况下来执行的。

从今起，工厂、矿山、铁路等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象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形式。

这就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是有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唯一正确道路。让情报局分子记住，他们诽谤咒骂无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

另一方面，关于劳动集体即劳动人民参加我国经济管理的这一法令，对于哪里有真正的民主，即是在我国还是在大肆费扬和歌颂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回答。在我国，民主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物质基础上。群众感觉到这种民主，并正在利用这个民主来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建设美好和幸福的未来服务。对于那些大谈特谈我国没有真正的民主，说我国是一个警察

国家等等，以及常常喜欢谈论我们缺乏物资和我们缺少这个那个的西方人士，这就是一个回答。诚然，我们还缺少许多东西，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制造足够的工具，还不能够生产足够的各种消费品和其他足以使人们生活更美好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但是，我们正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而且我们将为所有人这样做，而不象西方那样仅仅是为了少数人。在西方，商店里堆满了应有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呢？在那里谁能够满足他们自己购买这些东西的愿望呢？只有很少数的人。只有统治阶级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却不能。因此，那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因为赚得的钱只够糊口的劳动人民或失业的工人和职员从这种民主中得不到任何东西，这种民主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果实，但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以便使他们有能力供养其他人并保证这些人能过富裕的生活。但是，我们是在努力使所有劳动的人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这就是我国民主的物质实质所在。

我们认识到，在我国工人克服了由我国的落后所产生的一切困难以前，我们总会有很多麻烦的。但是，我们相信，我国劳动者将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因为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而且只有依靠他们自己顽强的、自我牺牲的创造性努力，这一切才能实现。

我国人民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对劳动人民和我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是人民的政权。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和建设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使我国工人幸福，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城乡劳动者自己就是今天和幸福未来的主人。那时人们不需要象现在这样紧张地劳动了。这个美好的未来什么时候会来到，取决于我国城乡劳动者自己，取决

于他们的顽强精神、自我牺牲和毅力，取决于他们如何鼓足干劲，取决于更少的人袖手旁观，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争取实现五年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生产更多和更好的消费品的日常斗争是否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自己管理自己的合作社的农民们和从现在起自己管理自己工厂的工人们，今天已经真正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译自《铁托专题文选》塞文版第4卷）

同英国国会代表团成员的谈话

1951年5月24日于贝尔格莱德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们。你们是受欢迎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在我国所到之处都会亲身看到我国各族人民对英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好感。先生们，这是因为我国人民很善于判断谁是他们的朋友，谁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国人民从近三年来东方国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封锁和千方百计的威胁中尤其能够看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些艰苦的时刻，他们不仅得到英国人民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他们的物质援助。

我国人民记得很清楚，我们两国在最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国，遇到类似的困难，遭到巨大的牺牲。因此，今天我们两国人民都为争取保卫和平与和平合作而斗争，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如果我说我们今天正处在新南斯拉夫和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进一步加深和巩固的最好的道路上，那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两国人民相互联系和相互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愿望，定将保证这种关系是友好的，是持久的。

你们在我国所到之处可以看到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只是希望世界上有和平，以便能够在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更美好的生活。

先生们，当你们回到英国的时候，请你们介绍我国人民对英国

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感情，并转达我个人和我国人民向英国人民的最热烈的祝愿。

(译自《铁托言论集》1959年塞文版第6卷)

就美国结束对南斯拉夫 援助发表的声明

1951年8月11日《战斗报》

我想就美利坚合众国向我国人民提供援助讲几句话。运送援助食品的最后一艘货船抵达时举行了庆祝集会，我没有参加，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表示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旱灾的时候，向我们提供了这一援助。我国人民高度评价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我国这一友好的表示和行动。尤其是，这样的援助不是头一回，因为战事一结束我们就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大量援助。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讲过了。此外，在给我国提供经济援助方面，我们得到美国政府，特别是杜鲁门总统先生的谅解，我国人民对此也表示赞赏。

借此机会，我还想说，我不同意西方某些报纸的观点。它们写道，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是合算的冒险。在西方报刊上，这种说法不是普遍的，而是个别的。但是，这对我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具有侮辱性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美国政府向我国人民提供援助，是因为它认为南斯拉夫人民需要这一援助。南斯拉夫人民也受之无愧，这不仅是因为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法西

斯主义侵略的世界大战中是美国的盟友，而且因为今天我国人民站在争取和平的力量一边。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永远会站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一边。

我想，美国政府正是首先考虑到这一点，才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的。

我们之所以赞赏所得到的援助，尤其是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援助同政治或其他性质的某种条件联系起来。如果那样做，势必会损害我国人民的尊严和威望，同样也会损害美国人民的尊严和威望。我认为，这正是我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更密切合作的最正确的途径。

最后，我想对在这里观察援助计划和分配计划执行情况的观察员先生们，特别是理查·爱伦先生表示感谢。他总是向美国客观地报告援助分配的情况，使得援助畅通无阻地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同样要感谢爱伦大使先生，他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使我国获得这一援助……

我还想补充一点，不仅我国领导人，而且我国全体人民都希望尽可能少地寻求外援，因为在这种援助中包含着别国人民的劳动。我们首先希望尽最大可能自力更生，就是说，为了不必寻求外援而竭尽全力。这是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不愿意靠别人生活。一旦有了较多的资金，我们也会帮助别人。但是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首先取决于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从而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总之，我们的原则也是帮助他人，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国际援助才能排除妨碍和平合作的因素。这是避免和制止战争冲突的最好途径。帮助经济落后国家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应该说，我对记者们在损纸上所发表的感想的客观性基本

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应该说,记者的客观性——特别是美、英、法以及我国想与之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和其他关系的西方国家的报刊记者的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对形势的客观看法、对我国发展的所有情况看法,可以大大地促进关系的改善并排除可能阻碍正常关系的许多误解。我认为,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在国际紧张局势的现阶段,特别是在南斯拉夫,记者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涉及所有的记者。我谨借此机会向在南斯拉夫的美国记者说这一番话。

(译自《铁托言论集》塞文版第6卷)